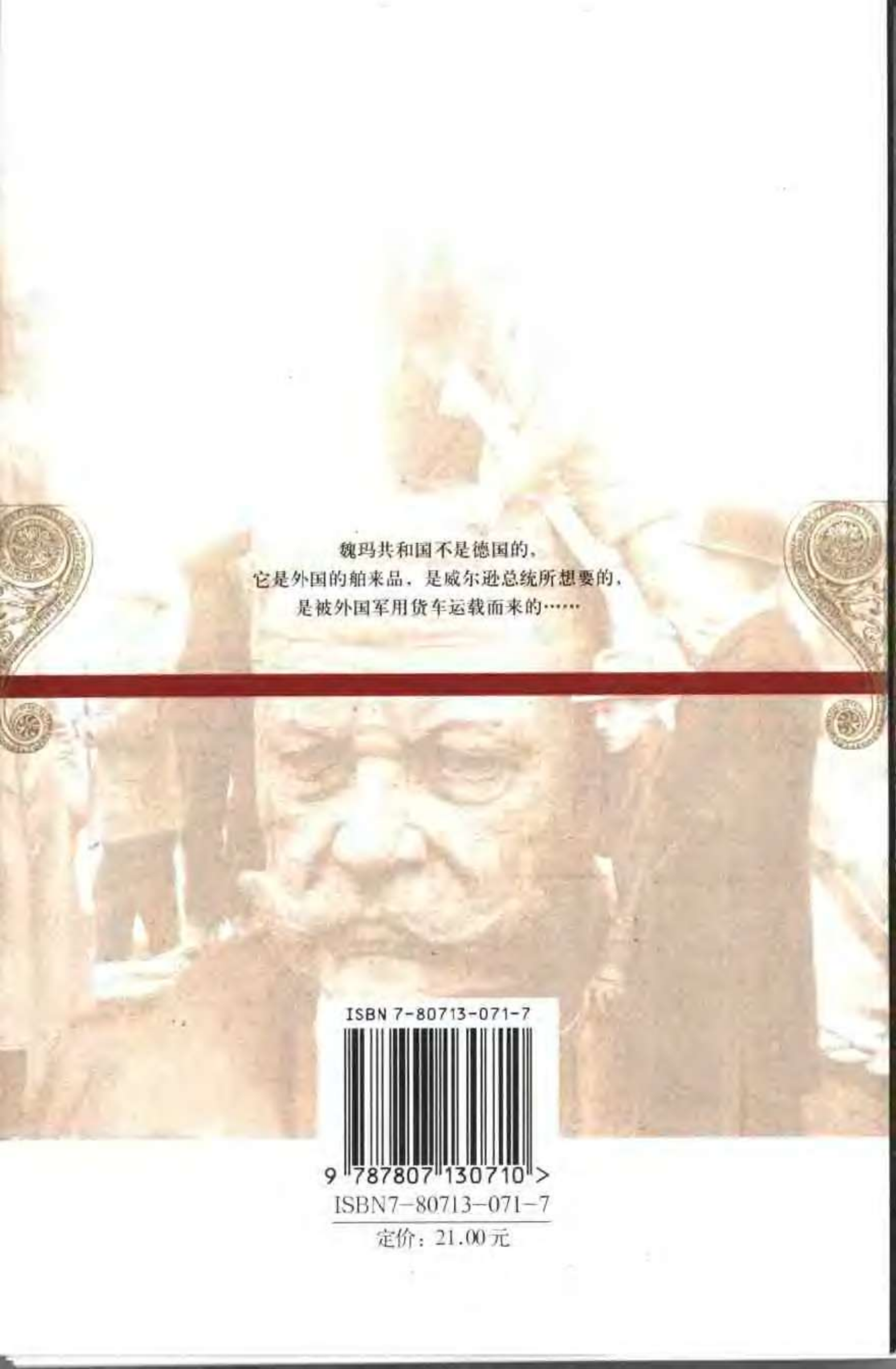




魏玛共和国时期 的德国

(1919~1933)

李未 译
〔法〕里昂耐尔·理查尔 著



魏玛共和国不是德国的，
它是外国的舶来品，是威尔逊总统所想要的，
是被外国军用货车运载而来的……

ISBN 7-80713-071-7



9 787807 130710 >

ISBN7-80713-071-7

定价：21.00元



日常生活译丛

魏玛共和国时期 的德国

(1919~1933)

[法] 里昂耐尔·理查尔 著

李末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 / (法) 里昂耐尔·理查尔著;
李末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2

(日常生活译丛)

ISBN 7-80713-071-7

I. 魏 ... II. ①里... ②李... III. 社会生活—
史料—魏玛共和国 (1919~1933) IV. K51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3989 号

责任编辑 吴金彪 刘 霁

装帧设计 王 芳 王 钧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98470

市场部 (0531) 2098042 (传真) 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8.5 印张 65 幅图 201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6000

定 价 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几年前，有机会读到由著名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五卷本《私人生活史》，闲暇时翻看翻看，也用不着特别认真地去读。隔了岁月的灰尘，过往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点滴像一颗颗泛黄的珠子，擦拭一下，还能映照出昔日真实的光泽。

以往书写的历史，常常是一部“公共舞台”史，一部男权的统治史。帝王的光环下，透见的往往是刀光血影，伟大辉煌的年代，记载的常常是战争。而人类个体所赖以生存的“私人”空间，却因为“不登大雅”而被忽略，被掩盖，被抹杀了。

就我们所知，“私人生活”这一概念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私人”相对于“公共”，趋于日常，富于偶然。这是一个免除干扰、自省、隐蔽的领地。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扔掉他在社交场合必备的面具和防卫，可以放松警惕，可以随心所欲，可以身着“宽松的便袍”脱去在外面闯荡时穿戴的坚硬铠甲。拿米兰·昆德拉的话说，私人的空间，虽然是日常的，不完美的，不定的，有



时甚至是虚无和邪恶的，但这是一个有可能导向“欢乐之完满，自由之完满，存在之完满”的世界。然而，因为私人生活总发生在深墙内院，关着门，上着锁，自然也就有其封闭性。乔治·杜比指出，19世纪的资产阶级竭尽全力想捍卫这堵“墙”的完整性，遮蔽墙里的一切。但这堵墙内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生活，最真实的自我，有不见刀光的争斗，有不可言说的离合，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因为各种利益和需要交错成一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如何穿透这堵有形又无形的高墙，真正进入私人生活的空间，并勾勒出其历史的真实面貌？如何在其变化中确定岁月所覆盖的现实？如何既准确无误地抓住主题，同时又不迷失方向，避免陷入纯粹个人的私密生活迷宫，而失去对历史精神和文化内涵的把握呢？面对这一个个疑问和难题，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忠实描述，致力于还历史一个原样。我们给读者推荐的这套“日常生活丛书”，便是这一领域最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不久前，葛兆光先生在谈文史研究学术规范的一篇文章中谈道：现在编的各种历史书，至少经过了“意识形态”、“精英意识”、“道德伦理”、“历史编纂原则”四道筛子的筛选过滤，诸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等等重要内容在书写的历史中被省却；经过层层染过的修饰，历史的底色隐而不见了。他认为，要透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到历史的底色，找回那些被省略的、被删减的东西，尽可能接近历史原来的面貌。这不仅需要史学严谨的考据，还需要对生活必要的体验和想象。葛兆光先生的这一观点与我们推出的这套“日常生活译丛”的主旨不谋而合。在我们看来，以往我们所阅读的西方历史，确实如乔治·杜比所说，大都是“公共舞台”的历史，也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是经过层层装饰过的难见历史原貌底色的历史。而深入“私人生活空间”，着眼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想象和感觉的史料和文献非常少见。通过对这套丛书的译介，我们至少多了一分可能性，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被“大写的历史”或遮蔽、或过滤、或忽略、或排斥的“小写的历史”的某些真实侧面。

法国阿歇特(Hachette)出版社出版的“日常生活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大型丛书，可谓内容丰富，色彩缤纷，加之作者们近乎散文化的笔调，在为广大读者剥去“大写的历史”的装饰、还原历史原貌的同时，常给读者带来阅读的



欣喜和发现的愉悦。在阿歇特出版社已经推出的这一系列百余种图书中，我们有目的地选择了其中的30种以飨中国读者。神游历史、穿越时空，我们一起去结识古希腊的妇女、最早的基督教徒、乌托邦的追求者；去看一看国王的卧房、艺术家的斗室、士兵的营帐、百姓的平常日子；去体验一下官墙内的沉重、美丽下的丑陋、炮火后的悲怆、辉煌中的黑暗。

从卢瓦河的城堡到蒙马特高地的广场，从帝国鼎盛时期的罗马到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从古希腊诸神的游戏到爵士乐手叛逆的鼓点……走过文字书写的历史，市井街巷、深闺内闱、宫廷豪宅、寻常人家，只要你用心去看、去发现，就会有别样的感受，就会有意外的收获。

许 钧

2003年4月16日于南京大学



前 言

1932年初，安德雷·西格弗里特在一次旅行后回到德国，他注意到，1918年的危机在那里引起了一场变革，不幸的是，法国很少有人能权衡出它的意义。^①如果说新的德国共和国是随着1919年8月11日宪法在魏玛颁布而正式诞生的话，那它其实就是直接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若没有这次战争的外交后果，若没有这次战争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德国本土上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也就没有魏玛共和国。

正因为如此，为了指出魏玛共和国的深层起源，在我看来，有必要上溯到德国濒临失败的时期。但我并不力求根据一个编年故事来讲述那些事件。我曾提出过一个想法，认为人们在其社会多样性里可以拥有其有利形势，并指出他们是怎样让它存活下去的。对于革命战斗、对立矛盾和后来的内部斗争而言，我采取了相同的观点。我曾试图描述这个领域，在该领域，另一个德国从物质和精神上注定了要建立其基础。

这样一种安排在我看来尤为不可或缺，何况德国人民从1917年前后开始共同经历的那些事件使他们的精神状态动荡不安。当失败已不容置疑时，他们对军事原因的兴趣并不大^②。每个人都倾向于按照其政治热情的意愿，对非常简单的解释感到心满意足：政府官员无能，缺乏方法；军队被动，内部叛变。绝大部分德国人的烦恼在别的地方，那便是失败之后所带来的结果。无论他们所设想的解决办法是什么，这是长期的心理震荡，因为有新的事件保

^①安德雷·西格弗里特：《德国》，《已阅》，第213期，1932年4月13日，470页。

^②例如可参见弗里茨·斯特恩：《关于19世纪到20世纪德国政治文化的非自由主义政治研究之失败》一书212~228页中的“魏玛的崩溃”，普罗皮莱恩出版社，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1974。

持了它：边界的改变，鲁尔区被占领，必须为其所造成的损失而给协约国赔款的经济负担。对现在的忧虑和对未来的恐惧于是在德国变成了集体现象。

在我看来，在意识里所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与历史环境分开的，反过来说，历史环境是在意识里的延伸，它给世界表象强加上一些动力线，而我只在这个意义上来关注它。

短短的14年，魏玛共和国所处的社会背景却呈现出多么矛盾的场面啊！它没有经历过一个持续的渐进发展过程，而是在一些极端情况中转来换去。直到1924年初，正是通货膨胀，失业率的增长，在1923年最后一个季度，影响到了就业人口的1/4。然后是美国于1924年资助的1.1亿美元以及美国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所制定的计划，使得生产力提高、失业减少，不仅让德国工业不断集中，还给了它一个繁荣的外观。1929年末，一切都随着经济危机而崩溃了。1932年在影响就业人口44%的失业之中结束了，就业人口里只有1/3的人拥有一份全日工作。

1919年，人们可没有预见到这条路，经济混乱和社会恐惧在那时被归咎于战争、失败、革命、投机商人、罢工。可是这些矛盾没被置于新生的共和国中心吗？

而且，在它的每日生活形式中，这个新德国也不是空穴来风。它收集了它之前的所有传统遗产，尤其是霍亨索伦王朝的遗产。在大多数家庭里，每日的晚饭就只是几片黑面包，加一点乳酪或猪肉。人们睡在没装花边的床上，盖一床鸭绒被，罩着一个床罩。所有这些都绝非臆造。

由于这些习惯本身并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德国文明，我就不多加注意了。我所说的不是——那完全是另外一本书的目标——要描述德国人的整体社会习俗。我是想指出，一个特殊时期给他们所带来的东西有怎样的独特性。魏玛共和国是个新国家，这个国家在其国界中、组织里、文化里，都是新的。

教育、性文化、建筑、戏剧、电影，所有这些领域里的成果和经验何其多！由于不得不在只言片语间揭示如此广泛的内容，我并不总能进行详细的分析。无奈，我只好时不时仅限于很快地指出一些现象，仅限于挑起人们的好奇心而去阅读其他资料，去进行其他的研究。

至于小说、戏剧、电影，我并不是不知道，比起我曾记录下的巨大生产



量来，它们更是品目繁多。然而我的目的不是写一部德国1918至1933年间的艺术史。我必须只谈论产生过社会影响的创造者及其作品，这些作者和作品在日常生活中或时代知识环境中拥有着人们的敬意。

诚然，这是很相对的事情。在这样或那样的德国公民的日常生活里，罗伯特·穆西尔的《无优点的人》、海尔曼·布罗赫的《梦游的人们》^①、马克斯·贝克曼的画或者阿诺德·勋伯格的音乐也不是不可能代表一种基本的忧虑，并永远将之铭刻在其生存方向中。作品与岁月在很大程度上十分相像，但幸好，它们也有区别。

我努力想传达的，说到底，是一个时期的气氛，是它的生活背景^②，是希望与辛酸，是雄心与幻灭，是紧张与恐惧，它们横穿过一个又一个社会群体。



^①仍然要注意的是，罗伯特·穆西尔和海尔曼·布罗赫虽然是奥地利作家，但他们的作品是在德国出版的。

^②这目的与其他人的完全不同，比如与瓦尔特·拉科尔在《魏玛1918年~1933年文化史》一书——魏登费尔特与尼科尔松出版社，伦敦，1974（乔治·列贝尔法译本，罗伯特·拉封出版社，巴黎，1978）——中所追求的目的便不同。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战争的终结与帝制的终结 1

苦难，饥饿 1

从全民一致到逐渐的破裂 5

广泛的反战运动 11

神奇元帅 14

民主的要求 15

投降与革命 17

第二章 魏玛共和国及其难产 19

一场革命，两个共和国 20

镇压革命 24

坐在证人席上的作家与艺术家 29

制宪议会选举 32

一个历史景点：魏玛 35

天生脆弱 38

难以克服的矛盾 42

第三章 昔日空间与新的国界 43

新的国界 45

心理效应 47

城市与乡村 53

霸主柏林 57

中央集权 60

第四章 混乱、矫正与危机重现 63

幻想破灭，信心不足 64

失业率的增加 67

数字旋风 70

习俗的改变 73

投机与排外 76

受害者与受益者 77

相对的繁荣 80

一次前所未有的失业 83

恐怖之征兆 85

第五章 各结其社 89

民族主义者与民族种族主义者 90

所谓的国社党运动 94

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 100

政治或是宗教，大量宗派 110

青年运动 117

走向军事化社会 118

第六章 从小学到大学 123

新教育法的努力 124

有限的改革 128

为有工作之人而设的授课机构 131

在中学机构里 133

保守的高水平大学 136

第七章 衣、食、住 145

传统居住环境 146

各种各样的贫困 150

新的建筑 153

日常饮食 155

传统服装与国际时尚 157

第八章 休闲与娱乐 161

爵士乐节奏与休闲美国化 161



- 综艺性场所 164
- 轻歌剧与时事讽刺剧 166
- 夜总会时尚 167
- 一种群众性娱乐活动：电影 174
- 音乐会、戏剧表演、读书 178
- 现代舞、广播、游山玩水、体育 181

第九章 知识分子环境 187

- 几个文化活动中心 188
- 乡土崇拜 191
- 右翼观点的势力 193
- 左翼的动荡 199
- 表现主义的死亡与新的客观性 203
- 大胆的探索 206

第十章 一次剖析的素材 211

- 帝制遗产的势力 212
- 欺骗性外表下的民主 213
- 远非公正的法官 214
- 走向第三帝国 216

附录 219

- 大事年表 231
- 人物简介 249
- 译后记 257

肉屑。烟叶自1915年2月起就开始限量配给，到1918年就只是掺了85%干山毛榉叶的混合物了。

营养不良明显使得疾病更易发生。在法兰克福，结核病死亡率从1914年的11.9%上升到1917年的17.3%，在柏林，1916年有许多人也是死于结核病，与前30年的总数一样多，那时人们才刚开始能够治愈这种病。在学校里，全班的学生都会患上疖子。伤寒和霍乱病人也突然出现。1918年流感横行，成千上万的儿童、妇女、老人因此而死亡。

至于江湖郎中，他们的生意可火爆起来了。一些半路出家的化学家向大众提供神奇产品，以弥补卡路里的不足。一个庞大的代用品工业发展起来了。一些发明家、专家、医生、教授将平生所学全都投入到制造人造维他命的工作里。最著名的发现之一是属于哈贝尔教授的，他使得人们可以使用麦秆来替代面粉。甚至健身学校也应富裕家庭的意愿面开放，在那里，通过做一些适当的吐纳气功，便可以尝试着更容易地守斋挨饿！

从全民一致到逐渐的破裂

面对这所有问题，1914年8月初曾攫住德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开始冷却。时代已不是在运兵车上用粉笔写下“再见了，让我们相聚在巴黎的大道上吧！”的时候了。1914年曾停工24次，有1000多人响应，到1917年，停工达600次，竟有60多万罢工者。他们当然首先是因生活条件恶劣面罢工，但也表明这是一场反对战争的运动。

很快，曾经被一种狂热推动着、在柏林街道上近乎疯癫叫嚣的神圣联盟，已不再对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意义了。对于贵族、职业军官和一大部分资产阶级来说，它意味着吞并，意味着领土征服。相反，工人群众之所以参加进来齐唱好战之音，首先是为了保护受到威胁的民族。这些事件在他们看来实际上是对外来侵略的回应。当俄罗斯针对奥地利而发布动员令之后，1914年7月31日，皇帝便宣称道：“有人把剑放到了我们的手里。”

所有政党无一例外地认为威廉二世说得对。他当然获得了保守党、国家自由党——这两党代表听命于国家的社会阶层——以及工业家、乡绅、高级

军官的拥护。社民党一般都是跟着工人群众走，也表示赞成。同样还有进步人士，包括一部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最后是势力很大的中间派天主教政党中央党，其左翼由基督教工会的工人们所支持，更靠近社民党一些，但它的方向被由公务员和上层神职人员组成的另一翼控制着，站到了保守党和国家自由党的沙文主义立场上。

战争还受到了一个强人组织的煽动，它没有议会席位，可对精英们却具有诱惑力：泛日耳曼团。它成立于1894年，反对犹太人，反对斯拉夫人，反对各领域内的社会主义者。它呼吁日耳曼民族团结起来，提倡为了保卫德国，必须吞并周边小国。它认为，战争不是破坏性的，而是拯救性的，生成性的，可以改善人性。通过阿尔弗莱德·胡根伯格——创建克虏伯数家工厂者之一，同时也是其领导者——该团与一些企业家建立了联系，像施廷内斯、奇尔多夫、洛伊什和波尔斯西，他们都赞同其吞并方案，从比利时到乌克兰。

对于这种全民一致，大部分记者、作家、教授、学者竟都不愿与之保持距离！长久以来，他们因为赞成帝国主义者所兜售的观点而著称，比如很成功的小说家古斯塔夫·弗伦森或路德维希·冈克霍夫。不仅是他们，而且还有许多原本与政治保持距离的人，甚至连曾因具有批判精神而享有盛誉的人也成为其中一分子，比如自然主义这一代作家，尤其是格尔哈特·豪普特曼、海尔曼·苏德尔曼、理查德·德梅尔。

Helft uns siegen!



zeichnet
die
Kriegsanleihe

德国战争海报，“助我们胜利。”

在歌颂民族主义的洪水之中，有一首歌的歌词是由曾获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格尔哈特·豪普特曼创作的。这是一首骑士歌。先是一个法国人想蹂躏德国人，接着来了一个俄国人，最后是一个英国人，但美丽而勇敢的德国人没有退让，她也不会退让，哪怕敌人是9个而非3个。因为照看着她的有上帝，有皇上，有德国军队！……至于理查德·德梅尔，他更是说到做到，他曾要求上前线，只是已过了编入军队的年龄界限。

在圣彼得堡、巴黎或伦敦发生了与柏林那



边相似的爱国游行，而且也不乏用言辞来为消灭德国这个宿敌的观点而辩护的作家，在法国只举出莫里斯·巴雷斯和保罗·布尔热就够了。但在德国，其独特之处是，所有脑力劳动行业全都毅然投入到这场狂热运动中。在他们声称受到拉丁“文明”威胁的德国“文化”面前，诗人与思想家们站了起来。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曾因看到个人与人民被相同愿望团结在一起而欢呼。常被看做一个唯美主义者，《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著名作者托马斯·曼——他有几年和兄弟海因里希·曼闹翻了——曾向团结强大的德国民族致意问候。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麦纳克乐于评论说，政治与文化分家的时代真正一去不复返了。



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

自1848年以来，德国的集体热情就没再经历过如此的飞跃。长久以来，重大国家问题不再和这种毫无歧见的热情一起处于知识分子的辩论中心了。1914年10月的头几天，所有德国报纸都刊登了一份呼吁书，93名著名人士否认德国原本希望看到战争。他们的宣言严词正告说，不，德国人不能做那些被人指责的野蛮暴行！在呼吁书下方，签名的人有历史学家和神学家，有画家马克斯·克林格与马克斯·里伯曼，有科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马克斯·普朗克、威廉·略恩特根，有建筑家彼得·贝伦斯，有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

在拒绝签名的极少数人里，有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当柏林生理学家尼科莱建议发布一篇《致欧洲人呼吁书》作为反宣言时，他的同事中只有三个人敢于与他联手，其中一直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但是一个和平



兴高采烈地踏上战场的士兵。

主义组织诞生了，即新祖国团。该团于1916年被禁止活动，借口是它与一些外国人——比如说与罗曼·罗兰——保持联系，并且与一些敌国保持联系。一向冷静的诗人莱纳尔·玛丽亚·里尔克在这种狂热的环绕下也昏了

头，清醒的头脑稍晚一点才又完全回到他身上。他在德国动弹不得，于是在法国暂时居住期间，到莱比锡作了一趟旅行，他先是体验到一种局促之情，感觉自己退缩在喧嚣纷乱的后面。然后，他乘火车前往慕尼黑，与士兵打了交道，分享周围的喜悦气氛，在欢呼的人群中振奋不已。他看着前来火车站庆祝上兵出发的农民农妇，十分激动。^①

斯蒂芬·乔治的学徒圈子也同样沉溺于民族主义的昏乱之中。而他们的老师则与之保持着距离，倒不是因为他曾于世纪末常和法国象征主义者相往来，并将波德莱尔的作品翻译成德语，更多的乃因他是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下做这些事，他打心眼儿里就不同意那种好战政策。在他看来，只有诗才值得积极地活下来。但在他所选用的少部分诗中，其构想无论如何还是曾竟至转而主战。弗里德里希·衮多尔夫——后为海德堡大学著名教授——因此曾反对罗曼·罗兰于1914年9月所发布的著名呼吁书，该呼吁书称赞了欧洲精神为和平而出现的团结，即《超越混乱之上》。他回答罗曼·罗兰说，凡足够强大而可去创造者，也应足够强大而可去毁坏，德国，不管怎样，是惟一能保证欧洲精神复兴的国家。

大量的爱国戏剧浸没了剧院。海报上，有一些很有说服力的标题：《露

①真不过是一时糊涂。1915年被流放了几个月后，里尔克很不情愿地给夏尔·维尔德拉克写了一封手足情深的信。1916年1月末，他给罗曼·罗兰拍了一封电报祝贺他的50岁生日；他为没能避免战争狂热而感到懊悔。



营》、《七个对两个》、《德国心脏如何跳动》。对三十年战争和1813年解放战争的歌颂被重新编排上演。报纸在整个栏目里只对赞扬仇恨与复仇的人开放。被以手抄本方式传抄了数千份的最著名的诗，是《仇恨英国之歌》。它讲了什么？对俄罗斯，对法国要以子弹还子弹，以拳还拳，但对于英国，还得加上7000万德国人心中的仇恨，团结起来！恩斯特·利扫尔，这部不朽作品的作者，本是犹太人。1933年他被迫移居国外后，意识到沙文主义能走到怎样的致命疯狂，这时他对以前所写的东西感到后悔了。

一位犹太裔德国人参加到1914年8月的集体歇斯底里中，这没什么特别的。

这种参与在今天显得很奇怪。怎么解释呢？反犹太主义在德国由来已久，它在1914年就 and 以前一样很流行。第一个公开宣称要进行反犹太战斗的政党是阿道尔夫·斯托克牧师的基督社会工人党，始于1878年。1879年，记者威廉·马尔建立了一个反犹太团。1881年，伪哲学家欧根·杜林声称建立了反犹太主义的“科学”基础，还揭发出一种荒诞的“犹太人支配状态”。由于某些犹太人在19世纪下半叶获得政治自由后，选择了在报刊上进行活动，俾斯麦已习惯于用“犹太人”一词来指反对派记者。但正如他们其中一人——泰奥多尔·莱辛——在1890年所写的那样，犹太人一般都表现出极热烈的德国式情感，他们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对他们的德国人资质提出哪怕是一点点怀疑。而对于很多人来说，战争恰恰是证明他们属于德国民族的机会。^①因而在其《未



1915年的一幅漫画形象地反映了德国的野心。

^① 参见纳胡姆·戈德曼的《犹太悖论》，斯托克出版社，巴黎，1976，28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知识分子们更多的是揭露普鲁士军事主义。然而，我是在德国受的教育，所以我是一个德国爱国主义者。而且，对于全世界的犹太人来说，事情很简单：沙皇俄国是犹太人和犹太教最大的敌人。可是德国人反对俄国，因此我们都是亲德国的。我个人的学习经历使我的这一观点更为加强了，我的文章都倾向于证明日耳曼意识形态。要在今天我是不会写的。”

来周刊》里，令人生畏的记者马克西米连·哈尔登——他根本就不买威廉二世的账，总把他描绘成一个可笑的傀儡——面对战争和由此产生的民族大团结，也立即表达出他的激情，他在1914年9月5日写道：“德国从未如此美丽。”至于他的同道，杰出的漫画家托马斯·泰奥多尔·海纳——他也被迫于1933年移居国外——则引导直到那时还很反世俗的讽刺期刊《简单主义》走向了狂热的民族主义。《简单主义》里的画从此几乎专门讽刺协约国，而且较以前有了更多的读者。托马斯·曼在当时的一封信里欣悦地说，没有多少民族能拥有这样高质量的报纸，又是讽刺性的，又是民族主义的。

在作家中间，只在小杂志——如威廉·黑尔措克的《讨论》或弗兰茨·范费尔特的《行动》——的周围，一个反对帝国政治的核心从一开始就留存了下来。比如1914年8月1日，范费尔特在《行动》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说为了和平而下的决心到如今都是无用的，他为此感到懊丧。他预言会有一场大规模的屠杀。他写道，因为沙文主义象征着一种“对于人道主义而言的死亡危险”，在这一范围中，它能将“几百万天生有理性的物种”弄得“魔鬼附身”。

从个人角度说，某些人本来是拒绝投身到爱国主义大合唱中的。无政府主义诗人艾里希·缪萨姆就是这样的人。他曾写过一份《理想主义宣言》，主张民族间的和平，还争取到一些著名人士的签名，并得到了海因里希·曼^①的同情。但也不过如此，没其他的什么了。由于周围气氛的缘故，公开表态并不太容易。

海尔曼·海塞知道点事情。当战争爆发时，他在瑞士已生活了两年。他亲自到德国驻伯尔尼领事馆，以便有可能被编到预备役部队里去。^②他想他不应该保持距离，想这次战争可以丰富经验，它在德意志帝国国内也许能成为有益改变的根源。但是他要求编入部队的提议一直没结果。稍后一些，由于他对在如此多的各种作品里每天都表现出来的仇恨感到恶心，于是公开站出来^③反对那种得到满足的野蛮，有了这种野蛮，所有精神价值都注定会被摧

^①他的小说《臣仆》于1982年由今日出版社用法语再版，有让·儒尔德伊的一篇很有趣的导言。

^②见《书信选集》卷，卡尔曼-列维出版社，巴黎，1981，爱德蒙·波戎译，1914年12月26日的信。

^③《新苏黎世报》，1918年9月3日，“哦，朋友们，别唱这调子！”这个题目借用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最后一章中欢乐颂歌词的开头。



毁。而他则认为爱比恨更相称，认为和平比战争更高贵，认为对生命的崇拜是比对死亡经验更高级的兴趣。于是在所有的德国报刊中，他被人们大喝倒彩，被当成无国籍的家伙，被当成知识分子恶棍。

首批严苛的配置措施和不断增长的社会不满之后果，是在大众中打破了对皇家政治和战争的普遍赞同。而且，1915年10月4日，海尔曼·海塞从伯尔尼写信给罗曼·罗兰，说在德国南部度过了几天后，他的印象是：在人民中间，仇恨消失了。^①

尽管有无情的审查，但随着在精神领域里速战速决的假设的崩溃，对现状现实耳闻目睹的材料便大量汇集起来，那些少见的反对派也不再被孤立。在公众舆论内部，严格意义上的各党派很快就不再真正起作用了。最后有两个趋势显现出来。一个是要战斗到死，另一个是支持和平。有一个党派独自经历了这一分裂的考验：社民党。在1912年的立法选举中，它拥有34%的选票，成为第二工人国际最坚固的链条。1914年，它就有了一百多万名党员。作为模范组织，它到处都在发展俱乐部、图书馆、合作社。其领导人的立场导致一个新的左翼党派于1917年4月诞生：独立社会党。

通常来说，凡仍是社民党成员的人被叫做多数派，而离开了它的人被叫做独立党。

广泛的反战运动

他们包括一个革命支派，即斯巴达克同盟，在地下发表一些署名为“斯巴达克思”^②的新闻简报。作为以后共产党的胚胎，其主要领导人有卡尔·李卜克内希和罗莎·卢森堡，他们后来被判入狱。在他们身上，工人大众找到了其为和平而战的旗手。卡尔·李卜克内希是律师，威廉·李卜克内希的儿子，他起初是最希望建成社民党的负责人之一，按照他的对手们的说法，他

^①见《书信选集》卷，26~27页。

^②《斯巴达克思信函》，迪茨出版社，柏林，1958。这次再版包括恩斯特·梅耶尔的第一版前言。《政治信件》的第1期和第2期于1914年12月出版。它有22期，最后一期是1916年12月25日。同一天，在第23期还出版了一篇斯巴达克同盟的通报。后来出版了12期《斯巴达克思》，从1916年9月20日到1918年10月初。



卡尔·李卜克内希。



罗莎·卢森堡。

变成了战壕中最受欢迎的政治领导人。

由独立党，特别是由斯巴达克同盟^①所组织、推动和影响的反战运动开始出现。罢工活动自从1917年末以来便扩大了，有时会发生暴力。1918年1月，大城市里有一百多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游行。在柏林，警察荷枪实弹，枪杀了数名工人。在工厂里，政治意识抬头了。^②1917年11月在俄国发生的辉煌革命点燃了人们迅速达到和平、同时结束帝制的希望，而这正是斯巴达克同盟成员进行地下宣传的目标。《斯巴达克思》简报说，布尔什维克革命只是一场欧洲革命的序幕。

在艺术家和作家中间，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和平主义的战斗精神也得到了巨大发展。在弗兰茨·范费尔特及其《行动》杂志周围，聚集了一部分表现主义画家，这么叫他们是因为他们反对以前的艺术流派，特别是印象主义。他们大部分出生于1890年左右，在1914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反抗他们父辈的社会了。随着创办于1911年的《行动》的出现，抗议潮流扩展到各类艺术中，从绘画到戏剧。另一部杂志《风暴》在一年以前由海尔瓦尔特·瓦尔登创办，它更多的是将一种美学反叛精神引到反对传统形式的方向上。但这种种艺术形式都聚到一起来反对社会上的因循守旧。由于他们发现了战争的真相，加上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在最初几次战斗中免于杀戮，于是逐渐对政治愈来愈感兴趣。

众所周知，尽管有些人在1914年8月是自愿上前线的，但他们在经历了战壕中的种种残酷之后，变成了帝国政治的反对派。属于这种情况的有鲁道

①《图示》中所用的术语很奇怪，是“斯巴达克人”。

②见《1904年—1945年法兰克福青年工人运动》，阿纳巴斯出版社，拉恩—吉森，1978，124页。



夫·莱翁哈特和恩斯特·托勒尔，或者是更为年长的画家海因里希·福格勒尔，他由于在1917年胆敢给威廉二世写信，要求他最终做他所自称的人——和平君主，结果被关进了疯人院。另外有些人开了小差，他们像威兰特·海尔茨费尔德和弗兰兹·容一样，被军事法庭判服苦役。最后，有些人得以离开德国，赴瑞士避难。正是在瑞士的伯尔尼，阿尔萨斯人勒内·希克雷接手了他的《白纸》杂志，并在那儿发表了巴尔布斯的和平主义小说《火》的摘录。胡果·巴尔在苏黎士安了家，于1916年与里查尔·许尔森贝克短暂重逢。瓦尔特·塞尔纳也一样，在那里出版了《密斯托拉北风》杂志，后更名《天狼星》。有了他们，也因为有了他们对挑战精神的爱好，产生了后来的达达主义的初期活动。

反对战争的诗人、画家、音乐家在柏林习惯于摆脱监视，三五成群地到这个人或那个人家里聚会，颠覆性的文章被大声朗读出来，然后次第传阅。就这样，莱翁哈特·弗朗克的某些和平主义小小说在德国出了名——而他当时生活在瑞士，或者还有从《白纸》、路德维希·鲁比纳的《时间回音》、《密斯托拉北风》上摘录的诗作，这些杂志都是从苏黎士秘密传入德国境内的。

但这些放任不羁的文人们更喜欢的会面地点——总还在柏林——即使是在战争最激烈时期，仍然是在咖啡馆里。在这里，人们的讨论相对自由，什么可能的主题都有，条件是得提防着满世界的密探和警察耳目。在“西方咖啡馆”里，形成了一个帮助逃兵的组织网络，人们向他们提供假证件和工作，警察们也知道这事，因此这地方被特别监视起来。然而，画家路德维希·麦德纳、莫普、格罗茨（他为了抗议周围人的反英情绪，将他的名字英语化了，叫乔治，就像海尔穆特·海尔茨费尔德将名字从此改为约翰·哈特菲尔德一样！）和其他很多人恰恰就是在这里聚会的。艾尔斯·拉斯克尔-舒勒尔的朋友汉斯·莱波尔特、弗朗茨·马克、格尔克·特拉克尔死亡，他受到震动，便向愿意听从他的人建议怎样能想办法让自己退役，还提供了一些热心医生的地址。格罗茨写道：“我们所有人便是在‘西方咖啡馆’碰面的。我们在傍晚时分或晚上坐下来，进行讨论。从政治上说，我们的观点有分歧。但我们更为倾向的无论是理性方面还是宗教方面，都有一些共同点——我们不喜欢军人和大工业家统治阶级，从1916年开始，我们知道，从这场战争里得不

到任何好结果。”^①

神奇元帅

其实就是军人掌权。1916年8月29日，当德国军队在凡尔登前线屡屡受挫的时候，威廉二世解除了冯·法肯海恩将军的参谋长职务，任命冯·兴登堡元帅接替他，派鲁登道夫作助手。这一任命发生在罗马尼亚向奥匈帝国宣战之后，鼓舞了一大部分德国人的士气。看到兴登堡拿到战斗指挥权，他们感觉松了一口气，因为他曾于1915年在塔嫩堡大胜俄国人！事实上，虽然威廉二世仍是最高权威，但对于军事战略他已经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了，对于国内事务他也没什么可说的。参谋部获得任意指派或解除首相职位的权力。

为了不让民众沮丧，政府曾经有一条原则，那就是维持幻想。兴登堡被抬到民族英雄的地位。身材高大，双肩宽实，银发短齐，胡须微卷，略向嘴角翘起，这位六十余岁的老人是充满活力的、永恒的德国战士化身。



冯·兴登堡。

1914年8月，他本来是效命于帝国的，即将退休。直到那时为止，他的生涯尚无光辉可言，他和其他小兵小将一样，只不过是个人不为人知的将官。可突然之间，他一俟被任命为东线军的司令，就战胜了俄国人！民族主义的报刊找到了他们所必需的偶像，他们把他变成了胜利的象征。

各种报导、明信片、招贴画使他变得妇孺皆知。作为守护神，他关照着德国的命运。在他的纪念章上，还为前线士兵制造了一些蜡烛。在柏林胜利柱旁边，为他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木

^①乔治·格罗茨：《一个小小的“是”和一个大大的“不”：“他叙述说”中的生活》，洛沃尔特出版社，莱茵贝克—汉堡，1974，105页。





兴登堡塑像。

雕像，立放在三层台架之上。人们可以从阶梯登上高台，逛马路的人则拥向这里，每个人都为能在上面钉上一颗钉子以示崇敬之情而感到自豪。至于战争贷款，宣传海报上整页印着他的侧面头像，下面写了几句话：“岁月艰难，然而我们必胜！”

民主的要求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各方面都断然提出了民主要求。在精神领域所逐渐出现的变化，正是

国家所持的观点。原因很简单，自从1871年的宪法以来，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过改变。在皇帝的主持下，德国是个封建国家。它由25个联邦成员组成，其中有3个共和国和22个君主国，而且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也附属于普鲁士。皇帝拥有行政权。由全民公决选举出的中央议会只有提出法律议案的权利，代表联邦成员并且不由被选举人组成的封建议会比它还要强大，甚至如果皇帝同意，还有解散议会的可能。此外，整个系统是建立在普鲁士霸权之上的。普鲁士国王不仅拥有和德国皇帝一样大的权力并能任命首相，而且还拥有多数议员。因此整个德国的帝国建筑有着反民主基础。

议会里发生了争辩，以便完全改变这种组织方式，给予议员更多的权力。然而这是徒劳的。也仅仅是在参谋部确信会战败的时候，他才任命了一个新首相：麦克斯·德·巴德，威廉二世的表弟。他曾受命开始与美国总统伍德洛·威尔逊进行谈判，旨在签订一项停火协议。

是战是和？必须谈判，这并不能让所有人都感到高兴。于是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一位高级官员豪斯曼起草了一份声明，要求将战争继续下去。电力总公司的总裁瓦尔特·拉特瑙给战争部部长寄了一份报告，详细阐述了组

织国防部的方式问题。首相内阁收到成千上万封来自教师、官员的信件，呼吁不要投降。诗人理查德·德梅尔宣称自己决定重返战场，招来和平主义画家凯特·科尔维茨的严厉批评。^①

罢工、游行、抗议活动最终发展为争取卡尔·李卜克内希的释放。这次释放早在公众舆论里就已经感觉出来了，尤其是在工人家庭里，仿佛预示着和平已然临近，德国的变革已然迫在眉睫。能证实这种确信不疑之事的是威廉·格律纳将军被任命接替鲁登道夫。同一天，即1918年10月26日，有一系列法律对1871年宪法进行了修改。国会的职权范围扩大了，军事决定必须呈交给它审核。德国变成了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可这还是君主制国家啊！这些并不能让独立党感到满意，他们要求威廉二世下台，释放包括罗莎·卢森堡在内的所有政治犯，解散国会机构。从3月份以来，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在受了俄罗斯所发生之事的启发后，在各工厂提出建立工人与士兵理事会组织的口号。

突然，11月3日，发生了基尔港叛乱，把一切都打乱了。^②军官们想继续海上作战，可水兵却拒绝服从。恶劣的生活条件造成了这一后果：红旗在海船上飘扬，两万全副武装的水兵成为港口的主人。他们解除了军官们的武装，释放了关押在兵营里的囚犯，选举了一个士兵理事会。工人们学着他们的榜样，也都停止了工厂的工作，并组织了一个工人理事会。

继基尔之后，斯图加特和汉堡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火车站被占领，兵营发生反对军官的暴乱，军队指挥权被剥夺，交通工具被起义士兵征用。人们到处都在撕扯象征剥削时代的三色旗和鹰旗；红旗飘扬，工人和士兵的理事会被建立起来。

11月4日，社民党的一位领导诺斯克与政府达成协议，被紧急派到基尔。正如马克斯·德·巴德后来在其回忆录里所写的那样，他被看做是最能“控

^①他在《行动》杂志1918年第43-44期再次进行了这一批评，题目是“惟一的拯救”。该文发表在1918年10月30日社民党的《前进报》上，并配有一幅画，画着一位拼命保护自己孩子的母亲。

^②事实上，根据工人奥托·普莱斯勒的见证说，早在1918年1月，在基尔港各码头上就已经发生了一些游行示威活动，甚至还组成了一个工人议会。至于独立党，其大多数负责人都被投入监狱，而他们中的某些人被判服多年苦役。这由卡尔·西比克进行了报告，《恩斯特·布适》，罗沃尔特出版社，莱茵贝克—汉堡，1980，27页。另见恩斯特·布适自己的回忆，28页。



制传染病”的人。至于政府自己，它一直稳坐泰山。必须控制局势，扼杀如今已在柏林开始酝酿的革命。5日，它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多数派呼吁遵守秩序和纪律，呼吁不要听信能将人引向侥幸冒险境地的口号。



“十一月革命”期间，一架机枪被士兵们从军舰上搬下来架在了城市的街头。

投降与革命

在通向佛赫元帅所辖的莱特洪德斯、通往法国总司令部的路上，他的车颠簸着，这位德国政府特派员要考虑的事儿够多的了！他是谁？他就是马克斯·德·巴德所组建的战时内



起义士兵在德国皇宫前架起山炮。

阁里的心腹谋士，名叫马提亚斯·艾尔茨贝格尔。此人个子不高，很有活力，微显发福，以前是小学教师，现在是国会里的典范人物。

在全民骄傲的气氛中遭受耻辱的德国派来了他这个信使。在脑海里，他打算尽可能地讨价还价，得点什么，以便减少这种耻辱。不过他也知道，革命正威胁着德国，而政府如果拒绝停火条件，那就有无力与之对抗的危险了。和他的部长同事们一样，他反对革命派的要求。当初在政府里谈论基尔港叛

乱水手的问题时，他主张进行有效的军事干预，在城市周围建立封锁线，可是没人听他的。

哈里·凯斯勒伯爵，是个编辑、外交家，业余爱好艺术，常资助文艺事业，11月6日星期三，他到首相府去，在楼梯上偶遇被任命陪同马提亚斯·艾尔茨贝格尔前往的一位高级官员。他对他喊道：“时间紧迫，代表团的出发时间定在5点……”而凯斯勒伯爵在他的《日记》中叙述完这次见面后，立即简述了当时情况，还加上一句说：“全都崩溃了，又是投降又是革命……”^①

签订停火协议正好也就是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终结。对于许多国民和士兵来说，梦想正在完成。而其他的人，像那些顽固的民族主义者中最天真的人——他们甚至向国家献出金表链，以便战争能继续下去——对他们来说，梦想正在崩溃。

德国处在一个新时期的门槛上。这门槛还很难跨过去，在那上面，拥挤着成千上万的饥民、起义者，还有挑剔者、复仇者。在这些人后面，是180万牺牲者，是无可数计的残垣断壁。现在就是在这之上，应当产生一个新的国家。但过去能够被抹杀吗？



^①哈里·格拉夫·凯斯勒：《1918年～1937年日记》，茵瑟尔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1。这一重要作品曾由格拉塞出版社出过法译本，但有很多删节处，而且译文总不太理想。



第二章 魏玛共和国及其难产

从莱特洪德斯回柏林的路上，马提亚斯·艾尔茨贝格尔决定在斯帕停一下，因为德国参谋部在这个比利时境内的阿尔登地区建有营地。他吃了一惊，红旗在帐篷高处迎风飘扬……兴登堡元帅和格率纳将军告诉他最近发生在德国的突变：皇帝逃到荷兰避难，马克斯·德·巴德政府解体。一个新政府上台了，由社民党人艾伯特和谢德曼领导。

很快，马提亚斯·艾尔茨贝格尔便后悔没在前几天就呆在柏林。他本可以反对一个完全由社会党人士组成的政府的形成。而现在，对他来说，再没别的解决办法了，只有接受现状，自行安排，以便压制所有来自艾伯特那边的共产主义危险。而且，这个艾伯特代表着能挽救德国统一的保障。他很清楚，各征服国当局都带着怀疑目光观察德国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不愿意看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国几乎取得完全胜利之后又渗透到这里来。

11月14日，他到达柏林，发现首都已经大变，只有一项强硬政策还和他曾为铲除基尔港起义祸根而主张的措施比较相像，在他看来也还合时宜。消息传来说政府将他纳入到了它的团体中，并任命他为停火协议签约委员会主席。很好，不过是谁在治国？他自己那辆车曾经悬挂的是一面红旗，现在换成了黑、红、金三色旗，即共和国的颜色。当他穿城而过时看到的是什么？作为布兰德堡的门户，卫兵换防差不多还是按着军人的步伐来进行，但比以前更加漫不经心。士兵不再佩带徽章，一群戴着显眼的红色臂章的人陪在他们周围。街道上到处是市民部队。昔日多么神气的交警如今失去了他们的步兵短剑，也随之失去了他们的威严，他们静静地指挥着交通，毫无傲慢之色，而且都佩带着红色臂章……当他与佛赫将军一起在莱特洪德斯签订停火

协议期间，没有爆发过一场革命。在马提亚斯·艾尔茨贝格尔的印象里，革命正在永久定居下来。

一场革命，两个共和国

正是在几天前，也就是基尔港、汉堡、不来梅、慕尼黑、斯图加特起义之后——在外省不过迟了些罢了——柏林的工厂和兵营全都沸腾了，为推翻帝国的临近的起义传闻口说耳听地传开了。这时候，谢德曼立即以社民党的名义，要求民众不要听从鼓动他们上街的口号。但在11月8日，由恩斯特·梅耶和卡尔·李卜克内希签名的一份斯巴达克同盟传单明确呼吁柏林的工人和士兵也都尽快行动起来。

9日早上，柏林如此平静，以至于人们以为社民党人为阻止所有起义的言论取得成功了。地铁和有轨电车来回行进，工人与职员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客栈开门营业，顾客们按习惯在那里匆匆喝咖啡。没有任何特别的紧张气氛，没有任何动乱迹象。菩提树下路——著名的菩提树大道^①——的散步者们带着他们的豪华生意，看到各店铺热闹起来，丝毫不曾怀疑有什么不平常的事。

在工人街区，短暂的快餐之后就不一样了。从9点钟开始，人们聚集在一起，工厂全都空了，上千示威者排成队列出发，来到街道上。队伍取道柏林市郊，那里有几家最大的企业。口号早在7点钟夜班换班时就用传单散布开了。

这些游行队伍朝市中心走去，朝波茨坦广场走去。第一排的工人们拿着武器，然后是手无寸铁的示威者，最后是妇女。在路上，无数行人参加进来。在到达兵营门前的路上，同样的景象不断出现：大门被打破，在押士兵被释

^①在19世纪而且一直到二战期间，所有这些德语名字一般都被译成法语。例如在19世纪末出版的一本优秀作品《柏林其貌》，恩斯特·柯尔普编辑，巴黎，参见此处）中，爱德蒙·诺伊柯姆经常使用 Allée des Tilleuls（菩提道）或 Avenue Sous les Tilleuls（菩提树下大道），而非 Unter den Linden。比如在17页：“人们匆匆前行，步履矫健。不一会，那些尖顶帽便转过了 Allée des Tilleuls 的一角。我们跨了三大步，来到这条著名的散步街上，有大道、普拉采博物馆路、柏林人大麻田路……”。41页：他没有说亚历山大广场（Alexanderplatz），而是说 la place Alexandre：“一条长长的商街将我们带到 laplace Alexandre，这是首都最有生气的地方之一……”在其他地方（156页），他提到了“le Grand Café de la place Alexandre”（亚历山大广场大咖啡厅）。他用同样的方式，没有在“普伦茨劳尔街”散步，而是在“la rue de Prenzlau”散步（45页）。



放，枪支和弹药被分发到手中，整个集体建立起兄弟般的情谊，红旗四处飘扬。只在一座兵营，一些军官开枪打死了一名年轻人，其余都是毫无阻碍地行进。

接近中午时，从菩提树下路直到王家

城堡，所有街道都被这群暴动者占领了。人们时不时给一些装有喇叭的军用卡车让出一条道。演说家们一个劲儿地向人群发表讲话。大约4点钟，李卜克内希出现了。他站在一辆小卡车高处，开始了一场演讲：“革命的一天来到了，我们已经得到和平……”然后，为了让示威者更清楚地听到自己的话，他离开王家城堡门前，上到一间阳台，宣讲道：“同志们，我宣布，德国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这将是一个社会各阶层聚集在一起的共和国，是一个没有仆役的共和国，是一个所有工人重新找到自尊、得到名副其实的工资的共和国。”

王家城堡的卫兵那时已经被解除了武装，红旗飘扬。接着，示威者们分散到城中各处，攻占仍有负隅顽抗武装的建筑物。整个下午，他们占领了主要公共设施、国会、沃尔夫电报公司办公室、某些报纸的总部。在和暴



城市广场和街头出现的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集会。



1918年德国革命的讲演者。

乱者长官进行谈判之后，首都警察局也被攻下了，独立党人艾米尔·爱希霍恩被任命为新警察局局长。

没有一个地方发生过真正的抵抗。在几个小时内，再没有任何帝国君主机构能够幸免于难。面对这场动乱，皇家的军官、公务员、谋臣都十分被动。有轨电车的职员早已表达过不参加罢工运动的意愿，因为他们在前一天就已经不得不停止工作，但他们不是心甘情愿停工的，中午时便停电了。

泰奥多尔·沃尔夫——一位声名卓著的记者——于第二天，11月10日，在《柏林日报》上写道，首都刚刚经历了革命的最辉煌时刻。皇家制度这座巴士底狱转瞬之间便土崩瓦解了：“还在一个星期前，军队和民事行政部门尚拥有分支庞大、错综复杂、根深蒂固的机构，以至于其制度似乎确实拥有能克服所有挫折的能力。军官们的灰色轿车飞速横穿过街道，各处广场上，交警们笔挺地站立着，像是权力的支柱，硕大的军事组织仿佛无所不包，在公共职能和国家部门里，一个表面上不可战胜的官僚机构居中端坐。昨天早上，至少是在柏林，一切都还在。昨天下午，一切便烟消云散。”尚未购买《地区报》^①这份发行量极大的报纸的柏林人在11月9日这天晚上，非常惊讶地发现一张具有同样特征的印刷纸，不是《地区报》，而是叫《红旗报》^②。说真的，其实只有第一版与《地区报》的前一期不同，其他版面都保持了原样。这第一版讲述了占领各兵营、工人与士兵间的友爱、释放警察局里650名犯人等事件。

一群革命工人于8日晚间占领了《地区报》的编辑部办公室。这份属于谢尔出版社的右翼日报曾因对工人运动表现得尤为仇视而著称。由于该期已经排好，也就不可能足够快地改变其发行量。从策略上讲，最好是能在惯常出版时间出一些报纸，因此只有标题头版被改动了。

《红旗报》，这在汉堡、斯图加特都已经有了，在柏林的这一家只是个象征。该报第一期除了在普鲁士和帝国的中心奏响了革命胜利的凯歌报导外，还有威廉二世退位以及首相曾要求士兵不要使用武器等内容。它还按照同一方向，复制了社民党工人与士兵理事会的公报。

^① Berliner Tageblatt:《柏林日报》；Lokal-Anzeiger:《地区报》。

^② 社民党的机关报是《前进报》(Vorwärts)。共产党的机关报是《红旗报》(Die Rote Fahne)。



然而这里所提到的是哪个首相？这著名的社民党理事会又是什么？对此，《红旗报》什么也没说。而多数派报纸《前进报》关于这一天的总结似乎稍微清楚些。它发行了不止四次，而且每次的头版都不一样。首先它宣告总罢工开始，伴随着该宣告的是一个工人与士兵理事会写给柏林市民的呼吁书，柏林市民一再被劝告要保持平静与秩序，最后报纸高呼：“社会共和国万岁！”接着威廉二世退位的事情被它公开了，同时说明首相向士兵下令不得使用他们的武器。在第三期的头版头条，是任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首相的报道。报纸更详细地说道，现在权力掌握在了人民的手中。最后，第四期复制了政府的一份呼吁书，请士兵们回到他们的兵营中去，并且在第二天注意看报以便接受新的命令！

由此看来，对于消息灵通的柏林人来说，德国失去了一个皇帝而赢得两个权力。一个是街道上的、各罢工工厂的权力，在这一权力的带头作用下，卡尔·李卜克内希作为领导人脱颖而出，他主张，在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框架内，应该进行全德国工人与士兵的理事会选举，这才是国家政府之所以来的全部支柱。还有一个是新首相的权力，他沿用的是帝国时期的头衔。帝国，一个从此不再存在的国家。平静与秩序是他的首选要求，余者嘛，他只预见到会有一个全国团结的政府。

在罢工队伍游行的同时，社民党众议员们决定在国会集中。这时出现了两个内涵丰富的图景。柏林人在两小时的间隔时间里，跑了两个不同的地方，见识了两个权力之间的竞争。下午两点多一点的时候，在国会那边，谢德曼宣布德国共和国成立。这是在他了解到李卜克内希的意图后，很快就采用实施的，事先没跟他的社民党同事们进行任何商量，把艾伯特也置于了尴尬境地。两个小时后，当李卜克内希在王家城堡前宣告一个共和国——然而却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时，他的话就只像是一种挑战了。

第二天，11月10日，整个柏林城都在抢购多数派报纸，尤其是工人。社论里说，德国无产阶级所取得的胜利是史无前例的，但未来仍令人担忧，因为由庞大的工人大众所完成的事业有受少数派牵连的危险，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多数派与独立党重新团结起来。“不要手足相残！”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标题。



谢德曼在议会大楼的阳台上，向黑压压的人群宣布 德意志共和国成立。

《青春时代》^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在该书中，沃尔夫冈·格彭特别强调了1918年11月9日所出现的对立。书中主人公是一个孩子，他与母亲乘坐夜班火车从波美拉尼亚到柏林去。在车厢里，他目睹了两名乘客的争吵。一个声称是李卜克内希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另一个强烈反驳说是谢德曼宣告的。为了证明各自观点，他们两人都挥舞着报纸，当然不是同一家报纸。而且，按照各自方式

来说，两个人似乎都有道理。

镇压革命

德国从君主制度中摆脱出来的头几天，多数派与斯巴达克同盟之间的夙仇便爆发了。《红旗报》事件就是一个好例子。这份新日报的第二期按惯例将于11月10日发售，而且和第一期一样，计划在《地区报》报社印刷。但接下来事情却发生了变化，罗莎·卢森堡8日从狱中获释，于是就准备组织一个编辑组。听到这个消息，谢尔出版社的排字工人和职员拒绝为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干活，他们的老板也找艾伯特政府要求进行干涉。艾伯特政府于是向军

^① 沃尔夫冈·格彭：《青春时代》(Jugend)，苏尔坎普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7。由雅克·勒格朗译成法文，标题为Jeunesse，阿歇特P.G.L. 文学出版社，“德国书库”丛书，巴黎，1979。



队下令将《地区报》出版社各楼的人全都赶走。结果，《红旗报》第二天未能出版。至于《地区报》，它和以前的形式一样，又回到了那些报亭里。

从更通常的情况来说，多数派使出浑身解数所要反对的，是独立党整个左翼的活动，是各工厂工人代表所保持的兴奋情绪。他们为了不与当前的变化完全偏离，终于在罢工运动中重新联合起来。然而面对在街道、工厂各处所出现的动荡，他们所乞灵的，是对他们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进行控制。工会受他们影响，不支持试图控制生产资料的工人理事会，迫不及待地 and 老板进行协商。11月15日，他们签订了一份协议，将每日工作时间限制在八小时，还准备安排一些集体契约。

但要说11月9日的起义发生得十分混乱，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海尔穆特·冯·格尔拉赫是普鲁士贵族，后来变成了和平主义战士，他在回忆录里记录说，霍亨索伦王朝君主制度就这么覆灭了，而示威者并没有暴力行为，行走在街道上的不是渴望流血的大众，而更多地是向往生活在和平与自由之全新幸福中的一群人。^①哈里·凯斯勒伯爵在其《日记》中也评议说，人民的态度非常出色，尽管有枪炮射击，可人民仍然冷静地反抗着。^②

因为发生了针对示威者的枪炮射击事件，据统计共有15名受害者。其中有7人的葬礼由私人办理，即由各自家庭负担。至于其他8个人，则由柏林的工人与士兵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组织葬礼，而且在成员们进行辩论之后，执行委员会还拒绝了多数派提出的在墓前发表讲话的建议。11月20日，送葬队伍在柏林出发，由南向东，这是该城从未经历过的，也是首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民游行活动。一路上，工人们高声合唱革命歌曲。

在构成帝国所有联邦的城市中心，从黑森到符腾堡，从来来梅和吕贝克到萨克森和莱茵省，罢工、游行、国民议会、讲话、民意投票、攻占公共设施、送葬队伍，这些活动以同样方式公开地不断发生，只不过有时候日子不太一样。

更为奇怪的是发生在巴伐利亚和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事。在慕尼黑，以文人库尔特·爱斯纳为中心的独立党在一场直抵维特尔巴赫王宫的庞大游

^①海尔穆特·冯·格尔拉赫：《从左到右》，格斯腾堡出版社，希尔德海姆，1978(1937年在苏黎世初版)。

^②哈里·克拉夫·凯斯勒：《日记》。

行活动之后，建立了巴伐利亚自由共和国，这是一个要求脱离柏林中央政府而独立的国家。至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按照停火协议条款，它本应回到法国，却也进行了反叛活动，真是奇特的立场，因为这在它从此所要归属的领土上完全是孤立的。11月10日，在斯特拉斯堡，一个工人与士兵理事会在最高法院成立。理事会要求城中的德国军人政府投降，呼吁进行政府中央议会选举。11月13日下午3点，在大教堂屋顶上飘起了一面红旗。

关于当时的情形，有大量照片资料被保留下来。相同的场景几乎都通过镜头而被定格。人群在公共广场上聚集，成群的革命士兵在军用小卡车前摆出姿势。街道上，民兵和身穿制服的人带着临时拼凑的装备，肩扛步枪，向前行进。通过衣着、旗帜或头上的帽子，硬领衬衣、领带、短上衣或水手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有这些游行不仅仅只是聚集了工人群众，而且还吸引了职员、自由职业和知识分子成员加入进来。

于是从1918年11月底到1919年1月中旬——对于巴伐利亚州来说是直到1919年5月初——艾伯特政府和多数派发动了一场无情的战斗，以镇压卡尔·李卜克内希的支持者和独立党中的革命者。个别人被禁止拥有武器，凡未归队的士兵均被视为叛乱并被肃清。

古斯塔夫·诺斯克曾在9月初被多数派派去与基尔港暴动者进行交涉，但毫无结果，这次他则被授予了军事指挥权，并可全权决定是否用武力来减少反叛者的数量。他大概说过：“我们中得有一个人扮演嗜血成性的猛犬的角色。”在历史上，“嗜血成性的猛犬”的形象和他这个人物紧紧结合在了一起。

不仅皇家军队的正规军——比如说从东线回来的军队——被召来进行这次清理行动，按照诺斯克自己的话说，还征召了特殊部队，即独立部队。这些非正规军招收的军官、副官和职业士兵，都是些复员后无法接受帝国的失败，更无法接受其末日到来的人。他们没有回家，而是选择了继续战斗。他们由小贵族地主和某些工业家提供金钱上的帮助，享受比以前更高的军饷，并能自行征召外国雇佣军。这些独立部队就这样变成了反革命派最积极的助手，从波罗的海地区到柏林、黑森、哈雷和慕尼黑，他们到处都在致力于用恐怖来使一切恢复秩序。

通过一场针对左翼和极左领导人的闻所未闻的诽谤战役，敲诈行为占了



上风。民族主义组织被建立起来，在那里集中了战前的爱国与反犹太战线上的残余势力（德国工人党便产生于这个时期，它是希特勒国社党的胚胎），作为口号，他们宣传对“布尔什维主义”和犹太教开战。



革命期间，行驶在街头的政府武装车。

他们通过手册、传单、招贴海报来呼吁进行谋杀，杀死那些被称为“德国叛徒”的人。对斯巴达克同盟成员，他们进行了一次真正的以人为猎物的行动。甚至在多数派的报刊上，还将他们说成是应当被赶尽杀绝的强盗。

在柏林，决定性的战斗发生于1919年1月。当警察局局长艾米尔·爱希霍恩被革职后，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组织人民进行示威。几十万人走上街头游行。斯巴达克同盟领导人有力的一声高呼，得到一阵简洁的齐声附和。从1月6日到9日，某些报纸，尤其是多数派的报纸的编辑部和沃尔夫电报公司大楼再次被抗议者占领。在革命者那边，传单到处散发，呼吁推翻艾伯特政府。而在对手那边，传单上则要求杀死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希，决不留情。其中有一份传单的签名很简单：“前线士兵”，在1月初就在散发，宣称道：“工人们！公民们！祖国就要崩溃。拯救她吧！威胁并非来自外面，而是来自内部，来自斯巴达克同盟。打倒他们的领导人！杀死李卜克内希！然后你们就会有和平，有工作，有面包！”

数日之间，机关枪在柏林城哒哒扫射。政府军甚至还把武器发给自愿去干掉斯巴达克同盟的市民。“打倒李卜克内希！政府万岁！”成群结队的军官在威廉街——部长们所居住的街区——上高喊着，要求在路边看热闹的人拿起枪跟他们一齐走。某些街道被封锁，禁止行人通行，而且被包围起来，因为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在这里设置了路障或者说是正躲在这里。这是合乎手续的战斗，城市被巡逻队分区控制，好奇的人群跑去看热闹，而一旦子弹从身



游行队伍中出现“打倒斯巴达克的血腥独裁政权”的标语。

边呼啸而过，又都吓得不得了。

1月13日星期一，枪声渐渐稀少了。诺斯克和他的独立部队获胜，就只剩下几个小岛状地带尚待征服。清理行动开始了，一屋一屋地搜，一家一家地找。每个十字路口都有士兵岗哨，皮带上挂着手榴弹，步枪上绑着

刺刀。在战略重地，大炮或自动机关枪被安放在桥上。大部分街道更是荒无人烟，偶尔，在工人街区，一些男人或女人被士兵队揪着头发推推搡搡。

正是在这期间，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希被捕了。1月16日，《柏林日报》上宣布说，当罗莎·卢森堡走出伊甸旅馆——卫队骑兵参谋部总部，她就是在那里刚刚接受了审讯——时，被人群打了个半死，她本应被用汽车带走然后干掉，她的身体本应消失。这份日报还指出，卡尔·李卜克内希在被押送穿过动物园时，背上中弹而死，他当时试图逃跑。

这一报纸的题目是：“李卜克内希试图逃跑时被杀，罗莎·卢森堡被人群打死。”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两位革命领导人是被暗杀的。一些人兴高采烈，大排筵宴庆祝这次胜利，另一些人则于1月18日星期六在各城市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送葬游行活动。

罗莎·卢森堡的遗体直到5月31日才找到。她的遗体被扔在一条渠沟里，即兰德维尔渠。^①她的葬礼在6月13日星期五举行。李卜克内希的葬礼于1919年1月25日星期六举行，同时安葬的还有另外30名受害者。送葬队伍原准备从胜利小路前面出发，但整个街区都被军队封锁了：众议院门前，波茨坦广场上，布兰德堡门附近都设有大炮和机枪，因此他们采用了另一条路线，稍

^①从字面上翻译就是“陆军渠”。例如可参见斯蒂凡·赫尔姆林的小小说《科纳琉斯桥》，收在《生活之困苦》文集（其中一部分由安娜·郭杜译成法语，题为《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今日出版社，巴黎，1982）里。这些关于暗杀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希的回忆早已翻译发表在《欧洲》杂志（1969年4月—5月）上了。



稍远离市中心，从布洛夫广场出发，所走的方向是到弗里德里希田野墓地，在那里还栖息着1848年的革命者。棺材被安放在平板马拉车上，每辆车上放四具。和其他车不一样，在第一辆车上，是一面巨大的红旗，它覆盖着李卜克内希的遗体。

在所有地区，革命起义于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相同的结局。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是因为有法国军队的介入。从街头战斗到送葬队列，都是同样的装饰。2月初，不来梅自由州落在了政府军的手中，而巴伐利亚议会共和国则在5月陷落。其他革命领导人，他们若未像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希，还有柏林的独立党胡果·哈瑟与慕尼黑的库尔特·爱斯纳那样被暗杀，就不得不逃走，藏匿起来以躲避压迫。某些人被判死刑，像巴伐利亚的欧根·莱维内，或者被判服多年苦役。

总之，这些被革命愿望驱使所占领的主要是城市，那里的独立部队死者数以千计。相反，在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并未发生这些动乱。在某些村庄，成立了农民理事会，那里的皇家警察被解除了武装，市长被吊死，人们组织起一支民兵部队。在巴伐利亚州，人们为了给城市中心直接供应食品，甚至打算重新整治军需站。但从总体上说，在农村百姓中间并没有多少革命迹象。与军队里士兵理事会渗透有军事干部一样，大部分乡绅和特权阶层人士进入到农民理事会中，并将组织变瘫痪了。村民们愤然反对红色运动，将他们宣传成罪恶滔天的肇事者，时刻准备着保护自己的一块土地，准备着迎接独立部队。

坐在证人席上的作家与艺术家

以青年一代为主的许多画家和作家刚刚经历了战争的惨烈，1918年11月9日这一天，他们都表达出激奋之情。他们一有机会就参加工人与士兵理事会，或者参加知识分子组织的特别理事会。在那闹事的几个月里，他们与革命者保持一致。一些石印作品、素描、油画作品见证了这激动人心的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凯特·柯尔维茨的木刻作品，画的是李卜克内希躺在棺材里，人们来向遗体鞠躬——代表活者对死于革命之人的敬意。同样，乔治·格罗茨有一幅经常被人复制的画作，近景上画着一个戴军帽的军官，左手举起一只



希莱希特。

酒杯，而右手则挥舞着军刀，刺死一个婴儿，整个画面建构在成堆的尸体和流淌着的血河上，题词则写着：“干杯，诺斯克！无产阶级投降了！”

在奥格斯堡，年轻的布莱希特是他家乡城市的工人与士兵理事会成员。在一篇《1919墓志铭》里，他深切怀念了罗莎·卢森堡，而在剧作《夜鼓》中，他表露出面对革命失败而感到的苦痛。

约翰内斯·R·贝歇尔当时在柏林，他也歌唱了红色的罗莎：“啊，你，天堂草原上的香料！你，独一无二的你！你，神圣的你！啊，女人！”面对暗杀李卜克内希事件，鲁道尔夫·莱昂哈特表达出上百万德国人的悲痛：“他的尸身躺卧在整座城市上，躺卧在所有庭院中，躺卧在所有街道上……”^①很晚以后，1937年，当阿尔弗莱德·德布林移民到法国的时候，着手写了四卷本《1918年11月》。通过几个人物的相似命运，这部作品让人想起了战争之后发生在阿尔萨斯的革命和对革命的镇压。

在慕尼黑，一些作家，像埃里希·缪萨姆、恩斯特·托勒尔、莱特·马鲁特、古斯塔夫·兰道尔，积极参与了新巴伐利亚州的组建工作，以至于这个州被讽刺性地叫做文人共和国！古斯塔夫·兰道尔被暗杀了，埃里希·缪萨姆和恩斯特·托勒尔被判五年监禁，莱特·马鲁特被迫逃走。莱特·马鲁特移民到墨西哥后，逐渐与德国完全断绝了关系，不久以后，他用特拉文这个笔名，变为成功的冒险小说作者，作品有《死人船》和《马德尔山脉的财宝》等。

巴伐利亚小说家奥斯卡·玛利亚·格拉夫^②——他的文学生涯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在他的一部自传作品里，叙述了独立部队进入慕尼黑时，他所感受到的恐惧：“在肮脏的小路上，躺着一些死去的工人。他们被扔在地上，

^①关于这些诗人，见笔者编辑的诗集《德国表现主义诗人》，马斯佩罗出版社，巴黎，1974。

^②奥斯卡·玛利亚·格拉夫：《我们是囚徒》，D.T.V.出版社，慕尼黑，1981。



或直挺，或斜卧，或仰面朝天，或侧身僵直。只有脚形成一条直线，抵着墙壁，散发出强烈的鲜血和尸体的臭味。”而在《在德国的一段青春》^①中，恩斯特·托勒尔于1933年讲述了在慕尼黑街道上发现悬赏他的脑袋的大型通告后，他是如何想办法躲藏起来、后来终于被告发、然后被用车送到施塔德尔海姆监狱的。在监狱入口处的栅栏门上，用粉笔写着这么一行字：“在这里，咱们用斯巴达克同盟的血来做香肠和火腿，在这里，咱们随时把红色人士送上西天！”

从另一方面来的见证同样很能说明问题。年轻的恩斯特·冯·萨罗蒙参加了独立部队，他在其报告文学《被天主弃绝的人们》^②的开头，述说了当他在柏林城内看到他所谓的恶棍即贱民在游行时的印象：“在长长的队列前头，人们举着一面巨大的旗帜，而这面旗帜是红色的；它那样可怜，潮湿，悬在大旗杆上，在迅速集结起来的人群头顶上，像一块血斑似的摇晃着。”蔑视之情噬啮着他，令他无法呼吸，我们的这位16岁的小伙子从反革命战斗一开始就参加进去了：“我看见机枪的嘴在跳舞、蹦跳、闪烁。哒哒哒……那一线窗户出现在我的射程之内，在窗洞上斜靠着那个年轻的水手，哈！他还在那儿，在准备他的步枪，朝我们射击。我的机枪安静下来，我冷冷地瞄准，然后扣动手指，这就又开始了，窗户那儿就全都给报销了……”

在波罗的海诸国，独立部队的战斗是针对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军队的。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另一个16岁的年轻人，施腾伯克-费尔默尔伯爵，他遵循着自己对探险的爱好，而且也不多加考虑，于1918年12月加入了那些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十字军。他在过大的军衣里冻得四肢麻木，不停搓着手脚，但他拿到一杆俄国步枪，一顶德国军帽：“在我们后面是学校，在我们前面是生活，是战争，是冒险！”这次经历，正如他所叙述的那样，与他在新的抉择中站到共产主义者那边去对纳粹作战相比起来什么都不值。这位狂热的年轻贵族原想朝前猛冲奔向生活，却只遇见了不人道的恐怖和死亡，他于1929年写道：“可以谈论战争的，只有个别像我们那样参加过的人。可以谈论死亡的，

^①恩斯特·托勒尔：《在德国的一段青春》(Eine Jugend in Deutschland)，由人岁出版社译成法语，洛桑，1974。

^②恩斯特·冯·萨罗蒙：《被天主弃绝的人们》(Die Geächteten)，贝尔特尔斯曼出版社，居特尔斯洛，1930。由安德雷·瓦扬和让·库肯伯格译自德语，普龙出版社，巴黎，1931。

只有个别像我们那样如此切近地感觉到它的人……”^①

制宪议会选举

尽管有一些麻烦事延伸到不同地区交替着发生，1923年末，社民党领导人艾伯特和谢德曼还是在他们的同事，泼辣凶悍的诺斯克的帮助下，在军队的支持下，按他们在1918年11月头几天所建议的那样，遵守了诺言：组织全民选举，以便组成一个新的国民议会，并赋予德国一部共和国宪法。街道上的政府公告宣称道：“打倒混乱，打倒无政府主义！”

1919年1月19日，选举按预定的日子在全国举行。那时的柏林刚刚才获得平静，还很像一个战场。在多数派报纸《前进报》所栖身的大楼里，曾有300名斯巴达克同盟成员躲避于此，后来被手榴弹和机枪给撵走，大楼墙面上，有一些张着大口的黑洞，楼梯也完全被打坏。城中许多地方都安置了轻炮，以便保证选举——一场不会有什么严重事故的运动——顺利进行。这是一座未清理的城市，在巨大的招聘广告牌上，招聘着清道夫，每天给五马克，伙食全包。

在帝国时期，柏林陶醉在长治久安之城的名声当中。它被看做是欧洲各国首都中组织得最好、最清洁的城市。每天晚上，当清道夫走过之后，地上沥青在路灯的照耀下，闪亮得像一面镜子。如今，淤泥侵入街头，垃圾堆积如山，军车来来往往，把碎石路轧得开了膛，破了肚。火车准时、有轨电车按点发车……这已是依稀往事！从此以后，旅行者们你挤我，我挤你，在等了几个小时后，他们在台阶上挤来撞去，混乱不堪。在火车站门前，停着一些马拉的破篷车，取代了那些被征调走的出租车。

气氛都变了。在波茨坦广场，沿着菩提树下路，在火车站里面，复员士兵来回徘徊。有时他们就临时当上小商贩，偷偷摸摸地售卖糖果、香烟、明信片。某些人四处行乞，炫示他们的战争创伤。身残、肢残、老兵、伤卒都不可思议地聚集在一起，一些人拄着丁字拐杖，另一些人则缠着一大堆缠带。

^①亚历山大·施腾伯克—费尔默尔伯爵：《志愿者施腾伯克》，恩格尔霍恩斯继承者出版社，斯图加特，1929。



在这个背景中，选举运动的第一个新颖之处，是妇女宣传者的参与。因为妇女刚刚获得了选举权。她们在有轨电车站旁边和大商店旁边散发传单，或者在脖子上挂着宣传牌四处走动。她们多半属于建立于战前的妇女组织、宗教或社民党组织。面对妇女选举所能表现出来的胜券，连最反动的党派也积极予以合作。

第二个新颖之处是宣传的办法。现代的手段，也就是美国式手段，渗透进政治风尚之中。公众建筑物上，巨幅公告色彩鲜明活泼。多数派的公告中有一幅绘着一架天平，其中一个托盘上放着一袋金子和一顶高礼帽，而另一个托盘更重，只放了一顶弗里吉亚小帽——所得结论写在下面：“投社民党的票吧！”当然，妇女顾客没被忘记，他们呼吁她们想想丈夫、兄弟、儿女，要么是让家人的牺牲更光荣，以免到头来一场空，要么是为了抹去他们所经受过的恐惧。除了公告外，还有一些身前身后都挂着宣传牌的“三明治人”在街头巷尾散发政治纲领。尤其是政府用上了军用卡车，四处进行布道，前面，一辆卡车带着一个军乐队，第二辆上则是散发传单的人，第三辆上是一位演说家，每到十字路口，广场，车队就会停下来，在那里，演说家大发讲演，称赞艾伯特和谢德曼，接着乐声四作，卡车又出发了。

在选举前一星期，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周刊——《画报》^①——的封面是多么发人深省啊！一个天真的、旨在触动大众的象征，新日耳曼国，再不是戴着战时钢盔的接生婆，而是一头金色长发的少女，没戴帽子，身穿民间服装，一只胳膊下夹着《摩西十诫》，另一只胳膊撑在投票箱上，投票箱里如雨点般飘着选票。在她身后，旗帜飞扬，一群人正在跨越悬崖，朝着充满万千阳光的地方前进。

选举当天，在柏林，有七个师担任纠察任务。每个投票室里有一支配着机枪的护卫分队。窗户，屋顶，都有士兵监视。如果选举队伍在街上排得太长，成群的纠察兵就会将他们疏散。普通车被禁止在城中穿行，只有画着圆形白底红十字的英国救护车，或者是浅灰色板壁的法国救护车可以来往。

凯斯勒伯爵在1919年1月19日这一天的《日记》里记述说，他在下午时

^①指莱比锡的《画报》。

来到他所属的被设在一家小旅社里的投票室。各党派的代表一言不发，将选票发到男女选民手中。一些家庭举家前来，带着孩子，有机会的话，还带着佣人。“四处都寂静无声，愁云惨淡；没有激情，没有狂热……”

与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相反，新近才组建的共产党最终决定拒绝参加此次选举。其他所有党派都在竞争那421个席位。独立党和多数派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来参加全民选举，除他们之外，其他党派也进行了一些重组，改变了一下战前的政治格局。中央党一直都保持着原名，其目的是成为一个庞大的基督教党派，将新教徒也包括进去。保守派不存在了，国家自由党和进步党也没了，这些右翼组织突然间烟消云散。与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派别集中在民主党里。人民党集合了传统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工业家和企业主；其领导人之一是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德国民族党更为右倾，包括了所有1914年以前的保守人士与帝国主义者。在所有这些党派里，只有独立党、多数派和民主党要求建立共和国，虽然观点各异。

参加选举的人达到83%，在被统计出的3700万选民中，有3000万人参加了投票。妇女、士兵、年满20岁的青年——像以前一样实际只是大于21岁的人——从此都有权投票，因此没多少德国人能最终听从共产党和几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弃权号令。结果显示多数派获得大胜，得到38%的选票，并且通过这次胜利，其影响在人民阶层得到加强。

这种结果意味着革命已经结束。独立党退化成一个右翼组织，尚有许多革命人士的支持，但它的选票甚至还不到8%。它没有得到它所希望的50%的选票，不得不在它右边寻觅盟友，在以资产阶级选民为主的党派中寻觅。

真正的胜利由议会制再次获得。德国人曾在政党全民选举中同意了多数人意见，这些政党在1917年要求国会将各项制度民主化。多数派、中央党和民主党——来源于进步党与国家自由党的合并——共同得到了75%的选票。正是因为他们的联合，全新的德国共和国才得以建立。就和到1922年末为止相继出现的五个政府中的那四个一样，组建于1919年2月13日的谢德曼内阁便依靠着这一联盟。

在产生于全民公决的国民议员中间，有37名妇女。德国是第一个让妇女在众议院里当代表的国家，这比起法国来是一个巨大进步，因为法国妇女直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才获得选举权。这些当选者中多数人属于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国会里后来还拥有了一个洗衣女工、两个过去的佣人和一个保姆。不过中央党也有6个妇女代表，其中有天主教妇女团的主席埃德蔚格·德兰斯菲尔德。民主党里有5个，其中有德国妇女团主席格尔特鲁特·鲍依美尔。

一个历史景点：魏玛

2月6日，议员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所选的地点既不在波茨坦，也不在柏林，而是在魏玛，图林根一座拥有6000居民的城市。这里有20余个学会的总部，德国文化中最伟大的名字与之均有联系，歌德和席勒的墓地就在此城，巴赫曾是这儿的管风琴演奏师，弗兰茨·李斯特曾与其国立剧院息息相关达12年。此外，这还是一个宁静的地方。和柏林比起来，它的优点是不可忽视的，它几乎没有工厂，没有全副武装的无产者，没有动乱，立法者们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2月6日这一天，魏玛下着雪。然而，大量看热闹的人还是如赴约会般前来观看人民的新代表们庄严的入场式。曾进行过辩论的剧院大厅被饰以花簇、花叶、花环，人们呼吁用那个半圆形舞台来接待政府成员与议会办公人员，于是舞台被铺上了红地毯。由于缺少汽车，议员们是坐火车到达图林根的，然后他们乘坐有轨电车接踵而至。艾伯特和政府成员们则拥有官方当局的专用汽车，他们一下车，就受到等候在剧院门外的军乐队的礼遇。

所有这些人会聚一堂为完成尚待完成的任务。第一项任务很快解决：2月11日，德国人听说他们从此会有一个总统，即社民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这只是委任给他的一个临时职务，等到德国一旦有了一部宪法后再进行共和国总统选举。实际上，这是议员们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最终制定一部宪法。在前一年的11月14日，艾伯特曾让柏林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胡果·普罗依斯，起草了宪法草案。

议员们首先得对一个棘手的问题表态，即与战胜国的和平问题。未来和约的文本已经在巴黎的和会上起草好了，却未与德国人进行任何商量。当这份文本于5月7日交给德国代表团，让他们签字的时候，所有右翼和左翼的报



无权参加巴黎和会的面孔阴郁的德国代表团。

刊都怒吼起来，诅咒那种让德国人民屈膝于人、忍饥挨饿的丑恶想法。

于是各城市民众被动员起来，进行示威，组织宣传运动，呼吁拒绝在屈辱

条约上签字。组织者和参加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可是对于协约国列强，尤其是法国将成为帝国主义剥削者，工人们也不能无动于衷。《画报》发表了一幅封面插图，图中，西格弗里特挥舞着利剑，叉开五指挖土，仿佛是要发掘宝藏，口中高喊：“别碰我！”

5月12日，谢德曼在议会宣布，他不会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说条约上的条件在他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他为此从政府辞职。很快，他党内的同事古斯塔夫·鲍尔接替了他，这个人的观点是建议在条约上签字，否则会看到德国被投向混乱之中。国家已没有能力去反对协约国的决定了，因为它刚勉强重新找到一点稳定。诺斯克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也持同一观点。人民太沮丧了，国内的危险太大，他说，以至于德国不能冒昧地拒绝和约，无论协约国所提的条件是什么。

最后，议会于6月22日在魏玛以237票对138票接受该条约。四天后，

一个新的德国代表团在鲍尔政府的外交部长海尔曼·缪勒亲自率领下，来到凡尔赛。凡尔赛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签定。德国失去了阿尔萨斯-洛林和它在非洲的殖民地，它不得



1919年德国慕尼黑3万多人抗议凡尔赛合约。



不把土地割让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而萨尔地区被交付国联控制。比起其1914年的疆界来，它的损失占了国土面积的1/8。此外，它还必须减少军队中职业军人的数量，最多只能维持10万人；而且，义务兵役制也被取消了。

议员们的时间和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对宪法草案的讨论上。讨论持续数月，由此产生了一大堆条款，最终于1919年7月31日被通过。自从1918年11月9日以来便呼之欲出的共和国在德国成为现实。

这部新宪法于1919年8月11日由艾伯特总统正式颁布，它使整个德国领土呈现为一个统一国家。联邦制并未被取消，但被重新整治了一番。帝国的25个州归并成17个地区，拥有有限的立法和行政独立权。金融权从此属于中央政府。政府由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出的国会——按比例计票——产生，但从本质上说亦可算是总统制。有七年任期的共和国总统也是由普选产生，但在危急情况或国会中没有多数的情况下，他有解散国会并自行任命内阁总理的职权。最后，第165款给予工人和职员参与企业决策、控制和管理的权力。

起草这份宪法的宗旨，是着力于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的民主化，但奇怪的是，整篇文本里一直小心地避免“民主”这个词。德国仅仅被指定为共和国，其政治权力来自于人民。

胡果·普罗伊斯曾要求分割普鲁士邦，因为他觉得普鲁士邦对那些军事行动以及后来所遭受的失败负有责任，但未被允许，它依旧保留了其霸主地位。对于国家的经济组织来说，有一个条款谈到要在企业中建立理事会，然后建立一个地方议会，而在最高层是国家议会，不过只有那个所用的词对著名的工人与士兵理事会来说还有点关联。至于国会，当然是给了它一些权利，但根据宪法第48条，共和国总统可以解散它而实施全权管理。

于是，在魏玛设计的这个体系就有很大风险了——20年代末便已显现出该风险——人们会看到它产生效率低下，会看到国会无能和专制统治等现象。正是借助第48条，共和国总统兴登堡于19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担当总理一职。

不管怎样，在大量讨论并投票通过宪法后，凡尔赛条约被批准了，暂时借用给歌德与席勒所安息的城市角色也到此为止了。国民议会可以在柏林

的前众议院大厅里关起门来继续辩论。这一过渡是在1919年初秋完成的。在人们的记忆中，魏玛不再象征古典的文化传统，它近来的另一个名声逐渐抹煞了其他的名声。这名声不是来源于宪法投票，而是来源于按协约国条件接受和平。在人们的头脑中，它不可避免地让人想到了投降、屈辱、软弱这些词。战争赔款，鲁尔区被法国军队占领，这些只会助长那几乎普遍存在的无理掠夺之感。民族主义者，后来是纳粹很快养成不遗余力煽动情绪的习惯，鼓动人们复仇，鼓动他们重新发动战争。

天生脆弱

魏玛共和国诞生了。它产生于一场战争，这里有发战争财的人，有不知疲倦、尚自活蹦乱跳的狂热之徒。它产生于一场被镇压的革命。产生于对秩序的回归，这秩序建立在过去威廉二世时期的社会势力阶层、皇家军队干部与社民党领导人之间的联盟基础之上。从诞生伊始，它便很难不被右翼势力咬住。

它拥有什么力量来支撑自己呢？在极左派那边，明显没人把它放在心上。古斯塔夫·诺斯克，这个昔日的普鲁士伐木工人，他在新的一种砍伐行动中重操旧业，其所进行的镇压甚至让德国工人运动出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断层。至于右派的宣传则广泛浸透了流行的公众舆论，它把共和国各制度说成是衰败到了顶点，它煽动人们跨越这一衰败境况，抛弃所有它认为是曾致力于毁坏帝国的东西，抛弃所有它指称为“十一月叛逆”的东西。这一指斥稍晚以后便属于纳粹了。

在每日的闲谈中，在商人那里，在办公室，在城镇乡村，通常所兜售的论点是：魏玛共和国不是德国的，它是外国的舶来品，是威尔逊总统所想要的，是被外国军用货车运载而来的。人们从反犹太军火库里又一次拿出了永恒的犹太人谋反论，因为宪法之父胡果·普罗伊斯原为犹太人，魏玛共和国又成了“犹太人共和国”。^①

^①为回应这些进攻，犹太社团还勇敢地前来散发传单，张贴告示，公开为自己辩护。



1919年11月，当国会再次进行辩论时，兴登堡元帅给出了有利于民族主义宣传的另一种论点。为确定谁应对战败负责，被召来面对调查委员会时，他声称皇家军队并未在军事上被人打败，而是从后面被出卖了。他说，德国遭到了为反战而斗争的各种势力的暗算。这便是——一个广泛流传、根深蒂固的从背后猛刺一刀传奇的开始，它被倒转过来针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赞成民主的人。德国被比做西弗格里特日耳曼史诗《尼伯龙根》的英雄，他是被人叛卖受伤而死的。

真是令人惊讶的矛盾，恰恰正是兴登堡在1925年4月取代了艾伯特，被选为共和国总统，并对共和国失去了信任。由于按预计，1922年不能进行总统选举——其原因是国内局势太乱——议员们投票通过了宪法第180条附加款，根据这一附加款，艾伯特可继续履行其临时职务，一直到1925年6月30日。但他于2月去世，死于阑尾炎。他忽略了病情，没有及时治疗，结果恶化成腹膜炎。

这是一个举着君主制传统招牌的魏玛共和国，其体现在兴登堡身上的这种矛盾从1919年开始，就在许多德国人头脑里显现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更何况，被看做代表着共和国体制的政府在高层行政部门里什么也没改变，它仍在使用帝国体制时期的文武官员。

所有的罢工、动乱，所有的人民起义，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了。比如说在鲁尔区，1920年3-4月间，当根据协约国规定的条款，该地区被辟为非军事区时，独立部队杀进去了。汉堡是1923年10月。同月，萨克森州，一个在社会党人和共产主义党人之间合法建立的联合政府被宣布违宪并被解散。起义者马克斯·赫尔茨在福克特兰德组织了一支“红军”，为抓住他，政府曾悬赏5万马克，最后他于1921年4月被捕，并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判终身监禁，只是在一次抗议斗争——参加者有贝尔托特·布莱希特、艾贡·艾尔文·基施、海因里希·曼、库尔特·图柯尔斯基、阿诺德·茨威格等作家，而艾尔文·皮斯卡托上演了一部戏剧，用几个场景表现不公正，以此来予以支持——之后，这位新罗宾汉才被释放。

相反，从政府那边来说，针对权力阶层所发生的右翼势力的暗杀与夺权却没花费多少精力。当他们被判决时，得到一种出奇的宽容。1919年，由社



啤酒馆暴动失败后的希特勒。



1924年在监禁期的希特勒和他的暴动伙伴何曼·克里贝儿（左），私人司机爱默尔·毛里斯（右后）。

民党政府张贴在墙上的海报宣称道：“柏林是领你跳舞的死神！”这句话借用了瓦尔特·梅林的一首诗，在这里的意思却被转换了。

1920年3月13日，柏林发生了一起旨在建立军人独裁的政变，发动者是沃尔夫冈·卡普以及艾尔哈特·鲁登道夫、吕特威茨和帕布斯特——而且在暗杀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希事件中，帕布斯特就曾参与其事——只不过有工会的干预，政变方告失败，因为各工会发动了一场总罢工。鲁登道夫设法逃到慕尼黑，吕特威茨逃到匈牙利。在被捕的三个阴谋家中，只有一个人被判在监关

押：即雅戈夫，他本应在预料中的临时政府里担任内务部长一职。卡普跑到瑞典避难，于1921年未被送交法庭审理，调查委员会还没来得及裁定其罪，他便于一年后死在狱中。1926年颁发了大赦令，与此次政变有牵连的军官甚至还拿到了补贴，总额等于他们所未能领取的军饷数目！

艾尔哈特在巴伐利亚靠着他所指挥的海军纵队残部与额外招募的几个新兵，组织了一个行动队：执政官组织，任务是清除“国家敌人”。在他手上，



1922年6月24日，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倒下了。当时拉特瑙从柏林郊区的绿树林别墅里出来，当他的车与另一辆车迎面而过时，那辆车枪声大作。他的司机赶紧将他带回住处，但很快便伤重面亡。这一罪行引起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共和国的示威活动。几天后，暗杀犯之一泰科夫被人发现，先是被判十五年徒刑，后来减为七年，结果只执行了四年。接着，他重新学习法律，成了一名律师。除了两名直接主犯——一个中弹而死，另一个在警察局参与此事要逮捕他时自杀了——以外，其他13个人则受到了微不足道的刑罚。在他们中间，年轻的恩斯特·冯·萨罗蒙服五年徒刑，后靠着讲述他所立的功劳，进入了成功作家的行列。

1923年11月，一个原籍奥地利、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新近从德国军队以下士身份退伍，他在慕尼黑最有名的一家啤酒吧的一张桌子上乱蹦乱跳。酒吧里，在巴伐利亚州总警长冯·卡尔的主持下，聚集了爱国团体的成员。希特勒宣称政府已被废黜，军队已进入慕尼黑，不定何时便会走在柏林城中。他说，鲁登道夫将军——这个人在表示同意后，确实接着就来了——将是其作战部部长。一阵惊讶过后，卡尔——在他也公开宣布与希特勒联盟后——给柏林打电话进行反对。第二天，骑兵部队向暴动者冲杀过去，事情没花多少时间就解决了。鲁登道夫在家里被捕，而希特勒在试图穿越奥地利提洛尔边界时，被一个护林员抓住。这位新党派——德国工人社会民族党——领导人的政变企图就这样完结了，他被判五年监禁，不久，就被减为九个月。鲁登道夫则完完全全被宣告无罪。

至于阿尔科-瓦莱伯爵，他曾在慕尼黑杀害了巴伐利亚社会主义自由共和国的创始人，独立党人土库尔特·爱斯纳，他的死刑判决被改成终身监禁，在度过四年牢狱生活后，他被非常体面地释放了。还有一个与一位温和的人上有关的典型例子，那便是马提亚斯·艾尔茨贝格尔，签订停火协议的人，他在回到莱特洪德时，发现柏林正沉浸在一场他所不赞成的革命之中，还联合起来要建立一个共和国。1919年7月，他被张贴在斯图加特墙壁上的海报指称为德国人民的罪恶守护神，是制造失败的工匠。六个月后，在柏林最高法院门前，一个从前的学员军官朝他开了两枪。他奇迹般地再次逃过此劫，只是肩膀上受了点伤。暗杀犯仅被判了18个月监禁，法庭裁决说，他的行为其

实不过是受了理想主义动机的控制而已。1921年8月26日，发生了一起新的暗杀活动，这次可是精心准备的，而且也成功了。杀人犯是原海军军官，叫海因里希·提勒森，逃到匈牙利去了。1933年纳粹党掌权后，他像英雄般归来。

难以克服的矛盾

这些刺杀、暗杀、动乱、示威是初期魏玛共和国的特点，^①构成了总体氛围的背景。多么矛盾的场景啊！到处都意见对立，剑拔弩张，激烈极端，在人们的印象中，仿佛这是个怪诞的天地，是个不真实的世界。在柏林和各大城市里，居民区是一片寂静，但这寂静并不能让人对大家在街上正互相砍杀有丝毫怀疑。^②当身边面对着失业、精神困境、穷苦，当人们所关注的不是如何生活、而是如何生存时，小餐馆、剧院、电影院里便会集满人群。艾伯特，这位共和国总统，在报纸上被丑化，成了被评头品足、说三道四的对象，而他在大概六年时间里，进行了不下173场诽谤罪诉讼，试图得到公众对其职务的尊重！

这矛盾难道就没有发生在新生共和国的心脏里吗？在所有公共性建筑上，凡是能表明皇家政体存在的铭刻文字全都被抹掉。在柏林蜡像馆，再没有威廉二世的塑像了，但这位皇帝的肖像在大部分旅馆、店铺里幸存下来。就连制订宪法时也在两种国旗方案之间犹疑不定，官方的颜色是1848年革命的颜色，即黑、红、金，但在贸易活动中，旧的皇旗颜色被保留下来，即黑、白和红，只不过在远处角落里盾形的共和国颜色。

不管怎样，现在新德国好歹有了个属于自己的国庆节：1919年8月11日，即正式通过宪法的日子。这个节日，后来逐渐地便只有社民党去庆祝了，尽管在这一天，所有的城市和村镇都要鸣钟。

^①见E.J. 奈贝尔：《1919年—1929年德国的政治罪行》，夏尔·勒贝尔译，伽里玛出版社，巴黎，1931，11页。

^②关于这一矛盾氛围，恰恰得看斯蒂凡·赫尔姆林的小小说《科纳琉斯桥》。



第三章 昔日空间与新的国界

长久以来，德国被封闭在一个不确定的空间里，只从1870年后才统一，像个人造国家似的由一些分离的碎片拼制起来。在这里，普鲁士无论是从其领土面积来说，还是从其典型的行政手段来说，都拥有霸权，但它并未在总体上成为一个主心骨，大量的河流和公国导致了非常明显的地方本位主义。众地区和省份各自为阵，夸耀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习惯、方言，几乎是其地理环境上有多少不同，这些事物就有多少不同。

从传统上说，几个世纪以来，纽伦堡和慕尼黑周围的土壤里更适于播种啤酒花，而沿莱茵河各省份的土地上则覆盖着葡萄。荷尔斯坦因州和梅克伦堡州因养马而著称，黑林山州则因养羊而出名。在北部，草地适用于交替式生产牧草和麦子，而在莱茵州、萨克森州、图林根州、巴伐利亚州，夏季田野里种植苜蓿或土豆，后一年便种冬小麦，第三年种植夏麦。普鲁士东部到处是湖沼、平原和稠密的森林。

德国人这种保障基本生活的方式的多样性与其气候及地区特点有关，也进而产生了不同的脾气情绪、居住习惯、团体生活。一个旅客若从波美拉尼亚州到萨克森州，就会有身处不同国家的感觉。而且更突出的感觉是德国工业化发展程度不同，因为在世纪初，仅萨克森一州的工业就占了德国工业的14%，而其土地面积只相当于德国总面积的3%，还因为其主要城市——克姆尼茨、普劳恩、莱比锡、德累斯顿——的人口在50年中增长了四倍。

一块一块的德国直到后来才有了一个首都。1885年，柏林有100万居民。这个比巴黎先进15年的城市拥有地铁、电灯照明和十分密集的电话网络，但这仍不过是个省城，街道上拥挤着独轮车、农民的马车，它没有自来水，晚

上10点钟——公共娱乐地点最晚到11点——以后就没有任何活动了。19世纪末，那里没有太多的贸易和金融活动，还不如汉堡、不来梅、杜塞尔多夫。只是从1900年开始，由于有几十万东部移民，它才成为能吸引整个德国国内各地区兴趣的大都市，有了约三百万居民，在1914年前夕，终于获得帝国之都的地位。工业家和银行家在那里建立起公司总部，交易所行情能与伦敦和巴黎的交易所相抗衡了。

柏林在二十年里的直线上升，其贸易和文化影响，在德国人的精神里，无可辩驳地便利于从属于同一民族的意识。1910年，环球采访的记者儒勒·于莱走遍德国，调查帝国各州分离的可能性。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尽管地区间存在所有这些差别，甚至还经常反对普鲁士的霸权主义，但德国人自己感觉还是团结在了普鲁士的王冠和威廉二世之下。

对于这种统一整体的意识，儒勒·于莱承认，它还是个全新的事物，但如果在感情里没有实现这种统一，如果巴伐利亚人和萨克森人时刻不忘将普鲁士人当做他们斥骂的靶子，那么在精神上也不会形成这种统一：“利益通过纪律这根连接物将德国人汇聚在一起。在帝国里他们得到了繁荣，他们理应是帝国主义者。”^①

四年后，儒勒·于莱的这一想法完全得到了证实。在巴伐利亚州，面对有无必要跟随普鲁士去作战的问题，曾出现过一些迟疑，但最后，出于对帝国的忠诚，全德国的步伐都一致了。社民党因国家防务受到威胁而凝聚在一起，而且这一凝聚对于将德国民众团结在为民族集体义务效忠、而不向各种分裂主义让步的行动之中不无贡献。

就这样，1914—1918年的战争对于约六千万德国人来说，代表着第一次共同经历，这场战争巩固了德国的团结。从1918年11月开始，当失败的耻辱和不幸降临，某些人把所有责任归到普鲁士身上时，分离主义者们又活动起来。从他们这方面讲，民族主义者，然后是纳粹，他们都不会忘记歌颂战场，以激起全国的冲动。如果说革命运动正相反，能像导火索一样从基尔港迅速传播到斯图加特、慕尼黑和柏林，那也是源于这场全民都体验到了战争。

^① 儒勒·于莱：《巴伐利亚与萨克森》，夏庞提耶图书馆，法斯盖尔出版社，巴黎，1911，181页。



新的国界

新的德国共和国将一个国家作为遗产继承下来，在这个国家里，几个世纪以来，分裂都是自然而然的情况，可又慢慢地，尤其是由于一种共同命运所造成的偶然情况，出现了作为一个民族生存的模糊情感。它不可避免地带上这个既古老陈旧又近在眼前的昔日岁月的伤痕。在诞生之时，它就有四散分裂的风险，何况它是内部压力的口中食。正因为如此，魏玛宪法里所定义的德国是一个有着明显统一趋势的联邦国家。社民党把这个共和国放在洗礼盆里作了洗礼，他们的意志是延伸业已消亡的帝国，在其中保持住国家领土的统一性，同时承认这个领土被分成了几块。帝国制度下的25个州被改成17个，但普鲁士没多大变化，在那里依旧是首要成员，其人口占整个德国总人口的2/3。此外，首都柏林在中央集权统治中重新发挥起主导作用。

这一集权在相对较新的地理空间里开始运转，之所以说地理空间也是新的，是因为它被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改变了。魏玛共和国在一个被协约国，尤其是被法国截了肢的德国里行使其权威。在法国领导圈子里，背后的想法是一方面分裂德国，以便阻止它重新快速形成不利的力量，另一方面使得法国能在富饶的德国土地上获得补偿，以便重新刺激经济生活。

比如在西部地区，相对于帝国时期来说，德国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失去了14500平方公里，在萨尔地区丢失了1881平方公里。克里孟梭要求萨尔地区完完全全地附属法国，但英国人和美国人拒绝了，同时又承认法国在北部所损失的煤炭应该得到赔偿。最后，经决定，萨尔地区将由国联管理15年，其矿产由法国开采，等到期满时，萨尔人将举行全民投票，来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回到德国。

仍然在西部，奥伊彭和马尔梅迪两区曾于1815年并入普鲁士州，而比利时要求得到它们；斯雷斯维希，它于1864年被俾斯麦归并了，现在丹麦要求得到它。一个是在1920年2月10日和3月14日进行投票，其他的是在1920年7月24日。各自的民众态度坚决，3/4的人要求把北斯雷斯维希地区归到丹麦，把南斯雷斯维希地区归到德国。在比利时那边，由于在相关地区有军

队的切实保障，它几乎是全票通过而被归到德国。

帝制德国被改动最大的是东部，即普鲁士一翼上。被普鲁士、沙俄和奥匈帝国瓜分的波兰在协约国筹划下复兴起来，被亚当·米切维奇这一代浪漫主义者所歌颂的一个独立波兰的梦想实现了。约瑟夫·皮尔苏德斯基于1918年11月9日从马格德堡被释放，他是在1917年7月被关进去的，在带领武装志愿军与俄罗斯作战，接着与霍亨索伦王朝及哈布斯堡王朝断绝关系后，他被作为英雄迎到华沙。摄政议会授予他完全权力，宣布成立共和国，组织一个政府。直到1921年为止，波兰一直忙于从军事上把其国界线强加给它的邻国，其中包括德国。这些与协约国的决定相关联的愿望最后导致老普鲁士地区支离破碎。

波兹南地区是一个过去被叫做波森的城市，很不公平地属于普鲁士，由于人口大部分是波兰人，所以现在成为波兰的了。此外，由于波兰应该拥有一个自由的人海口，便在德国领土上、在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州之间人工开辟了一条100公里长的波兰大走廊，通到波罗的海。丹奇希城，即今天的格但斯克，它则获得了自由州的地位，由国联一位高级官员管理，但铁路和海关由波兰控制。最后是上西里西亚地区，它自1740年以来就是普鲁士的，现在经过一些混乱之后，根据一个1922年1月15日突然达成的德波协议而被瓜分了。

对于普鲁士来说，丢失的领土还有梅梅尔——它先由协约国管理并由法国军队占领，后于1923年2月归并到立陶宛——和西里西亚的呼尔琴——被捷克斯洛伐克吞并。在前面的地区，47%的居民说的是立陶宛语。在后面那个地区，大部分百姓讲摩拉维亚语。

至于莱茵地区，它倒总还属于德国，但被协约国占领了。莱茵河左岸被分成三个地区：北部地区，即科隆一带，必须在五年后将居民全部移走；南部地区，即科布伦茨一带，十年后疏散完毕；最后一个在美因兹一带，十五年疏散完毕。法国政府起初打算在莱茵河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但终于同意英美代表的意见，因为英美代表可不愿听人们谈什么合并，也不想听到这种解决方式。科隆成了大不列颠总司令部总部，美因兹是法国最高军事指挥总部，而科布伦茨是美国指挥部总部。1923年2月，美国军队离开了莱茵河地



区，但按预期五年前就应完成的疏散居民工作，直到1930年6月才最终着手进行。

心理效应

战争一结束，大部分德国人便跌入了战败的混乱之中，跌入了革命暴动和罢工所引起的恐慌之中，跌入了疾病传播和穷苦不堪的生活之中。他们面对这些领土的改变一直都很被动，但是一小部分不满意的人立即投身于民族主义躁动里，他们至少多半是反对共和国的。东部地区的独立部队进行干涉，反对波兰1919年和1921年所提出的要求。一些秘密组织准备了暗杀活动和战斗，抵制凡尔赛和约里的条款。整个宣传挑拨起潜在的不满情绪。由于经济困难，紧张气氛更加浓厚，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虽到那时仍很冷淡，但对民族主义论点也敏感起来。这些国界和被占领土的问题后来是右翼和德国极右势力常用论据的一部分，从心理上影响了各阶层的舆论，加快了纳粹的竞选进程。希特勒在被召到政坛后，从1933年开始就不停地通过强力来处理这些问题。

普鲁士被波兰分解，这特别触动了德国帝国主义领导界及其所能影响之人的那根敏感的弦。德国原来西到莱茵河，南至多瑙河河谷，东面日耳曼—俄罗斯大平原，北接海洋，对于统治者来说，问题只是选取这个或那个地区为轴心来推行领土扩张政策。但自从12世纪条顿骑士时代以来，能满足其征服欲望的传统首选地区正是东部。

正如布洛王子1913年在其《德国政治》里所写的那样，德国感到自己在东部被赋予了一种文明使命。为什么？因为，按他的说法，德国人在道德和智力上比斯拉夫人高一等，尤其比波兰人高。这便是过于简单化的种族主义原则，它引导着普鲁士在东部的殖民活动。在大多数人那里，除了少数特例外，普鲁士人都相信这种德国和德国文明高人一等的说法。对于工程师、教师、工业家和商人来说，波斯纳尼亚和西里西亚的领土均包括在他们的行动范围之内。

1914—1918年的战争助长了贵族和帝国主义者的梦想，他们认为从芬兰

他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驻莱茵各省高级专员——的庇护下，从美因兹法国文化处开始，一项教育任务、法国化任务被系统地操作起来。开展整个这场活动就是为了把莱茵人吸引到法国文化这边来。他们组织法语课程、展览，甚至还创办了一份法德语出版物《莱茵杂志》。这一宣传并非毫无成效。一部分莱茵河各地区本土的居民——比法国所能估计的要少得多，这倒是真的——显得都还能接受。但面对如此明显露骨的意图，柏林中央政府，更广泛地说，把德国作为民族来热爱的德国人，也不能总是处于被动地位。

由于害怕形成一个独立的莱茵国，中央政府——它被授权可在直至被占领地区的领土上提供公务员职位——有条不紊地将这些职位给予原籍不是莱茵地区的德国人。通过1920年11月15日的一项命令，由协约国组成的高级专员部强迫德国当局提供所有新任命公务员的身份证明，同时还认为，莱茵人到1921年在海关已不仅只占三分之一的位置，在宪兵、金融、教育行业中不仅只占一半位置了。莱茵省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也被一下子取消优待，因为大部分新任命者来自于普鲁士新教地区。分裂主义倾向没有被加以阻止，它在这里找到一个额外机会来变本加厉地活动。

鲁尔省于1923年1月被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一时间弄得天翻地覆。面对德国政府关于解决偿付赔款一事时的恶劣态度，法国和比利时政府决定派军队进驻鲁尔矿区盆地。德国始料未及，到处出现了疯狂开采。工业家们，特别是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炭大王胡果·施廷内斯下令进行消极抵抗，拒绝向法国交纳预期的煤炭。这就是德国所称的鲁尔之战。在德国公众舆论里，这仿佛又回到了针对法国的战



1923年1月，法比联军进军德国鲁尔。



1923年1月，德国人上街游行，抗议法比联军进占鲁尔。

争状态中，此次行动的负责人普安卡雷则因被各报纸称做“丢人现眼的普安卡雷”而名闻天下！

正好在这个时期，美国政府向它的军队下令撤出莱茵省。这次撤军与先前的鲁尔事件计划相呼应而无任何关联，但

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效应。报刊大量报道了在科布伦茨的艾伦布伦斯坦城堡举行了正式的仪式。一大部分德国民众感觉这是对协约国的一次胜利，是他们共同处境中的一个断层。

消极抵抗后来由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新内阁宣布结束，接着一直到1923年10月，一场针对莱茵省法国人的暗杀运动展开了。法国人，无论是士兵还是一般居民，在大街上被人辱骂，甚至有时还受到攻击。铁路线上频繁发生怠工。面对所有这些事件，法国最高指挥部决定用最极端、严厉的手段来做出反应，任何从事恐怖活动的人都将被判死刑。

就这样，一个曾在反波兰人的独立部队里战斗过的年轻极右军官，阿尔伯特·莱奥·施拉格特，于1923年5月一次怠工行动中被捕，很快被判死刑并枪决。反法民族主义者对此大发雷霆。受害者是一个最近才成立的党派德国工人社会民族党新招收的成员，他的同志们歌颂起他的往事，就在他被处决的地方，即杜塞尔多夫附近的戈尔茨海姆荒原之上，竖起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以便通过人们的瞻仰来维持那复仇的欲望。在施拉格特身上，纳粹党人赢得了一位英雄。像这种人，要在第三帝国时期，早就给他无上的荣誉了。

反对法国人的另一个原因是占领军中黑人的存在。皮埃尔·马克·奥尔兰曾经历过占领莱茵省的初期时光，他用一种非常巧妙的和缓语气描述了他



们。^①这远非许多德国人的看法，在该问题上，他们受到了报纸、海报、传单的种族主义毒害。非洲人被指控为伤风败俗、偷盗、斗殴。这种所谓的“黑色耻辱”——仿佛是名正言顺的——只不过是一种政治诡计，而且被马克西米连·哈尔登完全识破了。这个人在其《未来报》^②上为士兵们的肤色、纪律进行辩护，让德国人走近一点看看他们自己的弱点，看清楚有很多非常德国化的妇女为了出卖自己的魅力，毫不犹豫地摆出极具挑逗性的姿态。

据可信的统计数字表明，有3841个私生子被记在了莱茵占领军的名下。光美国军队，虽然仅待了三年，就得对1851名非婚生子女负责，英国军队有988个，比利时军队有199个。至于法国军队，在总共十二年时间里，有767个。占领军中美国人有5000人，而法国人约有6万人。比较一下就知道，由法国父亲生的孩子相对来说要少。而在767个归到他们名下的孩子里，只有15个是有色士兵生的，“黑色耻辱”好像最终没留多少痕迹，与揭发他们的种族主义谣言所说的正相反。^③

事实上，要给法国占领军加罪，何患无辞。在这种情况下，机会数不胜数。对于许多莱茵人来说，每天和法国军人打交道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了，尤其是征用房屋，使得他们不得不在敌对的气氛中与之同住。为了安置军官和副官们的家眷，居民的卧室被征用，还有厨房和厕所。这种在通常很简单的寓所里面被迫与人做邻居的感受，对于莱茵人来说，明显导致厌烦情绪的增长。争吵并不鲜见。莱茵百姓更是进一步相信，法国人的军队是由德国政府出钱维持的，而法国人没有别的意图，就是来吃德国人本来就惨不忍睹的面包的。

事实并不像法国宣传所要让人们相信的那样，莱茵人和法国人之间亲密友爱，都向1930年离去的占领军致意。在同年举行的立法选举中，纳粹党在莱茵地区的黑森省获得超过37%的选票。不管1933年3月5日的选票可信不可信——因为选举是在恐怖之中进行的——他们在同一地区和在帕拉丁省获得了47%的选票。一些法国高层政治负责人助长了人们的幻想，以为莱茵省

①皮埃尔·马克·奥尔兰：《莱茵省》，爱米尔—保罗出版社，巴黎，1928，24页。

②《未来报》(Die Zukunft)

③所有说明数字均见：保罗·提拉尔，《莱茵河上的法国》，普龙出版社，巴黎，1930。

可以学习法国的榜样，现在明白这是不可靠的。

在萨尔省，反对法国的情绪更加强烈。在这片领土上，1927年有77万居民，他们靠一点农业生活，但主要是靠由法国开采的矿产工业。在该产业中所分布的15.5万名工人里，有一半人是在矿上干活。萨尔人尽管对法国文化很感兴趣，但很少有人像萨尔团那样去参加亲法的政治组织，萨尔团一直都是极少数人。相比之下，萨尔布鲁克及其几十万居民——其中有很多普鲁士人——组成了一个积极的反法中心。

公务员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他们对外国当局的敌对情绪。按照他们的地位，他们只是脱离了萨尔省，但仍属于柏林中央政府。真是个模糊状况！因为萨尔省不再是德国的了，而被置于国联的管辖之下。起初，他们因此而拒绝为非德国的政权服务，要求领导机关——这是违反凡尔赛和约条款的——必须掌握在德国人的手中。在几场罢工之后，柏林政府最终决定给予他们一些特殊优待，这样他们才愿意顺从，并于1920年末集体向外国政权宣誓效忠。

然而一种沉重的不满情绪还是保留下来了，而民族主义的宣传很善于利用该情绪。当全民公决被提到日程上来，以便让萨尔百姓决定是否重新回到德国国家领土中去时，纳粹党人搀和进来了。他们通过暴力、恐吓、威胁，来逼迫萨尔人作出正确选择。他们租用公共汽车，好让住在萨尔以外的人去投票，甚至还给他们分发合适的服装。1935年1月13日，绝大多数萨尔人在这些情况下表示愿意回归德国，只有两千多一点的人声称愿意依附于法国。结果，萨尔省于1935年3月1日被归还给了纳粹德国。

德国人对凡尔赛和约所产生的新疆界——还要考虑到被占领土上人口的变化——的反应逐渐表明，他们中大部分人一直都是违心地接受协约国这一决定的。对于所有党派来说，凡尔赛和约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战胜者强加的一种“diktat”（跪受笔录）。就算这凡尔赛和约在德国传播上千份，所有人都熟悉中间的每一个段落，也只会导致恼恨情绪的增长。

这一恼恨情绪几乎专门转过来反对法国了。它被认为应对德国所有的不幸负责，它被指责是热衷于破坏德国。民族主义者将仇恨性宣传集中在它身上。正是一位法国将军，即尼赛尔将军，当他于1919年9月带领一个法英使团考察时，让独立部队同意离开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正是法国人从德国



夺走了萨尔和阿尔萨斯—洛林，是他们想让德国支离破碎的，是他们让德国人民忍饥挨饿。学校里上百万儿童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还有地图作例证。

城市与乡村

纳粹理论家瓦尔特·达雷把德国看做是一个投身于农业的国家，并且想把它弄成一个农业国。然而，这些胡言乱语早已经不符合德国现状了，尤其是在1919年和1933年之间更是如此。自然风光辽阔无边，田野森林一望无际，德国所表现出的这种形象尽管流传很广，却是错误的。到30年代末，德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5人，说明这是一片人口密集度极高的土地。在同一时期，法国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76人。

各地区之间是有差别的。只有东部的普鲁士诸省才呈现出极其开阔的景致和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片土地。其他地方，巴伐利亚省的符腾堡山区或巴登地区，高原与山岭造成一种块块垒垒的地形效果，那里的农业地产都是几十公顷，而不像波美拉尼亚省和梅克伦堡省那样有几百公顷。至于莱茵省，那里天然葡萄还要稀少，农业生产只限于小规模的开发。

事实上，德国是一个城市国家。它的城市化进程从12世纪和13世纪就开始了。到中世纪晚期，它已拥有3300座城市，其中有25座超过1万居民，有3000座拥有两千居民。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11座城市拥有50多万居民，28座城市有30多万居民，53座城市有10多万居民，拥有两千居民的地方有约1000多处。该时期的德国人有3/4是城市人，而他们中又有1/3生活在大城市里。

城市数量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增长的，工业化产生了一些经济大都市，打破了过去的管理结构。1882年曾进行了一项针对全体德国人的职业统计，结果显示：42.5%的居民从事农业生产，35.5%从事工业活动，10%的人在商业和交通产业里，农业生产仍是该国最主要的活动。但13年后，占据第一位的就变成了工业，1895年的统计结果显示，35.7%的德国人靠农业过活，39%的人依靠工业，11.5%的人依靠商业和交通。到19世纪末，德国便跃过难关，成为了工业国家。然后，它按照相同趋势缓步前进。1925年，生产行业里的

德国人数字提高到就业人口的50%还多。同一时期，由于城市改变的关系，办公室人员数目增长了约4%，农业行业里则减少了差不多相同的数字。1931年，工业、贸易和交通部门集中了就业人口的58%，而农业部门只有23%。

克虏伯工厂的发展似乎是该演变里较典型的一个。1826年，在埃森，母店总共加起来所有工人是4名。1843年，它有近100名工人。1880年，作为国家军火制造商的克虏伯拥有1.3万名工人和职员，1910年则达到了6.8万名。15年后，克虏伯成了一个王国，成了城中之城，在鲁尔省的埃森形成一个长8公里、宽1.5公里的城池，有144家商店，11家餐馆、35座食堂、1.1万座工人房舍和一所拥有600张床位的医院。与此同时，埃森，这座在19世纪初拥有3300居民的城市，逐渐合并了周边的郊区和村庄，成为一个城乡大区，人口达到45万人。

20年代的旅行者在游历这个埃森地区时，吃惊地看到熙熙攘攘的工人，成堆成群的工厂建筑和高炉，水渠铁路纵横密布，电线杆塔数不胜数。在鲁

尔盆地边界上的杜塞尔多夫城，有宽大的马路，其间点缀着公园和花园，人口则达到了50万。离它稍远一点便是杜伊斯堡港，其码头长数公里，白鹤满天飞。再就是汉伯恩，有2万居民，几乎全都受雇于蒂森家族的煤矿厂、炼焦厂、铸造厂、炼钢厂、轧钢厂。再往北，便是胡果·施廷内斯统治着的有30万居民的城市多特蒙德。

在鲁尔盆地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个例子。在萨尔省也是一样，那里的莱比锡计有70万居民，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9000人！至于巴伐利亚省，人们对慕尼黑的印象通常是习惯成自然了的：该城市仍是一个农业人口居住地，有啤酒酒吧，会心情愉快地组织大量狂欢节、节庆活动。而它也出现了人口的迅猛增长，从1871年的17万人达到了1900年的50万，两次大战期间更是达到了70万。符腾堡省是一个农业小地



德国埃森的克虏伯兵工厂的一个制炮车间。



产和小规模城市地区（如乌尔姆、海尔布隆、埃斯林根），然而它也拥有一个30万人口的斯图加特，作为因工业化而扩展起来的那些大型城市里的一员，它与德国土地上随处可见的情况也都一样。

这是不是说，在所有省份里，都像这样矗立着一些人都市呢？不是。在法兰克尼亚省，位于松林中的纽伦堡靠着铅笔厂和玩具厂生活，保留了中世纪的魅力。在图林根、汉诺威、哈尔茨、巴伐利亚，许多小城市蜷缩在他们的老招牌、城堡、博物馆、有轨电车里继续生存着，不去适应那些超大人口城市中的狂热节奏。在这儿，整个世界给人的印象是生活在一个与现代德国相隔离的天地里，与它的喘息相隔离，与它的运动相隔离。

然而真能这样吗？二十年来，大城市缓慢而不断地侵吞掉周围的乡村。对它来说，乡村残余不再只起遥远郊区的作用或内地作用了。与这种渐进的吞并相反，村庄里的居民都走出去让城市壮大起来。对劳动力的需要吸引着他们。即使从1920年开始，这场迁移运动大规模减速，城市与乡村也已变得不可分离，其间的对立由于交流与传播而缩小了。

德国拥有一个铁路网，便利了乡村与城市间的来往。它曾被比做是铁轨风景，其铁路每年从北向南和从南向北要运送两百来万旅客以及近五亿吨货物。1/10的居民服务于铁路行业，从管理到火车头与车厢的制造。加上必须得有的桥梁、路堤、库房、隧道，火车改变了荒僻乡村的面貌，在地理和人口上产生了一场动乱。

村庄被现代化了。从魏玛共和国初期开始，马路的修建、电力的推广、农耕工艺与方法的更新、由拖拉机和汽车带来的机械化，这些都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就在通货大膨胀时期，由于担心货币会贬值，结果农民都投资购买了改进物资。

在相反方向上，即从城市到乡村，也出现了一场交流运动。成千的城市居民在休闲时光中大量涌向乡村。要在大自然里漫步，通常是全家同行，这是德国的传统，如今却变得规模巨大。而且，作为城市人与乡里人的连通体，很多村镇都组织起来。它们对袭来的游客特别开恩，造了一些乡间寓所和风景秀丽的客栈，人们认为这是除了包菜与土豆的种植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纽带。

在20年代的德国国内，人口过度增长就这样既对特大中心城市产生了影响，也对小城市和乡村天地产生了影响。虽说1921年和1922年的出生率相对于1913年而言下降了，可是老人与儿童的死亡率也大大减少，结果，在因凡尔赛和约而发生领土的变化后，全国所剩土地范围内的人口从总体上增加了。1923年它增加了50万人，接着，它在十年间就赶上了1910年的水平。

许多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专家由此认为，从1924年开始，德国有2000万多余人口。他们觉得这些过剩人口是德国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甚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德国经济无法保证足够的粮食供应，大多数人已经不得不靠那么点食物过活了，而要对这些人再加限制，是不可能的。

真是同样的境遇，同样的反应。不过，生活方式与精神状况上的差别当然并未消失。魏玛共和国仍在遭受那些反冲之力，尤其是19世纪末在工业德国和农民党德国之间逐渐确立起来的分裂势力。前一种德国的结果是，发生工人运动，工会壮大，在反对专制政体的斗争中所建立的团结得到发展，旨在提高生活和工作条件。另一种德国主要位于易北河东部，出产麦子、家畜，也提供公务员。它由一个封建贵族组成，仍然很保守对所有侵犯其既得利益的行为都加以抵制。它虽是少数派，但凭借其在行会组织中的优势地位，控制着耕作者们的行为。

每个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都会调整其生活方式，受影响的百姓在他们的思维习惯里，也都或多或少地由它来决定。在德国北部的大工业中心，工人群众具有一种阶级意识，使他们远离资产阶级。在德国南部则相反，特别是在符腾堡省和巴登地区，手工业者和小农阶层的人数依旧很多。大部分在工厂里干活的工人与他们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与他们原籍所在的乡村也是如此。在他们的反应中，都倾向于把自己与小资产阶级相同化。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就出生于海德堡，他在战斗于社民党运动之前，曾向一个手艺人学制鞍手艺，是德国南部这类人的代表。

对于农民来说，这个家族式小规模开发的地区所经历的是一种父系制度形式。权力由父亲掌握，以至于如果有外客来拜访这家人，只有父亲能接待他，农场其他成员都得跑到邻屋里去。他绝对处理一切事务，直至遗产分配。如果孩子中有人拒绝服从其权威，将被逐出家门。遵行礼仪，那是不言自明



的天理。

霸主柏林

在德国这个到1914年为止中央权力被分化的国家，每个地区都拥有一个以其光辉文化为必需标志的城市。世纪初，一场像表现主义这样的艺术运动在柏林兴盛起来，不过其飞跃也得归功于德累斯顿和慕尼黑。丰富多彩的经济生活更多地是出现在汉堡，而非在柏林，原因是在汉堡制造了远洋客轮并开通了到美洲的航线。

1918年以后，某些外省城市荣耀与声望犹存，且远播于德国国界线之外。这类情况主要是一些商业城市，像汉堡、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或者是一些艺术城市，像慕尼黑、德累斯顿、科隆，而且对于达达主义运动和一群建筑主义画家来说，它们还是重要的活动中心。可是柏林有着约400万居民，它汇聚了所有的雄心和精力，所有的财富和困苦。有了四墙内那15万外国人的存在，它被提升到国际都市的地位，从俄国移民和前奥匈君主政府的侨民的成就中获益良多。很快，1925年，它就拥有了800平方公里土地、3万家企业和3000家银行支行。

前往征服柏林，正如纳粹头目戈培尔一部著作的题目中所暗示的那样，^①这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些年月里，对所有人来说，构成了一个主导主题(leitmotiv)。商人去寻商机，知识分子去寻生计，掮客和妓女去寻主顾，人人都抄袭着巴尔扎克笔下那位拉斯蒂涅的话，对自己一个劲儿地说：“该我们俩了，柏林！”到处都充斥着高楼、立柱、阶梯、房区，柏林拥有全欧洲最大的啤酒店、最大的旅馆、最大的电影院、最大的剧院。

在西头，是豪华与休闲的街区，其轴心是库菲尔施腾达姆大道(Kurfürstendamm)，在这条大道上有餐馆和露天咖啡馆，剧院和电影院，豪华商店。这里是轻浮之中心、放荡之中心和邪恶之中心。妓女、职业与临时乞丐，和那些伤残士兵一样，在街道尽头顽强地自卫。从9点到凌晨3点，热闹的气氛

^①戈培尔：《到柏林一战》(Kampf um Berlin),1932。

令人心痒难搔，夜总会、小酒吧、灯火通明招徕顾客的音乐厅随处可见。

柏林街区吸引着外省人和外国人。洛特·施瓦茨在一次瑞典之行后回到德国，她叙述说，1919年9月，身为年轻记者的她在回维也纳她所居住的地方之前，决定在柏林停一下，参观参观这个被各家报纸得意地描述成邪恶之都的城市。于是她发现了一个小酒吧，“在那里，一个男人两腿瘦长而裸露着，打扮怪里怪气，衬衫被撕碎，在探戈舞曲中任凭两个穿着夜礼服的女人鞭打”，然后她走进“餐馆的一个后厅，厅内有红绒软垫，里面的人躺在地上，鼻子里正吞吐着可卡因”。从这次夜间漫步中，她说她只得到一种恶心的感觉，一种地狱的印象，“在这地狱里，性与毒品，毒品与性用大量的狐步舞和苦难做交换来出售”。^①

但柏林也有另一种生活，在亚历山大广场那边，东边一侧，有另一种节奏。那儿的小店铺与大商店并驾齐驱。邮局、市政府、警察局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中各有其所，不同阶层的劳动者进进出出。这便是小人物的柏林，有着狂热活力的柏林，在那里，几乎再也不会有人像在库菲尔施腾达姆大道上那样闲逛了，而是从一个有轨电车跑到另一个有轨电车，从一家店子跑到另一家店子，从一间酒吧跑到另一间酒吧。在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用尽词汇，于1928年重现了生活的厚度与强度，重现了这些街区的运动，包括那里的贫民、揩油的人和无业游民，那里的婊子和皮条客。

商业中心、银行、大报社、行政部门座落于该广场的西南方，在弗里德里希街、菩提下大道和莱比锡街之间。它以波茨坦广场为中心向外辐射，该广场到下午便成为散步者与外国游客的首选之处。这个热闹的广场形成一个十字路口，交通十分繁忙。路口中间有一座灯塔用红绿灯指挥交通，这个系统很快便被欧洲所有大城市采用了。朝西北方向，怡目街笔直向前，可与巴黎的拉波埃西街相媲美，有艺术品、古董和奢侈品商场。

在柏林这三个部分的最北和最南，分别是维丁工人集中区和新柯尔恩工人集中区。那里的楼房街区排列成行，一望无边，密集而面貌相同，到处都

^①洛特·施瓦茨：《我誓死欲生》，瑟伊出版社，巴黎，1979，43~44页。



是这种供出租的公寓营——就像德国人所叫的那样——加上狭窄昏暗的后院，淡灰悲惨的宿处。它们中50%以上只有两间房，四到十口人的家庭便拥塞在里面。那儿的卫生设施最简陋，有时是二十多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那儿的空气令人窒息，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是无法饮用的黑水。

柏林，却也就是这样一座城市。要不，它那几百万居民还能聚集到哪儿去呢？外国游客，特别是法国人在德国首都只看到公园、绿地、无碎纸无烟头的街道，只看到清洁的氛围，他们的观察只限于库菲尔施腾达姆大道、菩提下大道，或者诸如威斯腾特、达勒姆和格鲁讷瓦尔特等居住区的环境。他们所看到的柏林只不过是其门面。像亚历山大·阿尔努1931年所写的那样，一切“仿佛都在逼迫着人们不再计算时段，逼迫着他们去超越所有界限而在工作和快乐中耗尽精力，去彻底斩断休闲、积蓄和想入非非那一部分”，这种城市是不存在的，可在那永不疲倦的狂热背后，也隐藏着贫穷困苦。^①快乐嘛，对于几千柏林人来说，也就是在郊区，每周日在一间带两米长、一米宽的花园的木棚里，休息休息罢了。

和所有城市一样，柏林的犹太人社区包括几千人，此外它在亚历山大广场北面还拥有一座犹太教堂和一处犹太人墓地。但在这些历史性的地方，昔日的贫民窟消失了。犹太人街区很久以前就迁走了。据说它曾延伸到阿莱克斯和布洛夫广场之间的小巷交错地带。正是在那儿，20年代，人们听到他们讲意第绪语，人们会遇见身穿东方皮里长袍的老人，一些店子铭刻着希伯来文字。然而，这几乎已是被抹煞难寻的生活了。因为犹太社区在1925年计有17.3万生灵，是在法兰克福的六倍，后来有些人便散居于四海他乡。此外，正如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在其小说中所提到的那样，亚历山大广场的四周不久就只变成一块摧毁与重建的工地，古老的小巷必须让位于现代房区。

柏林还迎接过五万多改头换面了的俄国移民。他们受着恐惧或饥饿的推动，于1919年到1922年间革命胜利之后，永久或暂时地离开了俄国。大体上说，他们属于知识分子或艺术职业人士。例如他们中间有作曲家尼古拉·纳波可夫和大提琴手皮亚提戈夫斯基，尤其是未来的《洛丽塔》的著名作者弗

^①亚历山大·阿尔努：“柏林形象”，载于1931年3月28日的《文学短篇》。



《嘉丽塔》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他在柏林的流放岁月里，以西林之名写了数部小说。不过这块俄国侨乡也包括有许多冒险家，反民主和反犹太人的政客。不管怎么说，随着俄国酒吧和几十家俄国餐馆开业，柏林因为有了一种新的夜生活而热闹起来。

中央集权

柏林是首都，它成了完完全全的首都。它起初是普鲁士的首都，这已经不大重要了，在它面前，其他城市都衰落了，它吸引着所有精神与物质的能源。它仿佛是商业、政治、知识创造的中央环节。在德国，从此一切都由它那里开始，一切又都回到它那里。对于外国参观者来说，再没有别的哪个德国城市能夺走它的鳌头之位。柏林被看做是给了德国一个声音，即使它在模仿别的都城。谁若想了解一下这个国家，一路上就不能弃之不顾。

它在二十年间异常的发展就很能说明问题，但另外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它在国内和国际上为何有如此声望。这就是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结构。虽说联邦制在该共和国时期实际上幸存下来了，只是相对于威廉二世时代而言进行了一些整治工作，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开始了：所有大型行政部门被集结起来。这场改革之父便是马提亚斯·艾尔茨伯格，其时，1919年到1920年，他正好去了财政部。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国家的象征再不是他们那个小祖国了，柏林就是国家。

邮局、军队、铁路，一切都被集中于柏林。无论是居住在萨克森、巴伐利亚或是普鲁士，公务员既不属于这个省，也不属于那个省，而属于德国国家。税务征课经由柏林过，然后再根据需从那里分配到不同地区。

人们意识到德国现在形成了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有一个头脑。而航空网络的发展也促成了这种意识。从1927年开始，离中央四公里处，柏林在旧的坦培尔霍夫搬运场上拥有了一个现代机场，能保证与布达佩斯、君士坦丁



堡、莫斯科、伦敦、巴黎之间的联系。就在国家内部，也有一些日常航班抵达法兰克福、汉堡、布雷斯劳、慕尼黑。由于有了飞机，那些大型报刊每天早上都可分发到全国各地。

柏林不仅仅是完全依靠人为方式而成为中央政府总部的。正是它，把持着实权。





第四章 混乱、矫正与危机重现

“今天是1923年11月3日，买一包香烟得花40亿马克，大部分人对未来已经完全失去信心……”这段介绍性评论是《蛇蛋》的开篇之语，该电影由瑞典影人英格玛·伯格曼执导，标题清楚指出了作者想赋予它怎样的意义。观众被带进这样一个德国，在那里，肥沃的贫困之土上，一切都不过是肮脏交易的对象，包括人的生命。战后这段时期在英格玛·伯格曼看来是纳粹主义的最初起因。他用画面表现了反犹太主义情绪的增长、纳粹集团的暴力活动、一直潜伏着的恐怖和百姓的无能为力与失望。

英格玛·伯格曼的目的，当然不是要忠实再现魏玛共和国初期年月的历史。他首先需要的是—种精神慌乱的背景，以便能证明那困苦、孤独、焦虑的境遇，在这境遇之中，人物登场了。和他所有电影—样，他所担忧的是世界上存在着恶，—个—世界，他认为，已经听任自己被上帝忘却了，人从此就只不过是恐惧与死亡的口中食。《蛇蛋》的主人公，犹太杂技演员阿贝尔·罗森伯格也是，他自然面然地被卷进凶险势力的圈子当中。

这种宿命论观点或多或少地受到德国后来发展情况的左右，仿佛30年代的危机变本加厉，让人又回想起20年代。纳粹党成立于1920年，其冲锋队成立于1921年，但1923年它只有9000名成员，在1928年5月的立法选举中，它尚只得到2.6%的选票。因此德国社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短期内，还没有孕育出法西斯制度。

《蛇蛋》形象地表现出了由通货膨胀现象所引起的当时德国的悲苦氛围。在其中，几千城市人挣扎着，不得已只能借权宜之计来活命。影片中最发人深省的一组镜头是，黑夜快要结束，—匹马倒毙在街道中间，马车仍拴在身

上，两三个人迅速将它当场肢解，一个女人手上鲜血淋漓，拿着它的肉立即以天价兜售给稀稀拉拉的几个夜行人。

幻想破灭，信心不足

这场危机不是突然间落到德国头上的，它起因于从1914年开始就江河日下的财政状况。战前，银行里的存款和储蓄数额极大。1913年达到了400亿马克。在小储户看来，信用合作社储蓄所，加上它们1.7万家分所以及分布于德国全国的250万社员，有助于发展经济并推动投资。战争期间，帝国不得不负债。尽管存款增长了四倍，但货币的流通却更快，差不多提高了六倍。此外，国库发行的债券数量太大了。这些措施导致信贷通货膨胀。到1918年底，马克贬值40%。

政府显得无法控制住这次贬值。许多德国人面对停火协议、革命事件和社会不稳定，感到忧心忡忡，具有经济能力的人于是购买了国库券。有四分之三的存款是由这些国债构成的。虽然1921年头六个月曾有过一段暂停，但马克下跌的势头有增无减。因为信贷需求最终必然要求有现金资本，而德国银行再也无法提供了。

而且，由于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一样软弱无能，德国成了一场严重的瓦解之势的牺牲品。1920年初，一座如法兰克福般大城市的居民已弄不到木炭来取暖了；有轨电车和煤气每天满打满算只运转一个小时。1919年，从7月到12月，在六个月之间，生活第一必需品的成本翻了一番。大多数德国人不得不勒紧裤腰带。1920年，他们被驱使着把日常食品等必不可少的东西缩减一半。

在某些企业里，由于缺乏木炭和油，机器都出故障了，人们又回到手工劳动的时代。^①让这些企业的老板不无高兴的是：工人工资没怎么提高，劳动力最终还是没变贵，尤其是若和原材料价格相比较的话。就算有闲置的木炭，可质量又太差，有那么多渣滓，以至于轧钢厂和工厂里的守炉人强迫司炉

^①于尔根·库钦斯基：《德国1800年—1932年劳动状况史》，自由社会出版社，柏林，1947。



员加倍努力，以便保持住火焰强度。^①

在1919年1月19日为组成一个国民议会而进行的选举中，社民党收到37%以上的选票。在1920年6月6日由此产生第一任众议院的立法选举中，它只得到21%多一点，而独立党从7%升到18%。这些数字，再考虑到右翼诸党的所得，将百姓的不满情绪大白于天下。人们寄希望于社民党所提出的改革，以期生活有所改善，可数月之间，社民党的那些许诺像肥皂泡一样破裂了。

1919年，街头上大量海报都在宣称：“社会化在行进”。可究竟是什么社会化呢？除了它的本义以外，也没多少别的意思了。在有些人看来，应该将经济国有化。在另一些人看来，换一种方式来组织经济就行了。在共产党看来，有必要按照苏俄模式来改变经济。工会负责人所谈的，则是要将生产的关键门类社会化，因为在他们看来，只须这些门类足够稳固即可。不管怎么样，政府还是设立了一个由著名专家组成的社会化委员会。

当“社会化”具体表现出来时，这个词就失去其神秘性了。1919年3月23日法律仅仅只是确立了国家对原材料以及自然能源的生产与分配的监控。针对赔偿问题，国家可把所有以提取土地财富和使用自然能源为目标的企业分派给社区。对这些企业的管理，在适当时候，可以委托给市政府或地区政府。

但这只不过是可能性而已。国家的监控，按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在于设立一些“理事会”（如钾肥理事会，木炭理事会），容纳一些工厂厂主、领导、工人、职员和消费者。他们的作用还是以最有利于集体利益的方式，调节生产与分配。

这次人们翘首以待的社会化因此最终并未触及所有制法。于是独立党投票反对1919年3月23日的法律，并揭发说这是一种鬼蜮伎俩，是一场骗局。真是徒劳的斗争，政府根据魏玛宪法第156条，批准了先前已通过的条款。工人和工会组织在其他方面获得好处。结社权从此被所有人承认，仆佣、农业工人、公务员终于获得合法权益，可以自行组成工会。但是，除了拒绝公务员所提出的罢工权之外，社会化也被降格为协调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

另一个万用词就是“理事会”。1918年，它为革命潮流所独有，指的也便

^① 见威尔纳·艾格拉特的讲述：《仅有一人》，图林根大众出版社，魏玛，1947，37-38页。

是多少相当于1917年末俄国“苏维埃”的一种政治体制。在众多独立党人士甚至斯巴达克同盟成员看来，此观点相当模糊。由此，他们特别想到要让工人阶级控制国家和国民经济。通过工人理事会，他们想让无产阶级当上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主人。

魏玛宪法在第165条里，也用上了“理事会”这个词，但掏空了革命内涵。工人和职员必须由企业理事会来代表，然后在地区范围内是由劳工理事会来代表，更高一层，由全国理事会来代表。后面这两个体制与业主代表合作，被用于在每个地区和整个德国境内组成一些经济理事会，其职责是必须确定符合社会化诸法令的工作任务，在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上监督是否遵守集体规范。

就这样，妥协达成，中央党与右翼各党也心满意足，实际上就不用再参考“苏维埃”了。况且，对“理事会”的新构想使业主与工人间的平衡关系得以建立。该词虽然仍在产生一种迷惑，但其被曲解的意义却一点一点地丢失掉了一部分神秘力量，那几百万德国人于1918年11月所赋予它的力量，就像“社会化”这个词一样，从1920年开始，理事会便退化成在工作矛盾、解雇、企业利润得失等问题上的协调机关，其独立性不再只属于乌托邦式请愿要求的王国了。根据集体规范，它们完全取决于行业组织和工会。

本打算在1918-1919年实行的社会改革在保守势力看来太放肆了，他们便尽可能早地加以压制。从1921年起，业主界竭力重提集体契约，其矛头所向是将工作日限制在八小时所体现出来的大块阵地。在鲁尔省境内，工业家们要求将矿区里的工作时段改为八个半小时，其他部门改为十小时，借口是应当提高产量，以便在德国重新确立正常的生活条件。1923年12月21日，一道命令下来，确认一天工作八小时，但有许多的例外，一周四十八小时工作制实际上被合法化了。对于公务员们来说，预计在1924年和1925年，一周最少工作时间将为五十四小时。

政府对所谓的开垦法也做了明显的让步。这部法律于1919年8月11日获得通过，规定地产必须限制在各地区农业面积的10%。既然在位于易北河东部的土地上，有人超越了这一限制，那就得通过调整或征购来进行各土地的集中归并，必须是大产业面积的1/3。



几处土地被让与了。但在最关键的几个省，农业地产却没怎么被分割。在波美拉尼亚省，地主产业占了51%的土地，有一百多万公顷，本来让与面积应该提高到30万公顷，而实际达到的数字勉强为2万。这些比例可以推广到整个国境以内。开垦法未被遵守，根据1922年的统计，对地产的新分配尚未超过法律所准许的2%。在农业部门和在工业部门一样，由建立共和国所带来的社会性胜利逐渐被抹煞了。

早在1920年，哲学家贝尔纳·格律退森永久性定居巴黎之前——那时期他在柏林每年上六个月的课——他在《法国新杂志》中，便把德国人描述成一个失事遇险的民族：“有些事情，好像人们如今已经丧失了，丧失了挣脱生活摆布的心情和在当下时刻的信心……”^①在《明亮》杂志的一位撰稿人看来，正是在1921年底，借一次旅行的机会，他发现德国在他心里留下了一种苦涩的感觉，他写道：“在柏林，我有一种模糊的压迫之感和几近绝望之情。”^②

可是当境况江河日下、昨日成果被毁于一旦的时候，人们又如何去对生活抱有希望呢？第一必需品的成本上升得比工资还要快。1922年，对于一个熟练工人来说，两者间的不利差距约为25%。大学教授的工资在1913年差不多是这个熟练工人的七倍，到1922年，就只比他高两倍了。

整个社民党运动被卷在政治与社会的矛盾之中，由于它不断地想折衷，想往后倒退，反把矛盾给激化了，尽管它拥有几百万支持者的庞大力量，却注定了是无能为力的。幻灭、忧愁、沮丧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在就业人口各阶层里，他们或多或少地感到自己被伤害了，被挫败了，被掠夺了。

失业率的增加

“有了这次谋杀，德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时期便开始、或者应该开始了”，哈里·凯斯勒伯爵在1922年6月24日的《日记》里记录道，他刚刚听说瓦尔特·拉特瑙被暗杀了。^③几个月以来，右翼报纸大发雷霆，反对德国将对外政

^① 贝尔纳·格律退森：“柏林信札”，《法国新杂志》，1920，第15卷，792～805页。

^② R·阿尔贝：“反对文化的富人”，《明亮》，1923年12月第8期，459～461页。

^③ 哈里·格拉夫·凯斯勒，《日记》，德语版，322页。

策交给一个犹太人去处理。上西里西亚的一支独立部队有一首行军歌，其重唱部分甚至是：“宰了拉特瑙吧，/他是个该死的犹太混蛋。”^①正是这位外交部长于1922年4月胆敢考虑到现实情况，与苏联签订了拉帕罗条约，建立正常的睦邻关系，致使反动派和保守派气愤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按哈里·凯斯勒预计，这是个不可避免的转折点，他等待着该转折点由人民的示威运动、由终能制服民族主义教唆分子的共和派暴跳如雷来引起，他写道：“反对暗杀拉特瑙者的愤怒之情深邃而坦诚，全如保护德国的意愿一般”。^②而实际上，从6月27日星期二中午直到星期三早上，德国的一切工作都停止下来以示哀悼。在柏林、慕尼黑、克姆尼茨、汉堡，几百万德国人跟在共和国旗帜后面列队游行。魏玛共和国从没有为任何公民组织过如此光荣的活动。艾伯特总统亲自念了悼词，宣称罪犯这次谋杀活动针对的是拉特瑙，也就是针对全德国的。然而德国并未转变态度，在恐慌中，甚至在混乱中，又往下陷了一点。

直到1922年中期，马克贬值出现了相对减缓的状况。杀害拉特瑙的事件具有导火索的效应，在国外，对德国及其货币的不信任感由此变得更加强烈。1922年11月2日，1美元兑换9000马克。到年底，财政预算的数字得用万亿作单位，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估计赤字为7万亿。1923年3月，由威廉·库诺主持的政府试图将马克的外汇牌价稳定在2.2万马克兑1美元，但该措施无效，第二天，美元攀升到兑2.95万马克，4月底达到了4万多马克，8月到了100万，接着很快就是300万、600万、1000万。1923年11月1日，1美元值10亿马克。有了这个无法想象的数字，德国货币可真是挨了温情的一击。德国处在灾难的边缘。

更有甚者，失业率在极短时间内增加了。到1918年底，由于士兵从前线归来，失业者数字上升了，在1919年头几个月里稳定下来，然后逐渐减少。1920年，失业率在就业人口的2%和6%之间摆动，1921年在1.2%和4.7%之间。1922年2月只有3%，相比之下英国同期为16%。但在1923年，它就直线上升。到年底，估计为25%。1924年元月，达到就业人口的27%，而未失业

^①见艾页·拉尔森的讲述：《魏玛共和国》，威廉·海纳出版社，慕尼黑，1980，166页。

^②哈里·格拉夫·凯斯勒，《日记》，323页。



的德国人里 52% 的人没有全职工作。

通过向雇主和雇员征收捐助金的体系，一个失业救济部门被设立起来。各市政府受理该部门，作为使命，它们必须保证其运转。而且，它们在失业者领取补贴的那几个月期间，可以交付给他一些公用工程：他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24 小时，若是繁重劳动，则不得超过 13 小时，作为交换，他可领取津贴，以补充其补贴。许多城市用这种方式设立了一种强制性工作，专留给失业者。他们承担着土方工程、道路修筑、树木砍伐的工作。

在法兰克福，年轻失业者会被救济部门建议去帮助残疾人、鳏寡者、享受战争年金者购物和做家务活。他们还受雇于慈善协会和社会性机构。有时，他们会作为助手忙碌于车间、企业或办公室，其义务是完成职业培训，每周上 12 个小时左右的课。作为报酬，他们可得到三餐饭和衣服。

在全德国，这些接受救济的失业者的总数于 1923 年 10 月 1 日增到 40 万，1924 年 1 月 1 日到了 150 万。接着，其数量逐渐减少，1924 年 4 月 1 日减到 70 万，后于同年 6 月 1 日跌至 20 万。有两个原因可解释这一结果。第一个原因是劳动市场有了些微改善。第二个原因是有了新的、严酷的条件来获得失业补贴。

机关设有这一帮助项目，但失业者的境况从物质和精神上仍是无法承受的。亚历山大·施腾伯克-费尔墨尔，这个曾与独立部队一道在波罗的海诸国作过战的贵族，叙述了 1923 年在鲁尔省当矿工的经历，描述了他是如何像其他几千人一样降格为失业者，和他们一起分担卑贱命运的：“我们这些人，住在一家接纳单身汉的人家里，在那儿，中午和晚上我们可得到一餐饭。我们每周有 2 万 5 千亿马克的补贴。一块面包要 1 万 5 千亿，余下的，我们便刚好能弄到点黄油、果酱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就算是这样，这家人的饭若能填饱我们的肚子，那也是可以忍受的了……”^①

亚历山大·施腾伯克-费尔墨尔详细说道，就整个食品而言，这家人可提供一份清得跟水一样的汤和几块烂了一半的土豆。他们所买的而包最多够吃四天。胃里火烧火燎般的饥饿感令他们无法读书写字。他们昏昏沉沉的，准

^①亚历山大·施腾伯克·费尔墨尔：《我当矿工时的大事记》，天使号角继任者出版社，斯图加特，1929，169 页。

备通过睡觉来消磨时光，等着发放下一笔每周补贴：“我们一大早就起床，以便能第一个到。我们在长龙似的工人队伍后面碰了头，等着我们的钱。工作人员很少严格遵守时间，他们叫我们10点或11点钟来，可是得等到三四点他们才来。我们出示职业证件，拿到毫无价值的几万亿钞票，紧紧攥在手里。我立即跑到一家面包店去给自己买一块面包。回到家，我们大伙凑到一起贪婪地吃着。有的人一口就吞下去了，哪怕后来会吐出来；另一些人把所有钱全花在酒里，以便能逃避悲惨生活几个小时！平常，我都是狼吞虎咽吃下半块面包，好每周至少体味一次填饱肚皮的感觉。然后，我的一周就再次在麻木、迟钝的状态中度过。”^①

数字旋风

1922年初，勉强有10%的德国人拥有最低生活费。随着通货膨胀加速，境况只见恶化。从1922年3月到1923年3月，仅一年时间，价格有时成百倍增长。餐馆里，一瓶葡萄酒从50马克涨到5000马克，一扎啤酒从10马克卖到500马克。在柏林，地铁票的价格涨了30倍，糖是几乎找不着的了，矿泉水也休想买到，就算设重奖悬赏都白搭。在大部分家庭里，桌上的肉每周只



1923年排队买肉的德国主妇。

^①费尔迪南特·《我当矿工的时的大事记》，170—171页。



能出现一次。

悲惨的是孩子们营养不良成了规律。根据在学校里进行的一份调查,15%-40%的学生表现出各种营养不良的症状。在卡塞尔,只有46%的孩子的平均体重差不多与其身材相符。萨克森省的比例明显一样。大体上说,仅极少数孩子一天能吃到三餐,15%-20%的孩子每天早上什么也吃不到就得去上学。至于衣服,条件也好不到哪儿去。在马格德堡,20%的孩子没有大衣。在纽伦堡,15%的孩子没有合适的鞋穿。在柏林,2.4万名儿童衣衫褴褛或难以避寒,1.6万个孩子没有衬衣,1700人没有袜子,5.7万人穿着破旧不堪的皮鞋,3.5万个孩子只穿布鞋,而1700名儿童脚上什么也没有。^①



某店员正在用茶箱装钱。



德国儿童正在玩一文不值的纸币。

在柏林,生活对于中等和贫穷家庭来说特别困难。由于外国人汇聚于此,这儿成了德国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马克每次贬值立即就在商人们的价格上反应出来。从1923年元月到11月,价格隔一夜就会发生变化,甚至隔一个小时就变了。一件卖1000马克的物品没一会儿就值1万马克了。大商店由此而

^①奥托·吕勒:《无产阶级文化史与风俗史画报》,新批评出版社再版,美国河畔法兰克福,1971,第1卷。

组织一些特别工作组，其惟一的工作就是给货架上的商品换标签。

马克下跌导致价格上涨，而价格上涨到头来又导致薪水和工资升值，看起来有必要再次印刷纸币了。这是个恶性循环。一天到晚，印钞铜板前有三班轮替工作，星期天也如此。不仅储箱里再也容纳不下这数量大得惊人的纸张，连银行系统的领导也由此开始担心，弄不好最后在某个时刻，纸币印刷成本比它自身的价值还要昂贵。

另一方面，鉴于只有大面值纸币才能真正提供购买与花费的可能性，中等面值的纸币在日常生活中就再也找不到了。有时候，银行甚至最后得提出10%的奖金，让人给他们带回这样的纸币来。流通最多的是1万马克和5万马克的纸币。几乎在所有地方，商人在买卖中竟都不可能收到零钱了！

荒诞性主宰一切。它有一个典型例证，就是明信片，无论它们是由行政部门还是由私人厂家印刷的，如今都变得毫无用处。原因是随着价格上涨节奏加快，不可能按合适价位来印刷新邮票，为付邮资，必须用尚在流通的旧邮票贴满整张明信片，有时还不止，这样一来，也就再没有任何空地来写收信人地址了……

许多完全真实、日常的场景像是插科打诨，滑稽可笑，可每个人都如在梦魇中经受着。街道上，一对对夫妻拖着装满钞票的大车或洗衣篮，擦肩而过，一些人到银行去取钱，另一些人是从银行取回来的。工资刚一发，所有人都跑到商店里买点什么吃的。人们带上用一周50多个小时的工作换来的一大

堆钞票，放在一些巨大的布篓里用车装着，买到供两三天吃的食品！

战前，与法国不同的是，用支票付帐刚刚才开始推广。后来，由于纸币过剩，批发商们和个别工资较高的人甚至被强迫用支票付款。渐渐地，公众部门也来用支票对付其员工的薪水。1922-1923年，人们对支票的流通最终是习以为常了。所有社会阶层都使用



德国人正在用洗衣店的篮子从柏林的一家银行领取薪水。



这一付款体制，例如在萨克森，90%的工人拥有一个来往账户。不过，流通中的现金总量同时则以较之大得多的比例增长。自1913年以来，它长了1000倍。

习俗的改变

就连在婚姻问题上，通货膨胀也有一些反应。尤其是在城市里，比起战前来结婚的人更多。在世纪初直到1914年，特别是在工人圈子里，年轻人要结婚，一般都是等到小伙子服完兵役，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之后，女孩子那边则做她的嫁衣。由于受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德国只能保留雇佣军，再没有兵役了，至于做嫁衣，那只成了一个空想，而稳定的差使逐渐也变成了空想！由于担心得等上好几年，因此促使年轻人们以穷还穷，冒着风险去早婚。

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偷盗成风。一些面包店被洗劫一空，不是为了偷走贵重物品，而仅仅就是为了偷面包。在高级饭店，顾客们要先付一定的押金以后，餐具才给他们摆上来，因为餐具时不时就不见了。对于楼房和公寓来说，因为害怕有人入室行窃，使得人们用上复杂的保护措施：安全锁、双重门、铁栏杆。

这种担心不会妨碍宽敞公寓里的住户，他们还是试图要租一两间屋给先来出个好价的人，居民家里的这种房屋买卖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买卖在暗地里进行，不向市警察局申报，这样，就不用付任何税款。房租按天算，这得通过熟人介绍，或者通过出租车司机，当然要给他一定比例的回扣了。外国旅游者理想的顾客。如果他用美元付钱，就可以享受优惠待遇，按照旅



为了防止饥饿的民众抢劫德国的食品店，军队在守卫一家肉铺。

店价位，折扣多多。

胆大的见这种买卖有利可图，便毫不犹豫地吧资产阶级的豪华住所里的一些房间出租或分租，好在那儿私下组织高贵或香艳的芭蕾舞会。即使当警察来检查时会吃惊不小，他们的收益依旧颇丰。在很快服完刑之后，就如没事人一般，到别的地方重新开始。在寻欢作乐的有钱人家里，对明日的怀疑其实是越来越厉害了。而在一无所有的人当中，总有东西可以随时拿去卖掉换点什么！某些报纸的广告栏里，少不了有年轻人提出能给寡妇富婆带来幸福，而一些15岁的少女为了度过休闲时光，希望能遇到老先生。

道德腐败现象因经济困难而倍增。一些严肃组织在马格努斯·希尔什费尔德博士的影响下，从事着科学和政治斗争，以便同性恋者不再招来官司。除这些组织外，一种办有极其特别的娱乐晚会的咖啡厅、酒吧或特殊俱乐部在大城市中猛增。在柏林，“黄金夜总会”是爱作异性打扮者常去的地方，同性恋者常去“倾慕夜总会”，另一家这类夜总会则只对女同性恋者开放。有人甚至创立了一个流动剧院，“爱神剧院”，给很想接待他们的人表演节目，也负责节庆活动、会议、放电影。对于女同性恋者，一家“天蝎俱乐部”同样上演戏剧。

所有这些怡情场所大量涌现，整个德国的暴发户、奸商、不法小商贩和亿万富翁都往那儿跑，裸体歌舞与戏剧是常点节目。当一名工人或职员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好赚到买一双鞋的钱的时候，堆积如山的菜肴、无数瓶精制的香槟和鸡尾酒却被吞扫一空！乔治·格罗茨的某些画表现出了这一幕幕山珍海味之景：人物舒舒服服地在桌边入席，大腹便便，脑门锃亮，夫人或情人一旁作陪，身穿长裙，很大方地袒着肩露着背，遍体珠光宝气。

在与库菲尔施腾达姆大道毗邻的首都街道上，只要拥有美元或可交换商品，各种堕落行为就可以拿来满足其条件。妓女们穿着红色高筒靴，在街头大步游荡。某些人还手举长鞭，清楚地指明其专业，以招徕那些闲暇时爱受鞭打虐待的主顾。冒险商人则向貌似外国游客的路人展示可卡因和淫秽节目。

柏林，正如奥地利作家斯蒂凡·茨威格在《昨日世界》中所记录的那样，转变成了一个巴比伦：“就连隋托纽斯的罗马所经历过的狂欢，也没有像柏林异性化装舞会那般，几百个身着女人服装的男人和穿成男人模样的女人在警



察和谄目光下跳舞。当所有价值都沦丧时，正是资产阶级圈子在其秩序原则中，仍岿然不动，这些原则的含义就是一种谵妄狂语。年轻姑娘傲慢地以堕落为荣；在柏林所有学校里，若被人怀疑到了16岁还有童贞是一种耻辱；每个女孩都想讲讲自己的奇遇，越有情调越好……”^①

物物交换主宰一切。医生和律师为收取酬金，宁可接受肉与蛋，而不要毫无价值的钞票。或者，要一样稀罕昂贵的东西，香烟！来自被占领的莱茵省的香烟可能弄得到，不过得在黑市上买。正因为如此，好多妓女也心甘情愿地让人用这种货币付钱。首饰、艺术品、毛皮全都成了很好的基本交换物。最常见的是，一些饥饿难捱的老人——然而看上去像资产阶级和高雅人士——向散步的人兜售，换点食品什么的。

拥塞的街区里，数百人站在面包店、杂货店、奶品店门前，一等就是几小时。为了喝到一碗汤，救世军楼前、失业补贴发放办公室门前或者报亭跟前排起了长队。报纸是天价，许多工人和职员再也买不起了。为了想办法掌握消息，他们便聚在海报标题前。

作为对失望、淡灰色氛围和悲惨冷清的公寓中之孤独的补偿，同样是这些小人物，为宗教集团的预言所吸引，突然出现了。东方神话直渗透到人民阶层中。一些云游僧人走遍乡村寻找信徒，这类信徒并不罕见。天主教和新教几乎到处都在失去忠实教徒。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但怎么说也是少数人——让步于蛊惑之力，开始相信假巫师和装神弄鬼的狡诈商人。

招魂、占星、遥感在美好的世界中百花齐放。托马斯·曼在其一篇小小说《神秘经验》里，描写了一位热心于同冥界通灵的男爵在其慕尼黑特别旅店中所组织的夜会。托马斯·曼幽默地讲述道，大学教授、哲学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医生都偷偷溜到灯光昏暗的街道上，带着好奇去瞅瞅M. 冯·施伦克-诺庆的通灵聚会！在百姓中间，受到青睐的更多地是各种伪科学家和名字华而不实的学院，他们声称能预言未来，或者能让每个人都找到成功之道。

^①斯蒂凡·茨威格：《昨日世界》，费舍尔，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0，227页。

投机与排外

通货膨胀所导致的危机是所有这些行为的根源。通货膨胀另一个更为自然的后果——即通货膨胀自身的第二性质——便是投机。若有投机的办法，德国人就都冲到一切不会贬值的東西上。最富裕的人，像工业家胡果·施廷内斯，买下工厂与楼房。另一些人则满足于钻石、宝石和美元。农业主在机器与物资上投资。那些只能得过且过的人则艰难地试图存留下几公斤糖和几盒罐頭食品。

投机成了一门手艺。脑子灵光的人借来马克去买美元，然后把美元脱手，去买不会腐坏和容易变卖的商品。他们不用花很多精力，可以生活得安逸舒适。正是这样，整个暴发户阶层壮大起来。有人在战后为买地产而负债累累，此次他们甚至连什么创举都没有，便偿清了借款，重新拥有了真正的财富，这种人的数量也在增加。

萨尔省是投机的首选地区。马克曾被保持为交换货币，但工人和职员在法国人的管理下工作，工资用法郎付。从井底上来的矿工再也不祝下井的伙计们好运了，而是用一句新的习惯用语：“兑多少了？”指的是法郎！人们从此就只谈买卖法郎了。马克每次一下跌，用法郎付工资的工人和职员们便赶紧跑到商店里去买各类商品。

对外国人来说，德国成了天堂。假期真是利益颇丰，致使1922年有30万美国人到那里去，同年，黑林山的所有旅店都住满了瑞士人，而莱茵省则更多的是得到了荷兰人的惠顾。在柏林、法兰克福或莱比锡的大商店里，主要顾客一般都是外国人，以至于售货员陪他们去收银台时，会自动问他们所买货物应该送到哪家旅馆。那时的特快火车有三个等级的车厢，慢车有四个，但三级和四级车厢实际上是专留给德国人的，而一级、二级以及餐车里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外国游客。

诚然，有些时候，外国人所付的费用要比德国人多。比如说在博物馆，他们买门票花的钱比德国人贵八倍。在歌剧院和剧院也一样。相比之下，商店里的商品则是自由出售的。玩具、体育用品、光学仪器在德国比在欧洲其他



国家都更合算、质量更好。若用马克付钱，手持美元、英镑、荷兰盾，甚或是法郎的人就能很便宜地买到这些东西。

在德国百姓中由此产生了一场排外冲动。外国人被指责为抢劫了德国，人们都另眼瞧他们。排外主义甚至渗透到商业行为中，常见的是，在旅游城市和地区，相同产品有两个价格：一个，显而易见，是为外国人设的；另一个被藏起来，专留给德国人。巴伐利亚省也是这一情况，那里的排外运动如火如荼，针对外国人的价格至少被抬高了50%，以便弥补马克跌价。

受害者与受益者

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是靠年金收入生活的人和退休人员。他们时常能拿到一笔固定的钱，直至那会儿还够生活，但都六十多岁了，还不得不想一些权宜之计，以便挣扎于困苦之中。有些人卖掉尚值几个钱的东西：珠宝、油画或家具。另一些人则将其寓所出租或拿一部分与人合租。最一无所有的就只好等死或者不等阎王来叫便先去了。

恩斯特·艾里希·诺特在其《一个德国人的回忆》中讲述说，祖父为了让他以后能上学，一辈子都在一分钱一分钱地攒。到祖父死时，他继承到一笔8000马克的钱，已经存在银行里。可即使他能上大学，这笔钱也毫无用处。1923年，他父母赶紧把钱从银行里提了出来，免得失去所有价值。这笔钱刚好够买一块面包、500克人造奶油和60克咖啡。

许多学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从传统来看，他们大多数人都来自中产阶级。他们的家庭没有能挣钱的手艺，其后果便是上大学的人数减少，甚至当学生确实能报名的时候，也对课程感到很厌倦。他们盼望着用鸡蛋、黄油和土豆付工资的日子，仅仅是为了活下去。

至于在办公室和工厂里劳动的妇女，她们的处境大为恶化。从比例上说，妇女工资在战争期间比男人工资稍稍多涨了一些，因为需要劳动力，许多女职员被招募到邮政和铁路部门。1918年后，这一增长现象曾两次被提出讨论。由于为转业士兵考虑，凡丈夫拥有一份固定工资的妇女被解聘，必须回到她们的炉灶跟前。接着，为了替工作的男性着想，便开始强调工资之间

应有差距。^①

此外，脑力劳动者似乎比体力劳动者受的伤害更严重。因为，他们结成工会的比率很低，极难通过共同保护来收回其利益。而且，市场对其劳动产品的销路不太有利。在地主、工业家或暴发户那边——本来是惟一能用金钱保证生活所需的人——对知识的好奇心并不强烈。中等阶层或是工人，由于已经受尽苦难，文化需要并不能得到满足。

德国注定陷入了文化孤立状态之中。不可能再到国外去买报纸、书籍或杂志了，科学博物馆的采购工作几乎停顿下来。由于书店店主要求收取额外税费，所以书籍出口也变得耗费巨大起来。而且，邮寄价格涨得那么高，凡在德国本土寄一样东西简直就会倾家荡产，更别提寄到国外去了！对于许多作家来说，他们之间的联系变得稀少下来。他们得省下口粮，以便能付邮票钱。

1923年，小说家卡西米尔·艾德施米德把德国形容成吞食数字的疯人院。他抱怨说，那儿的人不再读书了，也再没人买得起了，书的平均价格相当于一名高层公务员一天的工资。高级剧院从此什么戏也不演了，或者演点无聊的东西。在柏林那想办法让外国人眼花缭乱的表面光华之外，德国到处都在劈啪炸裂。他认为，群众中只有3%的人勉强能被称做富人，其余的人都在节衣缩食谋求生路，或者饥饿而死。

艺术生活总还是构成并且包含着的一部分真实。由于纸张价格和印刷费用的确导致书本价格大大增加，出版商不得不在其出版计划中减少年轻作者著作的比例。一些像恩斯特·罗沃尔特与库尔特·沃尔夫这样的作者，出版社本来之前已同意出版他们的作品，却又突然转向经典作家，猛地大量出版巴尔扎克和左拉的作品。

不过，这一通货膨胀时期并非对所有人都是苦难深重。某些人——有资本的人——给自己设置了庞大的财富，得到稳固的价值。工业家胡果·施廷内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真是建立了一个帝国。1923年，他依靠银行贷款将其财产翻了四番，拥有4500家企业。他还参加到钢铁、报刊、旅店、海运、制烟和精糖提炼等各种行业分支机构里去！据说，他比洛克菲勒还要富。以

^①贝克罗迪娅·哈恩的著作《魏玛共和国的开放性服务部门与女行政人员》，载于合著《苦难与劳工手册》，费舍尔·塔申布赫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1。



至于1924年当他去世时，继承者们无法继续其猛冲之势，管理如此巨大的财富。因为这种势力也是政治上的势力，施廷内斯是人民党议员，该势力并不比其创始人的命长。

尽管有通货膨胀，或者说幸亏有了它，一些像克虏伯、蒂森和克吕克纳这样的工业企业日子过得也都不赖。凡是与国际大金融集团相关的企业所遭受的损失都小于其利润。德国国民经济最终并没有留下重大损失的记录。相反，1924年，德国工业家联合会认为，工厂和新生产部门曾有过一次大量投资。

有一个部门出现了超常的飞跃，那就是产生于该时期的无线电工业，虽然在当时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这是很难承受的。无线电公司、洛伦兹和胡特立即投身于建造接受台。除他们之外，为反对其垄断，一些小制造商和商人也轮番登场，建立一个职业联合会。从第一批广播于1923年10月被发送起，接受台购买市场就等待着人们去征服了。它很快便被征服了，1926年，拥有接受台的人超过100万，1932年，就有400多万了。德国位居世界第三，排在美国和英国之后。法国位居第四，只有90万台。

正是在这通货膨胀的几年里，商船行业被恢复了1/3，不同的航海公司在强大的哈帕格公司和北德利沃依德公司内部进行了重组。铁路物资、火车站、铁路和车厢被修缮一新和改装。鉴于顾客量上升和计算操作复杂化，银行扩展了其部门，招募人员，购买房屋，以便另开或新建事务所。

除了庄稼价格下降外，农业主们则从战争刚一结束起，便在售卖产品时获得很多优待。1921-1922年，粮食甚至丰收了，以至于其利润滚滚而来。1922年，一个中等农业主如果通过售粮换来东西，那么他所能弄到的商品是其1913年所得的两倍。从1923年4月开始，像其他社会阶层一样，他也受到马克贬值的冲击。但他所受影响要小得多，因为他很快就明白，他必须在物资上投资，并投资改变其生活条件。那个时候乡村的布匹、家具、钢琴和许多不知名的商品走的都是农场道路。在那里许多地方安有电话，打破了乡村的孤立。如果说1923年电话网络在某些时段会拥塞不堪，那绝对不是偶然情况，原因很简单：农业主们时常询问美元的价格并向他们的银行家发出指令。

故此，根据社会集团的不同，通货膨胀所导致的状况也不均等。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有时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经济状况也会有差别。

这个时期的形象当然总还是集中在柏林，在那里，两种极端会碰到一块，奢侈浪费与缺吃少穿并驾齐驱。从总体上说，外省城市里的对比没那么明显，虽然也少不了困苦与肆无忌惮的富贵，但没那么招人注意，尤其是在公务员占很大比例的小城市里、在邮局或铁路部门里。其实，由于有国家支付的补偿性津贴，他们的工资损失不太大，总还差不多能够生活。

在以贸易，特别是以对外贸易为生的城市里，给人的印象甚至还是一种相对的繁荣。正是这样，莱比锡市场才没怎么经受过商业上的停滞。1921年，它接待了13.5万名访客，1922年则多了1.5万人。对于法兰克福来说也是一样，这种繁荣的标志就是火车站，它本已有24道，大概是欧洲最大的火车站，现又扩建了两排房屋。

相对的繁荣

尽管各种困境很不均等，但德国毕竟不可能承受着这样的通货膨胀而不走向灾难。面对工业家们在鲁尔区暗中操纵旨在抗议偿付赔款与法比占领军的消极抵抗，威廉·库诺政府通过印发钞票来补偿损失。马克纸币于是一文不值，必须找一个振兴货币并稳定它的解决办法。

1923年8月11日，众议院在社民党的提议下，收回了对库诺内阁的信任。由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人民党成员——组建了一个大型联合政府，社民党党员鲁道夫·希法亭任财政部部长。财政改革委员会开始投入工作。1923年10月16日，新措施出台。

他们的想法是将德国资产抵押出去。所有商业、工业或银行企业以及用于农耕的土地都加重了债务负担。业主们为其资本和在一家新银行里的储备担保，该银行发放抵押书，每份抵押书为500金马克。这些抵押书保留在银行的保险箱里，代表它在流通中的所能有的票面价值。

此外，业主们还应为被抵押资本付6%的利息。如果企业或商业公司没有楼房和土地，就必须认购金马克债券。

这样，在整个1924年一年中，德国人能使用两种货币：过去的纸币马克和地产马克，又叫公债马克，相当于1个金马克。马克价值反弹体制最终建



立起来。美元被固定在400万亿多一点纸币马克的水平上，而1公债马克值100万亿纸币马克。从1924年4月开始，一种新马克终于取代了公债马克，公债马克毕竟只不过是过渡货币。

同一时期，两个负责考察德国偿付赔款可能性的专家委员会提交了报告，由此有了道威斯计划。一方面，确定了所赔款项的总额，另一方面，通过向美国借款，几百万美元被注入到德国经济中。这些操作使德国国家财政得以复兴。到1924年底，国家银行的保险箱里有20亿金马克。由于外国资本进入，稳定马克变得容易些了，这些资本从净价值上说，等于赔款应付总额的两倍。

自那时起，德国的形象似乎是一个从头再来、步伐稳健的国家。民族重新站立起来成了一种口号。1925年元月，国家的财政状况非常平衡。工业家们为生产和让企业赢利而费尽心神，纷纷仿效美国技术。他们将泰勒管理模式引入工厂，以避免能源浪费，发展合理化管理。就这样，美国的生命力与现代化通过实例被展现出来。它激起人们四处宣传，说危机过后是众人的幸福。

通货膨胀的恐惧结束了，可是安乐因此便来了吗？1924年，失业仍然影响到11.4%的就业人口，它只在1925年有所下降，但很快又回升，到1926年几乎达到18%。给1926年留下烙印的这一场危机状况是由一种想法所导致的，即不惜一切代价让经济合理化。在1929年爆发更严重的那次新裂痕之前，只有1927年和1928年，从这一点上看，相对来说是良辰美景，失业人数低于10%。

就整体而言，除了1926年的停滞是个特例外，在此期间工资的增长倒还是很有利的。从1925年开始，工人阶级的工资也逐步出现增长，他们又回到了1913年的生活水平上。损失最大的是农业员工、矿工和冶金工人。得利最多的是房屋建筑工人。许多拥有信贷的市政府实际上将精力都投在住宅建筑之上。一个泥瓦匠那时的生活还有些节余，一家人每周能着实吃上好几顿肉。

在所有职业阶层里，自由职业圈子是看到自己收入明显改观的集团。由于有酬金付款期限，律师和医生由此挣得和工人一样多——有时比他们少——走出了物质上的崩溃境地。他们和高级公务员一起，像战前一样，成为中等阶层的砥柱。所有主要靠笔杆子吃饭的人条件也好些了，版税不会再遭到一贯的诋毁。此外，国家、地区或市政府还发放津贴，资助书籍或杂志的出版，支

持科学界的活动，授予学术访问奖金，鼓励学术项目。仅1927年，国家就出资重建了柏林歌剧院，设立了德累斯顿卫生保健博物馆，组织了科隆报业展览会。

不过，画家和雕刻家从货币稳定中获益的方式与其他自由职业不同。对于名气最响的人来说，市场并无多大变化，他们的顾客很可靠。对于许多勉强过活的人，尤其是学术性艺术家来说，通货膨胀于他们也不无益处。为了保护自已免受马克贬值之害，一部分有钱的德国人转而购买画作或雕塑，也很少分辨一下画家的良莠再行定夺。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投资，而非充当艺术业余爱好者或收藏家。

此外，在这些年里，不同社会集团的组织活动被一个现象给搅乱了，这现象自19世纪末就已表现出来：雇员数量的增长。1895年勉强有100万人，占就业人口的7%。这一比例到1907年超过了11%，1925年约为17.5%。在最后这一年，也就是说对应着有380万人，其中130万名妇女。工人数量还没翻番，而雇员的数量却翻了五倍。从此就业人口里每5个工人里就有一个雇员。这些雇员中有一半人在银行、商店、公共运输部门工作。工业部门雇有135万人，贸易部门有200多万。大多数人，即80%的妇女和56%的男性不到40岁。

老板们为证明合理化管理，把中等阶层介绍成受益于所谓现行进步的人。与他们所传播的标语口号正相反，这些带假领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上晋级的前景并不比工人阶级光明。从总体上说，雇员们只有最基本的知识培训，无法进入高级岗位。他们中上过中学或中专学校的人不到一半，不到10%的人担任实质性职务。他们的工作多半都是常规性、自动性的。妇女大部分是速记打字员，她们的待遇最糟糕。72%以上的妇女所从事的工作报酬最低，相比之下，男性为32%。

比起工人来，雇员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工人也不同。他们花在食物上的钱较少，而花在住、穿和娱乐上的钱较多。他们享受较优越的社会保障制度，按月领工资，而非按天、按周领，如果生病，仍能继续领取一部分工资。所有这些特殊性也许能解释，他们虽然在社会中任职，却不如工人那样意识到自己属于无产阶级。大概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比工人阶级更容易受到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渗透。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所有



选举表明，投票支持纳粹党的雇员比例实际上比工人差不多高出四倍。加入国社党现象也显示出相同关系。从1925年开始，雇员与商人、手工业者及自由职业成员一起，成为纳粹主义渗透活动的社会基础。^①

这一时期又叫经济稳定时期，或称施特莱斯曼时代，一般被看做是前50年里德国所经历的最繁荣时期，即使这种繁荣只是表面现象，且弱不禁风。当那些回忆录作者们谈到20年代的黄金岁月时，他们想指的就是这段时光。到处都展示出技术上的进步。在柏林—汉堡的豪华列车里，商人是常客，电报和电话使他们能与外界进行交流。构想大胆的水泥和钢铁建筑与城市中的黯淡分庭抗礼。工厂里，流水线工作像普罗米修斯的胜利一样被人们歌颂。就连戏剧舞台方面也向好莱坞和美国时事讽刺剧学习，与新的摆阔显富之人步调一致了！

一次前所未有的失业

1929年初，为了德国对协约国的债务问题能被重点解决，施特莱斯曼宣布了用于取代道威斯计划的措施。在美国人欧文·杨格的主持下，组成了一个专家委员会。1929年6月，新计划出台。计划的实施应当于1930年5月开始，它将使德国债务减少了10%。在施特莱斯曼——他于1929年10月去世——的想法里，必须于见到杨格计划付诸实施之前，努力偿还这些协约国的债务，不是像以前那样用外国信贷偿还，而是通过德国出口盈余来偿还。

由于经济危机突袭美国，德国政府所预想的一切都付之东流。德国本依靠美国信贷度日，所以立刻间接受到危机的影响。它无法再将贷款延期，却被要求偿清原来的贷款。外国资本抽走了，德国私人资本也流失了，德国再次面临陷于停顿的财政体制，不久便面临着完全混乱的经济了。

繁荣景象终于停止。逐渐地，1923年的某些场景又为人们所熟悉。价格没有以骇人听闻的步伐发生疯狂的改变，几百万德国人也没有因马克贬值而陷于破败或穷困，而是出现了失业，津贴发放办公室门前出现了长队，出现

^①所有指数见：汉斯·施派尔，《纳粹主义之前的雇员》，万登霍克与鲁普莱希特出版社，格丁根，1977。



1931年，德国的失业者在领取供应汤。

了救济汤。在柏林，4000人时常睡在夜晚收容所里。扒窃案件大大增加。犯罪率升高。卖淫也一样，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每天早上，几千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徒然等在职业介绍所门

前。每天晚间，街道上，则是顾客等待着。

1929年，失业者人数占就业人口的14.6%，1930年超过22%，1931年增长了12%，而1932年则达到45%左右，550万人没有职业！他们靠什么生活呢？20个星期里，他们有失业保险，大约相当于工资的35%。接着，在40个星期里，他们接受危机救助，也就只有工资的20%。最后，由于一般不可能找到工作，他们便领取市政府救济，那些施舍物刚刚能保证不让饿死。1932年，该救助在每月40到60马克之间摆动，而此时一间陋室的房租最少得要20马克，3斤面包价值51芬尼，即半个多马克。

事实上，大概有200万失业者没有接受任何救助，有权领取津贴的年龄其实是在16到21岁之间，已婚妇女必须提供需要财政救助的家庭状况证明。有些家庭本身需得在垃圾残渣里找点吃的，他们的前途就只有卖淫或乞讨了，除非选择自杀。

亚历山大·阿尔努1931年到柏林旅行时叙述说，在地铁站，一些乞丐向行人乞。一些“脚穿皮靴或者穿系着鞋带的半统靴的妓女中，有的似乎是男人改扮的”，夜幕一降临，她们便在闪烁的路灯下向顾客叫唤。衣装体面的先生们或者带着孩子的母亲们会向你索几分钱买点吃的。亚历山大·阿尔努还指出，城市中有如此多的人自杀，以至于报纸被禁止报道此类事情，以免让百姓越发沮丧。

对于有一份固定工作的人来说，生活条件也恶化了。1930年到1932年间，工作减少了20-30%。税收增加了，退休金和战争年金却没有上涨。许多



小农民被要求偿还贷款或银行抵押，落到悲惨境地，不得不放弃土地，到大地产者那里把自己租给别人当仆役，或者向城市迁移。雇员们被迫在外观上节省开销，虽说他们本来很看重这些，因为这能使他们与工人有所区别。

在柏林的莫阿比特区、维丁区或诺伊科尔区，和所有工人城市的郊区一样，每个月的月底，街上便满是手推小车，上面堆积着如山的旧货，却没什么价值。一些家庭离开原来的住所，因为已付不起房租。他们寻找安身之处，一间陋室，要不就是楼房门厅或后院。

在这段时间里，杂志上充斥着时装照片和广告牌，推销最后一批福特、雪佛兰或梅塞德斯汽车。首批录音机被介绍给公众。一些化学家从如潮水般席卷非洲大陆的蝗虫身上，成功提炼出一种脂肪，能用来制造肥皂。作为日常生活中技术进步的顶点，柏林的某些兔笼大楼配备上自动发放机，只要把本用来给牲口吃的土豆皮放进去，就能拿到一包取暖木炭和一张彩票！

在柏林、法兰克福、汉堡，啤酒吧、音乐厅、电影院里顾客满堂，他们到这儿来主要是渴望暂时忘却一切。那里的员工再也不发固定工资了，而是领一点吃的东西。在人潮如涌的舞厅里，一些没有工作的年轻人盯着一杯水和一块面包待上几个小时，听着音乐。奢侈与惬意的生活似乎尚未停止。汽车在街上呼啸着来往穿梭，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

恐怖之征兆

魏玛共和国自从海因里希·布吕宁1930年3月接任总理以来，便置身于反对工人运动、企业破产和社会衰退的措施之中。到1931年底，在德国400万18到25岁的青年中，有1/4以上的人失业。这些失业者里，有4万到5万人具有大学文凭。^①

要暂时应付这些年轻人的危机，所能找到的惟一救药就是在劳动营里创建民事义务制。1932年底，他们包括了约20万名志愿者，分布在公路、铁路的工地上。这种义务制只不过是迈向后来纳粹所宣称的义务兵役制的过渡阶

^①见《智力合作》第55~56期，1935年7~8月。

段。而且，其监控权已经掌握在极右翼势力的手上了。主要负责人是希尔上校，未来希特勒政府的青年教育国务副秘书长。

相比之下，大量的财政资助实际上是救了东部地主的命。面对人们对这些款项的揭发，以及对它们并未用在改善农业状况上的揭发，国会里出现了抗议活动。这事发生在1932年底施莱歇尔政府时期，施莱歇尔后来被人奉希特勒之命暗杀。但在当时却毫无结果，只不过是一件一俟揭发便被压制下去的丑闻罢了。连兴登堡总统自己也被直接牵连进此事之中，他收到诺伊德克的地产和城堡以为谢礼，名义上说是其子奥斯卡尔所赠。

1929年10月，当纽约股市崩溃的消息传到欧洲时，一个笑话传遍了德国全境。一个柏林人对朋友说：“我刚收到我美国叔叔的一封信。”另一个人问道：“太好了，那他给你写的什么内容？”前面那人回答说：“他要我给他寄10美元！”——三年后，这一针对那著名的美国天堂的讽刺再也不流行了，真不幸啊。

1932年7月，社民党在立法选举中，与1930年相比失去了3%的选票。共产党获得的选票略微超过1%。纳粹党从18.3%升到37.3%，他们的党成了国会中实力最强的党派。在所有城市的街道上，甚至是在乡村里，其冲锋队的人到处炫示武力。他们使用这一武力去反对各工会常委会、共产党、犹太人和所有与他们作对的人，以致经常发生斗殴。对社会困难的回答被用拳头和恐怖公之于众。

几年以来，德国社会经受了公开的野蛮行径。盲目的暴力如重负压在它的肩头，可怕的社会杂闻助长了迷惑力与畏惧心。这迷惑力，畏惧心，都是被纳粹党人鼓弄出来的，他们使用它们，以便狂热地宣称恢复秩序，并对犯罪之人惩一儆百。

死刑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已经不再使用。1931年，它又出现了。哈尔曼，绰号汉诺威屠夫，谋杀了数名少年，被处以绞刑。在学校大门口，孩子们高唱着：“等等吧，那就等等吧，/该你啦，哈尔曼要把你来抓！/用他的斧，也就是一场游戏嘛，/他要把你做成腌猪娃！”^①

^① 参见伊丽莎白·伦克与罗斯维塔·凯弗尔的书：《杜塞尔多夫吸血鬼彼得·库尔腾的生活与工作》，罗格纳与贝恩哈特出版社，慕尼黑，1974。



还是在1931年，同样的命运降临在一个被人称做杜塞尔多夫吸血鬼的人身上，他在1929年曾令整个德国胆战心惊。彼得·库尔特，当时是一名失业工人，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性冲动，便到处杀人。他犯下九桩杀害年轻妇女和少女的案件，还有数次谋杀未遂。^①各报纸在专栏里以近乎谰语的风格来讲述这一事件，根据该事件，弗里茨·朗拍摄了电影《M》，由彼得·洛尔饰演罪犯角色。



国会大厦大火。

占星术时尚也达到顶峰。在报亭里，充斥着各种像《半仙》、《预言家》、《新德国》、《德国之未来》、《未卜先知》这样的标题。他们预言说，有一个强大的人将走上政坛，一个新的恺撒。魔术师中有叫约瑟夫·威森伯格的，自认为是圣使徒，有叫马克斯·墨克的，当过社民党党员，后归到纳粹党门下，有叫艾里克·晏·哈努森的，把他在柏林的房子称为秘术宫。

通过哈努森，所可能预见到的也就是魏玛共和国的衰颓。他出生于匈牙利一个从事戏剧工作的家庭，是犹太人后裔，真名叫海尔曼·施坦施耐德尔。他在柏林的成功始于1930年，作为巫师、幻术师、催眠师的他，先是出现在各种综艺节目的演员名单牌上，后来在人气最旺的地方开了间办公室，进行遥感会面和催眠谈话，最上等的社会阶层常来光顾。他的挚友中有纳粹党人、冲锋队的头面人物。的确，在一度错误地把赌注投在胡根伯格身上之后，他随风一倒，清楚地叫嚷起人们期待已久的救世主的名字：阿道夫·希特勒。

^①转引自奥托·弗里德里希：《世界之城柏林，1918年—1933年之伟大与衰落》，库尔特·德施出版社，慕尼黑，1973，289页。

谁也不会断定说，他可能就是筹备1933年2月国会大厦纵火案——戈林所策划的一次反共阴谋——的人之一。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很难游走于这么高层的圈子里的。神秘失踪15天后，1933年4月7日，他的尸体在一片树林里被发现，面目全非，口袋里一无所有，连一张纸也没有。事件很快被了结，但无人知道调查结果。^①



^①见格萨·冯·奇夫拉：《哈努森，魔鬼之预言家》，海尔比锡出版社，慕尼黑—柏林，1978。战前，布鲁诺·弗雷尔也出版了一本关于哈努森的书。



第五章 各结其社

比起其他民族来，德国人是否会有更多的组织才华呢？这种资质，就算是真有，是否来自于一种过团体生活的趋势呢？……在法国人与德国人的比较当中——莱茵河彼岸的无数次旅行见闻已使我们习惯于这种比较——这些问题长久以来频频摆在眼前。一些卓越的智者，如罗曼·罗兰、安德雷·纪德、安德雷·苏阿莱斯，以及后来雅克·里维尔在其《德国人》的书中，都没忘记提到它们。^①德国人被赋予一种“群居本能”，该描述在世纪初变得很庸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只不过被当作一种明证。

某些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言论，的确，无非是确证并加强了这个过于肤浅的解释，它建立在不可靠的历史分析与生物性论据上。1915年，在与一位瑞典记者的谈话中，著名学者、莱比锡大学化学教授威廉·奥斯特瓦尔德说出一句话，在法国报纸上引起一场笔战，政治界与知识界里最知名的人士都参加了进来。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科学哲学》的作者——声称说，德国人，或者不如说“日耳曼种族”，臣服于一种组织行为，因此他们优于其他欧洲民族，那些民族把个人主义摆在首位。^②

对于喜欢为个人意识辩护的哲学家爱米尔·布特鲁来说，威廉·奥斯特瓦尔德所吹嘘的这种组织系统终究只会达到对群众、对人群的颂扬，终究只会将个体抛在一边，把个体看做令人扫兴的人。德语专家爱德蒙·维尔麦依^③

^①雅克·里维尔：《德国人》，伽里玛、巴黎，1919。关于这一主题，见我的研究“雅克·里维尔与德国”，载《民族心理学》杂志，1974年3月。

^②参见于让·拉巴迪耶的调查《德国有组织之秘吗？》，观点书库，巴黎，1916，5页。

^③《德国有组织之秘吗？》，259页。

在其中则看到了天生富有联合与社团生活品味的正常后果，不幸的是，这后果已经产生了很灵验的结果：“最令人吃惊的是，在德国，这是个人们极少断言的性格，他们自发地服从于既成秩序，遵守祖先传统、警察与行政组织，在相同日期准点完成相同行动，他们天生讲秩序，在家庭、城市、外省和全国都从事着无声而有规律的活动。这是一种令人厌烦的单调，但其结果是可怕的工作能力、非凡的群众效应、社会结构明显的团结性，在新近方始建立的国家中，是各方面大量的物质优势……”

早在19世纪末期，各团体、政治或行业社团便百花争妍。所有人都组织了起来：农业者、工业家、公务员、商业职员、手工艺者。在冯·施坦恩将军周围，君主主义者建立了一个强人团。那些狂热崇拜所谓德国优越性的人建立了泛日耳曼团。一些敌视工业扩张的地主成功地将几十万农民拉在他们身后，成了农人团。某些社团甚至只有一个纲领，否定一切而非建设一切，要与其他社团做斗争。还有这样一个团是反对社民党的，那便是汉萨同盟团，它由批发商、工业家和银行家于1909年设立，重开昔日中世纪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战斗。

于是有两个现象传播到了魏玛共和国，这两个现象都是德国历史演变的结果。其中一个现象与宗教冲突、被组织成大量突现的社团的集体生活、民主发展密不可分，即德国人逐渐有按照利益或自卫而集结的趋势。而另一个现象并不限于出现在采取特别形式的德国，即群众驾临到政治与社会生活之中。

民族主义者与民族种族主义者

迷恋皇家传统的德国人并未因共和体制而感到很不自在。德国民族党承袭保守与反动的观点，给他们提供了所需要之物，抚慰了他们对旧日时代的思恋和对新事物的恼恨。对于霍亨索伦王朝，民族党怀播彻头彻尾的崇拜。它拒绝凡尔赛和约。它保留着一个梦想，要让德国统治欧洲大部分地区。在它看来，犹太人是一切恶的起源。

居住于易北河东岸，属于地产主范围，信奉新教，这些便是德国民族党拥护者们的典型特征。为了从事军官职业，或者为在行政部门里升到负责人



岗位，这一社会血统不仅极其重要——如果没有一个贵族式名称的话——而且它冒着失败的危险，逼迫人们不得不支持德国民族党。为了渗透进上层社会，必然需要加入它，或者至少应该采纳其宣传主题。

它声称要保护的是职业界，有商人、手工艺者、农业开发者、租楼业主。但事实上，它吸引了所有不满分子，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或者说得更广一些，把德国现状全都归罪于制度的改变。就这样，聚集在一起的有军人、教师、学生、农民，以及所有不愿意只有一支仅10万人的德国军队、拒绝向战胜国赔款、拒绝容忍共产主义战斗精神的人。正因为如此，它获得的影响已超出了地主所控制的地区，直至南部的德国天主教徒。在基督教工会的工人中间，包括在商业职员中间，它也不缺乏同情同感者。德国工会团，1921年拥有200万名成员，它通过转弯抹角的办法，实际控制了数个行业工会组织。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1931年在其所代表的阶层中有约35%的多数支持，全国商业职员协会便属此类。

直到20年代末，在每日的公众生活中，要躲开它都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数量庞大的社团都直接依赖于它，或者围着它转。德国民族党是反共和主义的中坚力量，同时它还参与到魏玛共和国制度的运转中去，成为一个合法的屏风，在它身后，所有反民主势力均可受其庇护。在共和国的刘海缝隙间，充斥着谋反集团。从它的腰膝环抱处，逃逸出种族情绪最强、最爱诉诸暴力的分裂分子，以便要求独立。它是所有运动交汇的支撑点，这些运动宣布要保卫日耳曼本性，保卫德国种族。选民大众从1930年开始加入到纳粹阵营，这并非偶然的。

自1918年末起，右翼冒险家或活动分子保卫其狂热活动的办法多得让他们难以选择。退伍后无所事事的士兵可以应征到独立部队中去，后来他们在军校的中学生、小学生或在大学生的陪同下，于1919年为反对红军而保卫波罗的海诸国，为反对波兰的苛刻要求而保卫西里西亚，为反对鲁尔矿工起义而保卫秩序。如果他们有兴趣举手行道以及找人算账，还能进入秘密社团中，像圣威姆、黑军，或者进入国民自卫队、执政官组织、保卫性社团。他们的任务就是暗杀那些被民族主义者们指责为玷污了德国荣誉的人士，像艾尔茨贝格尔和拉特瑙。

在所有城市，独立部队解体后，右翼准军事集团幸存下来。他们打着所谓爱国社团或老兵团、射击俱乐部、猎手社的幌子维持原状。1927年，所有这些运动估计有4万人参加。光射击俱乐部在1926年便有10万人加入。尽管为了不违反凡尔赛和约规定，他们只被允许使用小口径武器，但却成了未来优秀士兵的预备队。

醉心于射击练习的社团中最活跃的一个叫狼人俱乐部。它由以前的一名军官建立于1923年，考虑到战争，它公开对其成员进行军事训练。其目的是重新征服失去的土地。它组织郊外行军，组织模拟进攻的演习。它是独立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成为民族主义者的，偶尔也反对过德国民族党的要人，到1930年拥有十几万名成员。

由于没有义务兵役制，射击社团能让人进行传统的男子汉入门练习。正因为如此，它们主要存在于外省小镇上甚或村庄里。他们甚至无意识地呼唤着几代人祖先的形象，让他们随时保卫城市社区的四壁墙垣，如中世纪时期一般，这些形象在贵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仍然十分清晰强烈。通过射击社团，宗派、小集团和行会意识都被部分地保留了下来。它们通常分为两种级别，一个专门留给社会精英们，另一个招选时便没那么严格，手艺人、商人、行政或司法部门的中层干部时常出入此处。通过其活动，各社团实际上已被纳入到团体仪式的发展当中。在它们的庇护下，各社团会进行一些比赛、上街游行、节庆或舞会，这构成了一年之中集体生活里的快乐时光。

一般来说，学员骨干来自于兵团的大量老兵协会。这些纯粹是地方性协会，但多少与一个国家或民族主义组织有联系，例如钢盔团。这个组织于1918年由一位前参谋部军官弗兰茨·赛尔特在马格德堡建立，它给自己确定的目标是集合昔日的战士。1919年初，它只有250人加入，但在同年中期就有了近2000人。接着它与一个同类性质的协会合并，该协会总部在布兰德堡，它拥有数千成员，十分强大，于是在全德国都引起公众的兴趣，其领导人也从全国角度来看待它。一些地区性联合会被建立起来，产生了关系选票。兴登堡元帅被提高到荣誉会员的资格。1923年，钢盔团里有17.5万人，1926年，则达到了45万多人。

他们不再仅仅包括老战士，无论什么人都能加入。这是为扩大队伍，尤



其是为了能实施易于影响百姓各阶层的宣传而采取的巧妙策略。于是他们分布到数个部门中，最高层是前沿人物，他们组成干涉势力，是运动的中央核心，他们在一战期间曾在前线作战，或者对于最年轻的人来说，曾在独立部队里战斗过。接下来就是17到21岁的人，即新一代的新成员。然后是13到17岁的青少年，以便领他们入门熟悉战争游戏。最后，是两个专为妇女设立的团。这不仅是为了战争寡妇或士兵妻子，而且也是为了在全军拥有必要的女性名额，尤其是在医药部门。

钢盔团给了自己一个很明确的任务，就是忠实地仿照俾斯麦的普鲁士模式，弥补军队的弱点。他们设置了一个军事规章，身穿灰绿军服，乘坐卡车、汽车，手持武器，参加练兵。所有不到30岁的健康男子都得服从于一个积极的义务兵役制，这一制度打着健身操的幌子，差不多对任何士兵学员所应完成的学业都适用。

弗兰茨·赛尔特及其助手迪斯特伯格设立了自己的首席长官，冯·塞克特将军，那么他们是否由此而在军队的秘密基金上获得资助呢？于是谣言四起。最后他们被证明是无辜的，但许多德国人并不为此而感到震惊。在军队征兵办公室，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①所以必须得找到一个弥补办法。在有些人看来，钢盔团的征召工作可满足年轻人心中对民族传统那受了挫折的爱。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回应协约国压力和抵制凡尔赛和约的正常手段。

四处的市民与村民已习惯于看着钢盔团列队走过。无论是否同意他们的想法，人们都不得不这样评论：他们占领着街道。其活动从怀念德国昔日的胜利到为纪念性建筑物揭幕和庆祝威廉二世的诞辰。他们步行前进，四人成一纵队，背负军包，身侧提棍杖——持棍后来于1928年被内务部长塞福林禁止了。完美的秩序抹去了因几代人混杂而带来的不协调效果。一些青少年与曾在战争中负过伤的人搭讪，伤员便拖着一条腿，骄傲地举起其铁十字架。

阅兵仪式在威廉二世时期曾如此辉煌，如今威望犹存。伴随着军乐、旗帜与行军歌的游行是献给胜利的。而且，军队自己每年一次的演习也成了蔚

^①根据冯·佛尔岑上校的说法，1926年德国军队有94337名副官和士兵，1927年有94765名。士兵签订的从军年限为12年。这显然是因为失业而得到的意外收获！在服四年兵役后，一名普通士兵在1927年每月可领取120马克，但要从其军饷中扣除掉36马克伙食费，12马克住宿费和两马克税费。这些信息参见于雅克·莫尔塔纳：《菩提树下新德国》，波迪尼埃尔出版社，巴黎，1928。

为壮观的场景。大发行量的报纸纷纷加以评论，电影在介绍时事的过程当中，都要显示军队的行进和骑兵的装备，由高层司令官提供的战略信息在收音机里反复播放。

这种军事主义宣传把希望寄托于爱国热情之上，并且得到了一位德国民族党议员的响应，即权势熏天的阿尔弗莱德·胡根伯格。这位克虏伯工厂的前厂长于1928年被推举为党魁，五年后，在希特勒所组织的第一届政府里当过昙花一现的部长，发展了一个报刊帝国。他首先买下了谢尔报社——它拥有最畅销的报纸之一《地方画报》和各种杂志——的大部分股票。接着，胡果·施廷内斯死后，他得到了一部分原本在这位工业家控制之下的报纸。最后他创建了自己的电报公司，对一千多种出版物实施控制。1928年，他在弓上又加了一根弦，成为惟一一家电影公司环球电影公司（乌发公司）的主人。该公司在德国真正是势力庞大，公众舆论因此几乎完全落在他的摆布之中。每天，公众舆论都不得不遭到民族主义主题和口号的狂妄滥炸。

所谓的国社党运动

正是在这种反共和、反犹太、反共产的氛围中，德国工人党于1919年初扎下根来。它由一个锁匠安同·德莱克斯勒和一名记者卡尔·哈勒尔创立，与德国多如牛毛的大量右翼宗派和社团没有任何区别。有一个副官，尚未退役，原籍奥地利，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很快在其三十几名成员中成为重要人物。该党建立一年有余后，1920年春，这一小帮人将名称改为德国



啤酒馆暴动中的冲锋队队员。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慕尼黑的各啤酒吧里，演说家、宣传家希特勒迅速被人公认为领导人，甚至还没等他登上总统宝座，就被人称为“元首”。



自1920年秋以来，这些纳粹党徒——正如不久人们对他们的流行叫法那样——拥有了一个体育与健身部。1921年夏季期间，这个部取名叫冲锋队。希特勒当即派给它进攻的角色，而不仅仅是防守。这是纪律极其严明的战斗队，一个精英集体，仿效军队模式，其惟一的规定，就是绝对服从首领。

这些准军事团体在巴伐利亚、慕尼黑——它成为纳粹运动的中心——在国民保安队的反共保安人员和独立部队之中招兵买马，同样也招募无法重新适应国民生活的退伍士兵。海尔曼·戈林上校，光荣的飞行员，却只能游手好闲，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当希特勒把不久前所设立的一些组织的指挥权交给他——后来转给了他的同事罗姆——时，他的新生涯开始了。到20年代末，许多年轻人——其中某些人是共产党员——出于其他原因也加入进来：作为失业者，他们能在这儿拿到军饷和吃的东西。

从外面来看，这些冲锋队意味着什么呢？徽章、旗帜、游行、示威。在1923年1月国社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们使用这些东西在慕尼黑校场上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阅兵式。同年11月，被希特勒投入到战斗中的正是这些，他徒劳地企图用武力来夺取权力。真是一段可怜的插曲，在该插曲之上，他盘算着他的回报，为此戈林身负重伤也值得，但在该插曲中，它们以侵略性而声誉广著，并使其成为他们的明显标志：偷入一家印刷厂，将社民党的地方报纸焚洗一空，非法关押犹太裔公民。

此次未遂政变之后，冲锋队被查禁了。事实上，它们仍继续在暗地里存活。当希特勒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后，被允许重操政治活动，这时它们再次出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更有甚者，国社党创建了另一支部队，党卫队。这些党卫队势力庞大，1928年仅有280人，到1930年便有了2000人，当时他们尚无武器，服从于最严格的纪律。1929



希特勒离开兰德斯堡监狱。



希特勒和他的党卫队。

年初，海因里希·希姆勒被置于首领之位后，他将他们定义为新德国的御林军。

逐渐地，纳粹党人通过一个分别用于各社会阶层的组织网，把百姓吸引到了身边来。1926年7月，希特勒少年队问世了。六个月以后，国社党学生协会归属于

它在各大学里的分支机构。1928年，为了各艺术职业，在阿尔弗莱德·罗森堡的领导下，出现了德国文化战斗团，接着涌现出医生团、法律人士团、教师团和小学生纳粹团。至于妇女，红色卐字妇女社汇集了由伊丽莎白·参德尔所主持的各类协会，后来她被提升为纳粹党领导下的妇女问题负责人。从1927年起，通过企业支部组织，为工人着想的工会政策出台，但不怎么成功。

与通常所写的相反，大部分国社党党员，其准军事团体或其所控制的协会并非来自于工人。^①除了无职业的退伍士兵和失业者外——他们中自然有很多人是工人——招募对象主要是手工艺者、小商人、办公室职员和农民。尽管如此，直到1929年，招募人数还是不多。纳粹党宣布，他们在1929年发放了15万张党员证，其真实情况肯定少于这个数字，即便是在这个基础上，若与传统党派相比较，其人员之缺乏仍然很明显，因为德国国家党同一时期有

^①一般所给的数字，很遗憾，无法根据其他资料来进行证实，都是国社党所发表的统计数字。这些纳粹统计显示，1930年有31.5%的工人，21.5%的职员，6.7%的公务员。这样，工人看起来便成了人数最多的阶层，虽说比起当时德国整个人口而言比例还不足。数字有假造之嫌。原因很明显：纳粹领导人必须在德国内外显示出他们的党是一个工人党，才能名副其实。

关于这些统计问题，可见于尔根·格劳耐特和米凯尔·日卡特尔的研究，莱因哈特·曼编，《国社党党人》（手稿，第9卷）克莱特—科塔出版社，斯图加特，1980。

根据A·蒂雷尔《元首诏曰》，德罗斯特出版社，杜塞尔多夫，1969），纳粹党党员中工人数在1930年可能是30718人，也就是说占总党员数的8.5%。

该数字被另一个纳粹资料给证实了，该资料显示，到1930年9月30日这一天，有3.4万名工人党员。



约70万成员，而人民党有40万。

正是借助于经济危机，并依靠着铺天盖地的宣传，1931年，纳粹党越过了50万党员数大关。某些德国资本家^①所给予他们的经济资助以及他们在所有右翼势力



1932年7月，各式的的选举海报遍布街头。

中的诱惑，甚至是与之联盟，使他们得到了大量的同情者，于是很快便出现了群众运动。这几十万并非刚开始跟从他们的，不是被他们的叫骂和暴力给吓住了，而是许多人倾向于他们的立场并将之作为解决失望情绪的办法之一。

要给1930年前后投票支持纳粹党的典型选民画一幅肖像，这并非易事，因为纳粹党在各界都曾获得过选票。但有几个因素表现出来了。1928年到1932年间，德国国家党和人民党明显崩溃，一目了然，原来投给他们的票因此都转向了纳粹。相反天主教中央党、中央党还是比较稳定的。于是纳粹在它们身上得到大多数民族主义和民族种族主义选民——他们一般信奉新教——的票。

他们频频声称投票支持他们的妇女人数比男性多，可似乎并非如此。1930年，在选民中，她们占妇女总人口的不到13%，而男性比例——还是和总人口相比——达到16%以上。无数向纳粹鼓掌、与希特勒一起狂热地乱蹦乱跳的妇女形象多是宣传，而非事实，因为国社党直到1933年元月，党员总人数中女党员的数字从来就没超过6%。

^① 1930年11月，希特勒与鲁尔区的工业家们进行了谈话。1931年10月10日，兴登堡元帅与纳粹党代表（希特勒与戈林）之间达成一些协议，以便使纳粹党有可能参加到政府中去。同年10月11—12日，胡根伯格的德国国家党、钢盔团与纳粹党组成一个民族阵线，即哈尔茨堡阵线。尤其是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在工业俱乐部门前发表讲话，正是根据这一讲话，工业家弗利克、蒂森、哈尼埃尔、福格勒尔等人决定资助纳粹党的战斗；希特勒向他们保证让“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完蛋。后来蒂森与纳粹断绝关系，有一本著名的书以他的名义——尽管严格来讲他并非作者——出版了：《我资助了希特勒》（1941）。



呼吁妇女投希特勒一票的竞选海报

乡村与小城市的工人运动没多大份量，但从1930年开始，他们不断的大吹大擂奏效了。他们身着军服，手持旗帜，一切按仪式进行，在所租房屋或啤酒吧的大厅里集会，这些场景吸引了公众，尤其是吸引了年轻人。有一天，冲锋队成员进行游行，他们从四面八方乘坐卡车过来，或者按小分队步行而至，引起方圆几公里人们的好奇心。他们在行进过程中扔撒传单，在街头画卐字符，高声合唱进行曲，震耳欲聋。他们的首要作用是将大厅准备好。他们从来不选择太宽敞的大厅，因为这样更能给人以人山人海

的幻觉，哪怕得将人群拒之门外，并在外面放置一些高音喇叭，能突出热闹场面。你推我挤，大打出手，向捣乱和反对者拳脚相加，这都是时不时会有的结果。受伤是常事，而在1931和1933年间，死人也司空见惯了。这些冲锋队小分队若不带几个新招募的成员走，那才叫少见呢！

雅克·德库尔于1930-1931年在德国一所高中任法语外教，他列了一份其日常经历的年表。^①一个星期天，他从人们的合唱声中醒来，以为是在唱圣经赞美歌，便赶紧跑到屋子的窗户边。他发现了什么？一些平民，没戴帽子，穿着衬衣和靴子，在街道上列队而过。在他们身边，是坐满全副武装的警察的卡车。他们与平民队伍同时前进，像是陪着他们。我们的这位观众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记录道：“歌曲与步伐如此一致的节奏穿透了我的心。就此我已无微笑的意念，我逐渐被拉入到鼓舞着他们的集体情感里去；再要拉一点，我就会和他们一同歌唱。街头边一个小保姆举着右臂向他们致意，一直站了五分钟，我不再觉得她很可笑；他们一路行走，一路无言，只以法西

^①雅克·德库尔：《那力斯人之城》，伽里玛出版社，巴黎，1931，85页。至于雅克·德库尔本人，他真名叫达尼埃尔·德库尔德若什，尤见让·波朗《语言之不确定性》中与罗贝尔·马莱在电台里的访谈，“理念”丛书，伽里玛出版社，巴黎，1970，149-151页。雅克·德库尔在战争期间与让·波朗秘密创建了《法国文学》杂志，在被法国警察局送交给盖世太保后，被纳粹枪杀。



斯敬礼予以回答。”

另一个见证是达尼埃尔·葛林，他于1932年徒步穿越德国，在一个夏日到达德累斯顿，那时纳粹正准备在市



希特勒和他的冲锋队。

体育馆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从下午起，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投洒传单。晚上，体育馆里挤满人群。人们站在阶梯上，等候着。仪式在队列游行中开始，似乎没完没了：“投射灯昏暗微弱，在低级乐队的音乐声中，在令人失望的谈论声中，冲锋队的人一个一个向前走去，队首举着旗帜。当队伍行进速度慢下来时，他们机械地原地踏步，踩起尘埃，晃动手臂，步调一致。每一面军旗走过时，一万只手臂举起来，以罗马人方式敬礼，而这接连出现了25次。当每个部都在体育馆里转了一圈之后，便到场地中央，在为演说者所设的讲坛周围排成方队。在我们面前，是一片棕色衬衣的海洋，全都立正站着……”^①

现在该轮到突击队演说家^②了，他是“头领”之一。两个小时的讲话，夹杂着数千听众表示同意的喊声。直到所有人齐声轰然高唱向霍斯特·威塞尔致敬的赞歌，仿佛受了集体催眠。这个人物只不过是个追随者，却有资格被抬到国社党英雄的地位，后在1930年元月，其同领域中一个地位与他一般的人给了他致命一伤，给他加上了“共产党”背景。几个月以前，他在一份纳粹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从该诗中产生了一首歌。霍斯特·威塞尔那蹩脚的诗句仅仅是在旧格律上镶了点金而已。很快，由于戈培尔筹划出整个美丽的英雄故事，毫不害怕受到一个坏共产党分子的牵连而被指责，全德国后来都像德累斯顿那晚一样，唱了起来：“举起旗帜！行列整齐！冲锋队在行进，步

①达尼埃尔·葛林：《棕色瘟疫》，马斯佩罗，P.C.M.丛书，1978，第1卷，39页。

②更确切说，这是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1934年6月，在长剑之夜事件中，他被希特勒清洗。



戈培尔。

伐坚定又有力……”^①

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

对于工人来说，引力中心不是民族主义者和纳粹，而是社民党。在他们的生活中，甚至当他们反对它时，他们与社民党的关系也无可避免。1930年，在工人行列里有约60%，而10%的成员是职员，3%是公务员。^②在同一时期，社民党工会包括有3/4以上的人会工人。至于职员，其比例只勉强有1/4。

自1890年左右以来，社民党在团体生活圈子的所有领域里，发展了十余个工人组织。这一活动也涉及反对酗酒、戏剧、裸体现象的斗争或妇女解放运动。在权威、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封闭世界中，工人们被驱使着退缩于自己的集体内，退缩在独立制度下。从摇篮到坟墓，从小到老，工人家庭的成员都能在他们那里找到庇护，找到团结。通过在政治、工会或文化领域担任职责这条途径，他们也希望在这些制度内部能达到一种晋身，获得社会尊敬的形式。

1928年，隶属于社民党的体育组织计有77万党员和20多万工人拥戴者（与所有资产阶级协会不同，它们从世纪初以来就是混合组织）。工人撒玛利亚善人团建立于1909年，旨在救助受工伤的工人，拥有4万多人团成员。如果一个工人爱好收音机，他就可以拥有一个俱乐部，在里面教人如何制造方铅矿石收音机。如果他喜欢读书，他就可以到专为他设立的图书馆中借书。徒

^①此诗是一首题为《举起旗帜！》的进行曲，曾发表于1929年9月23日的纳粹周刊《进攻》上。霍斯特·威塞耳是柏林冲锋队部队的领袖之一。他被对手打伤后，没几天就死了。四天后，即1930年2月27日，戈培尔在《进攻》上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从1930年10月起，《霍斯特·威塞耳之歌》唱片在市面上发售。后来也有无数书籍、诗歌来讲述这位纳粹“英雄”的史诗故事。1933年后，《霍斯特·威塞耳之歌》正式成为党歌，与国歌《德国至上》(Deutschland über alles)平起平坐。关于该主题，见笔者的书《纳粹主义和文化》，情境出版社，巴黎/布鲁塞尔，1988。

^②1930年，社民党内不满25岁的青年有7.8%，60岁以上的成员数量更多，有10.3%。至于25岁到30岁之间：10.3%，30岁到40岁之间：26.5%，50岁到60岁之间：10.6%。这些数字转引自《193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年报》，柏林，1931，194-195页。



步旅行的业余爱好者可以到大自然中找到朋友。这样，所有娱乐需要都能在其各自领域得到满足。

此外，社民党首先看到的，是将工人组织起来在这些地方聚会。政治上的担忧和战斗精神在这里应当退避三舍。共产党人所反对的主要就是这方面，从1920年开始，他们便在发展竞争性组织作为反应。在他们看来，社民党在19世纪已经完成其有用和必需的工作，现在已不合时宜。一切事情都首先与阶级斗争有关，无产阶级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应放弃其下一个胜利。在获取政治权力的前景上，工人们应当始终清醒地牢握阶级意识。

社民党的势力来自于他们在工人职业协会中的安插，因为他们设立了救助基金。会员所缴会费一部分被用来维持慈善事业和互相帮助。[在关于《德国职业协会》的博士论文（法学与判例总书店，巴黎，1932，231页）中，阿尔贝·布尔瑟莱估计，社民党各工会20年代的收入在1亿到2.5亿马克之间。至于从1926年到1929年的收入与支出，按马克算，见下表：

年	收 入	支 出
1926	148 139 716	135 529 991
1927	182 252 326	129 463 897
1928	221 696 195	189 363 911
1929	251 391 000	203 168 000

支 出 细 目 表			
年	团结工作	斗争工作	行政工作
1926	62 100 000	6 100 000	38 600 991
1927	40 900 000	11 300 000	43 200 897
1928	62 500 000	32 200 000	52 200 911
1929	86 800 000	13 300 000	58 800 000

] 津贴被发放给病人、寡妇与孤儿。这便是社民党工人组织从1892年277名成员增长到战前250万人的原因之一。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它们所管理的基

金十分庞大，有20%到30%被充做救助资金。在生病或失业的情况下，若为隶属于工会总联盟的组织中的工人会员，可按他到那时为止所缴会费的一定比例领取补贴。^①

在曾经对1918年和1919年间旨在改变德国帝国经济结构的游行持有好感的阶层中，通常对社民党工会进行指责，说他们是在适应形势，而非为了改变它而斗争。1919年7月，在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其内部“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分裂公开化。在600名与会代表中，407人表态支持过去泰奥多尔·莱帕特所代表的方向，192人反对。一边是300万工会会员；另一边有一半多一点。因此此次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总联盟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这一分歧。它后来在不无狂风暴雨的岁月中经历了各派别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至少到1929年年底。在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在其领导层内部形成了主要反对派，即革命工会反对党。

在公众生活里，社民党本身的影响是什么呢？有几千人可能只不过是出于机会主义才入党，以便在他们所确实能加以管理的机构或市政府中保住位置。但比起会员大众来，他们的比例终究很小。1920年，它拥有100多万成员，随后，它便出现停滞或负增长。1926年，它有大约80万党员，然后其数字有规律地增长，1930年又达到了100万。

它能维持约一万名永久性党员，相对来说不算什么，数字一点也不大。无可置疑的是，在传统的帮助下，它将一种势力固定在德国社会里，从此很难脱离出去。^②纳粹党由于在工人阶层里无法大量招到会员，动不动就使用一个词来揭发社民党的这一势力，说它是“佛法官僚”。

尽管社民党穿插到了全德国，但仍很脆弱。其实，许多党员都不是战士。他们仅限于交纳会费。其次，原因在于所构成的年龄阶层不同。1930年，只有20%的成员在党内有15年以上的资历。这意味着他们中有80%未经历过1914年之前的困难斗争，而只经历了共和国体制下领导层所进行的适应政策

^①例如，1931年，一个交纳会费17年的矿工每月可领取22马克。交纳会费32年的人可多领取15马克。

^②社民党工会拥有楼房、餐厅、影院。在汉堡，工会总部也拥有一家餐厅和一个135间房的旅店。消费合作社也被开发出来。例如在吕贝克，就其2.6万名成员来看，其合作社管理着78家副食店、十家面包一肉类店、一家煤炭商号、一家服装店。关于该主题，见加布里埃尔·郭布隆：《接触新一代德国人》，南灯出版社，图卢兹，1930。



和妥协政策。自称是社民党，简单地说通常就是想体现魏玛共和国。

年轻人几乎没有被该模式吸引住。当他们觉得与社民党观点相近时，不是加入严格意义上的党派，而是更喜欢自己待在一起，同时参加到工人青年党里。他们每周一小组一小组地聚会。他们组成合唱队、民族舞组合，研究工人运动的古典作品，参加远足行动，到剧院去。到适当场合时，他们就上街游行。比如说5月1日，那时还没有被公认为停工日。他们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仪式和节日，男孩女孩聚集在同一协会里。^①

很想高效率办事的青年工人或学生尤其为极右翼派活动感到担忧，便投到青年军旗党麾下，即国旗党的青年部。该群众组织于1924年在马格德堡成立，其纲领是保卫共和制度。它是对钢盔团的反驳。起初，它也被构想成一个老兵协会。中央党和民主党对它的成立表示支持，后来却疏远了它。从成立之初起，还是得由社民党来主持其活动，社民党有点把它看成是保安队。1930年，他们甚至在那里建立了一支精英部队，即护卫队，任务是必要时回应纳粹党的暴力。^②1931年，他们与工会总联盟及他们所控制的健身协会一起加入了钢铁阵线，该党派是用庞大的人员来反对法西斯，并在企业里组织自卫组。

无论是国旗党、青年军旗党还是钢铁阵线，所有这些人都上街游行，就像钢盔团或冲锋队一样，但挥舞的是共和国颜色的旗帜。他们唱着《工人马赛曲》、《国际歌》。8月11日通过宪法的周年纪念时不时地也成为社民党公开展现其实力的机会。他们带头举行健身表演、火炬游行、舞会。那时便是共和国的节日了。

直到30年代初，他们尚能举办规模庞大的游行，以此与纳粹党人的游行相抗衡。^③所以，他们的领导人逐渐把该党及其大量组织介绍成民主之惟一真正的堡垒。他们说保证能让人满意，这一保证没忘记花开百朵，但很快成了

^① 在合著卷《1904年~1945年法兰克福的青年工人运动》中有大量数字，阿那巴斯出版社，拉恩-吉森，1978。

^② 尤见社民党领导人海因茨·屈恩的回忆录：《抵抗与迁移》，霍夫曼与坎普出版社，汉堡，1980，31~39页。他是“舒佛”护卫队(Schutzformationen, 简称Schufo)的成员。

^③ 参见雅克·德库尔：《腓力斯人之城》，192-193页：“民族主义者如此吵闹，人们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压制住了别人的声音。但是‘军旗’，一个共和国颜色的和平组织人数还是很多的。上周日，我看见过其成员游行。他们举着红旗，唱着《国际歌》和《马赛曲》。”

幻想！泰奥多尔·莱帕特，工会总联盟的议员与主席，他于1931年对一位法国记者断言说：“我们不怕希特勒，他一天不如一天了……”^①

社民党将他们的希望放在了出身于工人家庭的新一代人身上。在德国二十来个地区，他们为自己发展了一个组织，即儿童之友组织，其来源是战前的奥地利。几十万年轻人根据年龄来分布，在教师的簇拥下，学习如何以民主方式共同生活，如何对世界问题进行思考。

与工人青年党老大哥们一样，他们也组队旅行，或在兵营里、在帐篷下度假。8岁到10岁的孩子属于雏鸡营，10岁到12岁的属于小隼营，而12岁到14岁的便属于红隼营。按当时的现象，只有最后这个名字指称整个运动才有份量。社民党党人称呼最著名的红隼营——位于莱茵河一座岛上——的方式足以说明，他们在孩子们身上放置了多大的雄心。此前他们称孩子们为纳梅迪儿童共和国。

它还不是惟一被称作“儿童共和国”的。度假夏令营多半是在湖边，六到八座帐篷分布成“村庄”，每座帐篷内选出一位代表，在“共和国国会”里代表他那一组。他们所采用的原则是自我管理和自我负责。孩子们一切都得自己负责，开始时，他们安置厨房、厕所，然后他们分派任务。他们利用每晚聊天时间，共同制定次日的日程安排表。

按一般规则来讲，除了工会是特例外，社民党对其所控制的全部这些组织，都禁止敌对友党共产党加入。两党间的不和，甚至是激烈的敌对情绪自1919年起就成了一种慢性病。共产党虽然后来做得根其理性，但还是造了社民党方向的反。社民党领导人于是认为，通过这一决裂，两条不可和解的相反道路在工人运动内部表现了出来。

至于共产党人，在他们看来，自艾伯特和诺斯克以来，社民党领导人背叛之证据已是路人皆知了。他们在王家军队和独立部队的帮助下，从1918年11月开始就在压制革命活动。在共产党眼里，1923年11月，即共产党与社民党地区议会签定一份协议而在萨克森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之后，社民党竟决定镇压该联合政府，他们甚至已从1914年的“叛徒社会党”变成了法西斯的盟

^①转引自阿尔贝·布尔瑟莱：《德国职业协会》，法学与判例总书店，巴黎，1932，237页。



友，变成了“法西斯社会党”。

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这些立场变得难以调解！典型的例子就是柏林1929年5月1日的事件。共产党人坚持要进行一次游行，而警察局局长决定禁止。这位警察局局长就是社民党党人厝尔吉贝尔，他下令向游行进攻。统计结果为，31人死亡，100余人受伤，1000余人被捕。

面对“法西斯社会党”这一指控，社民党人还会被动接受吗？当然不会，他们把这一叫法还给了作者。从1930年到1932年，他们的海报将共产党与纳粹相提并论，称之为“民主的敌人”。其中一张海报把卐字符与镰刀斧头星星旗放在一起，写道：“谁投共产党的票，就是在投国社党的票！”

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事情，就是1932年总统选举之时立场的差异。社民党没有提出候选人，它考虑到共和国的命运只在兴登堡与希特勒之间被玩弄，于是以宪法和民主的名义，呼吁更新兴登堡的委任权。其口号是：“谁投希特勒的票，就是在投战争的票！”在共产党那边，他们有自己的候选人，台尔曼。其竞选团再次使用社民党的口号，作了点补充：“谁投兴登堡的票，就是在投希特勒的票！谁投希特勒的票，就是在投战争的票！”

结果，面对纳粹危险，两方面对于联合行动都迟疑不决。而当共产党向他们建议组成一条共同战线时，社民党领导人对他们的意图只有怀疑。通过共产党所建立的一个新组织，即反法西斯行动社，从1932年5月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民党战士，他们聚到一起，在游行中与所有反纳粹的人手挽手，但要发动一场能克服两党间分裂的运动已经太晚了。

从数字和选举角度来说，共产党比其竞争者的势力仍然一直弱得多。当社民党有100多万人时，共产党在1931年还不到20万。一个在1930



1932年，德国总统兴登堡和希特勒。

年的立法选举中得到了850万选票，而另一个只收到450张。然而，倒是轮着共产党来促使许多组织的产生，这些组织易于影响百姓各阶层，并抵制资产阶级的影响。在这方面，其战士显示出热火朝天、不知疲倦的活力。由此，人们若从局外来理解其活动，会感觉它的活动比社民党的有效多了。

在柏林，从1925年到1928年，前线红色战士团的无产阶级民兵队每年降灵节都要进行游行。这几万人来自于德国四面八方，脚穿皮靴，腰扎军用皮带，头戴黑檐鸭舌帽，以其秩序、纪律、制服之整齐，与钢盔团同样威风凛凛。不过，他们想成为反军事主义者，成为和平士兵！……为避免迎面碰上民族主义者的阴谋诡计，共产党组织了自己的保卫部队。1924年5月，数名工人在图林根被右翼准军事组织杀害，警方未采取任何措施。面对这一局势，共产党决定自己来确保其会议、游行和成员的安全。1924年7月31日，在哈雷人民公园，一群人为一个反军事主义战斗组织举行成立仪式。几个月以后，该组织便拥有了3万名战士。1929年，它在5月1日流血事件后被查禁，当时它拥有18万人。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数字。

通过招募，前线红色战士团成了一个几乎只收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由不满25岁的年轻人构成，他们占50%以上。而且还专门设立了一个青年部，招纳16到21岁的人。他们到这里来寻求什么呢？自然是能有机会当下就为革命事业做出具体行动。他们得到指令，不仅要服从于高强度体育练习，还要学习地理、数学、急救的基础知识。奇怪的是，他们中有60%的人不属于共产党，70%的人并未加入工会。

青年与红色先锋共产主义联盟的成员更为政治化。他们通过加入组织，完善其理论教育，并在车间、工人街区、学校里进行斗争。与青年工人党的社民党同志们不一样，他们的名声总让人扫兴。有了他们，便别想太多待在一起享受聚会之乐的事。没什么舞会或歌唱晚会，只学习斗争，与上年纪的和经验丰富的战士合作，总有一场辩论、游行和即将到来的罢工。

对于小学生来说，已经有极其具体的政治对象了！他们为了教室能摆脱满墙的战斗画片而战斗，为了皇帝与战功赫赫的将军的画像能被取下而战斗，他们练习对教学内容进行巧妙的批评。共产主义儿童团的一位负责人，爱德文·霍尔恩勒写道：“我们的孩子向老师提出问题，于是把课程变成了讨论



课。如果老师谈到路德，他们就问他关于托马斯·闵采尔和农民战争的问题……”^①

最特殊的伟大日子，就是5月1日！他们成群地走在示威者队首游行，举着旗帜和他们所画的燕尾小旗。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着：“5月1日不上课！”警察冲上去想从他们手中夺下标语，他们进行反抗，成人也站在身旁。下午，游行结束了，他们按传统加以庆贺。他们与父母聚到一起，又唱又跳，或者参加类似游艺会的活动。他们为敢于冲破禁阻而庆贺，尤其是庆贺这天能逃课！

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方法和任务都挺严肃，也许这也是其党员数目处于弱勢的诸多原因之一。当青年工人党于1925年有10万成员时，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才是他们的1/5。后来直到30年代，它发展了一万余人。但若要从另外一点来比较的话，同一时期，希特勒少年队全体党员增长了五倍。那服从于共产主义学生的批评的教师们呢？得相信这些学生很少引起他们思想里的混乱，很少表现出很强的说服力，因为1925年，站到共产党行列中的小学教师全部加在一起也只有180名。^②

而且，共产党在脑力劳动者中间招募成员的尝试不太有效。与集中在工厂里的工人不同，他们分散在毫无规律的职业阶层内，除了个人联系外很难接触。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人逐渐抛弃了所有的现存组织，借口是它们被打上了资产阶级势力的烙印。他们设立了大量的团队，小农民、商人、医生、作家、摄影家、运动员，还有其他很多人，他们都有各自的组织！结果导致他们将自己锁在自己的圈子里。

从这个角度看，革命工会反对党虽处于工人阶层内，但它脱离工会总联盟后，却远远未能飞向成功。在它推举了候选人的企业职业选举中，一直就只得到极不理想的结果，很少超过20%。妇女那边的失败尤其明显。红色妇女团于1925年在柏林成立，克拉拉·采特金任名誉主席，这个团在哈雷和莱

^①转引自卡尔·海因茨·艾尔森：“德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及其儿童组织”，《历史课程学科与公民知识学科》，第12期，1966。

^②米凯尔·波代克尔与安德雷·莱瑟维茨所给的数字，“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贝克里斯多夫·齐文海姆与安德雷·莱瑟维茨编：《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觉悟》，科隆，1973。

比锡地区以外，无法安身于工厂。在1926年的3.5万名团员中，有约80%的人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她们大部分人未从事固定的职业活动。

但还得退一步说，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当共产党是很不容易的事！1923年，后来从1929年开始，那就意味着愿意过一种亡命之徒的生活，必须干冒被镇压的风险。女人们所剩下的，就是她们不能缺乏勇气。何况她们在共产党里完全是少数，感觉自己很孤立。1931年，全体党员里的妇女有3.3万人，而男人有26.1万人！

此外，在所采取的策略问题上，一股矛盾洪流横贯于该党之中。它根据彼此的影响势力而被引来引去，改变方向。在这方面，共产国际的压力与指令也脱不了干系，它们很少符合德国国情，经常造成失败。结果，脱党与开除成了不间断的运动，党员完全成了临时性的。1920年的党员只有1/4到1927年还是党员。

最后，加入共产党还必须得付钱，因为其财政不是来自于资助，而是来自于成员们的钱，来自于每月相当高的党费。这对很多家庭来说不能不是一种牺牲！从1923年开始，按照收入情况，列了一个费率表，分成三个层次。最低额相当于一小时的工资。如果失业现象扩大，对于战士们跟对于其党一样，政治压力之外会再加上经济困难。入党人数虽然增加了，但到1931年底党内失业者有78%，而在1932年4月竟有85%！

除此之外，一些临时拼凑的青年宣传队在德国各道路上来往行走，售卖政治手册。另一些人为了克服死气沉沉的局面，便主持业余剧团或参加他们的演出，鼓动性和宣传性的戏剧潮流，宣传鼓动戏，^①有一部分即是由此产生。几百名柏林人——其中许多人来自维了红色街区——离开首都，前往一个工人“社区”。他们落户于周围湖边，那里有自1913年以来工人们经常往来的旧帆布兵营，库勒·万普兵营，它因布莱希特、奥特瓦尔特和杜多夫的一部电影而并未被人忘却。他们住在小窝棚里，实行裸体主义，通过集体读书与讨论，把时间花在弥补教育素质上，决定团结一败度过穷困时期。[参见达尼埃尔·葛林：《棕色瘟疫》，第一卷46~47页。关于坐落于缪格尔湖边的这块

^①见海尔穆特·达梅琉斯：《越过世界中心十大洋》，亨舍尔出版社，柏林，1977。



露营地，达尼埃尔·葛林给出了这样的描述：“小茅屋分散在湖边松树下，大同小异——仅有几根木头立柱，覆盖着帆布帐篷，白色或黑色相同。所有茅屋都很明亮、干净，布置整齐。建造者们在其创造性、在其妩媚上真能与人一较高低。一座微型花园环绕着最美的房屋……”在弗雷德里克·埃文的《贝尔托特·布莱希特的生平、艺术及其时代》（瑟伊出版社法译本，1973，224页）一书中，库尔·万普成了位于柏林郊县的一处贫民窟似的地方！至于电影，正是布尔加尔·斯拉坦·杜多夫——他从1929年开始与布莱希特合作——想出的这个主意。恩斯特·奥特瓦尔特后来加入到他们中间，还有作曲家汉斯·爱斯勒。该电影于1931年拍成，1932年送交审查委员会，委员会以它有害公众秩序与风化而禁演。在删节掉几个镜头后，该片于1932年5月30日在柏林首次上映。题目《库勒·万普兵营》在法语里一般被译做《冰冻啤酒肚们》或《冰胃们》，这一点也对不上号，因为这是个地名，无论如何，用复数是不确切的。另一方面，即使“万普”（Wampe）在行话里指的是胃、大肚子，但“库勒”（Kühle）一词和“冰冻”（kuhl）这个形容词弄混淆了。某些人声称这一混淆有据可查，在柏林无产阶级语言里，“kuhl”只不过是“kuhl”的一种变体，另一些人则把“Kuhl”看做名词。其实这是个老词，意思是“洞”。但两个字放在一块意思就不再那么清楚了：考虑到地形问题，它的意思可能是“肚形凹地”之类的东西。然而“阴凉窝地”似乎能更确切地对应地名。在沃尔夫冈·格尔施与维尔纳·海希特专论电影的那一卷里（《库勒·万普或世界归谁所有》，雷克拉姆出版社，莱比锡，1917），引用了1932年4月14日报纸上的一篇文章，175~178页，题目是“库勒·万普之行，缪格尔湖畔的一座帆布城”，该文描写了这块无产阶级营地，与达尼埃尔·葛林的描写不太一样，而是在精神上加以证实。这里有六十余位失业青年，他们体格健壮，本来决定把钱凑到一起，在缪格尔湖附近建立这座兵营，并与他们的孩子生活在此，集体伙食，实行裸体主义等。]

在隶属于共产党的组织里，有两个是人道主义性质的，具有很高的威望：国际工人救助组织和红色救助组织。红色救助组织25%由妇女主持，仅有50%由共产党员主持，他们专门帮助政治犯。它依靠名人的支持，发起争取将他们释放的运动。它还收留他们的孩子或者战士们的孤儿，养在其所拥有的两

间屋子里，^①时常给他们的家庭发放补贴，以便他们得以生存。至于国际工人救助组织，它诞生于1921年夏季期间，帮助俄国反饥饿的斗争，主要是在自然灾害（洪水、地震）或社会灾害之时现身。纯粹民主人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人士、作家和政治上独立的艺术家们的参与给这一创举增加了极大份量。它看起来像是一种慈善事业，散发生活物资、衣服，主持假日寓所里的活动。而且在所有共产主义组织里，它是惟一于1923年从用于打击它们的禁令措施中逃脱的组织。

在维利·布雷德尔1930年的小说《N&K 机器工厂》中，提到了在一次持续一周的罢工之时，国际工人救助组织所采取的行动：“大约上午11点钟，他们开始分发面包和生活物资包裹。凡参加斗争的工人都有份，无论他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分发之时大家情绪氛围非常好，几名妇女在酒吧门外等着，然后很快从丈夫手中接到这些面包和生活物资。刚过中午不久，250多名工人得到了够几天吃的补给食物……”^②

国际工人救助组织领导者们——主要是维利·缪恩岑伯格，共产党议员——的灵活性在于他们往自己身上完全涂上文化运动的色彩。该组织放映，甚至制作电影。它为游行活动保留了一个剧团。它发行报纸、杂志和手册。《工人画报》便是在它的领导下出版的，每周发行50万份。它有幸得到著名画家或图案设计家（约翰·哈特菲尔德、奥托·纳格尔、海因里希·齐勒）的合作，通过大量使用照片来进行报道，使得某些问题被通俗化，许多文章都是闻名遐迩的作家签的名。好景不长，因为魏玛共和国已经走向末日，但它曾经很成功，从1931年开始，还出版了一个妇女杂志，发行15万份，标题雄心勃勃地指明了其解放运动纲领：Der Weg der Frau ——《妇女之路》。

政治或是宗教，大量宗派

^①一间房于1923年由画家海因里希·福格勒尔所赠，位于沃尔普斯维德，是艺术家们在不来梅附近的寓居。另一间房——1925年得到——位于图林根的艾尔格斯堡。1929年那段时间，有一千多个孩子在这些假日寓所里居住过。关于这个问题，有数篇图片文章曾发表于《工人画报》上。

^②维利·布雷德尔：《N&K 机器工厂》(Maschinen-fabrik N.&K.)，建设出版社，柏林，1975，133页。



其他党派虽然没怎么靠宣传或游行而出现在街道上，但也拥有某些人民阶层的精神支持。它们的势力通过发行报纸以及竞选变得显而易见，还有就是当其领导人中的张三李四被时论猛烈炮轰的时候。他们更多地是依仗模糊的潜在愿望，而非依仗坚决的斗争精神。在公众生活中，他们更依赖于名人，而非依赖群众。

例如民主党，它是继承1848年革命的自由主义者们的藏身之所。它自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一翼，仇视保守主义。这是瓦尔特·拉特瑙的党。通过宪法之父胡果·普罗伊斯，他把魏玛共和国放到了洗礼盆中。然后，其党的某些成员便归附到各政府部门中去，直到1932年。该党拥有一些很出色的报纸（《法兰克福报》、《福西舍报》、《柏林日报》），在知识分子阶层广受赞誉。但除了这些证据能表明其存在以外，它未发动过任何影响深远的运动。所以它逐渐衰落，也可以说是逐渐消失了。1919年它得到75个议员席位，到1928年还没得到1/3，改名国家党后，1932年只得到两个席位。[民主党和阿尔图尔·马劳恩的德国青年社1930年结成联盟，产生了这个国家党(Staatspartei)。该联盟完全是昙花一现，并引起犹太人的反对，因为德国青年社是反犹太性质的。关于这一问题，见阿尔诺德·泡克尔：《犹太人的自卫斗争》，莱布尼兹出版社，汉堡，1968，94~96页。]

1930年以前，根据犹太社团的估计，投票赞成民主党的犹太人比例可能很高：64%。对于国家党，犹太选票一下跌到19%。

此外，《犹太人百科全书》（耶路撒冷，1971）列出下表，说明从1924年到1933年国民议会里反犹太议员的数量：

年	议员总数	反犹太议员的数目	百分比
1924(5月)	472	32	6.5
1924(12月)	485	14	3
1928	491	12	2.4
1930	577	107	17.4
1932(7月)	607	230	37.9
1932(7月)	584	196	33.5

人民党在地理上也是广为分散，只有表层上的渗透，从1928年开始，其选民融入到了纳粹中去。1919年它是反共和的，尤其反对企业理事会，它代表工业家与商业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不可忽视。后来它适应共和体制，骨子里仍是君主制思想。在占领鲁尔区事件之时，机巧的战术家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这位原萨克森工业家团理事，于1923年成了第一线的头面人物。他在总理位置上只待了三个月多一点，后来任外交部长时，艺术般地让德国重返国际社会，并与法国和解。可当他1929年被害以后，人民党就无足轻重了。

中央党，它有自1870年以来就深得天主教教众民心的优势。天主教像精神社会的酵母一样，在30%以上的德国人心中深深扎根。这个比例可不是指在其整体内投票支持中央党的人，但该党得益于厚重的习俗则是无庸置疑的。它在竞选中的结果很稳定，总是摇摆于15%左右。此外，其竞选结果完全受地理因素限制，在所有新教教派地区，选民数量几乎微不足道。

在工会里，德国国家党、社民党和共产党也都不是惟一具有影响力的党派。那儿还有的是呢，德国人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从19世纪开始，天主教工人协会便逐渐加入到基督教工会中，直至1920年，后来该工会主张与新教徒和解，受到了主教团的怀疑。其共同的原则（为反对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尊重个人自由与财产权利）最终战胜了昔日的争吵。还有一个工会联盟，它的产生受了19世纪在德国推广英国工会（trade-union）的莱茵省律师马克斯·希尔施的启发。它反对阶级斗争，赞成企业理事会、社会公约，赞成一切能将老板和工人结合在一起的事物。

无政府主义者、无工会主义者竟也都拥有自己的劳动者自由联盟！对他们来说，为了避免革命热情被扼杀和官僚主义化，互助资金和同老板谈判都是不需要的，解决所有问题只有一把钥匙——总罢工。最后还有黄色工会！他们赞成与雇主协调，反对一切罢工。最容易加入他们的是面包师、糕点师、大农业领地上的工头。

能避免不卷入到一个协会、一个社团、一个组织中去，这最终是极少见的特例。有时，正像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或托洛斯基主义者一样，结果还是成为拥有几十名正规成员的小帮派。自由思想家、和平主义者〔德国和平社



(Deutsche Friedensgesellschaft) 有 3 万名成员。还有一个运动，“再不要战争！”(Nie wieder Krieg)，包括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尤其是以《世界舞台》杂志为核心的人。它在共和国头几年十分活跃，后来大为衰颓。天主教徒们也有一个和平主义团(Friendsbund Deutscher Katholiker)，而拒服兵役团(Bund der Kriegsdienstgegner)则由他们中许多人来主持活动。库尔特·希勒尔是和平主义革命社(Gruppe Revolutionärer Pazifisten)的负责人之一，他与黑雷讷·斯托克一起，于 1926 年创立了一个涵盖整个左翼和平主义协会的组织(Verband radikalpazifistischer Gruppen Deutschlands)，与德国和平联盟(Deutscher Friedenskartell)竞争，该联盟也囊括了许多协会，但斗争方面比较温和。见卡尔·霍勒和沃尔弗拉姆·威特编：《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和平主义》，薛宁格出版社，帕德波恩，1931。]，甚至是流浪汉，^①虽然看起来他们是最自由的，但所有人最后还是聚集到小集团里去了。不管人们属于哪个党派，如果有人不再同意其行动方向，他可以立即被招收到一个更能符合其当时想法的社团里去。

从本质上说，所有组织多多少少都身携未来分裂的萌芽。在当时的德国国内，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从 1924 年开始，一个心怀不满的社民党党员可以加入格奥尔格·雷德布尔的社会主义团，或者一年以后，对于非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可加入莱翁纳德·内尔松的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团，或者还有，从 1931 年开始，为了尝试与共产党达成和解，可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退党的共产党员可选择的有红色战士、列宁主义团、坚定左翼、共产主义政治团、列宁主义组织、共产主义反对团。如果离开了德国国家党或纳粹，但仍然是民族主义者，那机会更是无限多了。从阿尔图尔·马劳恩的德国青年社到克劳斯·海姆的农民革命运动，从六月俱乐部到《行动》杂志圈子和奥托·施特拉塞尔的黑色阵线^②——它 1931 年产生于国社党左翼——不可能发现不了它的路线。若真是这种情况，所采取的办法就只需像弗兰茨·容及其《敌手》

^①有一个组织叫流浪汉兄弟会(Bruderschaft der Vagabunden)，它于 1929 年在斯图加特组织了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并展出一些流浪艺术家的画作。格雷戈尔·鄂克是组织者之一。他考虑到，只有流浪汉——一无所有而又蔑视金钱的人——才能够成为真正的革命家。

^②关于黑色阵线，见奥托·施特拉塞尔与维克多·亚历山德洛夫：《反希特勒的黑色阵线》，隐士出版社，巴黎，1968。

一样，或者像恩斯特·尼奇施及其《抵抗》一样：收集一点钱，印发自己的收据，哪怕得把它缩成四页油印纸的月清单！^①

在这些小集团的过量发展中，宗教及其机构都充分参与了进来。魏玛宪法将它们从国民权力的监管下解放了出来。通过颁布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法令，它们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它们自己来决定任命神职人员。但这一自由并不意味着其内部是团结统一的。相反，德国教派结构的旧组织因为其所有的传统而举足轻重，特别是对新教教会压力很大。德国过渡到共和国家后，在宗教方面加剧了自由人士与正统人士之间的对立，而且也加剧了教士中君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民主人士之间的对立。

自从工业化以来，教徒人数便减少了。大部分虔信者从此只去观弥撒或听星期日的布道。不过，洗礼仍然很流行。甚至在社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地里，它依旧存在。1925年，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父母所生的孩子中至少有95%进行了洗礼。初领圣体和按手礼也都仍然得到遵行。可除了这些家庭礼仪之外，自打姑娘、小伙儿离开学校去工作以后，宗教仪式就变得时有时无了。宗教热情只在乡村还在延续，在那里，牧师和神父让社区生活变得很有朝气，他们一直都是极有威望的人物。

天主教教徒得力于他们专门成立的一个党及其社会政策，所保留的东西比新教教徒要多得多。中央党与主教团从各自方面维持着种种组织，有教派性的，也有职业性的。他们主持一些出版社、民众性图书馆、艺术与戏剧社团。在联盟或团体里，聚集着妇女、学生、大学教师、小学教师，甚至还有天主教商人！1928年，德国天主教青年党集中了所有可以依仗它的青年，其成员最后达到150万名。

新教教徒人数比天主教教徒多两倍，但他们的组织则弱小一些，因为他们都分散在互相敌对的组织里。共和国的建立在他们中间导致了强烈的反民主与反犹太的情绪。在大多数牧师看来，社会主义是福音书的敌人，应该对它发起一场战争。一些新教组织也像天主教教徒一样，向着妇女、年轻人大大讲特讲，但各种各样的团体受到民族主义的渗透，最后走向纳粹主义，倡议

^①关于所有这些组织，最严肃的书是路易·杜颇的《国家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战略与保守性动力》，霍诺雷·尚皮庸出版社，巴黎，1979。



建立一种德国基督教，回归到所谓的日耳曼美德中去。宗教社会主义者团与他们相对立，但在牧师中只占了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至于犹太人，1925年他们在总人口里占了还不到1%。他们中有80%集中在普鲁士、巴伐利亚、巴登和萨克森地区，一般都聚集在城市里。^①从许多人已不再信仰犹太教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情况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不同。例如1920到1930年间，17%的犹太男女与教外人通婚。德国公民犹太教派中央协会只有六七万成员。不过，他们也都分成各种组织，有些人属于犹太复国联盟，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希望完全被同化，便加入德国国家党犹太人联盟，毫不犹豫地混在反犹太者的圈子里。一个犹太老兵团组成自卫队，并参加国旗党的活动，它确保了犹太教堂和犹太人士的安全。

马克斯·菲尔斯特，一个犹太裔细木工匠，在犹太德国青年社中战斗，他在回忆录^②里讲述了所有这些分支机构。新近来自波兰和俄国的犹太移民在昔日贫民窟落户。那些在德国生活很长时间的家庭都已搬向漂亮街区，他们通常很蔑视前面这批人。犹太复国潮流因为该差异而有所不同。东部犹太人受到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与俄国和波兰的工人运动有联系。西部犹太人与资本主义自由思想更接近，赞成泰奥多尔·赫尔茨尔的观点，认为他们的纲领只能在一个犹太国里才能实现。那宗教本身呢？马克斯·菲尔斯特说，长久以来，它不再构成犹太人之间的纽带了。对于年轻人来说，某些人还在遵守犹太安息日习俗，在过节那天还常去教堂，但这种事更多地是与其父母和祖父母有关。

虽说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集中了绝大部分德国人，德国仍然提供了很多其他可能给那些想寻求一种宗教的人。它有摩拉维亚兄弟教教徒、孟诺教教徒、浸礼会教徒、见证到耶和华者的教徒，还有在欧洲可能形成了最重要的社区的佛教徒。此外，有从事修行、神秘主义、天智论、秘术论，灵智论的狂热分子，他们彼此对立，发展了大量的思想院校、庙宇、接待中心。从

^①确切说，1925年犹太人占德国人口的0.9%，见里塔·塔尔曼：“民族同一性与文化特殊性，自由主义时代德国犹太教的经历”，《民族心理学》，1973年12月，379-393页。

^②马克斯·菲尔斯特(1905-1978)《舍黑拉扎德吉祥物》，D.T.V. 出版社，慕尼黑，1978。见40-41页和100-102页。

对马兹达兹南的崇拜到由海尔曼·凯瑟尔灵创建的达姆斯塔特智慧学校，有多少人呼吁体验内心生活啊！〔见加布里埃尔·郭布隆的两篇文章，《德国神灵再现》和《德国经验唯灵主义客观景象》，载《通灵杂志》，1929年12月。关于达姆斯塔特智慧学校，见海尔曼·凯瑟尔灵自己在雅克·莫尔塔讷《菩提树下新德国》中的陈述。

对马兹达兹南的崇拜使得几千名信徒于1921年会聚到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它还引诱来“包豪斯学校”的几位颇有声望的撰稿人，其中有约翰内斯·伊腾，当时的目的似乎是要将“包豪斯学校”改变成一种“马兹达兹南人”庙一类的建筑：睡草垫，吃素食，多放葱蒜，经常沐浴，吐纳练功，严格统一着装（上宽下窄的裤子，阔领束腰的上衣）。

这一崇拜在德国开始于1900年。起初，有个自称“法师”的人，奥托·哈尼施，他提倡回归查拉图斯特拉的智慧。他被人叫做奥托曼·查拉—杜斯特·哈尼施，或者还有人叫他查拉图斯特拉（又译琐罗亚斯德，可能在公元前700年到600年左右接受了善灵阿胡拉—马兹达的默启）。]

魏玛宪法在民法和刑法所允许的范围内，规定了教派的自由。无神论、自然神论、泛神论，不管什么组织，都能被行政部门所承认，条件是不违反公法。当时国家还保障其独立性，保护其原则、机构或建筑不受任何伤害。凡冒犯上帝、宗教、信仰者，都将被送交轻罪法庭判刑。

这样，每个对教会狂怒不已的人都被要求谨慎行事、温和行事。奇怪的是，教会所得到保障的自由导致对一切针对它的批评进行审查。乔治·格罗茨对此深有体会，他在艾尔文·皮斯卡托改编戏剧之时，用了捷克人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好兵帅克历险记》里的一组画。其中一幅画的是基督怪里怪气地戴着毒气面罩，另一幅则暗示天主教会愿为好战分子降福，该书被警察插手干预。他的出版商维兰德·海尔茨费尔德被判从市面上收回所有书。

传统教会势力不怎么坚持招募神父——尽管报酬适当，但该职位不怎么吸引人——也不热心于让神父们传教布道，他们只是一心在所有虔信教徒所必须付的捐税上。这种什一税专留给每个相关教会，以便根据不同地区有所变化，帮助它们得以维持。要想不付税，必须向行政部门正式申请离开他所报名参加的教派。该手续要求有成堆的文件，以至于只有极少数铁了心而有



头脑的人才愿意去这么做！多半来讲，还是习俗占了上风。

青年运动

对于年轻人来说，除了有直接政治性或教派性的社团外，各类组织更是数不胜数！自然主义的、神秘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所有组织都有其期刊、简报。同志关系远非上层社会或家庭中的公约，而是起源于这些延续了19世纪末青年运动遗产的联合组织。回归自然、回归原始力量是基本向往。仅就服饰看，必须取消扣子、帽子、领带。他们背负口袋，敞开衬衣，脚穿高靴，一头扎向乡村，扎进森林。他们露天而卧，或者借宿谷仓。晚上，他们围在篝火四周，在诗琴或吉他的伴奏下欢唱。

这是候鸟社的传统，该运动是卡尔·费舍尔依靠柏林附近施泰格里茨学院的学生的支持，于1897年创建的。起初，该运动反对成人的加入以及工业化对新生活方式的支配。他们拒绝烟草和酒精，惟一的规则就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出来：从学校、父母、习俗中解脱！从争取达到自由的行为中解脱！……对男子汉情谊的歌颂，在大自然里徒步旅行，这些最后发展成男性同性恋潮流。他们提倡的从成人中解脱，后来也为领袖崇拜、导师崇拜所取代。

过了20年代，更常见的是混合性社团。女孩和男孩一样，出发走到马路上。在社民党和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内部，混合现象得到发展。从那时起，该现象慢慢渗透到青年运动中，尤其是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青少年所组成的运动。但是这种消遣不再是反抗性、解放性的了，它仅仅是逃避现实的方式。

正因为如此，青年运动的残余成了民族主义社团的口中食。1929年，德国青年社甚至请所有年轻人来组成一个共同阵线，以便对国家采取行动。教派、政治理想、社会地位之间的差异应该被克服，以便使战后青年的所有力量超越党派，建设一个新时代！最后，正是纳粹党人遂了他们的心愿，集中起所有这些小集团，走向大自然，走向社区，走向一个领袖。^①

^①这一观点曾由多位评论家就当时德国现实而做出。从1926年起，拉马尔·帕特利便一直强调这一点（《今日德国国内的宗教》，帕约出版社，巴黎，232~235页）。关于整个青年运动，见马里于斯·括文的书：《1890年到1933年德国的教育复兴》，阿尔芒·柯林出版社，巴黎，1970。

走向军事化社会

为了魏玛共和国的利益，宪法法学家们曾设法尽量多的在里面写上民主条文。在那张白纸上，公民的自由可真多啊！所构想的选举系统也是为了让国会能真正代表整个国家。所有德国人到20岁就能成为选民。德国被分为35个选区，每个选区所提交的每份名单一旦达到6万支持选票，就可选举出一个众议员。余下的所有选票都设立于第二次名单上，于是选区被分成16个。选票都是累加起来的，每个党若得到6万选票的倍数，便能再次拥有与此数字相当的席位。在这次分区后还余下的选票也要被累加起来，以便根据一份全国名单来分配最后几个议席。

真是复杂、漫长的程序，但它考虑的绝对是所有表达意见的选民意志。这纯粹是很逻辑地使用了按比例代表人民的做法。在该系统的施行和结果中，所得到的代价是大量动用了国家财政。其实，1914年以前，议员每年只拿几千马克的津贴。从这以后，他们不仅可因参加国会会议而每天拿到津贴，而且还有一项月收入。就这样，1925年，每位议员在其社区里，每月得值约8000马克。由于每个地区那边都有自己的议会，花费就更沉重了！

选举团十分兴奋、活跃。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海报，作者一般都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然后卡车、军乐队、彩车在街道上游行，车上升着木雕或纸板雕，就像是在过狂欢节一样，街头扔满了传单。他们介绍着纲领，宣布会议消息。这类会议都是在晚上或后面几天在啤酒店里举行。大家吃着，喝着，抽着烟，一边听着演说，很少有人打断他们。而当捣乱的人进到大厅里时，或者哪怕只有几个抗议者，组织者的纠察队就会抓紧时间加以干预。

在这几年当中，选举团因技术进步而得到改善。1930年，高音喇叭代替了喊话筒。唱片、电影都被用于宣传。面对这些新事物，一位法国记者^①于1930年写道：“我们的候选人不要多说什么，应该到莱茵河岸边在如此场合下进行实习才好。他们会在那里学到，干一行能用一千种窍门，在这方面，他们给

^①莫里斯·拉颇尔特：《在钢盔之下》，阿莱克西·雷迪耶出版社，巴黎，1931，140~141页。



我的感觉像是笨手笨脚的学徒。他们会懂得，在大范围内钻研公众舆论到底是什么意思……”

该言论主要是针对纳粹方法而发的！但所有党派的确都受到了美国式选举团的诱惑。让·德·格兰维利耶，1925年在一次人民党会议中任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的助理，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在一间有着四五千座位的大厅里，主席台上，有一个步兵警卫团管弦乐队奏着军队行军曲，让人家耐心等待。“还有一些宣传电影在放。在一张地图上，德国各地区正在解体分离，这时一只强大的巨手出现在屏幕上，将它们组合起来——那是施特莱斯曼的手！”

到投票那天，要选择的不是人，而是整个那些名单。每个选民都拿到一张纸，上面写了所有党派的名字。每个党派和区别号的右边，画着一个小圆圈。若要投票，只需在所赞同的党派对面的圆圈里打一个勾就可以了，不得多选。

那民主呢，它接着变成了什么呢？在实践中，任何东西能远不如纸上写得那么美好。国会里，议员们的权力从20年代末开始就越来越小。首相布吕宁依法行权，却完全蔑视他们的权力。纳粹党人对国会这一幕暴跳如雷，最后的结果是民主制从此只成了外观形式，如漫画一样，滑稽可笑。

比如说，让我们来看看1930年国会里隆重的人场式吧。纳粹党议员全都穿着大衣到场。^①他们跟在威廉·弗里克后面，按军队秩序排列。他们各占专席。突然，他们脱去大衣，全都一身戎装打扮，上穿棕色衬衣，



1930年在德国国会进行时闹事的青年纳粹分子。

^①让·德·格兰维利耶：《我刚刚看到的德国》，法兰西出版社，巴黎，1925，172页。

^②参见莫里斯·派尔诺：《希特勒的德国》，阿歇特出版社，巴黎，1933，26~27页。

臂佩卐字袖章。轮执主席是中央党的一位议员，这时宣布大会开始，并点名称呼每一位新当选者的名字。这场大会随后转变成杂耍戏。第一个被点到名的纳粹党人喊道：“嗨，希特勒！”所有在场的纳粹党人便齐声应和。社民党和共产党对他们破口大骂，纳粹党人则还以口哨声和动物怪叫声。很快，人们在半圆形会场中央动起手来，动口是根本无法进行的了。主席被迫结束会议，在第三天向上汇报。然而这场会议要不按这种方式发展那才怪呢！

外面，柏林的街道都被示威者所占领。波茨坦广场附近，他们用石头打碎威尔台姆大商场的窗户。看热闹的行人一过来，只要他长着棕色头发、鹰钩鼻子，在他们看像是犹太人，就会被痛打一顿。警察们从动物园那边就一直有气无力地跟着他们。合唱的歌声响起。路人看着他们，没多少好奇心，只是害怕，模糊的歌词传到他们的耳中：“在街头磨亮你们的长刀吧！/在犹太人身上试试刀锋吧！/让他们的血如波涛般滚滚流尽吧……”

库尔特·图柯尔斯基于1930年用看破红尘式的语气评论说，这真是时代的通病，大家只成群生存、成群声嘶力竭以获得精神的满足。^①公众生活越来越简化成一场游行和示威。每个人都举着各自的旗子。共产党是红旗，黑、红和金色是共和派的，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继续竖起君主政权下的军旗，黑、白和红，在极右那边，纳粹在一面红旗的高角处，在一个白圈里，印上早已被独立部队使用过的符号，卐字符。[在威廉·莱希看来（《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1933，由帕约出版社译成法语），卐字符是一个性的象征。在勒内·阿洛看来——见《希特勒与秘密社团》（格拉塞出版社，巴黎，1969）一书——它属于德国纹学章，与种族主义有关，而非与东方起源有关。罗杰·布尔德龙——见《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与实践》（社会出版社，巴黎，1979，140页）——引用了这一阐释，勒内·阿洛的证明在他看来“很有说服力”。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所看到的是雅利安人胜利的象征，是反犹太主义的象征。让-克劳德·弗莱尔给出了该符号的使用编年，见《纳粹主义与秘密社团》格拉塞出版社，巴黎，1947。

可以肯定的是，从19世纪起，所有自称为雅利安主义、德国纯血统和反

^①库尔特·图柯尔斯基：1930年10月28日的文章，再版于《德国编年》，克劳德·波尔塞尔译注，巴朗出版社，巴黎，1982，281页。



犹太主义的团体，都将这个卐字作为他们的图案。例如1905年，里本费尔斯在《奥斯塔拉》杂志中发表了该图案，后来希特勒读到过。正如笔者在拙作《世界末日一个接一个》（10-18丛书，巴黎，1976）中所指出的那样，里本费尔斯已经在以某种方式来提倡“终极解决办法”了。至于独立部队所赋予卐字符的意义（艾尔哈特旅的军歌开头就是：钢盔上的卐字啊……），恩斯特·冯·所罗门在《流放》杂志1975年（第4-5期，11页）所发表的一次访谈中解释说，在两个交叉杆里应该看到一种对十字架的统一化图案的不确信，一种异教的东西，同时又是对“统一”的憧憬。]

他们每个人还都有各自的帽子。软布或硬布的，帽檐是呢绒或皮革的，类似于水兵们戴的帽子，或者更像法国军帽。帽子，这是制服的第一个部件。第二个是肩章，每个人都有一个！……青年工人党的一名成员讲述说，当他在有轨电车里遇到一位有梯形红肩章的乘客时，别提有多激动了：“肩章闪烁着，五色斑斓。我仔细地看，尽管我也佩带了一个。我的心仿佛跳得更快了。这时他从书中抬起双眼，我冲他用头暗示了一下，于是他也看看我的肩章，便这样向我还了一礼，但一言未发。就在当时那些人群中，大家素不相识，我们却认出了对方，我们，就像同志一般。”^①

从1923年起，亨利·李希腾伯格注意到，在德国，各团体几乎是按军事形式组织起来的，有固定、纪律严明的代表大会，有上令下行的领导，有尽善尽美的宣传手段。^②尽管有一



德国纳粹集会的纳粹党旗。

^①转引自《1904年—1945年法兰克福的青年工人运动》，52页。

^②亨利·李希腾伯格：O·海斯纳德《德国政党》一书的序言，克莱斯出版社，巴黎，1923。

系列的这个或那个组织被查禁,但这一评论对于30年代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矛盾的是,一个几乎没有军队的国家走上了社会军事化的道路。纳粹组织更为活跃,它们将各种极右运动一点一点地吸引到身边来。魏玛共和国对这些运动任其发展繁衍。希特勒登台伊始,终于将它们全都合并了进来,从狼人团到钢盔团。



第六章 从小学到大学

1921年，施瓦本地区的一位小学教师决定向公众发布其职业生涯一览表。他觉得这些数字比那美好的教育激情更有说服力，认为用这些统计数字来概述其方法会更简单。在30年职业生活里，他为管理学生，用了911500次棍打，124000次鞭罚，209000次关学，130000次尺打掌心，10200次拳击双耳，223700次巴掌相加。他很满意地总结说：“青春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①

德国几代人对于帝制时期小学所保留的，只有这种压迫体制的回忆了。小学教师多半都是苦刑犯看守人。与交通警察下不佩把刀便不可思议完全一样，小学教师不拿根教鞭或棍棒就不可想象！这一有着完美区分性的符号给了漫画家很多启发：在讽刺性报纸上，在数不清的画作里，他成了靶子，硬生生被加上荒唐人物的形象，不是热心于教育事业，而是在公开动刑的角色里津津乐道。^②

事实上，孩子在学校里只不过是又遇到他家里的方法罢了，家里人出于实用才使用，够不上技术层面。打屁股、扇巴掌、动棍子，这在所有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眼里，都被当做是达到良好教育必不可少的准备阶段！这些肉体惩罚，父亲们是最爱施与的。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会放弃父权传统所授予的这种合法权力。要大着胆子干，别怕失去作为家长的威信。当母亲们默默无闻地献身于所有家务活中时，他们就应该体现出权威来。

青年运动的成功；以及1910年左右在新一代诗人和文人中间所爆发的表

^①见《法兰西水星》一篇匿名笔记的转述，1921年10月1日，287页。似乎这是霍伊贝尔勒，转引自奥托·吕勒：《无产阶级的文化与风俗史图示》，佛库斯出版社，拉恩-吉森，1977，第2卷，225页。

^②例如在讽刺性报纸《简单主义》上就有很多小学教师的漫画！

现主义反叛，多少得归因于该方法所引起的后果。父与子之间的对立成了老生常谈。父亲形象在许多高中生看来，从此便只成为放弃个性、服从于集体调整的否定性符号。1913年的《儿子》一般被看做是第一部表现主义戏剧，在该剧中，瓦尔特·哈森克雷弗尔让其主人公在离家出走之前，冲父亲说出一番斥责之语：“你用鞭子来教我学希腊语语法的那段时光，我记得清楚极了！这一直要到我睡觉才算完，那时候我穿着睡衣，这样的话，鞭子离我的皮肉就会更近一些！”^①

快速工业化、战争、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所引起的价值危机在十余年间，使一个如此严格的天地失去平衡。对于孩子，由于不得不然，而非出于反思愿望，家庭中的纪律变得温和一些了，这首先而且主要出现在工人家庭里。而对着他们必须克服的新困难，家长们对自己以前所理解的教育任务的参与减少了。^②

相反，在公立小学，仍有人继续狂热迷恋过去的优秀教育方法！在汉堡，从1919年到1922年，一位德国年轻人讲述说，几年之后，我有一个女教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她打我们的屁股……^③从法律上说，肉体惩罚是被禁止的。凡实行体罚的教师，只要有一点证据，就会背上被绞死的危险。但许多家长害怕因为告状而可能在孩子们身上造成不良后果。而且，不少人还听到这样的话：“扇巴掌和打屁股从来就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伤害，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这样一来，保守的教师便因该“民意”而强硬起来，在教育学会议和代表大会上多次毫不犹豫地声称，应当承认神圣不可侵犯的教鞭，该让它正式重新回来。

新教育法的努力

然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学习生涯还不仅限于这些昔日帝制的残余。它被深深改变了，虽说比战后头几年所想让人改变的要少得多。其实从1918年11

^①瓦尔特·哈森克雷弗尔：《诗歌、戏剧、散文集》，洛沃尔特出版社，莱茵贝克，1963，117页。

^②关于这一问题，贝克拉拉·采特金在《为妇女而战》中的评论，该作由吉尔伯特·巴迪亚负责出版，社会出版社，巴黎，1980。

^③海因里希·克尔伯：《我的童年(1912年~1927年)》，见《无产阶级生活经历》，冯·沃尔夫冈·艾默里希编，第2卷，洛沃尔特出版社，莱茵贝克，1975，253页。



月底开始，所有左翼流派心中虽大不乐意，但还是同意了这种必要性：必须改革教育。社民党自世纪初以来就坚持声称要改革。原小学女教师克拉拉·采特金在加入独立党，又于1919年3月加入共产党之后，就这一问题多次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而且听众还不少。

在威廉二世被赶下台后第二天，就产生了自称为社会主义的不同运动潮流，其中出现了一种针对旧小学的共同批评。小学初级班从来便不是穷人的学校，仅仅只对军事领导层有好处，这正是1914年以前，社民党学校问题专家海因里希·舒尔茨的观点。根据他的想法，从物质上改善教学条件，提高学校信誉及教师数量，这是必不可少的。在共产党里，专家埃德文·霍尔恩勒于1919年给出了关于该缺点的相同结论，但他坚持要在教学的形式和内容上进行改革。

共和国宣布成立后紧接着的几个里，所有涉及学校的问题都成为百姓关注的焦点。一些改革派教育学家聚集在一起，发布其革新纲领，创办杂志。在柏林一所高中的教师保罗·奥斯特莱希周围，建立起了一个旨在对学校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协会。其目的是使每个孩子绽放个性，尽量施展他们的才能。

一些尝试性工作借助于革命激情和社会变化，从其原则中得到启发，蓬勃发展起来。在很多城市里，实验性学校机构诞生了。在汉堡，有四所公立学校建立起来，每一所都有六百多名学生，它们都建立在师生间的同志友谊基础之上。老师同志侧身躲开，学生们则学着对自己更加充满信心。有了这些新的兄弟般的关系，教育不再是从高高的讲台上发送下来，而是通过群体生活而在自由中获得。^①

这类自由学校社区在柏林、不来梅、耶拿也存在过。鲁道夫·施泰纳更强调艺术教育，他在制烟厂厂长瓦尔道夫-阿斯托利亚的帮助下，有机会在斯图加特将其教育学观点具体化。从1919年到1924年，他试图将人类解放的原则应用到瓦尔道夫学校去，这些原则是建立在其哲学观点基础之上的。这位灵智学创始人希望在孩子身上唤醒团体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这

^①关于所有这些德国教育改革的问题，见马里于斯·括文的著作。更具体的，关于绝对自由主义教育与自由学校社区的问题——尤其是在汉堡——有一本雅克布·罗伯特·施密特出版于1940年以前，即《老师同志与绝对自由主义教育》，由马斯佩罗出版社再版（校对版，并由波里斯·弗莱恩克尔作导言，由作者自序，巴黎，1979）。

力量就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会引导他们和谐地完成生命历程。学生既不必选拔也不必留级，在12年期间，他们学习历史、数学和文学课程，教学大纲按时期和专题来分布，要求有固定练习的题材，如外语、艺术学科、健身操，都通过课程来教授，每日进行实际训练。男生女生一起学习，互相鼓励，成绩最好的帮助资质最差的。每个人都被号召表现出责任感和团结精神来。

在那个时期，新教育方法的尝试或多或少总带有青年运动遗产的特性。其实早在世纪末，其领导人就已宣布学生应该有更大的独立性，应求助于艺术训练和积极的方法。他们要——至少是通过这几个方面——抢在塞莱斯蒂丁·弗莱奈构想的前面，此人后来于30年代在法国努力将该构想应用到反主流运动中去。孩子们被认为应当在学校里找到自己的真实，不照搬成人的东西，与教育者相处于同志般的氛围中，并且男女生同校。

在这方面，古斯塔夫·福讷肯——他想成为青年运动的理论家——的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位牧师的儿子1875年生于汉堡附近，接受过叔本华和黑格尔哲学的教育，他认为，教育的作用是让人性踏上通向精神进步之途，培养“精神骑士”，与任何政治或宗教约束都无关。他提倡自由学校社区，在那里，孩子们会通过自己来发现责任感和对责任的兴趣。从该角度出发，他于1906年在图林根创办了威克斯多夫学校。那里的学生按各自的亲密程度来组合，自己来选择老师的方向。老师不能给他们强加上完全现成的知识，而是要引导他们，按照他们的个性来指导他们。

古斯塔夫·福讷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1900年，他遇到海尔曼·里茨，此人在乡村开办了一些寄宿学校。他被这位既是绝对自由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既严厉又慷慨的教育家所说服——这位教育家对教育的定义是，每个人都通过自己对自己的关心，达到对性格的道德培养。海尔曼·里茨便委派给他一些教学任务。接着他决定自己也开办一个学校机构，由此产生了威克斯多夫学校。保守人士用传统的培养方式，尤其是用宗教教育来谴责他的自由。进步主义者则谴责他倾向于非理性主义，倾向于个人悲观主义，谴责他与社会主义理想相对立。一些人不能饶恕他唆使年轻人于1914年投身到炮火之中，将他们的理想主义引入歧途。其他人则指责他支持同性恋。这一指责于1920年使他吃了官司，他被迫正式放弃威克斯多夫自由学校社区的领导职务，但



直到1932年，他一直都还是该校的心腹谋士。

这类学校检验了教育家们对学生的新行为，对它们的嗜好很快超出了古斯塔夫·福讷肯的个性，一场反对专制主义的模糊运动弥漫在时代的空气之中。恩斯特·艾里希·诺特经常出入保罗·格诶普所领导的学校，格诶普是里茨的另一个徒弟，1906年到1910年曾在威克斯多夫任福讷肯的助手，四十年后，诺特在其回忆中记录了当他发现这场教育革命时，心中所感觉到的欢喜之情：教室更多了，班级更多了，必修课时更多了，老师更多了！他讲述道，课程里什么题材都有，对课程的参与也是自由的。^①每个人根据其兴趣和能力自做决定。大家聚集在一间十分普通的屋子里，围在教师身边，无拘无束。天只要一放晴，便在露天空地上举行友好的会议，地点在森林边缘或草地上。

公立教育并未远离私立学校里所尝试的这些革新措施。1926年，普鲁士州运转着三十来所新式学校。那里男女生合校，没有校长，不服从于任何督学。教师有完全的自由，无论是在教学安排方面还是在教学大纲方面。家长与参观者可随时进入教室听课。不同的教学讨论可使学生们沉湎于精装书本中，沉湎于木雕、音乐中。电影与广播时常被使用。

一位法国人，加布里埃尔·郭布隆，当他途经柏林并发现了其中一所先锋式学校时，很热情地将它比做教育学实验室：“参观博物馆，昔日遗迹的照片，这些都使教学具有一种客观面精确的特征，是法国学校所没有经历过的，它们用语言教学，按等级来组织纪律。法国有哪个小学教师敢自己带头旷八天课，和学生一起去参观布涅塔尼省，或者凡尔赛，或者是古阿雷西亚周围的考古遗址？”^②

另一个抱负，是在进中学之前学习外语。这一学习方式在某些小学付诸实行了。建议所学的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但最终，该尝试并未影响多少学生。1931年从中受益的人还没达到小学毕业年级全体学生数的2%。

与原帝国体制相比，最明显的新颖之处是家长参与到学校生活中来。各

^①恩斯特·埃里希·诺特：《一个德国人的回忆》，保罗·玛丽·弗雷舍译，于利亚尔出版社，巴黎，1970，145～147页。

^②加布里埃尔·郭布隆：《接触新一代德国人》，45～46页。

家庭选出成员，每50个学生有一个代表，组成一个家长理事会，每15天开一次会。教员只能以咨议的名义出席这些会议。家长们对卫生、手工劳动、图书馆、野游说出他们的想法。课程教材，得在老师们和家长理事会之间达成共识后才能采用。

有限的改革

这些家长理事会在民主精神中建立起来，事实上是属于强烈激情的范围。教会为了不失去其任何势力，到处都对他们试图加以控制。天主教教徒与新教教徒重新聚拢在一起，借口“保护意识自由”，想在小学里维持由神父和牧师所作的宗教教导。

其实，要建立共和国体制，从逻辑上说不能不统一公众教育，也不能不尝试着去推广世俗学校。根据各宗教的不同，帝制德国的学校生活是由不同立法体系来决定的。制宪议会还就教育问题长期磋商，以便在魏玛宪法里制订出易于团结所有人的条款。讨论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受挫了。社民党提出政教分离，而中央党和右翼各党表态要建立教会学校。

通过最后所采用的妥协办法，同意将整个教育的控制权交给国家。但学校系统并非仅仅是世俗性的，而是可以根据三条途径来组织。有一条原则，就是在最符合宪法导向的学校中，可在正常教学大纲范围内和在国家创制问题上给出宗教教导，它得到了自发学校这个名称。然而，某些学校也可以不要任何宗教教导，或者完全保留给这样那样的教派，其选择由学生父亲的意志决定。

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所有小学都是教会性的，神职人员对它们拥有督导权。一旦革命热情平静下来，从1920年开始，教会便出发到乡村去，重新征服它们曾失去的地盘。它们向世俗学校宣战（这话说得还不算重）。这一战，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促使众议院里发生了大量的辩论。学校改革因此而停滞下来。不仅仿效中学那样让小学也男女生合校的计划必须得放弃，而且教会学校重新占了上风。1931年，在645所学校里，柏林只有53所世俗学校。

教会代表或忠实于其导向的报纸随时都可以在学校生活，教学大纲、教



员培训、教学方法中插上一手。当他们认为一项宗教教导被忽视或不足，可又没有对其管理大加指责的时候，那就一定会在课程教材问题上发挥其批判精神。到那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挑起罢课，以便获得满足。魏玛宪法第148条宣布：“在公众性学校进行教学，必须考虑到不伤害持不同观点者的情感”。在这可怜语句的名义之下，各方面都有多少干预和冲突发生啊！只要一堂历史课眼看要谈到昔日帝制时期，或者一堂自然科学课要谈到圣经里的数据，保守势力就拿着这句话挥来舞去。而他们的对手又想不出更妙的策略来抵制，只好也都引用这句话。1927年，在汉堡，一位家长曾因此到教务处告状说，他看到女儿被迫在班上唱国歌“德国至上”。一些家长提倡或容忍这一做法，他完全能接受，但他要求，就他那方面来说，他女儿应免唱他觉得有民族主义倾向和具有毒害性的歌曲。^①

作家阿尔弗莱德·德布林是其子女所在学校的家长理事会成员，1936年，他回忆了自己为改善状况而不得不进行的努力！^②可为了得到什么呢？这跟在为祖国捐躯的教员纪念名单上方，用共和国旗帜来替代帝国旗帜还不一样呢！这种无能为力的表白道尽苦衷，最坚决赞成要在学校生活中加以改变的人们终于顺从于这苦衷了。说到底，保守主义几乎在所有领域里都占了上风。

根据1920年4月28日法令，男孩在6岁，女孩在7岁，都必须按固定时间上学。^③这首先是小学初级班，非男女生合校，且多半为教会学校。学生在那里待四年，然后有极少数几个人进入中等教育，其他人根据相同原则，继续在小学里一直学到14岁。对于继续学的人，最常见的前途就是学习一门行业，或在农场、商家、工厂里干活。

在初级班第一年，孩子没有严格的课程表，在一周18个小时内学习认字、写字、数数。相反，从第二年起，其课程表就有严格分布了。在每周22小时内，他得上八堂德语课，四堂算术，四堂宗教训导，每堂课半个小时。第三

^① 见彼得·伦德格林：《德国学校社会史概况》，克莱纳·万登霍克—莱厄出版社，格丁根，1981，第2卷，15页。例子摘自希尔德加德·米尔堡：《多元化社会中的学校政策。汉堡1890年~1935年学校改革的政治与社会方面》，汉堡，1970。

^② 阿尔弗莱德·德布林：《政治与社会论文集》，瓦尔特出版社，奥尔腾—弗里堡—恩—布里斯高，1972，341页。该文先是在1936年10月4日的《巴黎日报》上发表。

^③ 除了施雷维希—霍尔斯坦是例外，在那里，由于它在属于丹麦时期有一条规定，正常学龄为5岁到14岁。

年再加四小时，上的是宗教训导、绘画和唱歌。最后，第四年，还要加两小时。即一周27小时，具体情况是这样：三堂宗教训导课，三堂公民义务教育，八堂德语，两堂写作，四堂算术，两堂绘画，两堂唱歌，三堂健身。

和帝国时代比起来，所有这些课程设置在德国现在差不多都是统一了的。说到学年，则总是在复活节假日之后开始。对孩子们而言，开学时的氛围与战前没多少区别。和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忙于准备必不可少的学习工具：橡皮、写字板、海绵、铅笔和练习本。共和国时的学校教学是免费的，其余的可就不完全是了。日常用品物资仍由家长负担，至于阅读书籍、纸张、墨水、钢笔，要求每月交纳一点租金，1924年是两马克，只有贫困家庭可以免交。

街道上，小学生们的路队变了。工人与农民的孩子与较富裕阶层的同学相来往。同一所学校对所有人都是义务教育，对所有女孩也是。拖着时髦长辫的小女孩儿大大方方地与男同学聊天，与平等的人聊天。不过，在这些新的、不协调的群体中间，社会差异还是保留下来了，从外观、衣着上能感觉得出来。看到头上几乎什么都不戴，头顶上留有一绺宽发，中间仔细、对称地分出一条道，对半分头，便能认出那是资产阶级家的小男孩。其他人头发很短，偶尔甚至是光头，没那么花哨。母亲们操心的只是想看到他们干干净净的，不长虱子就行。

那老师们呢？对他们的培训也是统一进行的，但各有不同。巴伐利亚省和符腾堡省保留了原来的体制，有一所专门用于培训未来教师的学院。汉堡、布伦施威克省和图林根省选择完全在大学里进行培训。从1926年开始，普鲁士省拥有了一些教育学中心，每一期有四学期必修课。

这些老师有50%的人来自于中等阶层里最困难的阶层。他们的父辈都是职员、手艺人、教员，没在大学进行过任何学习。他们希望能比原来所在阶层生活得更好。但他们发现自己生活得很糟糕，因此经常就有幻灭与痛苦。除了备课与改作业外，他们每周只能保证30到34个课时。根据地区不同，班上学生的人数在45到60人之间摆动，有时还更多。在巴伐利亚，1927年平均人数为50人，这也就意味着某些班级人数较少，而另一些班级可能会有100名学生。

他们的生活条件比19世纪的同事们更好些吗？好不到哪儿去。从行政上说，他们隶属于地区州省。但在实际上，他们得听命于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



城市、从一座村庄到另一座村庄所存在的自由竞争，这样一来，他们的财产分配和课酬就有变化。职业需求由各村镇发布，然后得由市议会和教会的正式代表同意其招聘名额。

他们的社会状况和其他部门一样，从1929年开始便每况愈下。逐渐地，招聘工作停止了。还在岗位上的人有60%已超过四十岁。在像卡塞尔这样的城市里，1931年有30%以上的人在60到70岁之间。有时，负责给他们发工资的公众职能部门会经历国库财政困难，以至于他们领工资时得斤斤计较。就在他们领工资的时候，在吕贝克地区，1931年12月，约150名小学教员再也拿不到全部工资，他们因此吃惊不小。1932年元月，他们所领的又少了一点。到2月，大多数人便连一分钱也拿不到了，那便是失业或者劳而无获。在这些境况下，一份地方报纸写道，可以理解为什么教师们最终会对政府和共和国失去信心。

最特别的是小学女教师，她们也不乏抱怨的动机。比起男同事们，她们来自于更高的社会阶层，由此对她们所遭受的物质与精神惨境感到更为痛苦。1920年，政府颁布法令确认小学男教员与女教员有基本的平等地位。但事实上，要走到这一步远非易事。从招聘时就能感觉到歧视现象。1931-1932年，小学中的教学人员中差不多有25%的女性和75%的男性。在普鲁士省的32906所小学里，1928年满打满算也才有45位女校长。不光职业，工资也如此，根据是男是女而有所差别。此外，选择了小学教员这一行业的年轻女子还公开提倡单身。已婚妇女被弄得要过艰苦生活。在大部分地方，她们被迫接受每周减为数小时的课程安排。这样一来，比起单身女同事们，她们所拿到的工资自然就低10%到20%！

于是，在男教员和女教员阶层，对教学改革的迷恋最终让位于教员们的极大不满。在20年代，许多和平主义者和社会化论者到魏玛共和国末期便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其他办法，只有等待纳粹来掌权了。

为有工作之人而设的授课机构

14岁离校的年轻人在社会和文化领域有可能前程似锦，但这些可能性与

其老师们的憧憬一样，总令人大失所望。他们能有什么选择呢？他们要不就希望获得一个职业资格，在四年时间里，按每周八堂课的进度，坚持上与专业对口的免费夜校课程。他们要不就仅仅情愿进行补充性培训，指望哪天能获得一个大学文凭，于是在市政府报名修习同样免费的课程，每晚和每周六上课，尽管没有外语教师，还是能得到一个相当于中专的证书。

当一个人十四岁便使生活朝向职业活动发展时，要想自己在文化和社会方面有所提高，最需要的不是智商，而是顽强精神。从理论上讲，一步一步升上去不是不可能，对于除了小学教育外没有其他知识装备的人来说，大学生涯甚至还是可以设想的。但年轻人中间的成功者寥寥无几，成功的年轻女孩更是几乎不存在。每个学徒平均每天得完成10小时的工作量，每周得完成50个小时。他从早上7点钟开始干，到晚上6点钟结束，通常在临走之前还得打扫作坊。在手艺人那里，他几乎是无所不做的保姆。而在头一年里，按一般规矩，他没有一天假期。

对于被指定为工会干部的工人战士来说，一些培训中心可使他们得以学习、深造。这些培训中心在国家的支持下，对多数大城市开放。那里教授经济、工人法、宪法和行政法等课程。在柏林，政治高等研究学校自1920年成立之日起，便承担此类教育任务，在那里报名不需要任何文凭。至于法兰克福的劳动科学院，其宗旨便是从10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接收由职业组织派做代表的工人与职员。

一般来说，这些机构多少都是由社民党运动直接控制的，它们具有官方性，其成人对象来自于劳动界内部的精英或精选出来的人。在共产党那边，他们复兴了民间大学的传统，开办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柏林的那所设立最早，入学人数最多，先是由海尔曼·敦刻尔领导，后由约翰·洛伦兹·施密特领导——他是小说家安娜·赛格尔斯的丈夫。在“筛眼”学校——真是名副其实——1926-1927年开了26门夜校课程，有150名听众。这些课几乎涉及所有领域，从速记学到性健康。1930-1931年，课程数量多了10倍，而固定听课的人数增加了30倍。在老师里而，有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契，还有建筑学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和布鲁诺·陶特，导演艾尔文·皮斯卡托，作曲家汉斯·爱斯勒，经济学家于尔根·库钦斯基。人群中，有一个声名卓著的学



生：布莱希特，他正坐在凳子上，正式开始苦读《资本论》。

在中学机构里

有机会决心从事中学学业的那10%的学生又能成为什么呢？他们分布在短期或长期的中学机构里。前一种对应于法国的小学高年级，最后能得到一个专门文凭，一种中学证书。其他的则体现为各种传统、现代或技术初中，最后可拿到中学毕业证书。这些初中各具特色，所开设的主要课程也有差别：这里希腊语和拉丁语占上风，那里德语、英语、法语居主导地位，或者还有第三种解决办法，即数学和物理学科。

男女合校制度远未被四处采用。年轻女孩多半必须上高中，专留给她们上的中学才能有高中这个名字。此外，对于家长们来说，学费也比小学高得多。除了学费之外，还得加上练习本费、书本费、运动服费。体育课其实已被推广为必修课了。根据家庭情况不同，学校设有奖学金，但数量极少，数额也很低，通常就是减免学费。然而，由于中学机构不招收寄宿生，所以那些家住没有初中的村庄或小城市里的学生情况便极其不利了。他们必须找到愿意接受孩子寄宿的家庭，或者早晚骑几十公里的自行车来自己解决问题，寒暑不辍。^①

这些条件解释了为什么在1919年到1933年间，小职员和工人的孩子只有6%到8%能进中学学习。初中主要是中等阶层的孩子上得起。30年代，他们大约占招生总人数的60%。同一时期，高层干部（高级公务员、军官、自由职业）有20%能送孩子上学。一方面，中等教育机构的就学人数因其社会生源关系而与就业人口比例成反比：当就业人口包括55%的工人时，便只有7%的男生和3%的女生来自工人家庭。另一方面，高干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比例也体现了同样的隔离现象，随着离获得中学毕业证书的阶段越近，他们在各班里的人数也就会持续上升。

在学年期间，不仅进行着与社会等级相对应的选拔活动，而且根据学校

^① 见瓦尔特·吉尔德：《没有回程票的生活》，中部德国出版社，哈雷—莱比锡，1980，158—159页。每天早上7点30分，他得从家里出发，骑九公里路程的自行车。

的不同还有隔离现象。当工人们有能力时，更倾向于把孩子们送到短期学校里。中等阶层主要选择现代初中，而高级干部则对古典中学青眼有加，商人、手艺人、小职员更多地是走向技术初中。

那么年轻姑娘们又怎样呢？1914年以前，她们没有多少指望，只希望有一天能当上幼儿园的保育员，或者再困难一点，当小学教师。就算对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孩来说，这也便是通过职业活动来获得解放的希望了。1923年的学校改革为她们更广泛从事中高等教育敞开了大门。不过，统计数据显示了这一开放的局限性：1931年，勉强有8%的十一二岁的小学女生步入中等教育之门，而对于男生来说，人数达到了14%。

法兰克福的一位老妇人曾不得不听天由命，在工厂里当工人，后成为工会战士，为反对社会不平等而斗争。正如她在1978年所回忆的那样，与资产阶级家庭不同，小女孩能读书的想法在工人家庭里行不通，并非因为偏见，而是因为生活条件困难。她读到小学四年级末时，老师去找了她的父母，向他们建议说，鉴于她能力出众，应把她送到中学里去。但她母亲拒绝了，她把孩子叫到一边，跟她解释道：“你的同学们大部分都是富人家的孩子。他们会穿着高雅的衣服，饱饱地吃完早餐后去上课。他们还会有零花钱。所有这些，你呢，你都不会有。你会继续穿你姐姐穿过的旧衣服，早餐就吃面包和果酱。至于零花钱，根本就不可能给你……”^①

关于德国初中的氛围，雅克·德库尔就其1930年-1931年在普鲁士的观察经历，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当他到达时，受到一位六十来岁的校长的接待，这位校长自以为不得了，是个父权主义者，说话滔滔不绝。我们的德库尔的课表是，每周有12小时的固定课时，另外加授德语、拉丁语、希腊语、法语、数学，尤其是宗教，他很吃惊地得知，他的年轻同事们不像法国所有老师那样，在自然史、拉丁语和体育方面均是专业人士！对于每周25小时的课表来说，有三门必修课程，这其实就是德国一位中学教员的正常课程安排。^②

大大小小的初中生们是怎么认出来的呢？从他们的帽子上。雅克·德库尔被任用为教员的那所中学里的帽子为白色，上面竖着区分性标志，一根黑、

^①转引自《1904年~1945年法兰克福的青年工人运动》，35页。

^②雅克·德库尔：《腓力斯人之城》，25-28页。



白、红三色绦带，他兴致勃勃地评议道：“城里满是戴着黄、绿、蓝、红、橙色帽子的中学生。这是其他国民教育机构的标志。我看是不可能取消这些帽子的了，它们构成尊严（这里对应于英国式尊重他人的情感）的中枢。两个想打架的小学生第一件事是取掉帽子……”

上课时间只在8点到13点，除了星期天以外，每天都很固定。新的一周以周一校长在晚会厅中的布道开始。一大群孩子在管风琴伴奏下合唱着圣歌。然后大家开始学习并遵守纪律。这个纪律，正像校长对雅克·德库尔所重申的那样，不仅仅是老师们的事，学生们也有责任：他们应当维护其帽子的好声誉。^①

而且这著名的帽子从一个班到另一个班在发生着变化，至少是绦带的颜色在变。从二年级升到三年级特别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仪式要求，帽子得放到一盆温水里浸一下，小心揉搓，戴在头上吹干，使之成为最终形状，并把它朝左耳方向歪着以为炫耀。穿长裤而非短裤，坐垫被从一间教室传到另一间教室，放在屁股下面以减轻凳子那硬梆梆的感觉，正是这样的特征，说明他们从此已归属于大人集团！

凡是和政治时事、当代现时生活有关的事情，只会穿过细狭的门缝才能钻到学校内部里面去，仿佛历史在1918年11月9日这天停止了，维尔纳·吉尔德讲述说：“4月1日，一位老师给我们讲俾斯麦（他是这天生的）的重要性。我们熟知色当战役的纪念日（9月1日），而瑞典国王居斯塔夫·阿道尔夫在吕岑战役阵亡的日子（11月11日）时不时便要在我们的记忆里过一遍，因为我们是在一所新教学学校里。德国历史是在‘英勇不屈的德国军队在背上挨了一刀’中结束的。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凡尔赛可耻的和平’、暴乱、杀人、财政丑闻，众议院及街上大打出手，都是些对于中等教育机构里的学生来说没什么意义的事情……”^②

就这样，习惯、传统扎下根来。而老师们在出示了各种中学里一个又一个的实习证明以后，27到30岁之间便能正式担任职务。他们所熟悉的世界更多是帝制时期的世界，而非共和制时期的世界。在汉堡、萨克森或利浦小省

^①雅克·德库尔：《腓力斯人之城》，44页。

^②维尔纳·吉尔德，158页。

有德国教员协会，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加入了该组织，为反对反民主行径而斗争。但这只是倾向于被动地接受一切。以必要的政治中立为名，成了主流方向。1932年，一位代表参加了洛斯托克代表大会，他建议通过一项提案，呼吁遵守宪法，坚决反对所有企图用专制代替民主的潮流。提案被否决了。^①就整个心理状态而言，这一举措真是意味深长啊。

保守的高水平大学

这一代教员，甚至是于1925年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人，在他们所学习的大学里，又经历了什么呢？主要是保守主义。埃米尔·杜·布瓦-莱蒙1914年前在任柏林大学校长时，不无满意地公开宣布，该大学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霍亨索伦王朝家族军队的知识兵团。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社民党在脑力劳动职业中的势力尚极其弱小。^②那战后呢？从1918年末到1920年，独立部队正是在学生界里大量招收成员的。数所大学（莱比锡、马尔堡、艾尔兰根）甚至决定关闭大门，以方便该招募工作。在卡普和鲁登道夫所发动的企图推翻共和国的活动期间，50余万名学生和大学人士被卷进去。稍过一段时间后，通货膨胀恰恰让他们在对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的同情中找到了温床，与此同时，其家庭的生活水平却在下降。

当然了，在大学之间和学科之间存在着差别。新教神学、法律、德语研究一般被看做是右翼的，而社会学与心理学则被当成左翼。海德堡和法兰克福因有自由主义大学而声名显赫，至于柏林，根据极为确实的传闻，则由最保守的右翼势力所把持。

魏玛共和国时期随着竞选活动在大学里展开，几乎所有校长都是从保守教师中选出的，有时甚至明显就是个反动派。青年教员步入大学职业生涯对该状况未能造成任何改变，因为在招聘他们时所提的条件便是他们对共和制

^①转引自第特弗里德·克劳瑟-维尔玛编：《教师、共和国与法西斯主义(1918年~1933年)》，帕尔-卢根斯坦出版社，科隆，1978，12页。

^②例如在汉堡，1903年，社民党在16000多名党员中，只有3名医生，1名教师，16名记者或文人，以及8名电工技师，但是主要的工程师行业协会包括有22000名成员。



度的敌对程度。这样，德国大学人士大多数都是赞成民族主义和反对民主的知识分子流派。

1918年末和1919年初，因保守而著称的某些教师出于实际情况，同意与新政权合作。他们忠实于传统的政治中立主义，听命于他们所谓的“事物新秩序”。但他们内心深处的信念没有改变，尤其是历史学家，他们继续为一个超越偶然性的国家——它不通过契约形式与人民主权相联系——这一构想而辩护。无论是民族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他们都以这种方式来承认共和制，但并不真的赞成。弗里德里希·麦讷克较温和，他由此还很老实地将自己形容为“出于理性的共和人士”。这意味着他因为必需而适应于新的体制，但不赞同共和原则。

多数大学机构都拒绝议会民主制。但奇怪的是，他们都是由民主制所保护的。宪法第142条便规定将保证艺术、科学与教学的自由。有了这一条，法学、历史或哲学教师们都能自由自在地在讲台上向学生们散布自己的观点，散布反共和的观点。

民主教师和公务员抵制该影响的能力范围缩小了。例如在弗里堡，海尔曼·坎托洛维奇曾在一次课上宣称说，从结果上看，俾斯麦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收归德帝国是有害的。该大学的历史系成员立即便被召集起来对他的案子做出裁决。他们进行了投票，在系里17名教师中，15人判令他从此不得持有任何政治立场。

反过来，同样的体制却能容忍教授种族主义理论。耶拿大学一位动物学教授，路德维希·普拉特受到宣传反犹太论点的指控，被要求在纪律委员会面前进行解释，当他指明种族问题属于其学科范围时，便被洗去了所有嫌疑。他认为，当他在科学方面有力量断定社民党的概念完全错误时，便有权去批评它，他说：“告诉学生们说人从根本上是平等的，说他们的差别首先是由其环境来调节的，这错了；这些差别更多地来自血缘，它们本质上是具有遗传性的……”

各大学不仅嘲笑共和制原则，而且还安然无恙地充当反共和体制的讲坛。正教授数量相对来说不多，他们担任官员，其地位几乎不可动摇。他们紧紧抓着其特权不放。1914年前占主流的观点毫无断层，保留了下来。在大学里

所庆祝的不是通过魏玛宪法的周年纪念，它们庆祝的是第二帝国的生日，1871年1月18日！

学生也没多少能力来让事情有所变化。从1919年到1923年，他们的人数由8万增到13万，接着在1925年，又降到9.7万人，1931年再次升到13.3万人。但保守主义已经反映于年轻女生在他们中间占很小比例这一现象上了：1925年她们约有8000人，而且其中只有2%到3%的人属于工人或小职员家庭。1923年左右，通货膨胀时期，时代的严酷性逼得几万人得去找一份体力活，以保证基本生活所需，他们要么每天干几个小时，要么干一个假期。这些打工学生是个新现象，但精神状态却没有多大改变。

公开宣扬左翼或极左观点的学生从两方面都被孤立了。在老师那边，他们被看做是致力于与同班同学进行肤浅的联系——而这些同班同学害怕会有赞许相同观点的嫌疑。在大学组织那边，除了符合其理想的政治社团以外，他们都被拒之门外，占主导地位的是“行会”精神。

这些学生组织于19世纪初得以发展和统一了，他们有自己的会旗和游行服装，在小饭店里有固定的餐桌。博爱、团体精神将各成员连接起来。中世纪习俗的残余，支配着他们每一个人的人会许可过程。在用啤酒进行洗礼之后，新成员便被托付给一位更老道的同学照顾，负责他的学习，教给他怎么涂抹颜色，怎么喝酒、抽烟、唱歌、决斗。如果他对灌下大杯啤酒后应该高声喝彩习以为常，如果他把应时歌曲都熟记在胸，如果他刀剑功夫已经样样精通，那么下一步他就能经受最终的考验了，决斗！“狐狸”队——正如新成员们所叫的那样——的负责人从另一个“行会”里选出一名敌手，那位新手便被叫来和他较量较量。因为只有眼睛受到保护，完事时，其中一名战士的脸上免不了要带伤。败了，那是他勇敢作战的标志；胜了，那是他无畏精神的标志。总而言之，能清楚指明他属于该学生精英集团的，莫过于那长长的刀疤！

在魏玛共和国的23所大学里，某些座落于人口密集的城市，像柏林、法兰克福、莱比锡，但大部分学校的总部位于更为宁静、不太重要的外省城市，有的自14世纪和15世纪以来便是如此。对于后面这种情况来说，像图宾根、马尔堡、海德堡、格莱夫斯瓦尔德，围墙内学生的存在是一种活力源泉，一



种商业活动的源泉。它们对学生们的集会、游行、仪式都已司空见惯。这些中世纪城市昏昏沉睡于过去时光，至于学生们自己，为了填补由此所带来的空虚，便逐渐汇聚到一起。正是在那里，诸“行会”自然而然地继续拥有重要地位，以最大的热情来遵守传统。

在这些传统里，决斗被保留下来。某些大学所在的城市曾正式禁止决斗，但兴登堡总统于1926年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该禁令，他将决斗形容为骑士行为。在所有大学里，君主制崇拜和反犹太主义从根本上占据着统治地位。1919年，当各“行会”在艾瑟那赫见面时，曾通过一项规定条文，根据该条文，犹太人不得成为其成员。条文于1920年在格丁根得到确认。

教室里，时常会有人散发反犹传单。学生频频向犹太裔教师起哄或加以责难。爱米尔·衮倍尔在海德堡、泰奥多尔·莱辛在布伦施威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柏林所遇到的便是这种情况。爱因斯坦于1920年2月甚至还受到死亡威胁。在针对他所进行的战斗之初，反动物理学家菲利浦·雷纳德下了一个所谓纯科学的论断，专横地宣称相对论没有任何价值。

1932年，年轻的法国人雅克-里查尔·格兰在柏林居住了几个月，他——有机会便常去大学，发现他的大学同学多数都相当接近纳粹党，他们的“行会”也如此。在弗里德里希街大学食堂——那里一张25芬尼的餐票“能买到一份浓汤和一份带蔬菜的荤食”^①——吃完中饭后，他们便开始就当天所有问题进行无休止的讨论，用的是可怕的民族主义论调，我们这位年轻的法国观察家写道：“我不喜欢柏林大学。我感觉在那里没有我一席之地。我试图把事情弄懂，却大大伤神，我只不过是个不知趣的人，在那些仅仅只要求自己人待在一起、不想同任何外国人打交道的人群中，我扰乱了他们的亲密关系。”

是否所有学科里的所有学生都应当被指责为沙文主义呢？远非如此，即使是离希特勒上台的日子这样近，保守主义在新近的工程师学校里远没那么根深蒂固。然而，大学中的总体氛围似乎实际上没怎么达到民族间的亲密化地步，更没有达到与法国人握手拥抱的地步。要把德国和奥地利放在一起算的话，受社民党影响的社会主义学生会1931年的会员只有5000人多一点！

^①雅克-里查尔·格兰：《秩序与混乱(当代德国景观)》，儒勒·塔朗蒂耶出版社，巴黎，1932，86-88页。

普瓦提埃大学德国文化教授安德雷·佛柯奈也一样，为他在德国的经历而感到震惊，以至于坚持对同事们公开提出要小心此事，他在1930年开学典礼的讲话上解释说：“在课堂上，德国学生习惯于用两种方式来表达意见——要么用脚后跟有节奏地敲打地面以示鼓掌喝彩，要么用鞋底摩擦地板来表示意见相左或情绪不佳。不过必须说到的一点是，这些表示愤怒的标志多数情况下是专门留给其胆敢影射说德国应对战争负责的老师，留给影射德国所犯错误或认为它应履行和约义务的老师。还有，极少数真心热爱和平、支持各民族间和解的教师一般来说都不敢让人猜出他们的情感。”^①

然而，德国大学的水平是优质的。早在1914年以前，由于马克斯·韦伯、维尔纳·松巴尔特、费尔迪南德·冯·托尼斯的贡献，德国人就在现代社会学领域中占有绝对优势。这些社会学家来自哲学、法学、历史，甚至医学等领域，像弗兰茨·奥本海默，他们拒绝任何狭隘的专业化。这一方向在1918年以后得到发扬光大，有泰奥多尔·盖格尔关于社会阶级、阿尔伯特·萨尔蒙关于家庭等方面的著作，还有雷奥颇尔特·冯·维瑟及其在科隆的研究小组的著作。至于理科，某些教授的名声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学生——数量不多倒是真的——专门从国外赶来听他们的课程或讲座。比如说在格丁根，有人听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大卫·希尔伯特、海尔曼·威尔、马克斯·玻恩的课，在慕尼黑，有人听阿诺德·索梅费尔德的课，或者在柏林，有人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课。而且，193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也被授予了量子力学创立者维尔纳·海森堡。至于德国哲学，则主要受惠于远近闻名的现象学之父，埃德蒙特·胡塞尔。

在被切割成地区、刚统一不久的德国国内，外省大学因为其便于竞争的独立地位，故而拥有与柏林那边一样能干的专家。在海德堡大学全体教师成员中间，它有幸拥有文学方面的弗里德里希·衮道尔夫，哲学方面的卡尔·雅斯贝斯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阿尔弗莱德·韦伯。法兰克福大学则有著名的社会学教授，卡尔·曼海姆，哲学方面的杰出代表，保罗·提里希和马克斯·霍克海默。仍是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学院于1924年开办。虽说它于1945年后

^①载《认识自己》简报，巴黎，10月~12月，第4期，1931，4-5页。



因法兰克福学派而更加驰名，但以当时其首批参与者的资历论，也未让它失色：马克斯·霍克海默，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后来有文学社会学方面的雷奥·罗文塔尔，哲学方面的泰奥多尔·W·阿多尔诺与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埃里希·弗洛姆夫妇二人都是精神分析学运动的成员，他们曾与雷奥·罗文塔尔建立起友谊，试图调和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纳粹上台掌权后，社会研究学院（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暂时安置在法国。后来，它与其主要成员马克斯·霍克海默和泰奥多尔·W·阿多尔诺一起迁往美国。其著作在法国很晚才被认识到。关于这一问题，见《精神》1978年5月那一期，尤见格儿哈特·霍恩与热拉尔·罗莱的文章，“法兰克福学派在法国——书目评论”，135~147页。

瓦尔特·本雅明通常倾向于法兰克福学派，但他只是在迁居法国期间偶尔参与合作罢了。

社会研究学院初期成员之一有里查尔·索尔格，他在上次大战时因成为著名间谍而颇享声誉。作为共产党员的他给苏联递送了一些情报。阿兰·葛林就他的事迹写了一本书，由儒利亚尔出版社出版。]

柏林对学生和教师具有吸引力，因为它还有其他优势。如果说其娱乐生活比法兰克福、莱比锡或马尔堡更有诱惑力的话，那里的知识生活同样看起来要令人兴奋得多。一位见解独到的名人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有更多机会收到对其研究的热烈反响，无论他的活动领域是什么。社会学家勒雷·柯尼希很漂亮地描述道，当他概述其在20年代末的经历、并幽默地解释说他在那里没有研究什么，而是学到很多东西时，柏林产生了一阵狂热之情。^①

在柏林，精神分析学是继维也纳之后在欧洲最为稳固的学科。那里可见到所有信奉此说之人组成的集团。^②忠实于弗洛伊德的人聚集在国际精神分析学协会主席卡尔·亚伯拉罕周围。当他1926年去世后，恩斯特·西梅尔和桑多尔·拉多接过火炬。然而当精神分析学学院完全独立于大学工作的时候，大

①勒雷·柯尼希：《矛盾中的生活（一次智识人生的尝试）》，卡尔·汉瑟尔出版社，慕尼黑，1980，89页。

②1930年，威廉·莱希离开维也纳到柏林定居。关于他，见罗热·达杜恩的著作：《百花为威廉·莱希而开》，帕约出版社，巴黎，1975。由罗热·达杜恩所写的书，还可见关于精神分析学的传播的论述，《弗洛伊德》，贝尔封出版社，巴黎，1982。



弗洛伊德

学便公开表示了对它的敌对情绪：凡在学习医学同时对精神分析学也感兴趣的年轻人，若让其老师知道了，就有考试不及格的危险。

更为严厉的排斥情绪针对的是性研究学院。^①其创建者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被看做是丑闻的化身。1919年，他的电影《而非他人》为同性恋辩护，更引起了极其强烈的抗议活动。在外省做报告时，他本人时常遭到殴打。无论是其关于性病理学的著作，还是他为改革反同性恋法所作的不知疲倦的斗争，都未能在学术界上层圈子里得到严肃对待。

在相同阶层里，就连其他领域对于新类型学校也不乏迟疑沉默。包豪斯学校于1919年由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创办，后坐落在哈雷附近的德绍。各学科的艺术家在此授课，倾向于一起思考，一起创作，主要考虑的是改变社会环境，将艺术纳入生活。报名上他们的课的人数量有限，因为他们既缺乏教材，也被人们担心效率不高。学生数量从未超过200人。他们在一些讨论课上接受实践培训。从事艺术工作之前，他们得完成手工艺学习。有了诸如康定斯基、克雷、莫霍利·纳吉这样声名卓著的教授的指导，他们便可能获得素描、构图、用色的基础知识，进行雕刻、印刷、细木雕、篾编、制陶、织造、雕塑、戏剧创作等活动。戏剧班先是由罗塔尔·施莱尔指导，后来在德绍由奥斯卡·施雷默指导，不仅学习入门技术，还将一些剧目搬上舞台，^②通过哑剧、芭蕾、木偶戏，空间、运动、色彩、形式和音响都成为实验活动的对象。

他们为了符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的构想，于是热情地探索、发明新形

^①关于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医生，参见1921年10月1日的《法兰克福报》中乔治·博恩所作的概述《性病理学》第3卷，波恩，1921。克里斯托弗·伊歇尔伍德在其自传里用很长篇幅提到并描述了性研究学院，《克里斯托弗及其同道》1976年，由雷奥·迪塞译成法文，阿歇特出版社，巴黎，1981。另见恩斯特·埃里希·诺特的《一个德国人的回忆》。

^②见艾里克·米纳的书：《包豪斯学校的戏剧（1919年—1939年）》，城市一人出版社，洛桑，1978。整个这部漂亮的丛书“20年代戏剧”由德尼·巴布莱主编，凡涉及该时期戏剧实验尝试的事情都应当参考它。例如关于欧洲和美国的《1917年—1932年的宣传鼓动戏剧》，它就出版了四卷。



式，以便改善一系列工业制造品的表现与功能特征。工业美学曾经大大依赖于在“包豪斯学校”所进行的这些研究。一些商行制造出由马塞尔·布罗伊尔绘制的钢管状桌椅，由马丽亚娜·布兰特、阿道夫·梅耶尔或克里斯蒂安·戴尔所想象的金属灯与玻璃灯，由威廉·瓦根费尔德所加工的碟子和桌布，艾里希·迪克曼起草设计的家具。这样，“包豪斯学校”又恢复了在“作品联盟”里所完成的工作。该作品联盟于1907年开张，瓦尔特·格罗皮乌斯曾是其中成员。他的工作酷似苏联“生产主义者”和“建筑主义者”们在艺术与技术高级画室中的尝试。而且，一位俄国建筑师李西茨基同时与这些“伏库特玛斯”们和“包豪斯学校”合作。在德国，除了杨·奇柯尔德、恺撒·多姆拉、马克斯·布沙尔茨、库尔特·施威特斯外，他还是新印刷术、使用相片剪辑来进行书画构图并将之应用到广告上的创造者之一。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尽管他们还有不足，还有通常牢不可破的思想狭隘性，但高等教育机构却为此提供了机会，使人能集中精力勤奋学习，工作上硕果累累，至少从1920年到1930年是这样。接着，从整体上撕裂德国社会的紧张气氛将他们吞噬了。大部分师生将这紧张气氛扔向法西斯暴力活动，扔向法西斯主义的游行活动。这局势被新获得学位者中间的罢工所导致的不安弄得愈演愈烈。

报名加入国社党的教师人数并不多。大学单位更偏向于民族主义。它支持贵族主义或保守主义，对于被它称为“群氓”的人只有蔑视。另一方面，多数大学都能接受希特勒上台掌权，它们甚至希望如此。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解释了个中原由，同时表明自己的立场：不应该任凭大学沉溺在混乱之中，应当保留这块勉力沉思的封闭园地，应当有秩序。”

这种秩序，在1929年-1930年纳粹与右翼党派间组成地区联合政府之后，

①关于这一问题，见马丁·海德格尔的对话录，在他死后发表于1976年5月31日的《镜报》周刊上。此次谈话是在1966年9月23日进行的。海德格尔宣称，面对观点的混乱，面对由22个党派所代表的政治潮流，在他看来，唯一的替换选择于是落在了希特勒的身上。

由于有威廉·弗里克在图林根的政策，使大学人士都预感到了。在耶拿，为纳粹理论家汉斯·F. K. 君特尔开设了一个种族主义讲坛。那时希特勒在一次讲话中宣称：“从此以后，我们将在图林根让整个学校体系为教育服务，为能把德国人变成狂热爱国者的教育服务。我们还要从马克思主义—民主倾向里清除掉所有教员，并且反过来，采用符合我们的方向和国社党观点的大纲。”^①

图林根的经验是一次尝试，只持续了一年多一点。但从1933年1月开始，该经验便能在全德国得以系统地试验推广了。一半以上的大学人士归顺过来了，20%的人则被架空、关进集中营或被迫移居国外。海因里希·曼初期为反法西斯者，不得不居住在法国，当时他在1935年的一篇文章里评议说：“在各大学里，人们很有可能为新制度深感失望。但他们不可能抹煞，也不可能忘记一个事实，正是大学为这制度提供了最初的那批宣传者。”^②



^①转引自克里斯托弗·福尔：《论魏玛共和国的学校政策》，贝尔茨出版社，魏因海姆，1972，61页。

^②海因里希·曼：“秘密学校”，《世界新舞台》，1935.1.24。



第七章 衣、食、住

马克斯·冯·德尔·格律恩是1945年后终于成为联邦德国作家而名声大振的少数工人之一（他原是深井矿工）。他在1979年出版的回忆著作里，讲述了其童年和青年时期。^①他描画了1926年当他从拜罗伊特来到这个世界时，父母所处的社会状况，他写道：“我母亲25岁，按当时的叫法，她是农场里的女佣。父亲26岁，是鞋匠伙计。母亲每个月的吃住被包下了，除此之外挣20马克；为这份工资，她每天得干12到14个小时，有时在夏秋收获季节干得更多。她每15天有一个星期天，但在庄稼收割期间，她不得不放弃这个能自由活动的星期天。至于我的父亲，他则按鞋匠们的需要干活。如果他运气好，一周内就能工作三天，偶尔是四天，但多半只能干两天。他们两个人所挣的钱还不够租一间房子。”

于是马克斯·冯·德尔·格律恩被托付给他的奶奶，来到离拜罗伊特有六十来公里的地方。下面是对其屋子的描述：“德国到处都是贫困，我们尚没有电力照明，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油灯，只能在必需的时候才点燃，因为那算起来可都是一分一分的钱呢。我们四户人家共用一个卫生间，没有抽水马桶水箱。奶奶或者邻居主妇把一桶热水灌到排水管里，铺上石灰，每天最少一次，以免在炎炎酷暑之时臭气熏天——可还是臭气熏天。”

再稍过一段时间，他父亲跑遍大街小巷，挨个敲鞋匠的门，以便能有一双鞋修或弄点什么吃的，而他母亲则把他带到老板们的农场上，留在身边。但在农村，所有人都干活，没有人会担心让儿童劳动是否被禁止，一双双的手

^①马克斯·冯·德尔·格律恩：《此事原本如何？（第三帝国时期的童年与青年）》，路赫特汉特出版社，达姆施塔特和诺伊维德，1975。分别见5、8和31页。

在白干。于是他母亲对农场主们大发脾气，因为他们在他5岁时就让他把干草搬回到地里，放牛、擦洗马厩。她把他又带回到他奶奶那里抚养。

马克斯·冯·德尔·格律恩很想表明他的道路有多艰难，那他是不是把他所经历过的苦难有些夸大了呢？面对如此的生活条件（该书甚至复制了一幅八口之家的照片，其中有六个孩子，住在被改做他用的车厢里），很难相信这便是魏玛共和国时期许多人的命运遭遇。然而……

传统居住环境

一般来说，在人们头脑中，德国房屋所表现出的景象肯定更为祥和宁静。它们通常是木筋墙面，木制栏杆，屋内有墙纸，重家具，顶上是屋椽大梁。屋子一角，有精美的彩釉陶制高炉。这是平静的外省城市中传统的房屋。房子低矮，只有两层，石板屋顶，就像那位维尔特·德·歌德1772年春夏两季访游夏洛特之时，布福神父一家在魏玛附近的维茨拉所住的那种房子：小巷弯绕曲折，被艺人用刻刀涂上了石灰，小屋便出现在巷子尽头，可以看到它紫红色木架横斜勾划的围墙、铁栅和窄窗。

在农村，根据地区的不同，建筑风格也有区别。北方农民住在没有楼层的房子里，牲口棚与卧室相连；南方农民则更喜欢住在牲口上面，安身于低顶房间里。在降雪量大的地区，比如在法兰克尼亚省，屋顶很高、很尖，便于水往下流。下萨克森省主要是砖屋构造。在图林根省，各村庄由三层式的房屋组成，上面有许多窗户，四周有果园围绕。在莱茵省和摩泽尔省的河谷地区，葡萄藤沿着墙壁、窗户攀缘，百叶窗前青翠盈台，阳台上鲜花盛开。离此不太远，在洪斯吕克和黑林山地区，气候较为恶劣，生命都退居在远没那么可爱的住所里，低矮敦实，用淡灰色石头砌成，门窗极少。

这种建筑风格的多样性现象延续了几个世纪，在1918年以后的德国当然还是能见到的。乡村居住环境，说到底，相对并无多少变化。但在外省许多小城市里，它已不再是原来的模样。1920年的维茨拉远离老街的中央核心，歌德恐怕也会很难认出它来：那里铺设了铁路，开设了一个火车站，遍地都是工业活动，有煤气罐厂、炼钢厂、铸造厂、机器制造厂。



1870年左右，尤其是在大城市里，资产阶级专注于华而不实的东西。他们开始醉心于用次品将外表修饰成新哥特式风格，或是在公寓中堆满家具，可能是文艺复兴、路易十六或帝国时期的，有窗帘、挂毯、小摆设、半身石膏像。灰粉石膏花饰与希腊或意大利模塑争相媲美。接着，十年以后，同样是这些资产阶级人士的一部分人拜倒在新艺术派的涡纹花饰之下，这是来自比利时的一种新艺术流派，因定居于魏玛的梵·德·威尔德的建筑而传到德国。最后，在战争爆发前夕，暴发户们则热衷于修建别墅。于是郊区和居住区里到处都是亭楼，模仿着布涅塔尼式的庄园、英式村舍、瑞士-挪威式山区木屋，或者是瓦格纳式僻静小居。

许多公务员、职员或商人用规模较小的方法，依样画葫芦地追随这股堆砌之风、造作之风、仿窃之风。这样更便宜，却也更可笑。在砖制楼房里，在仅有一两间房的公寓里，除了给人以安逸、富裕的幻觉外，难道他们还能做点别的什么事吗？他们不得已，只好选择蹩脚画片，选择所有按系列制造、看着似乎是东方式样的旧货，让人浮想联翩。碗橱、床、五屉柜都被蒙上丝绸、缎子或带花边的装饰物。^①

至于工人，工厂老板们则在市郊专门给他们建造了千篇一律的、兵营式的住宅。每户人家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偶尔有两间。卫生设施仅限于有自来水。家具就只一张桌子，几个凳子或木椅，一个炉子和一个灶，几张草垫子。如果他们得搬家，正像画家海因里希·齐勒在柏林所拍摄的一张街头场景照片上所表现的那样，一辆手推车便足以搬走全部家具。^②

这种鱼龙混杂的居住环境通过帝国制度而流传下来，它本来可以被魏玛共和国当局负责部门在几年工夫里转变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呢？1930年左右，构成德国城市平民的主要景观还是该居住风格，相同的城市区划，相同的地段分隔，相同类型的街区，或者是差不离。工人家庭不会从他们的兔笼子迁到独立的亭楼中，资产阶级也不会放弃他们的别墅跑到简陋的集体住宅里。

^①例如参见儒勒·于莱在《巴伐利亚和萨克森》中描写世纪初德国建筑的那几页，118~129页。关于家具摆饰，参见143~153页。

^②在海尔曼·格拉塞书中复制了该照片，《机器世界与日常生活》，沃尔夫冈·克吕格出版社，1981，105页。

于是，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情况便被当做是合情合理的。当雅克·德库尔描述他找到地方住的街区，描述其房东太太——一位寡妇，原来从商，后已退休——的家具时，给出了一个说法。^①街道笔直，没有阳光，仿佛是拉墨线筑造的，有数家商铺，几乎都一模一样。此街两旁排列着“紫红色房屋，恍惚是佛罗伦萨风格”，一眼望不到边，造于世纪初，屋顶平坦，窗户上装饰着小圆柱。楼梯上，散发出洗碗水和花菜的味道。再看卧室，摆着一张床，一座棕色陶炉，一张假桃心木书桌：“没有自来水（好像整个城里都一样）。墙上有一种圆饼状睡莲，一团花，是一幅水彩画复制品，以及弗雷德雷克二世、俾斯麦、兴登堡的头像。”靠近这间卧房的是餐厅，一间气氛沉重的陋室，“一张巨大的桌子，一张被坐得坑坑洼洼的长沙发，一个轻易不生火的炉子，把房间填得满满的”。

在这种资产阶级的平庸里，没有任何诱人之处，却也没有任何惹人生厌之处。这是一种境况不佳但也还能凑合的贫困。相反，对于许多工人来说，这已经超过了可以忍受的限度。恶劣的生活条件导致他们的居住条件下降，图林根一市镇的镇长抓住该衰退现象进行了一番描画：“他们挤在摇摇欲坠的房子里，小木梁被虫蛀得如此脆弱，以至于放一个衣柜就有倒塌的危险。天花板上剥落的粉灰落在床上。墙砖风化开裂，屋顶木椽漏雨滴水。在一楼，院子里的积水渗进粗制滥造的墙壁，弄得裂痕纵横。人口众多的家庭，全家睡在阴暗狭窄的屋子里，屋中床下还贮藏着备以过冬的土豆，散发出淡淡的泥土味道。父母孩子、兄弟姐妹，结婚的没结婚的，都睡在同一间屋里，通常还睡在同一张床上。”^②

还有更不能接受的事情，这一描述，很不幸，与马克斯·冯·德尔·格律恩对其奶奶的公寓的回忆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个也能与此相提并论的事情，便是曼斯费尔德一位矿工1928年写给其领导的一封信，他要求给自己一间更能生活的房子，而非总是昏暗不明的九平米厨房，和他与

^① 雅克·德库尔：《腓力斯人之城》，72—75页。

^② 《德国与法国(1923年—1924年的经济与政治生活)》，由罗杰·皮卡尔作导言，(萨尔特)火箭国际调停组织简报第4期，1924，33页。这是原记者维克托·诺阿克写给经济学家罗贝尔·库钦斯基的一封信，题目叫“一座小镇的悲伤”。维克托·诺阿克当上了图林根省葛伦镇(4000名居民)的镇长。



怀孕的妻子及四个一到七岁的孩子同住的十二平米房间，该工人坚持说：“在这种状况下，由于缺少空间，五个人不得不睡在两张床上，此种事实足以证明必须赶紧采取解决办法”。^①而领导本人的回信中字里行间的含义又是多么深刻啊：我们完全理解你们的处境，我们在尽可能的范围内随时帮助你们，可我们首先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公寓来安置状况比你们还要差的^②家庭。

在柏林，就业者自世纪之交以来便聚居于庞大的楼区中，那里的某些房屋所拥有的卫生间、锌制澡盆和木炭冷水加热器都只是摆设，卫生与舒适程度这些最基本的方面也一样。这么多的人拥挤在这么小的空间里，结果所装的澡盆都被用做杂物角或食品柜。到处都可以使用煤气，但许多公寓里的煤气没法用，应该扔到计数器投币口里好让它运转的硬币被自觉地节省下来，或者压根就没这钱。

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伊歇尔伍德1930年曾在柏林生活过，他在自传中，通过描绘曾住过一段时间的诺伐克家公寓，以暗示的方式粗略表现了工人家庭里最常见的居住条件。可居住面积分为一间极小的厨房、一间起居室和一间狭小的卧室。起居室中，两张大床占了两处地方，一张桌子，六把椅子和一个碗柜，这样一来连转身都难！在卧室中，两张床占着一个地方。厕所在楼下一层，有二十来人共用。天花板到处都漏雨。厨房里只要一点火，一股闷味就传到另外两间房。洗碗槽常年散发着恶臭。^③

小公务员和职员与工人们一样也都住在同类型的楼房里，但他们很想表现出相对的优越性。作为好主妇，他们的妻子对家居外观精挑细拣。有一间房必须被专用做客厅，得在那儿接待客人、庆祝生日、摆放圣诞树。换句话说，他们尽自己最大可能做到最好。家中最漂亮的家具被集中放在一起，小摆设、几本书列于一处，其中有《圣经》。通常有一个沙发，能显示出高雅品味。客厅总是很干净，简直像一块圣地，只有在重大场合下才会往那儿待。

1925年左右，当经济状况稍微好转一点时，许多工人家庭便在家具和习

^①转引自于尔根·库钦斯基：《德国大众日常生活史》，帕尔—鲁根斯坦出版社，科隆，1982，第5卷，189—190页。

^②克里斯托弗·伊歇尔伍德：《克里斯托弗及其同道》，58—60页。

惯方面开始模仿小资产阶级。客厅里变派头了，长沙发也盛行起来。水货商品塞满碗柜和五屉柜。由于广告的作用，当时的时尚是在卧房里摆放亮色栎木家具，床占两个位置。可居住空间总还是那么狭小，人还是那么多，但有多少空间就补上多少东西，所以常常连走廊也占用了。

各种各样的贫困

这种杂居明显有利于疾病的发生，特别是有利于传染病的传播。结核病在大量居住条件恶劣的家庭里肆虐猖獗，而且这些家庭一般都还营养不良。每平方米人数越多，儿童夭折的情况就越频繁，而乱伦、少年淫乱、卖淫、酗酒现象也就越多，正像世界上所有贫困区一样。

在1924年所医治的6000个结核病病例中，估计8%的病人是数人睡在同一张床上，而80%的人没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根据保险公司保管处所进行的统计看，1925年，20%无工作能力的成人没有自己的床。这个结果并不让人吃惊，因为光在柏林，大约10%的居民至少是四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

从这些不卫生的住宅到角落里的啤酒酒吧，要走的路并不长。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德国的啤酒消费量如此大，从1922年到1925年一直在增长。另一方面，50%到70%的病人或因性病而就医的病人沉迷于酒精饮料。和整个人口相比，这些被传染上淋病、软下疳，尤其是梅毒的病人总比例非常大。根据1927年的一项医学调查，每年大约有10万此类病例，主要分布在大城市里，尤其是像汉堡和基尔这样的港口城市。^①

诚然，把酗酒和性病一股脑儿全都归罪于居住在兵营式住宅和工人街区里的人是不可能的！若想常逛窑子和狎妓，得有钱才行。这种快乐并非无产阶级能力所及，而是属于能毫不困难地付钱的顾客。可是对于那些经常通过暴力来行房的人来说，卫生条件缺乏对他们的性生活又怎能没有影响呢？就算是在村庄和小城市，多少家庭是男女混杂、父母小孩五六个人同睡一间屋

^①加布里埃尔·郭布隆：《接触新一代德国人》，68~72页，他提到了布鲁诺·茨克的一本书，《来自大城市地狱里的紧急呼叫》，该书以统计数字为依据，表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整个这种灾难：一些尚在适学年龄的少女跑去出卖自己的魅力。



啊！恩斯特·艾里希·诺特以自己作例子、十分羞臊地这样写道，从行房那一刻直到流产，再弱智的人到八岁也不会对生命“秘密”一无所知了。

贫困不能解释一切，那是自然。个人的心理机制也很重要。但证据显示，妓女一般不会来自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孩。相比之下，无论是偶尔卖淫还是经常性的，这在众多少女看来仿佛成了摆脱物质困难的临时出路。她们在柏林、汉堡或科隆的街头售卖香烟和鲜花以维持生计，很快就成了出卖肉体，从而通常也就落入黑社会控制之中，或是在窑子里了此一生。

也正是在该范围内，魏玛共和国进行了一次改革。1927年，一项旨在反对性病的法律撤消了警察局对妓女的体检权力，而将之赋予卫生部门。该法律还规定，妓院要被正式取消。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改变。1930年，有人向一位法官递交了一份关于柏林卖淫状况的报告。根据法官的结论，有数百家妓院在运转，什么价位都有，哪个街区都有。能采取什么解决办法呢？他提醒人们注意，关闭一家妓院，会导致另外两家妓院开门。

整个这种贫困状况的后果，是德国秘密流产数量与出生数量基本持平：每年100万。每年有20多万慢性病病例和1万到2万起死亡事件是由流产行为引起的。几乎没有哪个家庭没有实行过流产。从法庭那边来说，检举揭发每年都造成数千人被判刑，平均六七千人。和欧洲各国一样，根据德国刑法第218条，任何流产行为其实都是被禁止的。

此外，20年代末，这个问题成了左翼、极左，尤其是共产党等反对党派主要操心的事。人道主义运动和公众游行活动揭示出，法官们的严格是盲目的，著名的第218条太过分了。剧作家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本人是医生，他在1928年写了一出戏：《临界酸》，获得显著成功。1930年，艾尔文·皮斯卡托在柏林导演了卡尔·克雷代的写实戏剧《悲伤的女人们》。

由保守和反动观点构成的敌对势力对这一风潮作出回应。弗里德里希·沃尔夫，这位犹太裔共产党员看来成了他们的首选目标。1931年，他遭到一个阴谋的袭击，他被揭发说进行过流产手术，和他一起的有斯图加特的女同事爱尔莎·钦勒。诉讼程序启动了。真是一场壮观的诉讼，在两位医生的约诊本中登记过的所有女人都被请到证人席上出庭。爱尔莎·钦勒进行过一次反饥饿的罢工，持续了十天。最后，两名被告被释放了。几天后，在柏林体

育大厦，约20万人跑来听他们的演说。

这是魏玛共和国一段引人注目的插曲。德国百姓从未对流产的社会问题如此敏感。所有地区，甚至是在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数千妇女参加了消息通报会。各报纸用大量新闻铺天盖地地报导该事件。爱尔莎·钦勒被释放后，便投身于巡回报告会活动，到处都获得最热烈的欢迎。她占据了当年明星们的地位，从全德国，甚至从国外都收到贺电和花束。

但是，除了爱尔莎·钦勒和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所获得的胜利之外，流产行为本身又进展得如何呢？第218条并未被废除。不久以后，掌权的纳粹歌颂母爱，将之说成是妇女的自然义务。许多医生都认为他们说得对，因为除了在保险公司保管处开业的人以外，医生阶层都相当遵循传统，报难向新生事物放开。

然而，仅仅停留在悲惨境遇的形象上是不公正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就1918年来说，卫生组织虽然还不够，但尚未停止其步伐。他们追随着自半个世纪以来就已开始的改良活动。1922年，医院数量达到4000所，比1871年翻了两倍还多。在同一时期，可用的床位增长了三倍多。到处都在进行系统的分科活动，使用现代设备（如X光放射仪和放射性治疗仪）进行医护得到鼓励。在学校和企业里，卫生状况和预防性体检被有效地发展起来。

医生在百姓阶层中名声很差，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约有50%的外科手术失败。多德莱恩教授是妇科专家，他甚至声称，90%的分娩死亡现象是由其同事们的无能所造成的。而在1925年，李普曼教授在为妇科疾病研究院的成立剪彩时，毫不犹豫地探讨了德国医学教育问题，特别是实践培训的不足问题。第二个原因是某些医生关心实验，进行得太超前，以至于导致精神错乱，导致灾难性结果和公众性丑闻。在布莱斯劳，一位皮肤科医生，奈瑟尔教授，他由于未获应得的购买黑猩猩的贷款，最后便把梅毒微生物接种到儿童身上。也是在儿童身上，柏林的一位主任医师，伏尔默医生，他试验了一种新药，维杆妥，声称用该药能治疗佝偻病。^①由于这些事例均非罕见，且因为出版界做出了很大的反响，所以此类事情被要求不能再发生，以免人

^①这些病例转引自奥托·吕勒《无产阶级文化史与风俗史画报》，第1卷，分别见516页和521~522页。奥托·吕勒还给了其他一些例子。



们在医务界总看到只有一群江湖郎中。

总之，争取进步的工作完成了。凡是和性有关的，看来就成为无可否认的事情了。在动摇了它所象征的禁忌的因素和推动了道德习俗自由化的因素当中，某些医生所泄露出来的信息也没被人当做是无所谓的。他们中有一位，马克斯·霍丹在20年代末很满意地得出这个结论，他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事情，在2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在所有社会阶层里，年轻人终于获得了性解放。^①他还补充说，这样一来，年轻人就可以在与自己年龄相当的女孩那里满足性需求，去窑子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呼吁使用安全套成为证实他的言论的时代标志，这一呼吁占满了各报刊的纸页！

新的建筑

魏玛共和国的各城市也不仅仅都是帝国时期精雕细做或兵营式住宅风格的古老楼房，在某些人看来，这些楼房变成了脏乱差的陋室。起草宪法的人充分意识到，有必要出台一个城市化和居住环境的革新方案。于是这部宪法的第155条指出，国家打算为所有德国人保证健康的居住环境。计划倒是雄心勃勃，但只在施行之初烧了三把火。^②

1923年末德国克服通货膨胀后，开始重建和建设工作的。根据一项社会住房问题的庞大设计方案，一些公众性援助措施、补贴基金、银行贷款被用来鼓励不动产投资，国家有时甚至提供100%的资金援助。市议会手上把提着整个工程，由此避免地产投机和建立新住宅区时的无政府现象。一群建筑学家在各方面控制着工程的顺利进展。

这次与诸如瓦尔特·格罗皮乌斯、恩斯特·麦伊、艾里希·门德尔松、布鲁诺·陶特和马克斯·陶特、密斯·梵·德尔·罗厄、马丁·瓦格纳等建筑学人才的合作效率颇高，在这一情况下，建设方面的努力与技术研究紧密相连。1925年到1928年左右，在经济相对稳定期间，人们对技术上的各种可能

^①转引自奥托·吕勒，《无产阶级文化史与风俗史画报》，第1卷，488~489页。马克斯·霍丹，进步主义医生，为共产主义画报《工人画报》撰稿。

^②关于住房问题和魏玛共和国的政府，见彼得·克里斯蒂安·维特：“通货膨胀、住房统制经济与房租税”，载《居住不定》，冯·路茨·尼塔默尔编，彼得·哈默出版社，乌帕塔尔，1979，385~407页。

性信心百倍。美国模式拥有大量追随者。例如艾里希·门德尔松，他起初是表现主义者，在游历美国后带回一大本纽约、芝加哥和底特律的相册。摩天大楼被赞誉为技术佳绩。由于有了新方法和对某些物资的工业化，总算能构想出解决住房危机的办法了。

与建筑学家中间过去所逐渐发生的事情相反，这次的目的不是建造神奇之作，而是对社会发展能有所帮助。1923年，维也纳市社会党政府在社会住房方面出台了一个政策，该政策成为参考典范。奥托·海斯勒是塞尔市按照这个方向工作的首批人员之一，其工作是根据一项城市规划总体设计，整治出完整的地区。居民岛分布在一块一块的空间里，带有花园，各岛由规模不大的楼房街区构成，像是集体独立小屋。马丁·瓦格纳在柏林、布鲁诺·陶特在马格德堡、威廉·里帕尔恩在科隆、阿道夫·拉丁在斯图加特、恩斯特·麦伊在法兰克福都采用了类似的解决办法。

具体来看，法兰克福的情况比较典型，其特点是预定计划覆盖面广——未能完成——建造成果质量好。例如在柏林，从19世纪末开始，为小职员与工人修建的住宅楼，这些兔笼子，突然出现在周边地区。为了逐渐将住户从中清空，市政府委托恩斯特·麦伊着手实行一个建房规划。

于是从1926年到1928年，法兰克福有近8000套住宅投入第一期修建。它们属于一系列小型住宅楼，带花园，园内有小路。只有被安置于其中的集体设施——几家商铺和学校——能适应需要。实际上，其目的不是在城市外面改造出新城市，而是要通过一个宽大的城市交通网，将新街区与严格意义上的市中心连接起来。在恩斯特·麦伊看来，应该保留城市的统一性，必须形成一个匀称的新居民点。

在这些新楼房里，重新搬进去住的人数不到法兰克福人口的9%。但其经验被作为成功典范而为人例举。1930年6月，当雕刻家阿里施提德·迈洛尔在哈里·凯斯勒伯爵的陪同下参观全城时，他大声说：“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我头一次看到完美的现代建筑。是的，很完美，毫无瑕疵。我要是笔杆子好，就一定会写篇文章。”^①

^①哈里·格拉夫·凯斯勒：《1918年—1937年日记》，625页。阿里施提德·迈洛尔的话是用法语转述的。至于凯斯勒伯爵那边，他在622—623页写道：“在建筑方面，伦敦、还有巴黎都比柏林、汉堡、法兰克福与斯图加特落后至少半个世纪。”



不过，推广这种建筑整体有大一统的危险。正如亨利·比杜在谈到柏林时所写的那样：“建造工作被标准化，因为需要如此。这样一来，大家普遍采用的是平板屋顶，既非趣味使然，亦非时尚使然，而是为了节省建筑空间。其形式完全与实用日的相符。在一个屋顶下集中几百间公寓，两侧衬以花园，在一条林阴大道旁配上街道以为枝叶，将住宅朝向光线充足之处，把厨房洗衣间和公用炉灶安排在中央，为母亲在上班的儿童准备游戏室，所有这些问题——永远都是这些问题——导致其解决办法互相之间一比较而明了清楚，便是逐渐走向公共类型。”^①

建筑家们确实不得不考虑到这些住宅的社会必要性。从1925年到1928年，所有德国城市里的建设热情如此高涨，以至于其革新审美观的意图不费吹灰之力便建立在了其他类型的建筑上：银行，贸易机构，甚至还有工会领导下的人民之家。这是当务之急，而社民党市级政府一般都从这个角度来活动，也就是为大多数德国人提供各应所需的住宅条件。倘若建设工作在德国能按1928年的速度继续下去，这个问题在20年内倒是能够解决。不幸的是，经济危机破坏了所进行的努力，许多本来有机会搬家的人只好放弃新公寓，再次住进租金低廉的老楼里去。让那些带阳台的起居室拉倒吧！让卫生设施和现代厨房拉倒吧！它们的广告还用图纸做依据，吹嘘着那实用家私哩！

日常饮食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人的饮食方式继承了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习惯，又被工业文明一统化，所以它也是如此，根据通货膨胀期、相对稳定期或危机时期等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社会团体，都有所区别。和其他国家一样，德国亦有美食习惯，共和体制并未动摇它。北方德国人只要有可能，就会继续以猪肉、冷牛肉、奶酪和醋渍小黄瓜为主食。普鲁士人则保留了对鹅杂碎和肉糜排的爱好的爱好。至于巴伐利亚人，他们没有放弃腌酸菜猪肉系列菜、牛蹄子、维也纳肉片，而施瓦本人也没省掉面食。德国人的烹饪习俗在餐馆中、在家庭

^①亨利·比杜：《柏林》，格拉塞出版社，巴黎，1936，341页。

里都得到延伸发展：一般都是很多土豆、红菜或白菜、面团丸子、黑面包片以及多个火腿品种。相比之下，柏林、莱比锡或汉堡的工人家庭中的饮食在1923年初和1927年便不一样了。此外，它们与同时期的商贩、高级公务员或企业家家庭中的饮食也无多少相似之处。

汉斯·法拉达在其小说《群狼之狼》里，描画了一幅典型场面，背景是1923年柏林那些简陋的公寓：“人们用发黄的碎纸片在灶上生火，使用那些发出恶臭、或者是火柴头一擦就掉的火柴。潮湿柔软的木头和劣质木炭慢慢吐出火苗。不纯的煤气气喘吁吁地烧着，却怎么也热不起来。牛奶可以溶于水，现出淡蓝色，面包要么太软要么太硬。在屋子温暖的气氛当中，身价倍增的奶油散发出哈喇味道。人们迫不及待地吞咽下淡而无味的口粮，同样，他会急急忙忙穿起漂洗过多次的衣服。”^①

午餐没变化：土豆、鲑鱼、米饭。然而，还是在1923年的柏林，弗里德里希街上的猪肉店里售有大量来自全世界的产品：意大利芦笋、法国蓟、波兰鹅、英国果酱。而这些精制食品里只有极小一部分适合外国游客的口味。换句话说，几乎所有食品都在国内消费。某些德国顾客还是有能力购买的。

在德国全部地区曾对大量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表明，从1919年到1924年，儿童通常早上什么都不吃就上学，既没有热饮料，也没有面包片。他们中间平均有1/4的人处于营养不良的危险状况。甚至是在小康家庭，这些年的一日三餐都十分清淡。汉斯·法拉达在《群狼之狼》中提到了一餐饭，有莱比锡汤、豌豆面糊和极小的猪排骨。^②

1925到1929年间，家家户户的肉食消费量都在上升。但要和同时期的法国与英国比较起来，德国还是处于不利地位。没几个德国人能像法国一户中等家庭那样不为三餐发愁。按照习惯，应该是每天喝两次咖啡，放点麦芽精或菊苣，在吃完一顿热乎乎的荤素菜肴后，早晚各饮一次。晚上吃点抹上猪油、奶酪或夹着猪肉的黑面包片就够了。

自19世纪末以来，大部分城市里都有大商场、餐厅和啤酒酒吧的连锁店。在“阿辛格之家”分店，人们可以站着一扎一扎地喝啤酒，就着一盘腌酸菜

^①汉斯·法拉达：《群狼之狼》，由保罗·让提译成法文，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巴黎，1939，8~9页。

^②汉斯·法拉达：《群狼之狼》，311页。



猪肉或火腿下酒。大家最常去的便是这类餐厅。至于高档餐厅，它们有奇饌佳肴，或者至少是品种更多样、手艺更精巧，但无论是菜还是酒，大多数德国人对那贴出来的价格都不敢问津。

由于公寓条件不舒适，啤酒酒吧或酒屋常常客满为患。可当时在那些地方又能吃到什么呢？阿尔弗莱德·德布林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里有个中心人物弗兰茨·比伯柯普夫，他在那儿让人上猪蹄膀，就着豌豆或四季豆吃，这便是小人物大众的流行菜之一，通常甚至还少一些，就是一盆菜汤，盆底沉着几块肥肉，没有面包，也没有饮料。^①

1929年的危机和失业，使得几百万德国人只好减少本来就算不上丰盛的餐饭食量。于是，面包、猪油、土豆、放在咖啡里的麦芽精、肉多丝牌肉末成了每日饮食的基本品。肉食在大部分家庭里从此每周只出现一到两次。伊尔姆加德·柯伊恩的《身穿人造丝的少女》^②描写了一位年轻女秘书多丽斯的生活经历，她从莱茵省跻身首都而试图征服它。正如该作中所指出的那样，柏林确是星光闪耀，它以其各式酒吧、形如童话宫殿的露天咖啡店、可尽快吃到各色名目洋气的菜肴的自助餐厅和留声机里尖声唱出被人哼烂了的时髦新歌的夜总会，诱惑着人们，令他们迷恋。人们吃的是螯虾或意式沙拉，喝的是波尔多红酒或柯涅亚克白兰地。但在这副面具背后，在这似乎没怎么掺水分的热闹情景背后，饿着肚子，像少女多丽斯那样梦想能吃上一盘萝卜牛腿排，再加点苹果丁的，又有多少人呢？

传统服装与国际时尚

和当时许多巴黎都市少女一样，多丽斯宁愿节省口食，以便给自己买一顶最新的时髦帽子，一种深绿色羽帽。因为她觉得，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孩子来说，一套行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于是伊尔姆加德·柯伊恩赋予她达到目的的醉心渴望，即使并不总用诚实手段，也要弄到奢侈的化妆品。她

^① 参见雅克·德库尔：《腓力斯人之城》，86页，他的客栈女房东给他上的午餐菜谱：“我尽量去吃那餐饭，包括汤、葷菜杂烩、水煮土豆、红越橘和巧克力果冻……”

^② 伊尔姆加德·柯伊恩：《身穿人造丝的少女》，多米尼克·沃特朗译，巴朗出版社，巴黎，1982。



1925年的德国模特。

穿着一件橙红色连衣裙，缀有花点，戴一双鹿皮手套，一件偷来的毛皮大衣，一双蜥蜴皮皮鞋。靠着一位萍水相逢的情人相助，她达到梦想的顶峰：身穿经洗的巴黎造绉丝衬衣，上面有手工刺绣的花纹，睡衣是真丝的，鞋是真鸵鸟皮的，手提包是鳄鱼皮的。

从这个角度看，柏林只不过是追随国际时尚。适用于女顾客的衣服和奢侈品与巴黎、伦敦或纽约的没多大区别。时尚报纸以及发行量大的杂志，还有电影，都致力于描画一个国际类型的风雅少女。健美身材与短发被推广开来。1931年，广告图片很敏感地宣传德法两国相

同的女性形象：帽子斜戴一边，上衣紧贴，在腰胯处轻垂下来，身着长裙或齐至膝盖的短裙，脚穿高跟鞋。^①

但柏林在德国几乎可算是个特例，正因为这样，它才吸引了如此多的外省少女！在其他地区，衣着更多样又更正规。制衣业被工业化；在城市里，人们习惯于在大商场里购买工作服，就像购买休闲服和节日礼服一样。

工人在工作之余穿短衣，戴帽子。或者更像无产者一点，戴鸭舌帽，穿皮上衣。公务员和职员从那件罗登厚呢大衣可以辨认出来。通常，这些人手里都拿着公文包，早上，里面装着面包片和一瓶台尔莫斯热奶当快餐吃。军人、警察，而且还有邮递员，铁路职员，甚至是牧师穿着旧式黑礼服，各自都有一套制服。除了特殊场合外，职业界昔日的传统特定服饰已不再穿用。只有几个行会里的手工艺人，比如说木匠行会，还在继续穿它。

相反，农村一些小地方的人保留了地方服饰。男式的有皮短裤和各式各样的帽子，偶尔还有鹅绒马甲。女式的有绣花短上衣，花边短裙，带环饰的

^①例如可见迪特尔·施特劳斯所复制的相册照片：《这便是1931年》，海纳出版社，慕尼黑，1980。



鞋，丝绸披肩，彩色饰边围裙。除了极少数像巴伐利亚、法兰克福或施瓦本这样的地区只在纪念性或节庆性场合下才能见到此类服饰外，如此多的特色却在年轻人中间逐渐消失。

20年代末的服装一致现象尤其影响到了大多数妇女。有了机械制造，她们已不怎么做衣服了。街道上，数千妇女穿着一样的裙子，一样的大衣，戴着一样的帽子走来走去。为了能卖到最便宜的价钱，制造商们限制了款式的多样性。因为他们的顾客牺牲风雅与独特，所寻求的是价钱最低廉的衣服。^①



20年代德国的时装。

在大部分家庭的花销里，穿衣占最末一位。与住、食一样，它最终表现出德国人口中90%的人财政能力不足。在一个雄心勃勃的少女看来——伊尔姆加德·柯伊恩笔下那位小打字员就是这么想的——穿着肯定是重要的事情。可在其他人看来呢？保证能有餐桌和住宅难道不是更为优先的吗？而且这也正是多丽斯从自己的教训中所懂得的东西，要憧憬的是一种简单、安全的生活，而非在自己的美貌上下赌注。

^①参见让·德·格朗维利耶：《我刚刚见过的德国》，90-98页，尤见96页：“成批生产的衣服从未如此流行过。形式上是这个样子，颜色上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不得不考虑在穿着上花点钱的话，人们便特意选择深暗色调。最后，布料也是如此，它们从总体上说质量都平平。同样还可以说鞋、帽——这些标志对于法国女人来说意味深长——而丝袜又是个特例，亮色丝袜更复如此，它在我们那儿沦为大众阶层选择的对象。”



第八章 休闲与娱乐

1928年，法兰克福有3000名观众在节日大厅里观看了一场野蛮的体育比赛：国际马拉松舞蹈。^①在这两周期间，二十余对被选拔出来的舞者必须不停地跳舞，每小时只有15分钟暂停。这短暂的间歇可让他们得以休息，在远离舞池的两座帐篷内度过。外面，音乐仍在继续，而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则用麦克风让兴奋不已的观众耐心等待。舞蹈者们得一直转到头昏眼花。最后一对累垮的便被宣布为胜利者。

这奇怪的场景，耗时不可谓不长，且单调无聊，但大厅内却并未走空。里面不断传出叫喊、口哨、喝彩之声，就像是在举行自行车比赛或拳击赛一样。观看者没有上层社会的人，这是为大众举行的一场游戏，一种娱乐，由一个特殊企业罗斯娱乐公司设立组织。罗斯娱乐公司，是家美国公司吗？反正名字看起来是，其方法也是。

爵士乐节奏与休闲美国化

1924年以来，美国在德国非常时髦。直到1929年，美国人一直都在德国经济中投资信贷，这只不过是部分原因，从更深的层次看，美国象征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大部分德国人看来，该象征有其神秘方面。他们找到了一个真实的国家，能让他们得以在想象中逃离自己的国家及其灰暗的日常生

^①该例子转引自恩斯特·布洛赫：《时代遗产》，苏尔坎普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3，46~49页，“可气又可笑”（该书1935年先由奥普莱希特与海尔布林出版社在苏黎世出版，由让·拉科斯特译成法文，帕约出版社，巴黎，1978，译本题为《这个时代的遗产》）。

活。这是高速汽车之国，宏伟建筑之国，爵士音乐之国，是有着各类技术与体育业绩的国度。

魏玛共和国时期获得最大成功的德国歌剧，于1927年在莱比锡首演，后演出了五十余场的恩斯特·克雷内克的《琼尼开演》，^①恰恰就体现了美国的所有这些形象，在这部歌剧中，黑人音乐家琼尼体现的正是新美国。他与另两个人物——一个作曲家和一个小提琴手——相对立，他们象征着疲劳不堪、穷途末路的欧洲。一个最后被火车轧死，另一个去了美国。琼尼敢作敢为，冲破所有禁忌，是赢家，是未来之人，他说：“世上凡善良之事都在我分内。这些善良之事是由旧世界产生的，但旧世界忘了该拿这些事怎么办……”作品的结局是他获得成功。合唱队唱道：“旧时代的丧钟已敲响，新时代正在开放！莫忘书信常来往，您将深入陌生的自由之乡。”

从恩斯特·克雷内克本人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可知，他从当代生活中借鉴选取了一个主题，以至于《琼尼开演》最后一幕在火车站展开，开辟了一种歌剧类型，后来战胜了其竞争对手。他声称他是根据时代的焦虑来谱曲的。这个时代不能仅仅只用时事主题来表达，而且要用颤抖、喘息、切分音、不协和音来表达。正因为如此，他通过音乐，而不是用歌颂或讽刺，努力将滑稽小调、时事讽刺剧、轻歌剧、爵士乐、时尚舞蹈等各种风格混杂在一起。

音响材料反映出新的现实，不协调的现实。美国，通过其主人公琼尼，为古老的欧洲预示着这一现实。电话铃声、汽车喇叭声、电报嗡鸣声、火车呼啸声，所有这些由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声音被融入到狐步舞、查尔斯顿舞、西迷舞、布鲁斯舞的舞曲之中。要将杂乱无章的因素集中起来，使之两相结合，并时常作为主调浮现出来，那便是爵士乐！舞台边演奏的乐队由两个萨克斯风、几支小号、一个木琴、一副架子鼓、一个风琴、一架钢琴组成。

美国文化就是爵士乐，德国人自战后就已知道，但却是通过当时欧洲流行舞蹈认识的，即西迷舞和拉格泰姆舞。他们只是在1925年，由于诸如山姆·伍丁和丢克·爱灵顿等黑人乐队的巡回演出才真正发现这一音乐形式。一些德国乐队也开始演奏被他们称作爵士乐的音乐——主要是查尔斯顿舞曲片段。

^① 参见恩斯特·克雷内克：“简论我的歌剧《琼尼开演》”，载《戏剧》杂志，1927年10月2日，474~476页。该文被曼弗雷德·佛伊格茨在《论布莱希特一百文》中转载，威廉·芬克出版社，慕尼黑，1980。



当约瑟芬·贝克尔于1926年在柏林登台演出,跳了这同样的查尔斯顿舞时,她毫不困难地激起了人们兴奋之情。

1918年,斯特拉文斯基作了一个“十一乐器奏拉格泰姆舞曲”,1919年,阿尔图尔·鲁宾斯坦作了“拉格音乐钢琴曲”。在法国,艾里克·萨蒂、达琉斯·米洛、乔治·沃利克、让·维奈尔也都很早就对爵士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声望颇高的作曲家那里,这一兴趣较晚才出现。它只是从1924年开始美国时尚胜利前进时才表现出来。于是他们中某些人将爵士乐节奏融入到几段曲子中去。除了恩斯特·克雷内克及其《琼尼开演》以外,再就是库尔特·威尔1928年以及《四毛钱歌剧》的例子了,用布莱希特的话说,这是当时音乐方面的又一次巨大成功。

美国天堂的神话在1929年崩溃了,爵士乐几乎同时亦变得不再新鲜。不安全感使人们再也不能憧憬一个由技术所解放的世界放眼未来了,而更多地是逐渐回过头来惜古怀旧,感叹曾经历过的事情。美丽的维也纳华尔兹重新回到舞台之上。美国生活方式完结了,它在德国百姓中间所助长的幻想完结了。

美国天堂的神话在1929年崩溃了,爵士乐几乎同时亦变得不再新鲜。不安全感使人们再也不能憧憬一个由技术所解放的世界放眼未来了,而更多地是逐渐回过头来惜古怀旧,感叹曾经历过的事情。美丽的维也纳华尔兹重新回到舞台之上。美国生活方式完结了,它在德国百姓中间所助长的幻想完结了。

1928年罗斯娱乐公司在法兰克福组织的这个国际马拉松舞蹈显示出美国所产生的吸引力,但通过由一个影戏企业策划的这种活动,也表现出另外一个现象:大众娱乐活动的美国化。在大城市里,对于居民们来说必须有休息的时间和场所。于是面对这样的潜在顾客,负责其娱乐需要的商业公司便应运而生。

无论是哪一个社会阶层,能专门用来休闲的时间并不多。然而,从总体上说,工作时间比起帝国时期来有所减少,而且一些社会法对此也做了规范。



爱灵顿(中立者)和他的爵士乐队。

此外，中等阶层的比例上升了。那么对这成群的职员、公务员、技师能提供些什么呢？当根据经济合理化这一尝试而在办公室或工厂里机械地完成该进行的活动后，到晚上或周末，他们就没多少精力从事要求集中脑力来做的事了。应该给他们提供有效的排遣机会，提供一种能让他们从身体上和精神上忘记每日烦恼的机会。从钱这方面说，正像所有商业企业一样，如果也瞄准最佳收益，那一定有利可图。于是便有了能与工厂劳动合理化相媲美的娱乐的合理化，操控在一些商人手中的大众娱乐工业被引入德国。

人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办或修复了一些巨大的厅室，用来尽可能多地容纳顾客。如果有机会，也有必要组织一些艺术家进行巡回演出，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演出相同节目。至于外国艺术家，一般也采取这个制度。对于获得成功的歌剧和轻歌剧大多亦是如此。这样一种制度能助长被编排的像精密机器一样的节目，连最小的细节也被研究琢磨，以便达到最佳效果。让大家高兴，可不是说要发其深省，而是去引诱他，用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技术资源去让他欣喜若狂。

综艺性场所

战争一结束——不过主要是在1924到1929年间——根据这些原则，德国几乎到处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综艺”节目性质的专门机构。第一家此类机构于1918年12月在科隆一家旧旅店开办。一年后，另一家在汉堡成立。1920年11月，这次是在柏林，儒勒·马克斯将一家旧溜冰场改装建立成阶梯大厅，其中一间厅里有2500个座位，这个柏林式阶梯大厅很快便出了名。1930年，有300多家“综艺”性场所在运转，分布在一百来座城市里，虽然并不具有阶梯大厅那样的规模。^①

儒勒·马克斯是一代之典型，他在娱乐活动中发现了一个商业市场。此人祖居英国，原为银行家，后来一心扑到艺术的金钱交易上。他很符合现代经纪人的形象，在商业界留有许多关系，凭着这些关系，他试图在不同城市

^①见恩斯特·君特尔：《综艺史》，汉舍尔出版社，柏林，1978。



中为自己确立一系列“综艺”大厅的垄断地位。1929年，他在柏林拥有了另外一个娱乐厅，即广场大厅，座落在一个原货运火车站里。

在慕尼黑，有个与他类似的人物在“综艺”界一统天下：汉斯·格鲁斯。他拥有德国剧院，在那里上演轻歌剧和流行的百老汇音乐喜剧，而且有时还请一些美国明星来。他还有一家夜总会，糖盒夜总会。在慕尼黑郊区施塔恩堡，有一处建有体育设施的运动场地。小说《成功》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里翁·福伊希特万格以普方德勒尔的名义，把他描写成一个聪明的商人，说他在慕尼黑以外的一座城市也许会获得更大的成功。但他是巴伐利亚人，出生在这个城市，他想通过其娱乐事业，让它具有维也纳和柏林般的光辉。

公众在这些“综艺”场所里又有何感觉呢？歌曲、小品、滑稽独角戏，更主要的是，有穿得不多的舞女，她们在宽大的舞台上按着有节奏的音乐声向前走。它们之所以成功靠的是布景豪华阔绰，服装珠光宝气，女人身材匀称，动作优美和谐。为了能达到难得的迷狂，演给眼睛看的比唱给耳朵听的重要得多，一两百名舞女和伴舞者在台上跳着，演出一场接一场，一个晚上竟能演到五十余场。

这些节目和表演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属于人们称为音乐厅的那类事物。在柏林，早在世纪初，“都市剧院”就被一些差不多是同类型的大场面时事讽刺剧捧出了名。1903年到1914年间，这些讽刺剧在全德国都占有重要位置，平均每年能演300场。巴黎以其“疯狂牧羊女”和“红磨坊”给人做出了榜样。这些轻浮形式的娱乐活动的飞速发展在战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只不过其风格被改成日常趣味了而已。舞女们并未拒绝跳法国康康舞。但自那以后，这种舞要么是来自美国的，要么是根据美国方法编的，而腿上的动作则按照爵士乐曲子来跳，真是充满了异国风情。在剧团里，黑人少女的身影竟也非鲜见！

德国人最喜欢的一个剧团是梯勒尔少女剧团。约翰·梯勒尔原是英国军队的中士，他在其军旅生涯中发现了自己的使命，他被团队式训练给诱惑住了。一有可能，他便集中起几个女孩儿，教她们一起按节奏协调地跳一些简单动作。他的意图是培养舞台上的士兵，能像钟摆那样机械地移动。战后，他终于让他的学生们具有了国际声誉。他在英国成立了一个学院，招收巴黎、纽

约、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伦敦的舞女，然后她们分散到世界各地，成为20个剧团。1924年，其中的两个在柏林大获成功：一个是在海尔曼·哈勒尔的演出《还要还要》里；另一个是在《给大家！》里，是艾里克·夏莱尔，还有克莱尔·瓦尔多夫和威廉·本多夫的演出。

轻歌剧与时事讽刺剧

时事讽刺剧节目实际上夺去了轻歌剧的优势地位。轻歌剧首先由奥芬巴赫在巴黎上演，后来在维也纳风行一时，那里的上流社会以效仿巴黎精神为荣，轻歌剧便在德国完全扎下根来。在柏林，它最终以非常特殊的形式出现，而且受到了19世纪轻浮音乐与消遣音乐的影响。这种音乐有讽刺性、责难性而又有风趣，它以翻来覆去唱个不停的节奏、多种多样的歌词，被用在柏林底层百姓的生活当中。在很多后院里，1910年左右人们所哼唱的曲子来自于保罗·林克所谱的轻歌剧，他在领导过阿波罗剧院后，担任了都市剧院的乐队指挥。稍后一点，这些曲子被调子更富郊区风格的歌曲所取代——由海尔曼·弗莱为瓦尔特·柯罗的轻歌剧所写——即被让·吉尔伯特的轻歌剧片段所替代，节奏更明快，也更美国化了。奥地利人弗兰茨·雷阿尔自从1905年作了“快乐寡妇”一曲以来，在国际上获得成功，这一成功同样得到德国公众的认可。人们对他的热爱虽然有所减弱，但在战后再次升温，当时他定居于柏林，专心谱写其音乐传记，如1924年的《帕噶尼尼》和1928年的《弗蕾德丽克》，描写歌德对少女弗蕾德丽克·布里翁的爱情。而且，维也纳传统轻歌剧在德国远未失去其所有热爱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的人。在演唱弗兰茨·雷阿尔作品的人里，最受热烈欢迎的都是奥地利籍：男高音里查尔·陶伯尔和喜剧演员马克斯·帕伦堡的妻子、以优雅闻名的弗丽齐·马萨里。同样，最近几个成功的轻歌剧作曲家有作《白马客栈》的拉尔夫·贝纳茨基，以及作《维多利亚及其轻骑兵》的保罗·亚伯拉罕，这些人原为前奥匈帝国的人。

按拉尔夫·贝纳茨基的想法，公众感觉到需要一种现代歌剧所无法再提供的旋律，于是他们又回到轻歌剧来弥补这种缺憾。但对于轻歌剧来说，不幸的是，收音机的发展很快就能播送适应轻音乐爱好者口味的节目了。弗兰



茨·雷阿尔自己便愿意改编其曲作，一开始就完全为场景构思，目的是供无线电广播使用。从1927年开始，德国听众感觉到最有吸引力的正是这种音乐改编作品。

对于轻歌剧来说，另一个劣势为：无论是在主题方面还是在场景与旋律构造方面，时事讽刺剧能提供更丰富的多样性。艾尔文·皮斯卡托1924年曾用过这一形式，在立法选举时把它作为支持共产党的一种政治鼓动手段，他坚持这方面活动，并很确切地证明了他的选择：“时事讽刺剧不用进行任何统一行动，它在所有能与一般戏剧产生关系的范围内获取效率，在其结构里，它不为任何联系所束缚，同时它还具有某种极其率真的性质，以直接方式来表演节目。”

时事讽刺剧节目显然对各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在艾里克·夏莱尔看来——他自己就同时是舞蹈家、哑剧演员、编舞、歌剧剧本作者、导演——这里所需要的艺术性、技巧和精细度一点也不比戏剧少。他喜欢人们把他叫做品味高雅的魔术师。按流行女歌手克莱尔·瓦尔多夫的说法，他总是努力在表演中尽量找最好的艺人和最好听的音乐。海尔曼·哈勒尔在里德阿穆斯与威利·沃尔夫的帮助下，为一幅音乐插图提供了一些歌词，这些歌词也不比他自己的高明，但他在导演时不够严格。至于时事讽刺剧的第三号人物詹姆斯·克莱恩，他则更需要漂亮女孩，而非优秀的作曲、作词之人。其实他是裸体剧的行家，其在柏林喜剧—歌剧院的作品的题目就很清楚：1923年的《没有面纱的世界》，1926年的《无衣柏林》，1927年的《世人之原罪》，1928年的《你快脱吧！》与《爱之屋》。

这些裸体剧并未在柏林，而是在其他地方流传开来了。亚历山大·施腾伯克—费尔默尔讲述说，在汉堡的阿尔卡扎尔，晚会的压轴戏就是看着舞道地板机械地沉落下去，然后底层升上来，在那个底层上，有一个玻璃水盆和一座高台，高台直到天花板都是千灯照耀。于是先有头探出来，并且四处洒水，接着出现一些像夏娃一样只遮下身的少女，或者几乎只穿这么点。

夜总会时尚

鲁道夫·内尔森来自于都市剧院，是他将时事讽刺剧节目从音乐大厅引

入夜总会的。在柏林，从莫愁咖啡厅到伊甸旅店蓝厅夜总会，他杂七杂八地制作了三十余部小品、相声、舞蹈与歌曲。他于1904年与谣曲艺人保罗·施耐德-敦克尔一起开办波茨坦街夜总会以及柏林罗朗夜总会——这是首都人气最旺的夜总会——时，创立了这类大杂烩形式。1907年，他与合作者分手，在黑猫夜总会继续其营生，该夜总会的名字原为蒙马特尔的罗道尔夫·萨利夜总会所有，坐落于连接弗里德里希街与菩提下路的通道上。这位钢琴家与作曲家要通过音乐来寻求轻浮的情感，其主要作词者是弗里茨·格吕恩鲍姆，此人在爱情这个永恒主题中找到灵感，涵义丰富。战后不久，他有一首非常成功的歌这样唱道：“如果我们相爱，/那该多节省炭柴！/夜晚六点三十起，/我会让你的生命热腾起来……”但在他这种类型里，鲁道夫·内尔森的音乐才华世所罕有，他还很善于说服名声卓著的作家与他一起干。库尔特·图柯尔斯基便是其中之一，此人为他的歌写了许多歌词，尤其是1921年的时事讽刺剧《请付钱！》和1922年的《头朝后站着》。

还有一位显要人物弗里德里希·荷兰德尔，他比鲁道夫·内尔森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作曲家曾上过很好的学校，因为他的父亲，音乐家维克托·荷兰德尔，他在1914年以前几乎是沉迷于柏林都市剧院的节目。弗里德里希于1918年开始其职业生涯，为艾尔瑟·拉斯克尔-许勒、格奥尔格·恺撒、恩斯特·托勒尔的表现主义戏剧作品谱了一些场景音乐。1919年后，他来到夜总会，加入“音烟”小组，这是马克斯·莱茵哈特在同样的口号招牌之下呼吁复兴重建的，1901年，该小组首次改头换面，由鲁道夫·库尔茨领导——此人便是后来卓越的表现主义电影史学家，接着他到了狂妄夜总会。1931年，还是在柏林，他创立了自己的综艺性场所，琴绰音剧院（Tsin-Tsoin-Théâtre）^①，这个名字一般就缩写成三个字母：T.T.T.，让人想到了著名的杀虫剂D.D.T.。这个T.T.T.差不多把什么体裁都混杂在一起，既属于音乐咖啡厅、音乐厅，也属于文学夜总会，有歌曲、小品、讽刺性活报剧。

弗里德里希·荷兰德尔为一些歌写过曲子，在左翼阶层最著名的曲子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把瓦尔特·梅林、克拉本特、库尔特·图柯尔斯基等人的

^①杂耍剧院的意译。“Tingeltangel”的意思是“低级场所”、“有音乐表演的低级咖啡馆”。



诗都谱上了曲。正是因为他的《红色旋律》，图柯尔斯基获得了巨大成功，于1922年由罗莎·瓦雷蒂在火箭夜总会演奏：“一生独自一人，/这可不是原来的诺言。/我儿子在俄国人那边。/有人在高处拉他上了船/还不如畜生猪犬，/为了上前线——坐在公共汽车里面……”重唱部分则喊道：“将军啊，将军啊！你已经冒了不少险！还有死人在喊！红军啊，想想吧！小心点！小心点！/听那沉重的合唱声越来越响彻天……”

这首《红色旋律》的反战歌词被当做是一位在一战时失去儿子的妇女对鲁登道夫将军说的。库尔特·图柯尔斯基想痛斥按照命令，只因为一个永远志得意满的参谋长心血来潮而无谓屠杀上百万普通士兵的行为。弗里德里希·荷兰德尔于1933年移居美国，此歌导致他被美国反间谍部门怀疑为危险的革命者！但对他来说幸运的是，这并未阻止他的音乐引起好莱坞电影制片人的兴趣。他的另一首歌《我就是那活泼的罗拉》由玛琳·迪特里希在电影《蓝色天使》中演奏，此事千真万确，该片几乎在全世界进行了巡回放映，足以证明他的才能……

最后，还有一位作者马塞勒斯·席费尔，当时在夜总会中流行的时事讽刺剧中的某些节目便出自他的手，此人于1932年自杀。此外，席费尔偶尔还与弗里德里希·荷兰德尔合作。他尤其以词作者出名，其轻歌剧脚本甚至是歌剧脚本也很著名，因为其中有两部曾在柏林上演，即1927年的《往返》和1929年的《从新鲜事物到现实焦点》，由保罗·辛德密特谱曲。正如戏剧评论家赫尔伯特·伊厄灵所写的那样，1926年，他展示了柏林当时演出季节最讨人喜欢的消遣节目：《苦读》。这是一出音乐剧，把一本有点时髦的杂志中所能读，能看的全都滑稽地仿唱出来。玛丽·维格曼起先跳的是新潮舞蹈，



魏玛明星玛琳·迪特里希。

后被同化成弗里德里希·雅恩——此人在德国19世纪初是“健美舞之父”——式舞蹈了。人们还蜂拥而至观看卡尔·簇克迈尔剧作的演出，即《快乐的葡萄》，后来变成了《忧郁的葡萄》。

玛尔戈·里翁当时是马塞勒斯·席费尔的妻子，作为“苦读”女，为了赶上时代品味，她殚精竭虑地去了解所有必须知道的东西！她用阿兰·格莱的一个曲子唱道：“从前有位太太/吃不爱来喝也不爱，/因为她与众不同啊，这位太太，/她什么杂志都看嘞！/从笑话到图片，到小说连载，/到广告，她精挑细摘！/这事没法说明白，/因为这事本来就说不明白……”^①

德国的夜总会，并不仅仅是这些为了小型场景便给人以时事讽刺剧与音乐喜剧的印象而经过加工的节目。从世纪初起，它也继承了蒙马特尔夜总会的一些东西。于是人们在那里唱着讽刺性、社会性、政治性的歌曲，人们在那里朗诵诗句。老巴伐利亚省的顾客们像在柏林一样在那里跳舞，这也不是稀罕事儿了。那里有吸引人的节目上演，如小丑和魔术节目。这样在整个德国，在性质上多种多样的场所有150家，光柏林就有40来家。它们中许多场所质量低劣。然而比起法国来，德国夜总会的创新之处在于拥有一群作家人才，把它形诸文字。

有位诗人叫克拉本特，他欣赏弗朗索瓦·维庸和弗兰克·维德金特，留下了数百篇歌词，由当时的歌星布兰丁纳·艾宾格尔、安娜玛丽·哈塞、约斯玛·塞里姆成功地进行了演唱。其灵感所得之主题来自于底层民众的庸俗生活。他有机会的时候便使用柏林方言。当他谈到战争、帝国或普鲁士主义，谈到他所讨厌的东西的时候，语气就带上了嘲弄色彩。而当他谈到爱情、勾魂摄魄的或者为己倾倒的少女时，就带上了如愿已偿的情感色彩！

另一位几乎只为夜总会效力、投身于歌曲创作的诗人是瓦尔特·梅林。他给他们带来了达达主义这种有腐蚀性、除垢性的小玩意。其实，1919年他在柏林参加了达达主义活动。他还记得狂热分子约翰内斯·巴德尔——他给自己取名叫“超达达”——那具有挑战性的宣言：“滑稽理性的胜利便是达达……达达就是世界夜总会，正好像世界就是达达夜总会一样……”他写的

^①此引所有歌曲均见海尔伽·贝曼的歌集《总在广告柱周围转转》，亨舍尔出版社，柏林，1975。



歌词总是节奏分明、抑扬顿挫、紧张激烈，如同爵士乐。保罗·格莱茨一般都演唱他的歌，他将这方面的狂热推向了极端，自己却险些落入精神危机之中。作为行家里手，瓦尔特·梅林在其叙事曲里熟练地对宗教歌曲进行滑稽模仿，玩弄着方言或意第绪语的说法，玩弄着酒吧行话，其中的主人公要么是流氓，要么是冒险家，用各种庸俗方式来讲述他们自认为了解的世界。

库尔特·图柯尔斯基由于在左翼知识分子的柏林周刊《世界舞台》^①主持专栏，于是与因一时兴趣干起来的新闻工作断绝了关系，在他看来，写歌词或小品既是一种游戏，也是一种与被他看做时代之愚蠢行为的事物作斗争的方式。反讽——有时是挖苦——在夜总会看台上比在孤独的阅览室里更为有效。军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伪善、披着羊皮的共和主义，这些更能在一天接一天所唱的歌词中被加以严厉打击，而非出现在人们浏览一遍便很快忘却的文章里。

艾里希·凯斯特纳也是反军国主义者。在因著儿童书籍而驰名之前，这位《爱米尔与众侦探》的作者曾很滑稽地模仿了歌德《威廉主人》中的米尼翁行歌，著名的诗句“你是否认识那开满柠檬的地方”被改成了“你是否认识那开满炮筒的地方”！他有许多诗，尤其是专门写来当众朗诵的诗都被谱上了曲子，这些诗作在30年代初是高级夜总会中的保留节目。他对现代生活的活力、技术、办公室中那小小的天地十分敏感，其作品在中等阶层里非常流行。他以反讽为能事，很灵巧地呆在中间色调里。他给人的印象是在用幸灾乐祸式的怀疑主义、听天由命式的幻灭态度来看世界，这是与危机氛围相当协调一致的眼光。

这些作家和其他许多人所参与合作的夜总会大部分都位于柏林。它们的名字有音烟夜总会、狂妄夜总会、野景夜总会、拉里发里夜总会、笑景夜总会、滑稽夜总会或称卡得柯夜总会、胡蜂夜总会、地下墓穴夜总会。别的很多夜总会都是贸易优先，晚会上一股脑放出成队的裸体少女，按照一瓶瓶低

^①这份杂志延伸了《剧院看台》，主要是谈论戏剧。《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这个名字是在1918年初起的。西格弗里特·雅科布索恩领导该杂志，直到他1926年去世。那时他的朋友库尔特·图柯尔斯基对杂志方向的影响非常大。后来，到那时一直任主编的卡尔·冯·奥斯茨基升为社长，而他则与图柯尔斯基关系不太融洽。关于这份《世界舞台》周刊——被看做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刊物——的更多细节问题，见后面的第9章。

劣香槟代用品的售卖节奏表演，而上面这些夜总会则与它们不同，声称表现的是一种——就算把它们说得差一点——并不次于文学和艺术的类型。从这家夜总会到另一家夜总会，大家都精心地在幽默、反讽、嘲弄等方面进行竞争，这是时代精神的最好体现。

但在1929年的危机之后，确切说，时代还能适应这些以资产阶级为主的大众为了自我取笑而趋之若鹜的智力娱乐吗？1929年10月开办于怡目街一处酒窖的地下墓穴夜总会成员中便爆发了冲突，该冲突正是由这种令某些参加者忧心忡忡的问题面引发的。此家夜总会的主持人，汉斯·戴普和维尔纳·芬克，很快成为柏林的著名人物。在作曲家汉斯·爱斯勒的钢琴伴奏下，昔日的锁匠恩斯特·布适在这里演唱社会性和政治性歌曲。1930年12月，他们两人都认为——汉斯·戴普也持此观点——在关于法西斯的危险这一问题上，他们已无能为力，无法让资产阶级顾客发笑了，而这些顾客后来又都回到与以前一模一样的活动中去了。

以维尔纳·芬克为首，地下墓穴夜总会乘势追击。在指桑骂槐、含沙射影、与观众于双关隐语中会心一笑的艺术中，人们都唯他马首是瞻。战后，他承认他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态度最终给自己带来的坏处比好处多。他后来为自己和从事滑稽表演的同伴辩护说，我们低估了希特勒，在反对棕色袖章时我们过于懒散。在此期间，他的夜总会已被关闭。1935年，他在一处集中营待了六星期。在六年时光里，他变得寡言少语。^①

恩斯特·布适与汉斯·爱斯勒所选择的道路，以及许多像贝尔特·布莱希特、沃尔夫冈·朗戈霍夫、汉斯·奥托、艾尔文·皮斯卡托、马克西姆·瓦伦丁、古斯塔夫·冯·万根海姆这样的戏剧人所选择的道路，使得他们将时事讽刺剧与夜总会的技巧整合起来，投入到反右翼政策和法西斯的斗争中去。其中尤其是恩斯特·布适，他以其《钢印之歌》——唱的是几百万无业者时常得到失业办公室去在证件上盖钢印——而家喻户晓。一些剧院集体跑遍全

^①参见维尔纳·芬克：《昔日小丑今何在（我那个时代的历史）》，海尔比希出版社，慕尼黑，1972，D.T.V.袖珍版本，1975，56页。芬克被关进艾斯特威根集中营。不久他被释放，接着便参加了战争。1948年，他在斯图加特重操“夜总会业主”的活动。尤见让-米歇尔·帕尔米耶：《柏林安魂曲》，加利利出版社，巴黎，1976，38~45页，以及同一作者著的《表现主义与艺术》，帕约出版社，巴黎，1979年，第1卷，146~153页。



德国，把共产党的良言带到各地。他们由专业人员和——这是在战斗的同时来休闲的办法——许多业余人员构成。就像1931年被剧团搬上舞台的古斯塔夫·冯·万根海姆的《卜测地下水的女人》一样，他们的鼓动和宣传工作——或者最好用一个专门词汇来说，就是宣传鼓动剧——经常把歌曲、小品和幕间喜剧杂糅在一起。他们与大厅和传统观众断绝联系，而是在群众活动、政治会议，或者干脆就在街上进行露天演出。

在柏林的夜总会舞台上，一些头面人物也没忘记通过更为奇特的行径来让人们惊愕。例如有瓦莱斯卡·格尔特现编现演的舞蹈节目：她既模仿马戏，也模仿体育运动，勾人子弟，青楼卖笑，垂死挣扎。或者再如一个奇怪人物，他总一成不变地穿一件水手服，朗诵诗歌，朗诵自己写的诗作，手势动作非常有力，他就是约阿西姆·林格尔纳茨。当他于世纪初离开出生地萨克森省后，几乎什么行业都从事过。他曾当过图书馆员、会计、一家烟草局的主管。最后，还当过海军少尉！他的库特尔·达德尔杜水兵叙事曲通过一种假装出来的天真，并且为了最终成为神奇童话，便将反讽与忧伤、荒诞与黑色幽默都混合在一起。

然而最受大众好评的滑稽艺术家并不表演歌曲、舞蹈或朗诵诗歌。他们更接近于马戏天地和过去在赶集时表演的传统节目。艾里希·卡洛夫在柏林笑景夜总会演出时，身穿一条皮围裙，里面是一件过长的上衣，一条满是褶子的裤子。他使用所有小丑所能用的手段：扇耳光、摔跟头、跌碗碟，他手拿一块手绢以便擦汗，模仿着街头众生的喜与悲。在同一行列中，还有卡尔·瓦伦丁，他在柏林名气要小得多，只在战后表演过几个节目，拍过一些电影，但在其出生地巴伐利亚省则极受欢迎。他被布莱希特形容为形而上学小丑，还被他拿来和查理·卓别林相比。世纪初，他从一个镇走到另一个镇，用一件自己发明的乐器演奏。后来，从1911年开始，他面定与一位伙伴合作，此人算是他的一个小丑：李斯尔·卡尔施塔特。他身材瘦削，态度傲慢，微见驼背，面色苍白，鼻长面尖，像大部分小丑一样神色凄苦，一副病容。他和剧团在慕尼黑各酒吧里用方言所演出的滑稽小品总让人想到集市上的售货棚，在那里他感到真是适得其所。

一种群众性娱乐活动：电影

这些杂技、集市、游艺会等民间节目通常起源于数个世纪以前，而今在德国国内、在外省仍都保持着生命力。在慕尼黑，1919年10月，人们重新举办啤酒节。每年一到该节便人至如潮，成千游人被集市商铺吸引着赶到此处。军乐声、吆喝驯马声或者是流动剧团的吹拉弹唱声淹没全城。莱茵省的狂欢节，还有葡萄酒节也被保留了下来。而当巡游马戏团的队列散布于街头巷尾时，同样能吸引大量看热闹的人。在很多地方，这可是件大事，以至于学校的孩子们能被特许放一个下午的假。

但是，一种新的娱乐方式逐渐把这些传统消遣活动和所有可供选择的休息方式远远甩在了身后，那就是电影。1919年，德国只有约2800家电影院，10年后，它便有了5200家。它们不仅仅分布在大城市里，而且还有50%到60%分布在中小型居民区中。1919年，电影院可容纳的座位数是每1000个居民有12个，10年后是每1000个居民有30个。同一时期，法国每1000个居民只拥有大约20个座位。^①

投资建设电影院的德国商人满脑子胡思乱想的都是光辉强盛，坚信电影注定会成为了不起的群众娱乐活动，并将杀死其他所有节目形式。1920年，仅柏林就有300家电影院，其中有20家超大型电影院。在法兰克福，舒曼马戏团被改成了一家拥有5000个座位的电影院。在汉堡，有7家电影院各自拥有1500到2000个座位。与1931年进行比较的统计数字都显示出，环球电影股份公司（乌发公司）出产的电影占德国国产电影的一半，而且它还拥有100家电影院，总容量为15万个座位。在柏林，尤其是因为有了建筑师汉斯·颇尔齐希所建造的卡皮托利山电影院，乌发公司的这些电影院便像是一座座宫殿一般。^②

对于大量市民，尤其是中等阶层的市民来说，看电影成了理想的娱乐方式。他们到那里去，就像是去吸食毒品一样，以便忘却那斤斤计较的平庸生

^①这是保罗·摩纳哥的《电影与社会》(艾尔斯维埃出版社，纽约—牛津—阿姆斯特丹，1976)一书中很有意思的信息。

^②所给数字见迪特尔·施特劳斯的著作：《这便是1931年》。



活。1924年，根据记录，全德国有200万人次进入电影院，有些场次到晚上很晚还在放映。在柏林，有一家电影院甚至是早上开放。瓦尔特·哈森克莱弗尔一边亲自尝试，一边在琢磨，谁会这么早跑到电影院去呢？^①他发现大厅客满，坐在里面的是失业者、铁路职员、小学生、流浪者和妓女。门票卖60芬尼他们就很高兴了。他们欣赏的并非自己所处的世界，而是与现实不符的天地，在那里他们可以浮想联翩。

习惯看电影的人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看重一些大导演，像穆尔诺、朗或帕普斯特，而是纯粹为娱乐性和逃避现实性的电影所吸引。他们指望找到自1910年左右以来就为他们所熟悉的演员。金发女郎海尼·波尔顿，被誉为“日耳曼的维纳斯”，是她父亲弗兰茨·波尔顿的电影中的明星。或者是定居于柏林的丹麦女子阿斯塔·尼尔森，她在哥本哈根剧院大获成功之后，其电影生涯在德国也绝对是一片辉煌。然后还有不可缺少的冒失鬼英雄、心地善良而好打抱不平的哈利·皮尔，被称为德国的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他的魅力不可抵挡！观众们大多数都酷爱看体育冒险、警察探案、情感波折、异国旅行或者是时光倒流的影片。

1914年以前，屏幕上的德国电影极其罕见。柏林、慕尼黑或汉堡各影院放映的都是意大利、丹麦、法国和美国片。战争期间，为回应敌军的宣传，成立了乌发公司，起先这是用在军事目的上的，1918年后情况便有所改变。从此，一家强大的德国公司能够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了，它甚至还有走向世界的雄心，但显然它必须制作易于吸引公众和能卖到国外的电影，电影首先是一种工业活动和商业活动。

审查制度本来随着帝制垮台而被取消，但在1925年后又被重新建立起来并广泛使用。当时有一股淫秽电影的浪潮席卷各地。后来呈现在观众们眼前的，如约·梅的《印第安坟墓》^②，是对土邦主的爱情幽怨声泪俱下，让他们对背井离乡的土邦主的国度浮想联翩。在这些异国情节剧之后，由于有乌发公司众谋士的建议，紧接着的便是宏伟而虚假的历史重建，其中特别典型的

^①瓦尔特·哈森克莱弗尔：“每日电影”，载于《柏林于此落笔》，柏林，1929，被引用于弗里德里希·G.屈尔比什的集子，《此地卧而不安（1918年~1945年社会报告）》，J.H.W.出版社，后再版，柏林—波恩，1981。

^②该电影由弗里茨·朗拍了一个同名新版本（Das indische Grabmal, 1958）。

有恩斯特·路比池的《杜·巴利夫人》、《安娜·波莱恩》、《法老之妻》。从1929年开始，由于言语泛滥，一统天下的便是音乐喜剧了。在这里达到最高峰的，是艾里克·夏莱尔1931年的电影轻歌剧《国会正在玩》；在1814年维也纳国会和奥地利梅特涅时代背景下，一位年轻的维也纳女子克里斯特尔·威恩钦格尔——该角色由丽莲·哈维扮演——在历史重要人物中间收集他们的艳遇故事！

某些艺术成功在公众那里获得热烈欢迎。比如有1927年弗里茨·朗的《大都市》，1931年帕普斯特改编的《四分钱歌剧》，尤其是一年前的《蓝色天使》，由约瑟夫·冯·施特恩伯格导演，玛琳·迪特里希扮演罗拉-罗拉，这个角色是夜总会的一个歌女，令一位可笑的中学教师对她情有独钟。布莱希特反对其被改编的这个《四分钱歌剧》版本，认为歪曲了他原本所进行的社会批判，于是上诉法院，^①结果输掉了官司。《蓝色天使》^②直接受到海因里希·曼的启发，因为他的小说《垃圾教授》也被改编过，他也抗议在电影中因使用



德国影片《大都市》的一个场景。

性虐待和性描写方式而减轻了政治讽刺的份量；约瑟夫·冯·施特恩伯格尽量只用诱人的大腿和玛琳·迪特里希那性感的声音来获取商业利益！在这两种情况里，尽管它们对原版本的样子有一些严重歪曲，不过幸好，关心商业利益并未阻止人们拍出声望颇高的电影。

而且，有一种社会性电

^①关于《四分钱歌剧》诉讼案，见布莱希特的文章《论电影》，古册出版社，巴黎，1970。在1932年10月15日的《世界》周刊里，乔治·阿尔特曼对当时在巴黎法尔吉埃尔影院上映的电影赞不绝口。他概述了电影情节，并认为最好的场景之一是，当主妇的丈夫对她“艰难地念着一份报纸上所讲述的一位裸体舞女美妙奇遇时”，主妇正在数钱。但在这里，法国审查委员会给剪了一刀：“那个舞女就是玛塔·哈里，法国审查单位不想让人说出她的名字……”，最后，《库勒-万普兵营》在法国上映，但已经过了两重审查！

^②《蓝色天使》的首映式于1930年4月1日在柏林腓特烈宫影院举行。



影，由一些多少与左翼阶层有联系的小公司制作，在百姓中受到欢迎。根据柏林画家海因里希·齐勒的剧本改编，由皮尔·于奇在1929年投拍的《克劳森老妈奔向幸福的旅程》，便是个好例子。几年前，齐勒的画作便已为一些电影打下了基础。人们采用这些



1930年，魏玛明星玛琳·迪特里希以一部《蓝色天使》打入英国片市场。

画作主要是反映秀丽风景方面，以便让人想到社会底层和柏林的后院情况，想到营养不良的孩子们、酒鬼、街头歌手、妓女。这一次，电影也不再根据他的画作环境来拍摄了，而是根据完全由齐勒所想象的故事来拍摄，只有那悲惨背景没怎么改变。克劳森老妈是卖报纸的，决定退休，与儿女待在厨房里，并把她所拥有的另一间房分租出去。可惜啊，她的房客和一个妓女及其孩子住在一起，最后却勾引她的女儿，并导致他的儿子入室盗窃。对于这种不幸，她看不到还有其他什么出路，只有拧开煤气阀自杀。这部悲惨的戏剧是对环境和社会氛围的描画，其价值在于将几种生存构想对立起来，尤其是通过一个爱上克劳森老妈女儿的工人人物而暗示，屈服于绝望看来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库勒·万普兵营》^①由施拉坦·杜多夫于1931年导演，是一个曾研究过布莱希特计划的小组根据其美学构想所得出的成果，这是社会性电影，甚至是政治性电影的又一个例子，公众对此决不能无动于衷。不过，有多少米胶卷被审查委员会强令剪掉了啊！的确，围绕着所准备进行的禁令发生了争论，这场争论想不到给它做了一次广告。最终，1932年5月30日在柏林最好的影院之一“中庭影院”问世的，是一部被篡改和大量删节的作品。然而观众蜂

^①关于《库勒·万普兵营》，尤可见让·米歇尔·帕尔米耶，《柏林安魂曲》，156—163页。特别是布莱希特《论电影》的文章。

拥而至，来看看这段一个工人家庭在危机与失业肆虐时期的故事。据记录，上演第一周有14000人次入场。接着，该片出现在首都普通郊区十五家电影院的海报上。

但在无声电影时代，接待观众最多的电影院都贴出德国歇洛克·福尔摩斯式两面人奇遇记的广告，施图阿特·韦布斯侦探，由恩斯特·莱歇尔扮演。要不就是站在沙文主义和歌颂泛日耳曼主义的角度，上演弗里德里克大帝的大量生活轶事，像阿尔森·冯·切雷匹1922年的《弗里德里克王》，于是一系列电影都纷纷开始模仿这种榜样。当有声电影因明显相同、但很现代化的渠道被普及时，^①电影便更能吸引大量观众了。与此同时，关于深山探险的电影突然流行起来。这些探险者里有登山运动员路易斯·特伦克尔，他是民族主义者，几乎已经公开表明自己是亲纳粹的。

音乐会、戏剧表演、读书

和电影相比较，常去听音乐会仍然是精英们的娱乐方式。难道会没有供他们选择的机会吗！在欧洲，柏林是音乐之都。国家财政为三大歌剧院提供资金。一个是市级的，由布鲁诺·瓦尔特领头。另两家是国家级的，分别由奥托·克莱姆佩勒与艾里希·克莱伯领导。至于威廉·福尔特万格勒，他负责爱乐乐团。外省也没闲着！市政府或地区政府资助了五十余家优秀歌剧院，它们分散在德国全国。这从很大一部分来说，正是1871年前王公宫廷的遗产。像图林根省的葛拉这样的小城市，都有自己的歌剧院。它之所以能维持下来，就是因为有当地王公家族的资助。在法兰克福、德累斯顿或科隆，人们因比柏林走在前面，能在新作品节目中登记而引以为荣。

当科隆歌剧院于1920年上演阿诺德·勋伯格的《佩雷阿斯与梅丽桑德》、1922年上演他的《想入非非的皮埃罗》时，它冒的是多大风险啊！在巴登地区的多瑙辛格音乐节，然后是在1927年开始举办的巴登-巴登音乐节上，人

^①有声电影这一完全新鲜的事物于1929年在德国影院里出现。马克斯·菲尔斯特：《舍黑拉扎德吉祥物》，其中提到了《爵士歌手》这部电影（美国，1927），由艾尔·鳩尔逊化装扮演一位黑人音乐家，这是他在柏林所能看到的第一部有声电影的证明。



们演奏保罗·辛德米特、库尔特·威尔、达琉斯·米尔豪特最近的曲子，这是多大的勇气啊！因为大众没怎么改变他们的品味，里查德·施特劳斯、马克斯·雷格尔和古斯塔夫·马勒尔的音乐探索是他们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耶乎迪·梅努辛是当时的神童，他回忆说，在柏林，贝多芬和勃拉姆斯就是神，还有预言他们能成功的威廉·福尔特万格勒和布鲁诺·瓦尔特，还有最重要的音乐社女主人、他们的大祭司路易丝·沃尔夫。^①

1918年到1929年间，统治德国的是从巴赫到瓦格纳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传统。但从1924年开始，一种现代精神也表现出来，是由广播发展而推动的。这是历史事件，艾里希·克莱伯将阿尔班·贝尔格四年前所作而从未上演的《沃伊采克》记在了柏林国家歌剧院的节目单上，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反对。更为直接的转折点出现在国家第二歌剧院，那时是奥托·克莱姆佩勒来接任领导职务，通过他从中撮合，乐迷们能向斯特拉文斯基的《俄底浦斯王》、达琉斯·米尔豪特的《克里斯朵夫·哥伦布》、保罗·辛德米特的《凯迪拉克》喝彩了。

按一般规律看，从事现代音乐的努力极少来自官方机构。这一努力压根儿只有独立组织来进行。乐队指挥海尔曼·谢尔欣领导梅洛斯组合，并出版了一份同名杂志，进行持久而有效的斗争。幸亏他，新音乐社才自1919年起，时常在其音乐会海报中写上施克里雅宾纳、勋伯格或巴尔托克的作品。传统音乐集团，正像汉斯·爱斯勒能说出口的那样，很保守。正是这个原因，这位勋伯格昔日的学生在方法上加以创新，但在老听众里却未得到支持，于是他试图开始寻找另一种潜在的听众，即工人群众。^②

对于戏剧来说，情况则有利一些。正如在音乐领域那样，国家、地区政府或市政府会资助一些剧院和剧团，这大约有150个。此外，一些老式和地位稳固的社团能促使大众观看戏剧表演。人民戏剧联盟由社民党控制，1930年有300多个基层组织，总共50万成员。由于这个联盟，德国全国每年能卖

^①由奥托·弗里德里希讲述：《柏林世界城……》，173页。

^②见阿尔布莱希特·贝茨：《汉斯·爱斯勒，一个时代的音乐，就是这么产生的》，文本十批评出版社，慕尼黑，1976，法语版为挪威槭出版社，巴黎，1982。题目为《音乐与政治：汉斯·爱斯勒》，关于此书菲利普·伊维尔奈尔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概述，载《戏剧工作》，夏秋号，1977，36~44页。

出500万个座位。右翼各党按照它这个模式，成立了人民戏剧团，计有20万到30万名成员，并维持着6个巡演剧团。

可惜的是，这些社团主要是便于人们熟悉经典剧作、文化传统，或者是被普遍公认为名家的健在作者的作品，比如格尔哈特·豪普特曼的作品。右翼各党偶尔会鼓励人们去看当代戏剧，但那是当戏剧能为他们的政策服务的时候。因此，真正的新戏剧通常不可能找到观众，除非有国家或贵族的资助。而当这些财政资助停止时，比如说在1920年到1924年间，接着是在1929年之后，它们便由于缺少观众而注定要失败了。

这正是皮斯卡托在柏林所做各种尝试时的经历。他在1929年的《政治戏剧》中，讲述了他是在怎样的经济困难里挣扎的。他得不到工人客户或小资产阶级客户的支持，除非他们能付钱。然而，正如马克斯·菲尔斯特天真地叙述的那样，青年进步协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观看皮斯卡托的每一次新排剧目，他们热情地参加他的活动，但由于他们的办法终究有限，所以只能扮演巧妇的角色：“只要买两张折叠坐椅的票，我们就能弄进来约二十五个人。接下来管理人员就没法把他们撵出去了……”^①

当时的德国产生了一批才能出众的演员和导演。马克斯·莱茵哈特、雷奥颇尔特·耶斯纳、卡尔·海因茨·马丁、贝尔特·布莱希特和许多其他人所导演的剧作在当代戏剧史上受人瞩目。但大众呢，虽然从社会方面来说他们比音乐会的观众层次更为丰富，却也并未足够扩大。在外省，整个业余戏剧——或者差不多是业余的——都是地方性的，乡土性的，被控制在民族主义者或纳粹手里。至于能吸引绝大部分观众的戏剧，它们只限于两种类型：街头喜剧（库尔特琳与费伊多在柏林上演与在巴黎一样获得了成功）和根据时事问题改编的戏剧。

1925到1930年间大量涌现的这些时事剧，一会儿赞同左翼潮流，一会儿又支持右翼潮流。1925年，数千柏林观众为阿尔诺特·布洛嫩的《莱茵起义者》喝彩，该剧是对法国的控诉和对德国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的辩护。三年后，《少管所里的反叛》讨论青少年罪犯的改造问题，上演五百多场，其作者彼得·

^①马克斯·菲尔斯特：《舍黑拉扎德吉祥物》143页。



马丁·兰佩尔在战斗于独立部队之后，想成为左翼潮流的代言人。

读书，作为休闲活动，差不多遵守的也是相同标准。在社民党的庇护下，从19世纪末以来，就设立了一个工人或人民图书馆网络。共产党文化部在它控制的出版社内提出一项廉价书政策，以方便群众去钻研它认为有必要了解的文学，并抵制宣扬民族主义的著作的传播。然而，读什么书呢？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两百部小说或科幻书籍每本都卖出十多万册。它们中只有30%在1919年后出自其他思想深邃的作者之手，所有别的作家早在帝制时代便已出名，为首的有欧也妮·马尔利特、威廉米娜·海姆伯格、海德维希·库尔特斯-马勒尔、路德维希·甘格霍弗尔，他们代表的是玫瑰香水或保守思想之光辉的情感文学。民族主义斗士们，像瓦尔特·弗莱克斯、古斯塔夫·福伦森、鲁道夫·海尔措格、瓦尔特·冯·莫洛，他们也组成一个团结紧密的团体，差不多拥有好几千万固定读者。

那些今日仍占重要地位、名字流传到后代的作家并不在大众喜爱之列。只有托马斯·曼及其《布登勃洛克一家》、艾里希·玛丽娅·雷马克及其《西线无战事》的销售量超过了50万册。海因里希·曼的《臣仆》批判分析了对威廉二世权威和对其体制下之主导思想的服从精神，该书花了十多年时间才达到销售26万册的数字，而汉斯·格里姆的《没有空间的人民》是对泛日耳曼主义和帝国主义征服者的歌颂，它于1928年到1933间——只用五年——便也达到差不多相同的数字了。里翁·福伊希特万格是纳粹党人的靶子，他们把他指称为获得成功的“犹太”文学和“颓废”文学的典范，这位作家的小说中只有一部，《丑陋的公爵夫人》，突破了10万册的大关。^①

现代舞、广播、游山玩水、体育

就算没有电影的诱惑，德国人还是有其他休闲方式可选择的，那时有

^① 见唐纳德·雷伊·理查兹：《德国20世纪畅销书，1915年～1940年书目全集与分析》，赫尔伯特·朗出版社，伯尔尼，1968。关于汉斯·格里姆的《没有空间的人民》，瓦尔特·拉科尔在《1918年—1933年魏玛文化史》中说它有70万册销售量，这个数字似乎有点夸张。按理查兹的看法，甚至在1940年都还没达到这个销售量。



电影《西线无战事》的一个镜头。

1500多名学生在德国研究玛丽·维格曼的表现技术。玛丽·维格曼提倡能让身体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舞蹈动作，以便达到一种迷狂，达到“对灵魂的表现”。这一观点遭到奥斯卡·施雷默尔——他在

“包豪斯学校”教授舞蹈——的反对，他的“三人芭蕾”的首演式于1922年在斯图加特举行，他认为身体就像是一种“有机机械”，舞蹈演员应从机器那里借用动作。

当时还有一个引力中心，毫无疑问那便是广播。内容主要有音乐会、学术讲座、外语课程以及稍后一点的作家辩论。它的工作室里维持着3万多名音乐家、歌手、演员。报刊插页上有铺天盖地的广告，鼓动人们购买最新式的收音机，可以分期付款。1931年德国有28家发射台，居世界第三位。在城市里，一半居民是忠实听众。

这种广播由于影响大，并且所包含的宣传效果好，因此也成为政治赌注。没有哪个党派不拥有一家与之相关的俱乐部或杂志。共产党抱怨自己被排斥广播节目之外，因此当它在国会里也拥有席位之后，甚至成立了一个自由广播团。该团发表公告，要求节目民主化，播放课程，无论是技术方面的还是理论方面的，揭露针对左翼作家所进行的审查。1932年12月，该团甚至在每晚播放秘密节目：圣诞节前夜。在柏林，兴登堡总统的讲话就这样被中断，代之以呼吁与政府的军国主义政策作斗争。^①

但是德国人不喜欢独自静静地听，而对共同娱乐很敏感。由于所有团体都纷纷利用各种机会加以组织，舞会的数量和参加人数便增加了。在农村，除

^①参见彼得·达尔，《工人发送台与大众收听者，1945年前的无产阶级广播运动与资产阶级广播》，工会出版社，美国河畔法兰克福，1978年。



了排演合唱外，筹备地方性节日或老兵们的节日能充实无聊时光。在许多地方，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男人们还习惯于按照各式各样的亲密关系，每周聚会一次：大家玩九柱游戏、打扑克牌，一般是玩施卡特三人牌，除非只想在一家客栈里喝几扎啤酒或几杯葡萄酒，这种客栈通常都会为某群人专留下一张他们喜欢的桌位。

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那里，耶稣升天节传统上成为男人们的节日，妇女和孩子被留在家中。这些先生们与会里同志一起，到野外去野炊。他们系上领带，有时还穿上旧式礼服，戴上帽子，成群结队，仿佛是参加什么仪式。他们喝酒、抽烟、玩乐，高唱军歌或爱国歌曲，由他们中的某些人——一个军乐队总是必需的——用特意携带的乐器伴奏。

周末集体出游属于最难得的小小日常欢乐。在穿上所属组织的统一服装，或者至少拿上招牌后，大家便步行、乘火车、骑自行车、乘坐车队，一起出发了。到哪儿去呢？到柏林郊县，朝哈维尔省及其小艇行进，朝施普雷省及其渔船行进。还朝——这是铁路特票巨大的成功——波茨坦方向行进，到普鲁士诸贤王的居住地去。或者朝哈尔茨省的山区行进，这条路线的路标设置得如此清晰，以至于每个人都能带着他们的侏儒雕像、烟斗或鹰头回来。

那个时期更为典型的是体育活动。早在1914年前，体育在德国就并非小康业余爱好者的特权，这些业余爱好者，从事网球、剑术、游泳等活动。健身组织有100多万名会员。仅赞助社民党、置身于工人阶层中的组织就有20多万会员。这个数字到1928年翻了三番。青年组织里时常举行真正的节庆活动、运动会。拳击赛、足球、柏林自行车六日赛都有几万名狂热爱好者。

右翼和左翼政党通过体育展开了空前的竞争。首倡者们主要趋向于抬高男性力量的价值。由于没有兵役，体育活动对年轻人来说就是一种弥补，这些首倡者们的训练和行为很少脱离这一想法。社民党与共产党虽有分歧，但从各自角度都认为，这些活动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一种从资产阶级所强加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方法。正是这个原因，他们鼓励妇女和男人一样投身到体育中去。共产党的周刊《工人画报》刊登大量照片，上面有年轻女子正在跑道上奔跑、射箭、步枪射击，正在学习当时欧洲新兴的日本柔道，或者正在参加一种在法国还不为人知但在德国已蓬勃发展的集体运动：手球。



20世纪欧美女子流行的体育运动之一。

与这种作为解放形式的群众体育相关，在左翼青年组织里有许多人支持裸体运动。青年男女一起聚集到自然主义营地里，一起裸泳。这并非意味着是在支持性自由，提倡爱情自由。在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看来，

这些裸体运动完全是伤风败俗的。

法国人抱怨起来是不是没那么敏捷呢？在当时法国所出现的游记里，德国妇女被介绍的方式恰恰证明了并非如此。德国妇女让人感到吃惊，因为她们——而且该描述过于泛化和夸张——喜好运动，在性方面很开放！[让·格兰维利埃，《德国……》，106~107页这样写道：“男性外貌是生命力的象征，德国妇女以此为荣。看他们跳上行驶中的有轨电车，从公共汽车上冲下来，爬上火车月台，真是让人好笑。她们上楼梯时两级两级地跳，三步五步就穿过街道。这些动作在柏油马路上可没什么美感，当德国妇女在露天做体操时便失去了其粗犷性……”]

关于德国女人容易弄到手，参见理查德·格兰《秩序与混乱（当代德国景观）》（90~91页）中从一位德国年轻人嘴里说出来的话：“柏林超过了巴黎。道德风尚更先进了。那些不属于同性恋改扮成异性的男人或女人，或者不属于清教徒集团和通常不为色所动者的人，都在以明显或美妙的方式谈情说爱。女人们别的都不要，只要娱乐，进行体育活动就可委身，极端缺乏羞耻心，完全不把传统的尊严当回事。您想怎么样呢，这很摩登；柏林非常摩登。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无法长时间考虑爱情问题，我们不再有时间去向一个女人献殷勤，而得忙其他问题。她们很清楚这一点，为了不浪费我们宝贵的每一分钟，就习惯于自动送货上门。”]加布里埃尔·郭布隆讲述说，在



到德国人权团总部去的路上，他很惊讶地发现墙上钉着一幅甘地的肖像，从头到脚一丝不挂。他说，就算是在法国的崇拜者里，甘地的这种形象也会令人不无震惊。于是他用格言式的话总结说：“我们在德国的收获必丰……”^①

1925年末，法德两国开始和解后，某些巴黎商人还是这么想，但其原因更多的在生活方面。对于德国群众来说，到巴黎旅游成为家常便饭。一些娱乐公司租用火车和飞机，从柏林出发，可以在光明之城过上几天节日。许多巴黎旅店和餐馆转而去适应这些如潮水般涌来的旅客，甚至为了和他们用德语交谈而雇用阿尔萨斯人来工作。

1931年，局势逆转，巴黎生活对德国人来说太昂贵了。而且他们要出德国边界就必须付100马克——即一般月工资的2/3。巴黎与柏林之间的关系对于休闲来说，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不同局面：蒙帕那斯转移到了柏林。一些夜总会、小咖啡馆、舞厅纷纷开业，取名叫风笛舞会厅、拉丁区厅、浪子厅、萨瓦兰记厅。真实的蒙帕那斯之荣耀在那里被诺许留存。这样也就完全有一种幻觉——不需要到巴黎去就能体验到真正的巴黎感性生活了……^②

对于许多人来说，在这一时期，其休闲活动又是什么呢？在城市，就是只要一有时间便背上包袱，出门上路去步行探险。在乡村，就是周日一早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去观弥撒或听牧师布道。而在整个德国，就是全家庆祝圣诞节，围在圣诞树边唱着歌谣。

^①加布里埃尔·郭布隆：《接触新一代德国人》，105页。

^②参见《已阅》1932年4月13日第213期，534-535页，伊万·郭尔，“柏林的蒙帕那斯”。

第九章 知识分子环境

艾里亚斯·卡内蒂在自传《耳中烛光》^①第二卷里，讲述了自己的惊讶和局促之情，当时，1928年夏季期间，他才住了几个月便发现了柏林。自1924年以来，他就生活在维也纳。这个闻名遐迩的首都那时在他看来像是一个平庸的外省城市，沉睡在过去之中。和它比起来，柏林只不过是一股漩流。你在那里身不由己地被带到永无间断的运动和喧闹中。面对流水般来往的车辆、闪烁不止的灯光广告、现代楼房，给你的印象是突然置身于纽约。

一个怀揣学术抱负的青年人心中充满醉人的希望，可如果不邂逅一位名人，在路上就会寸步难行！为了稍微减少一点偶然性，只要在作家和艺术家常去的附近溜达就行了。中午或晚上，尤其是在每晚很晚剧院表演结束之后，你要是坐在一家时尚餐馆里，如施里希特餐厅或施万奈克餐厅，就能有运气遇到他们中的许多人。

新一代作家一般都更喜欢施里希特餐厅。餐厅主人亲自下厨，他是画家鲁道夫·施里希特的兄弟，而鲁道夫是乔治·格罗茨的一个朋友。他们两人的画作装饰着餐馆大厅的四壁。有一张大桌常年专留给“文人”们。人们时不时在那里看到布莱希特和德布林。

可能有行会的意思，戏剧和电影方面的名人们吃晚饭都喜欢约在维克托·施万奈克餐厅。餐厅主人其实原为他们的同行，他是莱奥颇尔特·耶斯纳剧团里的喜剧演员，有一天对不断改变角色感到厌烦了，便扮演起餐厅老板的角色。他演得完美极了，对过去再没有任何遗憾。何况他还保留着以前结下

^①艾里亚斯·卡内蒂(获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耳中烛光》(Die Fackel im Ohr)，汉瑟尔出版社，慕尼黑，1980，法译本由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出版，巴黎，1982，米歇尔—弗朗索瓦·德迈译。

的关系。画家海因里希·齐勒及其所有朋友圈子，从歌曲词作家保罗·尼科劳斯到克莱尔·瓦尔多夫、到散塔·索讷兰德舞台上刚刚走红的明星，他们经常来此拜访。^①

你要是口袋里没多少钱，那就到傍晚时分去罗马尼舍尔露天咖啡座吧，只要一杯柠檬汁，你就有机会瞅见报刊界、文学界和艺术界的柏林贤达。这还不算从施瓦冰——在慕尼黑，是画家区——或蒙帕那斯临时变节来的几个人。他们消费固定的饮食，在这期间，他们用手边能拿到的不管什么纸片固执地画着，其他人则一小群一小群无休止地讨论最近举办的展览、上演的剧目、政治事件和报纸文章。从下午5点到午夜1点，知识圈中的才子和浪子们邂逅搭讪、评头论足、相轻互斥。左翼小说家雷翁哈特·弗兰克就坐在阿尔诺特·布洛嫩身边，布洛嫩戴着单片眼镜，好向人们表示，在这些时间里，吸引他的是右翼。稍远一点，在画商安静的角落里坐着布鲁诺·卡西尔。诗人戈特弗里特·本恩通常是独自一人。而“红色记者”艾贡·艾尔文·基施则一个桌子挨一个桌子、一个椅子挨一个椅子地开始其新话题。

艾里亚斯·卡内蒂评论说，在柏林，与德国其他地方不同，似乎一切事情都允许做。“在这种令人兴奋、充满活力的氛围里，有些艰难与刺眼的东西。人们急匆匆地什么事都干，什么事都不回避。所有事情都可怕地共存着。在乔治·格罗茨的画中，人们像挨了一记耳光一样接受这种混乱。这并不夸张，在柏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一种变得必不可少的自然本质，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②

几个文化活动中心

在欧洲，从19世纪末以来，所有能维持知识生活的城市，所有庇护着心怀文学和艺术抱负的年轻人团体的城市，都有这种餐厅或艺术家咖啡店。从巴黎到维也纳、布达佩斯、罗马、巴塞罗那、伦敦和柏林，这些大都市里的餐厅咖啡店成为浪子们聚会的地方，成为文学社团间惯常约见的总部。有时，

^①见沃尔夫冈·切希纳：《海因里希·齐勒——后院里的宫廷音乐会》，D.T.V 出版社，慕尼黑，1979。

^②艾里亚斯·卡内蒂：《耳中烛光》，法译本，313页。



它们是深层文化运动的起源。1900年前后的夜总会风尚因此发展出歌曲、小品、独幕剧等特殊的保留节目。

这种表面上的运动似乎很肤浅，1914年前，它在德国是由艺术家团体、文学社等组织所促成的，是由面向新一代人的杂志的创办所促成的。无论是此地还是他乡，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小团体变得稠密起来，并组织了一些展览会和读诗会。1905年，在德累斯顿，一些画家聚集在其中一个人的周围，即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后来产生了一个朋友会，他们为之取名叫“桥社”（Die Brücke）。在慕尼黑这座光芒四射的城市，自然有小集团，从传统主义性质的到现代性的。1909年，为了反对固定展览负责人在画作中所进行的选择，在康定斯基和亚夫伦斯基的倡议下，一个艺术家新联盟“新艺术家协会”被建立起来。这个艺术家新联盟于两年后分裂，康定斯基的支持者们聚集在青骑士（Der Blaue Reiter）的麾下。在柏林、科隆、汉诺威、曼海姆以及其他好多城市，一些艺术社团和地方杂志同样成为聚会中心。^①

从世纪初起，柏林走上了霸权之路，逐渐耗尽了所有的财力和精力。战后，它被公认为德国知识生活无可争议的中心。过了几年，它甚至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艺术创造地之一。正当巴黎吸引着西欧的艺术家时，东欧和北欧国家的艺术家却朝着柏林走去。



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艺术家团体《桥社》的印章。1905—1906年。木雕。



《桥社》的章程。由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撰刻，1906年。

^①关于这一问题，见笔者前几本书，尤其是《表现主义百科全书》，索莫吉出版社，巴黎，1977。



康定斯基. 新艺术家协会会员证. 1909年. 木刻



康定斯基.《青骑士年鉴》的扉页. 1912年.

慕尼黑名望大减。^①随着对革命起义的镇压, 1919年, 昔日的“艺术之城”陷入了学院主义和保守主义。里翁·福伊希特万格和奥斯卡·玛丽娅·格拉夫直到那时还待在该城, 在他们看来, 最优秀的才子已离它而去, 只剩下小资产阶级和循规蹈矩之人占据着统治地位。别的剧作家也同意该观点, 像巴伐利亚人玛丽路易丝·弗莱萨——她原籍为英戈尔施塔特——和移居巴伐利亚的奥多恩·冯·霍尔伐特, 他是一位匈牙利外交官的儿子, 该外交官于1919年最终定居在巴伐利亚; 慕尼黑各剧院对他们的剧作没有任何兴趣, 不像对报纸和杂志的兴趣那么人。公众的喜好更倾向于汉斯·噶罗萨和格奥尔格·布里廷等传统作家, 或是亲纳粹的民族主义者约瑟夫·马格努斯·维纳, 此人以其1930年的战争小说《面对凡尔登的七日》而获得巨大成功。

但慕尼黑不能代表整个外省。虽然所有人都承认, 要认可一个事物从此都得经由柏林, 经由其画廊、博物馆、剧院和音乐厅, 但属于先锋派的作家与艺术家团体, 或者至少是敌视学院主义的团体, 仍在数座城市持续发展。在科隆, “进步主义者”们以弗兰茨·威廉·赛维尔特

^① 见《20年代的慕尼黑》, 这是1979年5月到9月在慕尼黑市博物馆所举行的展览会的目录, 由克里斯朵夫·施托尔茨主编。



为核心，完全独立地为一幅几何图形的时事画进行辩护，直至1933年。汉诺威市的雕刻家有库尔特·施威特斯，与达达主义若即若离，所有自称为“建筑主义者”的人都约在他家聚会：1927年，他主持着汉诺威抽象者组织。在魏玛，出现了第一所“包豪斯学校”，令人激奋，荷兰人泰奥·梵·多伊斯伯格尽管没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教书，但于1922年到那里作了暂时居留，以便赢得支持“新造型主义”的人。在德累斯顿，革命造型艺术家协会——通常被叫做“阿索会”——成立于1928年，它拥有一个非常活跃的部门，由雷阿·格伦迪希和汉斯·格伦迪希兄弟、欧根·霍夫曼、库尔特·奎尔纳主持。

为了在首都之外，在对过去的崇拜之中维持一种非僵化的氛围——这对探索新的艺术道路十分有利——人们做出了种种努力，使得德国从1919年到1933年拥有如此繁多的知识分子活动场所。颇有意味的是，纳粹者们无时无刻不在诋毁“酒吧文人的颓废作品”，可他们却把慕尼黑选为自己的运动之“都”。按照希特勒的说法，它是“德国艺术大都市”。他们做出为这座大都市辩护的姿态，从1925年起用审查制度来统辖此地。他们的警惕性导致数部剧作被禁演，其中有弗兰克·维德金特的《潘多拉魔匣》和恩斯特·克雷内克的《琼尼开演》。

这种外省精神助长了对本乡本土的歌颂，在该精神里，瓦尔特·梅林看到的是“以资产阶级为主的精神状态”，这位原达达主义者带着嘲弄口吻下此定义，同时指出了柏林人在其城市界线之外是如何被老百姓所接待的：“其每一条法令在那里都受到藐视和抵制，在其每一句话中，人们都感觉是对日耳曼祖国的背叛，在其思想里，人们都猜是在为‘知识布尔什维主义’做宣传，也就是说是在为表现主义、女孩留男孩发型、马克思主义、平顶式屋檐、夜生活和巴黎戏剧做宣传。”^①

乡土崇拜

昔日，这种对小型祖国、领地、血缘和逝世者的崇拜曾在1890年左右突

^①瓦尔特·梅林：“柏林与外省”，该文用法语发表于《已闻》，1932年4月13日第213期。

飞猛进，以反对自然主义运动，如今，在魏玛共和国最稳定的时期，在文学和绘画方面也产生了。由于时代的影响，不仅其主题未以任何方式有所改变，而且在公众那里，该崇拜年年都享受着毫不间断的同等的喜好。在自称有此崇拜行为的人和对此表示同情的人看来，所有都市都会产生恶劣影响，城市文明只不过是罪恶行径的携带者。相反，乡村和农民则源于理性，源于对古老传统的维护，源于一种健康生活，源于德国人民根本的纯洁性。

无数小说因而仍保留着对农夫道德中所留存的黄金时代的怀念。最著名的小说作者有古斯塔夫·弗伦森、艾尔文·圭多·柯尔本海耶尔、海尔曼·施忒尔。大量反映农村场景的彩色石印画传播着这一田园观，面对所有社会或道德上的焦虑，那里是抚慰心灵的避难所。一些记者、文学史学家、艺术评论家，尤其是阿道夫·巴特尔斯和保罗·舒尔策-瑙姆伯格，他们不知疲倦地热衷于用理论证据来证明该观点。

所有能与歌颂乡土相联系的创举都得到保守主义政治阶层的赞许。他们用这些创举来装饰出一种危机感，在外省宣传它，夸大它，并将之归罪于共和制。民族主义者和纳粹们要求得到所谓与日耳曼传统的人民价值紧密关联的天地。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他们把柏林揭露成一个腐败之地，被犹太人控制着。反过来，为了暗示所发生的变化正是混乱的原因，注定了只是昙花一现，于是他们将农民理想化，将其说成是永恒智慧的拥有者。

除了其政治基础和用于偏见的目的外，这股乡土潮流当时很容易被接受和遵行，这是因为与大自然的融通以及家庭精神是德国文学最为经典的灵感主题。罗伯特·闵德尔提出了这个惊人的悖论^①：从19世纪以来，一个过度工业化的德国，加上变成巨大城堡的一些城市，在其生存条件中则完全混乱不堪，它看到其最伟大的作家，从海尔曼·海塞到托马斯·曼和恩斯特·维谢尔特，在对外省生活的呼唤声中，或者是在乡村田园诗中，都姗姗来迟。阿尔弗莱德·德布林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在这种文学里，完全是个特例，它反映的是现代都市的活力与节奏。

^①罗伯特·闵德尔：“德国文学与法国文学”，载《今日德国》，1952年第3-4期。摘自合著《一位人文主义者的生动思想：罗伯特·闵德尔(1902~1980)》，《今日德国》杂志第79期增刊，1982，85~86页。



右翼观点的势力

无论在哪儿，某些社会团体及其思维习惯与周围所发生的物质改变之间总会出现一种差距。但是，在作家方面，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对工业化与城市文明的后果从未有过如此的厌弃之情，他们甚至根本不愿谈及。其原因之一是，在德国有另一个悖论，即由于工人运动是欧洲组织得最好的，因此革命思想的影响从各个程度上说，总是多少深入到所有社会阶层中了。

共和制建立伊始，在局势的压力面非深层演变的压力下，帝国中知识分子圈内有几个人的观点发生了转变。过去帮助或支持帝制政治的人，像瓦尔特·拉特瑙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转而为魏玛宪法辩护。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托马斯·曼：他于1922年公开宣布他与共和体制结盟，并与兄弟海因里希——他比托马斯更早地清楚认识时局——和解，现在轮到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参与支持民主事业了。

然而，确切地说，当议会民主制刚刚在德国经历十年之后，托马斯·曼在哀叹什么呢？这个国家像是一个特别容易接受非理性主义的土地，被浸没在非理性的行话之中。他在1929年说道，到处都被一种“在原始生命权利中胜利重建黑暗势力和无底深渊”^①的意志统治着。1932年，在被邀请到维也纳，面向奥地利社民党的工人做一个讲座时，他再次说道：“在德国，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想法如今被压抑住了。在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恰恰是其对立面。共和国自己对此也并非毫无责任，我曾透露过这个意思……”^②

事实上，1929年的经济危机并未显示出右翼思想在德国知识生活中的霸权。除非是蒙上双眼，否则不可能看不到那如潮水泛滥般的书籍、手册、报纸和杂志，它们从魏玛共和国初期开始就在为议会制、犹太人与“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法国与凡尔赛和约喝倒彩。反犹太和反共和的民族主义组织由一些商人与实业家提供资金，他们拥有势力庞大的宣传工具。德国文化保卫

^①托马斯·曼：“现代精神史中弗洛伊德的地位”。法语译文载：托马斯·曼：《论婚姻、莱辛：弗洛伊德与现代思想：我的时代》，由路易·莱布里希作导言和大事年表，路易丝·赛尔维赛纳译，奥比耶—弗拉玛里翁出版社，巴黎，1970。

^②托马斯·曼：“面对维也纳工人的演讲”，1932年10月22日，文章载：托马斯·曼：《政治手稿与演讲》，费舍尔·布希莱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8，第2卷，248页

团原名反布尔什维主义团，由爱德华·施塔特勒领导，它于1921年宣布，该组织已散发了400万份传单与海报！^①这正是一个较短时期内的活动总结，还仅只涉及众多组织中的一个组织。

正像乌发公司对电影制作的权力控制一样，阿尔弗莱德·胡根伯格对报刊业的权力控制在新闻与政治舆论的传播方面，导致了右翼帝国主义的垄断状况。其国社党议员的身份丝毫不会阻止他对一家向四面八方扩展的企业进行操纵，这家企业集中了电报公司、广告部门、印刷厂。他从美国方法得到启发，将报纸以尽可能拥有最多读者为目的作为原则。但他也说，一份报纸的水平越高，其读者数量就会越少。

尽管阿尔弗莱德·胡根伯格的出版物分布广、花样多，但他的这条报刊链日复一日传播着相同的单方面判断、相同的政治经济分析和针对民主的失败的相同的幸灾乐祸之情。其每日发行量超过了800万份。这不是惟一的报刊链，但却是最有势力的，即使它主要面向的是商人、农民和小公务员，很少面向脑力劳动职业成员。当他的《地区画报》印数达到25万多份时，一个竞争力很强的班子——即站在共和制一边、明显由泰奥多尔·沃尔夫领导的莫斯社——只有20万份。被乌尔坦社收购的自由主义报纸《福西舍报》平均拥有四到五万名读者。《法兰克福报》是一份独立的日报，由一些化工企业资助，格调很高，有优秀的文化专栏，不过发行量也多不到哪儿去。

战后不久在知识舞台前沿最为活跃的作家之一是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他的《西方的衰亡》^②卖出了10万多册！这部两卷本著作十分难啃，处处都晦涩难解，旁征博引而令人困惑，那些典故像烟花四射，从数学到宗教现象，从基督教到东方。这种历史哲学希望整个文化能让人经历与人类相同的发展阶段，最后到达相同的、不可避免的衰亡，由这种哲学，广大民众从一种完全相对的宿命论中只记取既悲观又令人快慰的教训：德国战败所导致的是欧洲

^①由昂布鲁瓦丝·郭特转述：《赤裸裸的德国》，法国思想出版社，巴黎，1923，199页。

^②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第1卷出版于1918年末，由伽利玛出版社译成法文。在法国，关于此书，曾有多少曲解啊！例如在雅克·莫尔塔讷的书《菩提树下新德国》中可以读到，施彭格勒激起了一种狂热，“向德国揭示了苏维埃运动，并认为社会主义胜利之钟已经敲响”……另见莫里斯·缪莱：“德国思想与东方”，《万象杂志》，1921年8月15日第10期，415-428页。



的损失，自19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就已进入了不可逆转的颓废之中——除非有一个新恺撒出现。

1918年前还不为人知的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由此突然成名，他曾在慕尼黑学习过哲学，也曾在莱茵省一所工业学校里教书，后来由于继承了一笔遗产，便专门从事写作。《西方的衰亡》于1911年开始动笔，他的意图是要预言未来，将人类的生物进化规律挪用到各国人民与社会的变化上去。因此他对未来的看法自然就集中在现世是末日这一观点上，而不考虑从一个行将终结的帝国可以产生另一个政府制度。

在施彭格勒看来，共和制度在德国是不可思议的。他拥护君主制，在整个战争期间都赞同泛日耳曼主义政策，崇尚普鲁士与霍亨索伦王朝。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于1919年发表了《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小册子，同样获得成功，更清楚地补充了《西方的衰亡》中的意思。他很精明地考虑到时局，在该书中并未提出要复辟君主制。他提倡“将德国社会主义从马克思那里解放出来”，他认为在这种社会主义中，异于欧洲精神面貌的犹太精神特点太过明显。为了阻止只会产生无个性权力的民主动力，他要求建立一种“普鲁士社会主义”。这是一种严格的经济组织，当然总还是资本主义的，建立在由一个精英人物所实施的权威之上，建立在其他人的服从之上。

仍是在战争刚结束不久，海尔曼·凯瑟灵伯爵的两本书也被广为阅读：《一位哲学家的游记》与《政治、经济、智慧》。这位保守主义者于1920年在达姆施塔特创办了一所智慧学校。在他看来，欧洲被一些混乱势力控制住了，一战与革命便是其征象。为了能达到一种新秩序，必须克服人类所遭受的精神危机。各存在体在“内心混沌”中被碾碎，它应当被转变，以期有利于“再生”。政治前途如何呢？凯瑟灵的言下之意是形成一个负责的精英。1929年，在《诞生中的世界》里，他直言不讳地歌颂“领袖”，无论此人是工业巨头还是政治领导。因为，他写道，惟有“首领”这类人才能获得丰硕成果。^①

^①海尔曼·凯瑟灵在德语国家长期为人淡忘。奇怪的是，甚至连关于魏玛共和国文化生活的、资料最详实的著作对他也未提及。他只被瓦尔特·拉科尔在《魏玛……》中一笔带过。他在法国倒风靡一时，几乎所有著作都译成了法文。关于这一成功，见H. 迪瑟林克：《海尔曼·凯瑟灵伯爵与法国》，布维耶出版社，波恩，1970。

1923年，阿尔图尔·牟勒尔·梵·登·布鲁克出版了他的《第三帝国》，^①读者较少，但他在犹豫良久之后选来以为尝试的题目，虽非他所创，却注定将会引起巨大反响。而且，当纳粹再次大量使用该题目的说法作为其政治纲领的旗号时，在很大程度上不无混淆。然而，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纪末时与浪子来往频繁的文人——的崇拜者与翻译者对道德、精神上的悲哀尤其敏感，这悲哀蹂躏着战后的德国，他断定，政党与议会民主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阻挡它的。凡尔赛和约象征着耻辱的德国落于弱势，他想用民族这个词的神秘含义所包容的潜在力量来对抗这一弱势。他认为欧洲正在失去其独特性，正在“黑奴化”，^②他勉励德国——不是用学识渊博的理论家的口吻，而是用充满灵感的抨击者的口吻——要坚持自己的价值以使之生机勃勃。

一些年轻人敌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在议会制共和国中见到的是一个从外国进口来的制度，没有传统可言，没有德国的根基，“新民族主义”代表人之一汉斯·施瓦茨曾于1930年解释说，在这些年轻人看来，该著作所能讲的正是这个意思。他说，在施彭格勒及其《西方的衰亡》可能将他们关闭在绝望之中的一刻，牟勒尔·梵·登·布鲁克使他们相信德国可以复兴：“从此，我们不再感觉自己像施彭格勒笔下那些浮士德式的主人公那样，必须服从于时间规律。在这里，正相反，我们位于空间的稳定之中，将会在各族人民的原子构成当中，发现新的精神前景……”^③

正如《法兰西水星》杂志的一位临时撰稿人蕾吉娜·查布鲁多夫斯基于1922年末所指出的那样，并非德国的所有知识阶层都同意这种“新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提倡的是一种“领导职能甚至是思考职能只应当返回到一小部分人手里的强大国家”，但其反对者的“信条”能流露到公众舞台上的实在是太少了，没有脱离小集团，而且影响非常微弱。而别人的著作却享受到人

^①该书由右翼出版商阿莱克西·勒迪耶用法文出版(法国杂志书店, 1933)。它由让-路易·勒诺(笔名阿尔图尔·阿达诺夫)翻译, 并包括梯也里·莫尔尼耶作的一个导言。关于牟勒尔·梵·登·布鲁克自杀, 梯也里·莫尔尼特别写道:“战后在德国, 有几代人相当有魄力, 认为为某些事业服务值得人们在谋杀与死亡面前决不退缩。”他补充说, 这次自杀是对由古斯塔夫·施特雷曼所进行的法德重修旧好的抗议行动, 并未被当成一次“弃生”, 而是被当成“激起希望与骚动”, 以便能真正建立起第三帝国。

^②参见《第三帝国》(法文版)最后几句话:“在人类中, 动物渐渐爬近, 非洲遮蔽住了欧洲。我们应当站在价值门口充当守卫者。”

^③《第三帝国》法文版序言, 收入1931年德语再版版本中。



们普遍的关注，引起了“无数的分析、评论和争辩”。^①

许多大学生和中学生由于战败而惊慌失措，对民族主义论调十分敏感，他们并不能对所有要求革新德国精神状态的呼吁无动于衷。毫无疑问，这一代人有一部分又回到了恩斯特·容格尔1919年《钢铁暴风雨》及1920年《战争啊，我们的母亲》里所描绘的战争之中：可歌可泣的共同体验，英雄主义的源泉，最辉煌的命运是为祖国献身。

因此，伴随着根据不同情况而或多或少有所不同的强度，各种反民主观点的持续渗透浸润——通常表达得很巧妙——并影响了魏玛共和国的知识氛围。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导致该现象更为明显。托马斯·曼不断重申其反对自负式非理性主义的立场，该立场与同时期其他人士所发出的警告十分接近。^②1931年，面对要求埋头于种族血缘、埋头于地域的非理性黑暗当中的诱人呼吁，面对虚无主义的行进，卡尔·雅斯贝斯——罕见的哲学家之一，其著作，以及其对手马丁·海德格尔的著作，在这些年的残余中幸存下来——在其《当代之知识状况》里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至于社会学家泰奥多尔·盖格尔，他在一年后的《德国人民的社会层迭》中，也特别对中等阶层所接受的一种“血缘浪漫主义”日益滋长保持着警惕。

1925年左右所建立起来的经济稳定一旦被公开破坏，纳粹理论者们的攻势便通过一个更为顽固、更有组织的集团表现出来。就在1929年初，阿尔弗莱德·罗森伯格成立了一个保卫德国文化战斗团，试图召集赞成“传统主义”的知识职业所有成员，不管他属于哪个政治流派。该团组织了一些反对“现代艺术”的诋毁运动，一段时间以来这都被叫做“文化布尔什维主义”，也就是说不改变德国“血缘和地域”、不改变“日耳曼”美德、不改变“北欧文明”的所有作品和作家。阿尔弗莱德·罗森伯格本人于1931年出版了《20世纪的神话》，歌颂雅利安，鼓吹对犹太人的仇恨。

在“新右翼”理论家那边，无论他们要求的是“新民族主义”、“保守主

^① 潘吉娜·查布鲁多夫斯基：“泛日耳曼主义的新形式”，《法兰西水星》杂志，1922年12月1日，577~603页。

^② 例如弗洛伊德1929年在维也纳出版的《文明中的不快》。面对“由侵略性和自毁性人类冲动所带到共同生活中的动荡”，他忧心忡忡（法语版107页，法国大学出版社，1971）。

义革命”还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危机也都被大量挖掘出来。几乎被人遗忘的阿尔图尔·牟勒尔·梵·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于1931年再版。还是在这个牟勒尔·梵·登·布鲁克周围，有一个六月俱乐部，1919-1920年间只有百来名忠实成员，而旨在将“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们团结成反议会“新战线”的《行动》杂志，介于纳粹与共产党之间，它在1929年末发行了20多万册，并在两年间令这一发行量增长了约三分之一。该杂志由出版商欧根·底德里希斯创办于1908年，与青年运动和新浪漫主义有联系，到这时，即1929年10月，恰好刚刚进行了一次改组。从此它由汉斯·策勒尔领导，此人原为独立部队成员。还是在1929年，另一家杂志也进行了改组，即《德国周报》，它直到当时还保持传统主义性质，但不完全反共和，可由于爱德加·容格在班子里的强大势力影响，它开始为反对“魏玛体制”而进行战斗。

诚然，他们彼此之间的思想还有好些细微差别，其观点也都各覆一面，但却都有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他们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能真正行使权威的精英，而非议会和强大的政党；是一个能拯救白人种族与欧洲文明的德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卓越的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最后甚至清楚地写道——必须独裁。而且对他自己来说，顺理成章的一件事就是，他于1933年5月1日加入了国社党，作为回报，他得到一份专门面向法学家的报纸的主编位置。于是他在那里将希特勒介绍成“法律的保护者”。汉斯·策勒尔的命运没那么令人称羨，他从1935年开始不参加政治活动，在生活中也与政治保持着距离，可他在1933年4月是赞成解散政党的，赞成结束自由主义的，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打败“左翼知识领域”。最惨的是爱德加·容格，他在1931年颂扬“国家社会主义的伦理基础”，并于1932年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惟一能将德国未来真正掌握在手中的政治家，^①但却在1934年的大清洗中被清算掉了。

30年代初，卡尔·冯·奥斯茨基在左翼周刊《戏剧世界》中指出，这些理论者用如此模糊的精神来对危机作出反应，实际上是纷纷投向了极右翼的怀抱。^②事件结果也证明的确如此。而且，某些人还完全心甘情愿这么干。费

^①文见1931年11月和1932年11月的《德国周报》。

^②转引自克劳斯·弗里彻：《政治浪漫派与反革命》，苏尔坎普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6，59页。



尔迪南德·弗里特，《行动》杂志撰稿人，因经济方面知识渊博而受人欢迎，他不久就成为纳粹的秘密警察，1934年9月，由于曾为希姆勒帮过几次忙，故此从他本人那里得到了党卫队军官头衔。至于其他人，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发自内心的盲目之中，他们正致力于启动一个早晚会将自己碾碎的机器。在这方面，保罗·尼科劳斯·科斯曼的经历更为惊人，这位转变得比德国人还德国人、比民族主义者还要赞成民族主义的人，在其杂志《南德月刊》中为反犹太者们开辟了大量版面，1942年却被关进了特莱西安施塔特集中营，因为他不是“雅利安”种族的。这是何等的经历啊！

左翼的动荡

就算是其作品的读者很难跨过几千名业余爱好者这一范围，热情参加左翼或极左组织的作家与艺术家仍然很多。在他们中间有最富才华的名人。从贝尔特·布莱希特到乔治·格罗茨、弗里茨·朗和库尔特·威尔，后代人最能记住的均是这些人的名字。奥地利小说家约瑟夫·洛特徒劳地声称说，许多书商拒绝在其橱窗里展出犹太裔作家的书，^①可这些书并不缺乏出版商或杂志来出版。里翁·福伊希特万格、格奥尔格·恺撒、雅科布·瓦瑟曼、阿诺德·茨威格仍然拥有一批忠实读者，尽管有各种反犹太运动可能会发生到他们身上。

如果你不是社民党党员、和平主义者或共产党员——那些专说别人坏话的人重复道——那就休想钻进去！给予你的，是在剧院中永远充当小角色，是在最偏远的外省城市里的音乐会大厅，是最平淡无味的菜叶子！据说，只有几家电影院还向你敞开大门……真是漫画式的观点，但它很普遍。投机分子们要想获得成功就会考虑到这一点。用这个观点，右翼战士或同情右翼的人就有一个极为简单的借口来解释自己何以失礼或被排斥于高尚职俸之外。对于那些因为自己才华未得赏识而怨气冲天的人——比如一个名叫戈培尔的年轻作家^②——来说，它成了将所有精力转而用于反对共和制的理论根据。

^① 1933年，载于《犹太手册》，巴黎。

^② 戈培尔以“文才”自炫。见其小说《米凯尔，一个德国人在日记本里的命运》，1928。

在签定停火协议后的革命岁月里，全德国出现了一次在广度上史无前例的创作活动潮流。所有被压抑的热情都爆发出来，所有人为关系都被打破。与过去一刀两断、创造某些新生事物的想法鼓舞着一代诗人、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刚刚成年，曾被战争的残酷性所伤害。他们的理想便是复兴人性，以便于一个新人来统治，一个真正是人的！

被称为表现主义的东西在1910年左右并非体现在宣言或声明上，而更多地体现在反对印象主义和其他主导性流派上。表现主义此时达到了巅峰，其代表人物中大部分人从一场杀戮中幸存下来，便都称颂针对父权和旧帝国世界的反叛，投身于支持现行革命的混战之中。他们在呼吁书上签名，绘制海报，谱写激情洋溢的诗歌。就连保罗·克雷也在慕尼黑开始画那幅“无产阶级青年”^①的肖像了。有一个今天完全被忘却的诗人，赫尔伯特·屈恩，他用下面的话来证明了这些活动：“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表现主义。如果新艺术也严格地向政治领域开放，那绝非偶然。”^②

达达主义是在雨果·巴尔、理查尔·胡森贝克和特里斯当·扎拉的推动下，于1916年在苏黎士诞生的，并很快渗透到了德国。理查尔·胡森贝克于1917年1月回到柏林，成为宣传者。1918年4月，他推动成立了一个“达达俱乐部”。没什么会员，但声响很大！德国达达主义者们以前几乎都为表现主义杂志撰稿，即使他们原来的同行还是相信人道主义伟大理想、因而后来大加诋毁的话，也不会放弃对政治目的的要求。而且这也就是与在法国所发生之事的重要区别之一，在法国，达达只满足于嘲弄一切。在柏林，所有人都同情极左派。出版商维兰德·海尔茨费尔德及其从事政治摄影合成工作的兄弟约翰·哈特菲尔德一俟共产党的存在为人所知，便加入了进去。

即使是在革命动乱被镇压之后，文学界和艺术界中仍大量保留着对左派的普遍敏感性。在导演卡尔·海因茨·马丁的领导下，柏林开办了一家“无

^①这幅肖像画知之者甚少，而且这就像克雷1919年在慕尼黑支持革命的立场一样不为人知。见展览目录《保罗·克雷：1883年~1922年早期作品》，1979年12月12日~1980年3月2日，伦巴赫豪斯市展览厅，慕尼黑，485页。

^②参见《表现主义百科全书》。



产阶级剧院”。他失败后，艾尔文·皮斯卡托重拾这一想法，后来成为现代政治剧院的试验者和理论家。在画家里面，有“十一月社”，开创于1918年末，确切说它将自己保持为一种团结组织，进行一些展览，在这些展览中，各种风格都能并存，但都并存于共和国头几天的一种精神里，忠实地延续它。

许多作家、画家、建筑家、音乐家与帝国时代划清界线，不想再为一位精英的美感快乐干活。在他们看来，艺术活动应被合并到整个社会活动中去。这便是以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为首的艺术

家们的想法，他于1919年创办了“包豪斯学校”。他说，建造不是从艺术中，而是从生活中去创造，是为生活赋予形式。在这方面，他反对同事约翰纳斯·伊腾，此人当时在“包豪斯学校”授课，为艺术是绝对物而辩护。

格罗皮乌斯所属的艺术工作理事会也包括其他建筑家（像布鲁诺兄弟和马克斯·陶特）、画家（像原“桥社”的艾里希·赫克尔与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雕塑家，该理事会将艺术家与群众间的合作当做原则。在1919年3月的纲领里，该理事会要求，从此并非所有公众建筑的建造工作都来自于上层的武断决定，应该用各种各样的展览将博物馆改造成人民的教育场所，而艺术遗产应当真正成为集体财产。

国家、地区和市政府根据各自资金预算的能力，满足了其中的一部分要求：购买现代作品以丰富博物馆馆藏，发展用于社会目的的建造工作，资助有利于民众生活的文化机构。

1925年，在地方压力之下，“包豪斯学校”只得离开魏玛。它后来设在德绍，遭到长期攻击，直到当时的校长汉纳斯·梅也尔被迫辞去职位。对一位能干的建筑家为什么会有这场运动呢？因为他有共产党员这一名声。但这事还没完，1932年新选举出来的、以纳粹为多数的市议会干脆决定关闭该机构。



《达达》杂志德文版第一期封面。



包豪斯校舍。

米斯·梵·德尔·洛厄，想在柏林以私立学校的形式将它维持下去。它举步维艰地过了不到一年，便于1933年4月被纳粹永久关闭。

纳粹党人威廉·弗里克对自己1930年在图林根所采取的措施也是振振有辞！他一开始就将一部分剧院关闭两年，借口是它们经历着财政困难。接着，他将艾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列为禁书，因为它有“失败主义”精神，并取消“布尔什维克”音乐家保罗·辛德米特与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的一些作品音乐会。所有事情的完满结局是：他在博物馆向参观者关闭了现代画作展览厅。

在1920年6月的立法选举中，右翼各政党得到46%的选票，选举一过，革命势力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走下坡路了。还有几家仍很活跃的杂志，几个团体，但乌托邦潮流和歌颂改变人性的激情却大为消退，幻灭与痛苦占据了上风。没多久，由通货膨胀所引起的苦难越发加剧了这种沮丧情绪。

不久以来，当时以被称为“左翼知识分子”为宜的人习惯于在一家旧式周刊里，找到对其质疑的回应，但用的是一个新题目：《世界舞台》。该杂志并不厚，它很像是小学生的练习本，封面为砖红色。它的销量也不大，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销量从来就没大过，只有1万到1.5万册。不过，幸亏有主编卡尔·冯·奥斯茨基及其主要撰稿人库尔特·图柯尔斯基，时代中的所有赌注都被包罗在字里行间。1920年，库尔特·图柯尔斯基在《世界舞台》中写了些什么呢？他没有用挖苦讽刺的口气，而是半带着破红尘的眼光，用焦虑色调，自问德国将何去何从：“霞光照天，我们不知道这是哪种霞光——是



晚霞抑或是朝霞呢？”^①

表现主义的死亡与新的客观性

对于表现主义来说，无论如何，所有艺术都因它而动荡，这是晚霞时分。诚然，这并非诗人们所承诺的表现主义。库尔特·品图斯将他们的诗作收集在一本诗集里，很快便出名了，并于1919年秋出版，取名叫《人类霞光》。他在自序中说，他们预言了新一天的黎明，将在黑暗过后出现。这在他们的神谕中是怎样的失误啊！……幸好，我们的诗人将火炬传递给了其电影同志们，这些人做了重大修正。

从1919年到1923年，表现主义尚未完全死亡。它的某些方面对于许多艺术家来说，继续象征着一些重要事情：自发的创造性，通过一部作品而总得给出来的主观视角，关于物质现实的自我优势。然而，另外一些趋势也在流行。在《各种主义》的书里，汉斯·阿尔普和艾尔·李西茨基用讽刺方法，从立体主义列举到建筑主义，不下十余种，中间经过了自发主义、纯粹主义、新造型主义和真实主义！这儿还有糊涂与混乱之印象，仿佛每个人都想创造自己的风格，从此只为自己工作。不过这还得除去已经通过建筑主义和真实主义——这是影响后来年代的两个潮流——而从那种乱七八糟的状况中隐约出现的情形。一方面，是一种秩序意志，一种对理性和功能性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现实主义场景所表现出来的兴趣。

其实，从1925年开始，氛围便已改变。时尚变得具体了，变成了社会学调查和报告。想象、直觉与神秘主义又回到了实证主义。绘画恢复了简洁性，这几乎是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奥托·迪克斯原为表现主义者和达达主义者，同情以乔治·格罗茨与约翰·哈特菲尔德为首的红色团，后同情革命造型艺术家协会，他后来说：“关于艺术，表现主义已经做得够多了。我们原想让事物在被剥去外壳的状态下展现，在其完全明显的状态下展现——几乎是无艺术的状态。”^②

^①文章题为“霞光”，写于1920年3月11日。载《德国年表》，46页。

^②由1981年12月4日的《时代杂志》周刊转述，汉堡，第50期。

小说——比如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阿尔弗莱德·德布林的作法是把报纸上的文章和电话簿内容放进去——将原始资料融入叙事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里翁·福伊希特万格1928年时的观点，他甚至给想象留出了很大的位置：他认为，战后德国新一代人从法国小说那里什么也得不到，它只像橱窗中的漂亮物品，而盎格鲁-萨克森小说，如美国的杰克·伦敦、辛克莱尔·刘易斯、阿普顿·辛克莱尔和英国的阿诺德·本涅特、约翰·高尔斯华绥、索默塞特·毛姆等人的小说，它们更扎根于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物质信息要多得多。^①

“我只想写些有用的书，我才不在乎美不美呢……”，《二十二班》与《和平》的作者恩斯特·格莱塞明确宣称道，他是1918年后脱颖而出的新一代人中的代表人物之一。^②所有关注的焦点是时事，获得成功的戏剧作品谈论的都是流产、死刑、儿童教育。讲述直接经验，而不追求文学效应的战争书籍开始泛滥。

1932年，皮斯卡托将其撰稿人雷奥·拉尼亚转给菲利浦·苏伯，把戏剧构想成一种集体活动，而不再是对个人命运的表现。他解释说，这一观点被惟利是图之人窃取了，社会主题在这一点上时兴起来，以至于再没给别的主题留下多少空间：“在德国，报告文学当时还不为人知，人们对艺术的反应特别强烈。文艺与戏剧从一个极端落到另一个极端；仅在朝夕之间，就有人宣布应该完全放弃诗歌和象征手法，摇身变成提供戏剧化报纸文章的奴仆，正是这种想让诗人与其时代发生关系的构想转变成了对时事的拜物主义……”^③

那些喜欢为文学而文学的人显然被这种崇尚技术、崇尚“美国实用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氛围激怒了。托马斯·曼的长子克劳斯·曼觉得，一种对思想的否定正在十分危险地落下脚来：“就这样，体育运动的巨大意义变得清晰起来，这种体育运动几乎毫无疑问地统治着年轻人。这个时代的事件似乎是将精神完全引向荒诞为己任。对精神怀揣敌意成为一种时尚。在柏林的文人

^①里翁·福伊希特万格的讲话（“论盎格鲁-萨克森作家的影响与特点”），转引自约斯特·海尔曼特与弗兰克·特洛姆勒：《魏玛共和国文化》，宁芬伯格书店，慕尼黑，1978，162页。

^②恩斯特·格莱塞与贝尔纳德·齐默尔的谈话，载1929年8月3日星期六的《文学新闻》，巴黎。

^③菲利浦·苏伯：《已阅》中论德国戏剧的文章，1932年4月13日第213期，540页。



中，关心文学一点都不时髦了。无论是谁，只要是喜欢诗歌而不关心六日自行车赛，他就会被看做是资产阶级而遭到这些文人的蔑视……”^①

“新客观性”——这个人们不得不承认的流派正如其名——多半只满足于一些“议论”、“谈话记录”、“报告”。共产党作家与画家用“革命客观性”来反对它，提倡以社会现实为基础，鼓舞人们去斗争。他们以苏联所发生的事情为榜样，建立了一些组织：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团，革命造型艺术家协会。他们创办了一份杂志，《Die Linkskurve》^②，第一期于1929年8月出版。一些工人，像维利·布雷代尔和汉斯·马尔希维查，开始在工厂或矿场讲述他们的生活。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些作家，像约翰内斯·R. 贝歇尔、恩斯特·奥特瓦尔特、路德维希·莱恩、安娜·塞格尔斯、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他们通过文学来支持这些战斗性观点。

不幸的是，在书的内容里写进针对资产阶级的控诉的想法压倒了风格质量，宣传压倒了美学关怀。^③关于这个主题，笔战与辩论是少不了的。应该是讲述还是描绘呢？是写小说还是写报道？是放在政治训诫中，还是仅仅根据赞成者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是以乔伊斯和多斯·帕索斯流派的方式来使用现代叙述方法，还是继续以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方式，运用可靠的写作程序呢？……极左的报刊杂志使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表了态。匈牙利共产党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契〔尤见格奥尔格·卢卡契：《现实主义问题》，法文版本由克洛德·普雷沃（“当今的卢卡契？”）与弗莱德·费什巴赫（“卢卡契、布洛赫、爱斯勒对论战史的贡献”）的研究。关于青年时期的卢卡契，《艺术史》已被翻译过来，并由莱纳·罗什里茨做了精彩介绍，克林克西克出版社，巴黎，1981。而尤塞夫·伊沙格普尔为吕西安·戈德曼的文本《卢卡契与海德格尔》（贡提耶出版社，“沉思”丛书，巴黎，1973）作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关

^① 雅克·莫尔塔讷《菩提树下新德国》中所记录的克劳斯·曼的一番话，同137页注①，210页。

^② 直译过来就是“向左转”。

^③ 不过施蒂凡·普里亚策尔，这位十分赞赏工人戏剧的人从德国旅行回来后，在1931年12月19日的《文学新闻》（“柏林的夜晚”）中却评论说：“多年以来，人们在施普雷河岸边，试图给予戏剧一个教育家的角色。在那边，戏剧不再是什么以自身为目的的艺术了，而是一位代言人，白色或红色的代言人。作为时事概念的舞台艺术主要是对政治性和社会性煽动有价值。评论界先是愤慨不已，最后也都屈从于该原则。人们甚至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主题戏剧的洪流淹没了光说不做的抗议者们……”

关于戏剧问题，详见古德伦·克拉特的书：《工人阶级与戏剧》，学院出版社，柏林，1975。

于贝尔特·布莱希特与卢卡契之间的争论，有一本很薄的著作，即让-马克·拉硕，《布莱希特—卢卡契：现实主义问题》，人类出版社，巴黎，1981。至于移民时期和有关表现主义的著名辩论，见安德雷·吉瑟尔布莱希特在《斜线》杂志特刊上对布莱希特所作的研究，1979。

关于这些文学和艺术的讨论，最完整的著作之一当数曼弗雷德·诺丝希、约翰娜·罗森堡与贝尔伯尔·施拉德的书：《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文学辩论》，奥夫堡出版社，柏林，1980。] 的观点立场鲜明，即提倡以19世纪的现实主义散文家为榜样，学习巴尔扎克而非左拉，学习托尔斯泰而非陀思妥耶夫斯基，该观点在这场争论中起了兴奋剂的作用。

大胆的探索

仅仅是些浪花飞沫泛在表面上，而海底涌潮则服从于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冲动，是这样吗？的确，当时最伟大的小说家或艺术家最终只不过是让这些潮流轻轻擦了一下。他们即使对此不能无动于衷，也只能孤独地走着自己的路。艾里亚斯·卡内蒂很正确地提到必须集中精力，这是一切真实独特的创作努力所要求的，而柏林的吵吵嚷嚷并不能让人达到这一点。一个不好的例子是诗人施蒂凡·乔治，他可能不属于他那个时代，有一个很小的年轻人圈子保持着对他的欣赏之情。但海尔曼·海塞宁愿退隐到泰辛省，在《草原之狼》^①中对此没有少写，并提到一个与时代精神完全相符的病况：哈里·哈勒尔这个人物在现代社会的压力下，遭受到自我的分裂，无法作为一个分裂个体来生活。

寻求具体事物，这大约在1925年到1930年间是魏玛共和国明显的特点，无论怎样，其积极结果是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习惯上被视做弱势的艺术上来。随着插图杂志的流行，绘图术、摄影、摄影剪辑成为关注对象，被赋予艺术价值。图像艺术在日常生活的天地里，开始占据优势地位。一些正式的创作者——有的来自绘画领域——参与进来，更利于其地位之上升：如汉斯·

^①海尔曼·海塞：《草原之狼》，1927。



贝尔梅尔、约翰·哈特菲尔德、拉茨洛·马霍利-纳吉和杨·奇柯尔德。无论是在报纸还是在街道上，广告越来越多地侵入进来。得利于广告，一些新的美学经验成为可能。招贴画也是，它成了一种艺术作品。1929年，在杜塞尔多夫举行了一次招贴画国际展览会。从出版商那边来说，他们则招聘版面画家来设计其书籍的封面。这在德国是引人注目的新鲜事物，大众更为广泛地关注起装潢艺术、家具形状和日用品了。一些制造厂商试图考虑到这些问题，并要求“设计师”们画出模型来。

随着“新客观性”的流行，在同一时期，摄影一统天下。对仪器的改进，对技术的热情都助长了这股迷恋之风。

这主要出现了三种方向。一些人被摄影实验所吸引，必然努力加以发明与建造，游戏于形式之间。1925年，拉茨洛·马霍利-纳吉出版了他的《绘画、摄影、电影》一书，这时显得像是一个先锋。另一方面，社会现实主义成为奥古斯特·散德尔肖像画的特点，1929年，他将这些画收集在《当代面貌》里，还有海尔曼·洛伊波特领导的工人摄影家运动。最后，某些人声称放弃一切评论距离，躲到被摄物体的后面去，以便使之绝对真实。这一纲领的成果有阿尔伯特·伦格尔-帕池1928年的摄影集《世界真美》和汉斯·君特尔1929年的摄影集《技术之美》。^①

此外，正是在这些年当中，精神分析学尽管还受到很多讨论，但在出身于战后不久的青少年那一代知识分子天地里，占领了一块地盘。环球电影公司的负责人很敏捷地把握住时代气息，甚至向柏林精神分析学院建议推广弗洛伊德的学说。在与弗洛伊德的合作者之一汉斯·萨赫斯博士进行了几次协商之后，环球电影公司于1926年拍摄了一部电影：《灵魂之神秘》。该片导演帕普斯特成功地将虚构与资料完美结合。根据对一个病例的描述，他展示了精神分析治疗的好处，尤其是对公众展示了尚不为他们所知的分析者与被分析者之间的关系。

无意识、超我、利比多不无时髦地成为当时日常谈话的主要话题！记者

^①该段所引的题目为：拉茨洛·马霍利-纳吉的 *Malerei, Fotografie, Film* (1925)，奥古斯特·散德尔的 *Antlitz der Zeit* (1929)，阿尔伯特·伦格尔-帕池的 *Die Welt ist schön* (1928)，汉斯·君特尔的 *Technische Schönheit* (1929)。

艾贡·拉尔森在其回忆中将之夸张到极点，声称在柏林实施精神分析的人与日俱增。他详细说道，这不是因为该城市比别的地方产生了更多的精神病人，而是因为许多年轻人意图与其父辈断绝关系，力求从压在身上的禁令中解放出来。而且，这一兴趣延伸到整个现代心理学领域，延伸到弗洛伊德的学生以及他的论敌和对手们身上：“阿德勒和他的‘个体心理学’，荣格和他的‘集体无意识’，威廉·莱希和他赋予机体的优势意义（他甚至找到了与其机制有关的基本粒子，机元）——他们中的每个人就像教派里的导师一样，都拥有一批追随者和忠实信徒。”^①

那时的德国不仅很容易受到新观点的渗透，受到所有知识时尚——有时持续不到一个季节——的渗透，而且在这个国家，一些影响较大的团体也向外国艺术潮流开放。许多俄国人和匈牙利人，其中有拉茨洛·马霍利-纳吉^②和“包豪斯学校”的马赛尔·布洛伊尔，他们没费多大劲就被迎到德国来工作。自1920年起，主要是得利于李西茨基，俄国艺术革命的前卫在德国比在欧洲任何国家都更加出名。在柏林，梵·迪门展览厅优先迎来了在西方各民主国家所组织的苏联艺术展览。苏联戏剧及其导演在知识界名人那里、而且在德国大众那里也得到强烈反响。莫斯科蓝色工作服剧团在1927年德国巡回演出中，还因此而获得巨大成功。

一份像《Der Querschnitt》^③这样的杂志走了个极端，向人们展示对外国文化的这种开放性。该杂志的老板是画商阿尔弗莱德·弗莱希泰姆，而且不加译文地发表英语或法语文章。这都是何等的文章啊！有杰尔特鲁德·斯坦恩的，恩尼斯特·海明威的，艾兹拉·庞德的，费尔南·雷热的，弗朗西斯·皮卡比亚的……当然，这份豪华杂志在其插图页中尽可能地收集所有画家的作品，不分国籍，它们与服装设计师普瓦雷、约瑟芬·贝克尔、莫里斯·谢瓦里埃、国际影星们的照片相邻摆放。

所有这些对比，所有这些争斗，所有这些彼此对立的团体，在不假思索

^① 帕普斯特的电影名字叫 *Geheimnisse einer Seele*。至于艾贡·拉尔森，引文摘自《魏玛共和国》，威廉·海纳出版社，慕尼黑，1980，112页。

^② 关于拉茨洛·马霍利-纳吉的最精彩的书之一，是克里斯蒂娜·帕苏特的研究著作（布达佩斯，1982）。

^③ 直译过来就是“侧观”。



的歌颂与深思熟虑的冷漠中，在混乱与秩序的交替转换中，造成了一种更为动荡多事的知识氛围！就连退避三舍这种行为，也由于其面貌繁多而难以把握。但在15年间贯穿其中的这些紧张气氛与冲突局面不正是大胆探索的催化剂吗？





第十章 一次剖析的素材

奥托·弗洛恩特里希是科隆进步党组织成员，他虽于1924年到法国定居，但仍保留了与原来画家同行们的良好关系。1932年初，他评论说，德国的艺术市场变得完全不存在了，收藏家与图书馆从此什么画也不买。面对这种状况，他得出了概括性更强的判断：“危机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它最后还导致了精神压抑这一特殊形式，导致了一种悲观宿命论……”^①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共和国总统兴登堡任命为首相。从2月起，纳粹便建立了一个压制体系。如果没有与数万对共和国死亡感到兴奋不已的公务员进行技术上的合作，没有几百万对共和体制无效性感到失望的其他公民的被动赞成或参与，他们真能做到这一点吗？

对于纳粹上台执政，人们给出了很多解释。^②其中有一种解释，1940年以前在法国右翼保守势力中很受欢迎，它把德国法西斯专制说成魏玛共和国的合理结果。据说，从1918年到1933年，德国人民生活在集体偏执狂中。^③所有政党都混杂在一起。德国人民忘记了两个主要原则：历史延续性意义和控制事件的意志。一方面，德国解开了系在19世纪上的缆绳，生活在虚空里，寻求一种无法达到的秩序，在对现代性的崇拜中精疲力竭。另一方面，它沉没在对智性、非理性、悲观主义的否定之中，在焦虑氛围里，无法掌握未来。

这个观点排除了所有对魏玛共和国时期经济政治力量的深入分析。它没

^①艺术杂志《艺术报》上发表的文章，摘自《月份》中的法文版，1933年2月1日~3月1日期，253页。

^②关于该主题，见皮埃尔·阿伊索贝里的著名总结，《纳粹问题》，瑟伊出版社，“历史点”丛书，1979。

^③比如贡扎格·德·雷伊诺：《德国从何而来？》，普隆出版社，巴黎，1939。

有考虑国际政治针对德国和关于德国的效应。^①在法国舆论中有一个很流行的口头禅：德国是一个行为过度、过分的国家，在它背后，对于共和制度死亡所应负的责任模糊不清。有了这种盖棺之论，要颁发埋葬许可证当然并非难事了！

帝制遗产的势力

这种观点认为历史延续性本不应由共和体制来保证。战争，革命暴动，采用议会制度，将投票权利扩展到所有年满20的男女公民，所有政党都按比例而可具有代表性——正是这些，毫无疑问，造成了与过去的断裂，扰乱了人们的习惯。但是这种扰乱现象从深层上显示出帝制的必然影响。正是由于帝制，社会矛盾才变得激烈异常，人们才做出过分的事。很不幸，魏玛共和国集中了这一混乱，在混乱中，该制度抛弃了德国。

相反，从1918年到1933年，以全身重量将德国前进步伐碾碎的，不正是历史延续性吗？就连共和制的死亡也不能归罪于它自己的孩子们，因为参加1932年11月民主立法选举的最后一代人都出生于1912年，因此出生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人在政治上对其进程无法产生显著影响。

事实上，德国人是带着一大堆帝国时代的行李而走进民主的。国家形式变了，但社会结构却没怎么变化。正是这个原因，从工厂里的工会生活到教育民主化，在深层领域尝试的所有改革才都遭到如此多的抵制，结果只得加以调和并退回到过去。那企业的“社会化”呢？1932年，掌握整个生产资料的人还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那土地再分配呢？光属于最高层贵族的七个地产主就拥有80多万公顷土地，而勉强两倍面积的土地在500万小农民中进行再分配。

^①参见罗伯特·闵德尔：《诸德国与德国人》，瑟伊出版社，巴黎，1948，165页：“魏玛德国的政治演变远未因特殊标准而发展成封闭的花瓶，相反，它有一部分是受协约国的影响而形成的，这些协约国更希望日耳曼滑向右翼，而不愿看到它投靠共产党……”



欺骗性外表下的民主

从表面上看，贵族再也不能在其位进行操纵了。但他们因此就失去权力了吗？几个没落贵族并不能阻止富翁们像1914年以前那样生活。虽有制度上有变化，贵族头衔还是被保留了下来，王公贵族仍长期享受着公众的爱戴。各杂志大量刊印威廉二世的长子、巴伐利亚王鲁普莱希特、萨克森—麦宁根格奥尔格公主等人的照片。在发行量大的报纸上，这些人所安排的宴席酒会也吸引了人们尊敬和欣羡的目光。

农业主拿到大量贷款，用于提高产量，将设备现代化。但在大地产上，雇农们的生活改变了吗？几乎没有。汉斯·法拉达的《群狼之狼》中讲述了普鲁士一位农场代管人的半天生活：“他凌晨3点起床，分好草料，看着牲畜吃食，监督人挤奶和洗刷牲口。4点钟，他将油菜放进仓库，这份工作，如果不想让油菜掉籽，就必须趁着晨露充足时去做。6点45分，疲倦不堪的他站着一口喝下一杯咖啡，狼吞虎咽地吃点东西，到7点钟，他便开始做每日必做的苦活……”^①

那宗教的地位呢？神父们至少在平日生活中不再穿长袍了，可这不是天主教会共和制的有力证明。世俗服装（帽子、礼服、马甲和黑色长裤）仅仅使他们更易于混杂在百姓之中。孩子们不必在每日清晨非得去望弥撒，正如帝制德国的许多村庄里那样，当他们掉了一堂教理课时，不会再看到警察跑到家里来了！但这种宗教活动的减少并不意味着教权干预从日常社会关系中消失了。事实远非如此，学校和青年组织很特别，保留了神父们高度的使徒式关怀。在新教徒那里，他们握住马首缰绳——也许握得没以前那么紧了——仍然密切关注着一群年轻的灵魂们，恩斯特·艾里希·诺特在回忆其准备对接手礼进行研究时讲述说：“神父对皇上仍然十分忠诚，在新国家里低声斥责无神论。对于再也不能像过去时代那样通过官方机构来庆祝皇上寿辰，他显然感到很忧伤。”^②

更具欺骗性的表面现象，是那些抽烟、出入酒吧、从事体育运动、驾驶

^①汉斯·法拉达：《群狼之狼》，保罗·让蒂译，57页。

^②恩斯特·埃里希·诺特：《一个德国人的回忆》，23页。

汽车的妇女们！^①妇女解放实际上范围很小。大城市，尤其是柏林的几处典型场景被过度普遍化。^②对于被解放了的现代妇女，右翼向她们喝倒彩，左翼拿她们做例证，其重要性在公众争辩中被夸大，而与事实不符。60%达到工作年龄的妇女除了家务事以外，没有任何职业，而拥有一份职业的妇女又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能拿到固定工资。获得较高职位的人十分罕见，所占百分比微不足道。[不过，在左翼政党里进行斗争的妇女百分数比法国的高。1921年，社民党里有16%的妇女，共产党里有12%。同一时期，法国共产党里只有2%的妇女。]

远非公正的法官

如果要问哪个领域一成不变，那就得说是司法了。宪法在第102条规定，法官完全独立，只服从于法律。但这些法官跟帝制时期的那些人一样，他们所承认的惟一法律是像在过去时代里那样，保护君主专制政权。在他们看来，1919年和1920年工厂里的理事会代表们，1921年春在马克斯·霍尔茨领导下的萨克森起义者，1923年10月汉堡的暴动者，这些人都是混乱的制造者，都是匪徒。当1920年和卡普政变参加者们达成停火协议时，与事件有关的军官甚至仍继续领取完整的军饷，对于这些被告来说，判几年徒刑和强制劳动已成了惯例。一些特别法庭为他们而专设，所有辩护都被完全拒于门外。1925年，共产党议员、国际工人救助组织的领导维利·穆恩岑堡宣布说，有7000无产者被定为密谋叛国，被关进监牢。

该司法机构还干预进来，查禁戏剧活动、电影、报刊、书籍。说到底，帝国审查制度的压制性显得倒还没1914年以前那么强。这些诉讼几乎总还是那样，针对的是左翼势力。为了损害共和原则，或者是为了辱骂共和国，1919年

^①早在1914年以前，一些妇女便被雇到有轨电车中供职，驾驶汽车。儒勒·于莱在《巴伐利亚与萨克森》中写道：“人们看到她们戴着鸭舌反帽，穿着粗布工作服，和男人一样，技术不比他们差也不比他们强……”

^②丽塔·塔尔曼于《在第三帝国当女人》(罗伯特·拉封出版社，巴黎，1982)中很正确地勾勒出一幅1933年前德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细腻画面，她在第一章结论部分写道：“在80年斗争中所获得的权利，诚然，提高了妇女的受教育水平，但并未保证她们在社会文化中的平等地位，最终也只不过是用来使得一小部分人能够个人得到提拔，不久国社党就让她们三缄其口了。”



到1933年间被控告的报纸就有十来家。而站在国社党报刊一方的纳粹报纸没有一家出现过此类情况，反共和国的攻击和种族主义偏激言论成了家常便饭。

1927年，在不来梅进行的一场诉讼中，法官们的精神状态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至于卡尔·冯·奥斯茨基在



1928年的德国法庭。

《世界舞台》周刊里借题发挥，用讽刺语气加以阐明。代理检察长甚至还谴责妇女化妆。卡尔·冯·奥斯茨基喊道，注意那粉盒和口红，叛国离得不远了！……他补充说，不幸的是，魏玛共和国并未随着这些永恒“厚古者”而完结：他们反对年轻女孩留男孩式发型，反对短裙，恰如他们反对宪法和艾森斯坦的《波坦金纳号装甲舰》一样。

两种重负，两种措施。比较一下1923年11月和1931年的两场诉讼，一场是希特勒及其朋友预谋发动慕尼黑政变所引起的，另一场诉讼的受害者确切说是卡尔·冯·奥斯茨基，我们就可以了解当时德国的司法状况了。当卡尔·冯·奥斯茨基只不过是告诉人们空军是如何侵吞未受议员检查的秘密基金之时，他被指控为泄露军事机密，被判18个月监禁。希特勒只被判了五年监禁，而且九个月后便结束了对他的关押。至于他的配角鲁登道夫将军则被无判罪释放。

歌唱家艾里希·魏奈尔特1925年在一首讽刺司法的歌曲里宣称道：“要想当律师又站在左翼，/那没别的，就是对祖国的叛逆……”^①阿尔弗莱德·阿斐尔正是最负盛名的左翼律师之一，他讲述说，共和国法官们光用一只手不仅能算出自己的末日，算出自己到外省就会失踪，而且能算出被告的代表们会受到地方报刊的攻击，硬生生地被推到街头暴力中去。在举出大量法庭

^①艾里希·魏奈尔特：“Die linken Rechtsvertreter/sind nichts als Volksverräter...”，歌词转引自库尔特·克萊勒尔：《德国司法传统：魏玛时代重大政治诉讼案》，克劳斯·瓦根巴赫出版社，柏林，1978，8页。

不公正的例子后，他于1933年痛苦地做出这一结论：“如果连一座大厦的主要基石——司法——都被蛀虫侵蚀，那么人们又怎会惊讶于它后来的崩塌呢？”^①

走向第三帝国

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这便是在法国和其他地方关于这个德国所得出的结论。但除了十几年民主经历所得的不够确切的结果以外，这句话还有别的什么意思吗？即使是在1932年的最后几次立法选举中，纳粹的选票也只勉强超过33%。如果共和情感没有得到坚决维护，没有得到要求建立共和国的人的鼓舞，是不是就不会维持下去，并在1919年后扩展开来呢？阿尔弗莱德·阿斐尔评议说，1920年3月，当沃尔夫冈·卡普以其军团惊动柏林，宣布政府被推翻之时，这一空想几天内便传遍全国：“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德国无产阶级展示自己，并让其他人都明白，只要团结起来，它就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②

左翼作家，尤其是卡尔·冯·奥斯茨基、库尔特·图柯尔斯基及其《世界舞台》周刊的同道们，有时对反共和体制的激烈情绪暴跳如雷，就像他们的右翼同行们一样。但和这些右翼同行们——他们追求的不过是利用一个专制制度来结束共和制度——不同，他们批评的是共和制度的演进过程本身：它远离了民主原则，因为非正义之事而走向毁灭，让人不信任，有丑闻（两个犹太裔家庭（这事使反犹太运动更为激烈）被牵连进金融丑闻中，让人费了不少笔墨！巴尔梅兄弟来自立陶宛，他们大肆行骗，与许多社民党要人有联系，时不时就请他们到自己的柏林郊区别墅参加一些宴会。他们的业务扩展到全德国、荷兰和北欧国家。由于有政治关系的支持，他们获得了银行贷款和食品送货合同。1924年该丑闻公开曝光。时隔才几年，同一出戏由柏林市的供货商施克拉雷克兄弟加以改编。据说，各方面的大量政治要人及其夫人都在施克拉雷克店得到免费服装，此事于1929年10月被报纸揭露。布莱希

^①阿尔弗莱德·阿斐尔：《德国司法底细》，伽里玛出版社，巴黎，1934，149~150页。

^②同注^①，88页。



特与库尔特·威尔的《四分钱歌剧》获得成功便是从揭露施克拉雷克兄弟丑闻中得利的。通过腐败现象延伸到市政府显贵以及警察局最高公务员这一氛围，观众们又看到了最近才发生的那次事件。]，有总是很突出的独断专行。他们目睹的是自由制度的堕落，而非进步。他们由此而感到愤怒。

远处，第三帝国接着浸没了德国，这一沉闷空气也许更能泰然评价尚可存在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相对自由主义。然而，占据上风的是阴影而非光明。从布莱希特的剧作到阿尔弗莱德·德布林与安娜·塞格尔斯的小说，从奥托·迪克斯与乔治·格罗茨的画作到汉斯·爱斯勒、保罗·辛登米特、阿诺德·勋伯格或库尔特·威尔的乐曲，棕色潮水最终用阴森的黑影吞没了当时艺术中所有重要的东西，将数百名作家、艺术家和科学人士清除掉或强迫他们移居国外。^①

事实上，正是在1933年3月24日，魏玛共和国受到温柔的一击 [国会以441票对代表社民党议员的94票，同意授予希特勒全权。但1933年3月5日的立法选举是在恐怖中举行的。所有共产党组织都被查禁。在由纳粹策划的国会大厦纵火案之后，政府于3月1日颁布法令实行戒严，



纳粹集中营。

^①这里参照的是拙作《纳粹主义和文化》。法国是个不太安全的避难所，最后从德国移民的贡献中没怎么得到好处。不过，摄影家吉塞尔·弗洛伊恩特，画家约翰尼·弗里特兰德尔，雕刻家弗罗孔，女电影史学家洛特·爱斯纳和其他几个人都丰富了法国知识遗产。在美国，有马赛尔·布洛伊尔、爱因斯坦、格罗皮乌斯等人定居，这种贡献更为明显，尤其是在建筑领域。

所有反对国社党的著名人士都被逮捕：普鲁士在几天之内便逮捕了 5000 人，其中有许多作家。卡尔·冯·奥斯茨基也是这一情况，他接连被关押于数处集中营，由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才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被送到一家医院。1936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其实是为 1935 年而颁发给他的。1938 年 5 月 5 日，由于一系列监禁，他死于结核病。]，不具代表性的众议院投票赞成授予希特勒全权。纳粹日报《民族报》于第二天写道：“议会制度在新德国而前投降了！伟大的事业开始了！第三帝国的日子来临了！”^①

这一天，数万德国人已被关进了集中营。



^① 见安德雷·弗朗索瓦—蓬塞：《柏林一处使馆的回忆》，弗拉玛里翁出版社，巴黎，109 页。

附录

人口状况

一、国土面积与人口

年	面积 (平方公里)	居民数	男性就业人口	女性就业人口
1925	470627	63180619	20053335	11319088
1933	470713	66030000	16104601	10336455

二、德国及其行政区划

州 - 地区	面积 (单位：平方公里)	所占领土 百分比	居民数 (单位：千)	所占总人口 百分比
普鲁士	295978	62.5	38175	61.2
巴伐利亚	75996	16.2	7380	11.8
萨克斯	14986	3.2	4994	8.0
符腾堡	19507	4.2	2580	4.1
巴登	15071	3.2	2312	3.7
图林根	11763	2.5	1607	2.6
黑森	7692	1.6	1347	2.2
汉堡	415	0.09	1152	1.8

梅克伦堡/施维林	13162	2.8	674	1.1
奥尔登堡	6424	1.4	545	0.9
布伦施威克	3672	0.8	502	0.8
安哈尔特	2306	0.5	351	0.6
不来梅	257	0.06	352	0.6
利普	1215	0.3	164	0.3
吕贝克	298	0.06	128	0.2
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	2930	0.6	110	0.2
绍姆堡/利普	340	0.07	48	0.08
萨尔	1910	0.4	768	1.2

这是1930年的官方统计数字。每个州-地区都拥有一个议会和政府。这些州-地区的领土地位由魏玛宪法第18条加以调节。图林根省产生于一次地区重组，由1920年4月30日法令确定。1919年10月30日组织了一次全民公决，结果科堡地区拒绝并入图林根省，而选择巴伐利亚省。另一方面，萨尔省则被置于国联的托管之下。

共和国总统

艾伯特（社民党），从1919年2月直至1925年2月底逝世。由制宪议会选举产生。

兴登堡，从1925年4月直至1934年8月逝世。根据魏玛宪法由全民选举产生。

一、参加总统选举情况

选举轮次	1925年	1932年
第一轮	68.9%	86.2%
第二轮	77.6%	83.5%



二、1925年的总统选举

1925年3月29日（第一轮）	所得选票（单位：%）
雅勒斯（人民党）	38.8
黑尔德（巴伐利亚人民党）	3.7
鲁登道夫（国社党）	1.1
布劳恩（社民党）	29
马克斯（天主教中央党）	14.5
黑尔帕赫（民主党）	5.8
台尔曼（共产党）	7

1925年4月26日（第二轮）	所得选票（单位：%）
兴登堡（人民党）	48.3
马克斯（天主教中央党）	45.3
台尔曼（共产党）	6.4

三、1932年总统选举

1932年3月13日（第一轮）	所得选票（单位：%）
杜斯特尔堡（德国民族党）	6.8
兴登堡（魏玛联合党）	49.6
希特勒（国社党）	30.1
台尔曼（共产党）	13.2

1932年4月10日（第二轮）	所得选票（单位：%）
兴登堡（魏玛联合党）	53
希特勒（国社党）	36.8
台尔曼（共产党）	10.2

四、首相与政府一览表

1919.2.13/1919.6.20	谢德曼 (社民党)
1919.6.21/1920.3.26	G. 鲍尔 (社民党)
1920.3.27/1920.6.20	H. 缪勒 (社民党)
1920.6.21/1921.5.9	费伦巴赫 (天主教中央党)
1921.5.10/1921.10.25	维尔特 (天主教中央党)
1921.10.26/1922.11.21	维尔特
1922.11.22/1923.8.12	库诺 (无党派)
1923.8.13/1923.10.5	施特雷斯曼 (人民党)
1923.10.6/1923.11.29	施特雷斯曼
1923.11.30/1924.6.2	马克斯 (天主教中央党)
1924.6.3/1925.1.14	马克斯
1925.1.15/1926.1.19	路德 (无党派)
1926.1.20/1926.5.16	路德
1926.5.17/1927.1.28	马克斯 (天主教中央党)
1927.1.29/1928.6.28	马克斯
1928.6.29/1930.3.29	H. 缪勒 (社民党)
1930.3.30/1931.10.8	H. 布吕宁 (天主教中央党)
1931.10.9/1932.5.31	H. 布吕宁
1932.6.1/1932.12.2	冯·巴本 (无党派)
1932.12.3/1933.1.29	冯·施莱歇尔 (无党派)
1933.1.30	希特勒 (国社党)

五、参加立法选举情况

日期	投票人数百分比
1919.1.19	83.02
1920.6.6	79.17



1924.5.4	77.41
1924.12.7	78.75
1928.5.20	75.60
1930.9.14	82
1932.7.31	84.02
1932.11.6	80.57

人口的社会分布

社会阶层	1925年	1933年
工人	43.4	43.2
独立工作者、自由职业	19.4	17.4
职员、公务员、军人	17.0	15.6
退休人员、领取年金者、食利者	9.1	13.6
从事家庭集团活动者（农业、商业、手工业）	8.9	8.3
家庭雇员	2.2	1.9

1926年每周工作时间

小时数	此类工人百分比
40至48	47.03
48至50	5.57
50至52	13.11
52至54	25.76
54至56	7.02
56至58	0.83
58至60	0.57
60以上	0.11

失业者百分比

年	百分数
1924	11.9
1925	8.3
1926	17.9
1927	8.8
1928	9.7
1929	14.6
1930	22.7
1931	34.7
1932	44.4

新住宅数

1919	1925	1930	1932
57000	179000	311000	141000

一名邮递员的月工资

1927	1931	1932
138 马克	123 马克	110 马克

妇女劳动力

年	劳动妇女中已婚者百分比	已婚妇女中劳动者百分比
1907	29	26
1925	32	29
1933	36	29



年	18岁以下	18至25岁	25至40岁	40至60岁	60岁以上
1907	18.1%	26.5%	26%	22.5%	6.9%
1925	14.9%	26.9%	28.7%	23.3%	6.2%
1933	7.4%	26.7%	33.6%	26.2%	6.1%

社民党党员人数

年	党员总数	妇女人数
1920	1180208	207007
1925	690802	153693
1930	1021777	218335
1932	1008953	230331

参加各工会的人数 (%)

年	社民党工会	基督教工会	希尔什-敦克尔工会
1918	25.4	17.8	10.6
1923	21.4	24.5	?
1929	14.7	18.7	7.7
1931	14.0	16.3	?

妇女工资歧视示例

年	相同企业中妇女相比于男性的工资 (单位: %)					
	丝织产业		纸张-纸板产业		农业	
	特殊工	普通工	特殊工	普通工	短工	仆佣
1924	73	70	65	62	26	75
1928	73	70	67	65	44	83

生活第一必需品平均价格
(单位：芬尼；1 马克 = 100 芬尼)

食 品	1925	1930	1932	1934
1 公斤面包	42	39	36	33
1 公斤土豆	13	10	8	51
1 公斤牛肉	220	230	155	150
1 公斤黄油	410	380	260	315
1 升牛奶	34	28	25	24

**1932 年一个四口之家的
每月开支 (单位：马克)**

一周工作 40 小时的父亲 (柏林 A.E.G. 工厂电力工人) 平均工资	121.60
缴纳社会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后的纯收入	109.56
房租、煤气、用电等固定必需开销	34.50
每周月票	1.20
报纸、广播使用费	4.40
工会会费	5.20
	45.30
化妆用品、维修等	18.00
节余生活费 (食品)	$109.56 - 45.30 - 18.00 = 46.26$
每人每天	1.49

德国 19 至 23 岁青年人数

年	男性 (M)	女性 (M)
1921	2411869	2517405
1926	2490218	2563223
1931	2474077	2464560



男女大学生人数

年	男 生	女 生
1921	111306	8890
1926	86716	8539
1931	115859	22076

根据教育类型的分布

年	综合性大学		高等技术院校		其他理科院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921	71%	93%	20.5%	3.8%	8.4%	3.1%
1926	65.9%	92%	24.5%	4.3%	9.4%	3.6%
1931	72.9%	87.8%	18.4%	4.1%	6.6%	4%

1931年，在继续深造的高中毕业生年轻人总数中，各教育学院（培训小学教师）仅有1.9%的男生和3.9%的女生。

根据学科在综合性大学中的分布

学 科	1924-1925	1926-1927	1931-1932
医学与牙科学	9399	10276	27823
文学、史学、艺术	13233	13046	20057
法学、经济学	24442	25401	23202
理科	5291	8719	12687
新教神学	1833	2088	6292
天主教神学	1581	1614	2203

大学生的社会出身 (%)

	1911	1924	1926	1928	1931	1934
高级干部	15	16	14	14	14	14
高级公务员						
自由职业	6	9	7	6	6	6
军官	1	1	1	1	2	1
大农业主	2	2	2	2	1	1
公司领导	2	2	2	2	1	1
中等阶层	19	17	20	19	15	16
商人						
农业主	9	7	4	3	5	7
公务员	24	24	24	28	28	28
职员	3	7	6	7	6	8
下等阶层	1	2	1	2	3	3
小职员						
工人	3	2	1	2	2	4



相对于总人口的大学生人数百分比

年	%
1919-1920	0.19
1920-1921	0.20
1921-1922	0.21
1922-1923	0.21
1923-1924	0.18
1924-1925	0.15
1925-1926	0.16
1926-1927	0.16
1927-1928	0.18
1928-1929	0.19
1929-1930	0.20
1930-1931	0.20
1931-1932	0.19
1932-1933	0.18



大事年表

1917年

4月6日 美国参战。

4月11日 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与社民党（S.P.D.）从内部分裂后成立。

7月14日 贝特曼－霍尔威克政府垮台。

7月15日 根据参谋部的决定，海特林被任命为首相。他一直任职到1918年9月29日。

7月19日 根据马提亚斯·艾尔茨贝格斯的提案，国会由中央党、社民党和自由党议员投票通过和平决议。

11月7日 俄国革命。

11月8日 俄国新政府提出和平建议。

12月3日 德国和苏俄开始进行协商，以签订停火协议。

12月22日 布雷斯特－立陶宛协商。

1918年

1月8日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提纲。

1月28日－2月3日 德国全境发生罢工，争取不含土地吞并内容的和平。政府将军火工业置于军事管理之下。

2月9日 德国在布雷斯特－立陶宛提出自己的和平条件，苏俄代表团负责人托洛茨基予以拒绝。2月16日，德国再次发动进攻。

2月19日 苏俄接受德国提出的条件。21日，向德国先遣部队发动反攻。

23日停火。

3月3日 德国与苏俄达成布雷斯特-立陶宛和平协议。

3月21日-4月6日 德国在西线（阿拉斯与拉费尔之间）发动春季大攻势，进攻失败，德军死亡20多万人。

5月7日 德国与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达成和平协议。

5月27日 新一轮春季攻势，直捣马恩河，但德军阵地亦未能保住。

6月24日 高级公务员冯·屈尔曼提出有必要与协约国进行和平磋商，因而被免职。

7月18日 协约国在斯瓦松地区发动反攻。

8月8日 德国前线被亚眠东线的协约国打破。

8月20日 协约国在阿拉斯-佩罗讷-斯瓦松一线发动反攻，大获全胜。

9月28日 参谋部建议完全由社民党人士组成政府，以便与协约国进行和平磋商。

10月1日 鲁登道夫将军任参谋部部长助理，说德国在军事上已无前途。马克斯·德·巴德被请出组建新政府。他建议社民党参加进来，社民党接受了。10月3日至11月9日，新政府成立，包括社民党、进步党、天主教中央党和工会（劳动部有古斯塔夫·鲍尔）等各界人士。

10月4日 德国政府向威尔逊总统发去信息，以便在1月所列十四点的基础上进行和平磋商。

10月7日 斯巴达克斯组织的秘密大会，草拟了一份行动纲领（组成工人士兵“理事会”）。

10月9日 为挽救国有企业，鲁尔省工业家决定与社民党工人协商。

10月17日 艾伯特以社民党名义，在国会门前宣称德国走上了正轨，由于其和平改良而从一个专制国家变成了一个人民国家，与在俄国所发生的动乱不一样。

10月23日 在群众游行之后，卡尔·李卜克内希从狱中被释放。威尔逊总统要求德皇退位或无条件投降。

10月27日 鲁登道夫将军退出参谋部领导层，由格律纳尔替代。

11月3日-5日 基尔水兵起义并发生罢工运动。



11月6日 汉堡总罢工。

11月7日 慕尼黑君主政府垮台。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人库尔特·爱斯纳组建政府。

11月9日 社民党（S.P.D.）决定撤回对马克斯·德·巴德政府的信任案。它要求威廉二世退位，并认为，革命将不可避免。同日11点，威廉二世发表退位声明（事实上，威廉二世根本未接受任何要求），12点，艾伯特被任命为首相。社民党人谢德曼在国会宣布“社会”共和国成立，而李卜克内希于一场人民游行之时，在柏林皇家城堡门前宣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

11月10日 组成一个人民委员议会，包括三名社民党人和三名独立党人。工人与士兵理事会代表议会在柏林布适马戏厅成立。晚上，艾伯特与格律纳尔达成协议。威廉二世逃往荷兰。

11月11日 在康皮涅附近，马提亚斯·艾尔茨贝格尔与佛赫元帅签定停火协议。在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内部，斯巴达克斯组织建立一个独立机构，斯巴达克同盟。

11月15日 业主与工会进行协商，建立了一个业主-工人对等委员会。

11月18日 人民委员议会设立了一个“社会化”委员会。工会拒绝建立“红色保卫团”，相反，其领导人却接受了“共和国保卫团”。

11月23日-24日 两个党派宣告成立：人民党（Volkspartei）与德国民族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11月27日 参谋部呼吁招募志愿军以加强军队力量。

12月1日 爱德华·施塔特勒尔与工业家胡果·施廷内斯成立反布尔什维团（Antibolchewistische Liga）。

12月5日 “社会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大城市中贴满海报：“社会化启动了。”

12月6日 人民委员会决定，应当通过全民选举产生一个制宪议会。柏林发生游行。

12月8日 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在柏林再次组织游行。

12月10日 护卫队军团从前线退回，到达柏林。艾伯特向他们致意，并宣称：“我们很高兴欢迎你们回国，任何敌人都没能打败你们。”

12月12日 第一批独立部队建立。

12月14日 罗莎·卢森堡发表斯巴达克同盟章程。该团与独立社会民主党断绝关系。

12月16日-21日 工人与士兵理事会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489名代表，其中有289名社民党人（S.P.D.），90名独立党人（U.S.P.D.），只有10名斯巴达克同盟（Spartakusbund）成员。多数人（344人）提出进行选举产生国民议会。

12月23日 勒奎斯将军部队企图解除投靠革命派的人民海军舰队的武装。这些海军发起暴动，勒奎斯将军部队开了炮。

12月25日 柏林民众游行，占领社民党报纸《前进报》总部。

12月29日 人民委员理事会中的独立党人退出该机构。斯巴达克同盟与不来梅国际主义共产党人（Internationale Kommunisten Deutschlands）协商，以便建立一个新党。

12月30日-1月1日 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Spartakusbund）成立大会。多数代表表示反对参加旨在建立国民议会的选举。数名领导人（保罗·雷维、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希）不赞成这一立场。

1919年

1月1日 合法工作日被设为八小时。启动失业者帮助计划。月初，独立部队组织扩大。

1月4日 普鲁士省政府各部的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布莱柴特、罗森费尔德、阿道夫·霍夫曼）决定辞职。内务部部长保罗·希尔什由此得出结论说，该轮到柏林警察局局长爱米尔·爱希霍恩——他也是独立党人——辞职了。

1月5日 德国工人党（Deutsche Arbeiterpartei）成立，1919年9月16日阿道夫·希特勒加入该党。

1月10日 “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不来梅建立。后于2月4日被诺斯克部队镇压。社民党临时政府设立。



1月15日 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希被暗杀。

1月19日 选举国民议会：社民党(S.P.D.) 获163个议席，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 获22个议席，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Bayerische Volkspartei) 获9个议席，人民党(D.V.P.) 获19个议席，德国民族党(D.N.V.P.)，即阿尔弗莱德·胡根伯格党) 获44个议席。

1月20日 宪法草案发表。

2月4日 德国工业联盟(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成立。

2月6日 国民议会开幕。独立党人(U.S.P.D.) 拒绝参加政府。

2月11日 艾伯特被选为共和国临时总统。他任命党内同志菲利浦·谢德曼组建政府。

2月13日 联合政府成立(“魏玛联合党”)，包括社民党(S.P.D.)、民主党(D.D.P.) 和中央党的代表。诺斯克任军事部部长，胡果·普罗伊斯(D.D.P.) 任内务部部长，古斯塔夫·鲍尔(S.P.D.) 任劳动部部长，奥托·兰兹伯格(S.P.D.) 任最高法院院长，乌尔里希·格拉夫·布洛克多夫-兰操(无党派人士) 任外交部部长。有一个不管部部长，艾尔茨贝格尔(中央党)。

2月18日 凡尔赛和平会议开幕。

2月21日 库尔特·爱斯纳在慕尼黑被暗杀。

2月末-3月初 图林根与萨克斯两省罢工，抗议解散企业理事会。军队被派出，进攻哈勒并于2月28日将该城占领。

3月3日 柏林街头罢工与战斗：人们要求实行真正的“社会化”，并解散独立部队。3月10日，罗莎·卢森堡的同志、革命领导人雷奥·约吉舍斯被暗杀。罢工者中约有1500名死者。

4月7日 慕尼黑人民宣告成立议会共和国，接着被独立部队镇压(他们于5月1日进入慕尼黑)。

5月7日 在凡尔赛草拟的和平提案被送交德国代表团。爆发反对协议条款的抗议活动。

6月1日 马克斯·多尔腾宣告成立莱茵共和国。

6月10日-15日 社民党魏玛代表大会。根据被通过的报告的说法，权

力转移给工人阶级这一工作已经完成。自从“十一月革命”以来，德国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领导人奥托·维尔斯在讲话中，将党的战略定为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中间，走第三条道路来迈向社会主义。

6月13日 罗莎·卢森堡葬礼。

6月23日 凡尔赛所拟订的和平条件最终被国民议会接受。同月28日，签定凡尔赛和约。

6月25日 兴登堡辞去参谋部长职务。

7月12日-13日 德国民族党(D.N.V.P.)柏林第一次代表大会，全体拒绝凡尔赛和约，呼吁与政府和国际列强做斗争。

7月31日 国民议会以262票对75票通过魏玛宪法。

8月11日 艾伯特总统正式颁布宪法。该宪法定于8月14日起生效。

8月31日-9月1日 泛日耳曼团(Alldeutscher Verband)柏林代表大会。该团要求“解放”德国人民，并回到帝制时代。

10月1日 德波协议。颁布法令解散所有民兵部队，如“国民护卫队”和“共和国护卫队”。

10月3日 民主党(D.D.P.)决定再次参加政府。

10月18日-20日 人民党(D.V.P.)莱比锡代表大会。其领导人古斯塔夫·施特雷斯曼宣布，拒绝凡尔赛和约是自然而然的事，应该对政府进行坚决斗争。他表示应回到帝制时代。

10月26日 要“理事会”还是要议会制？面对这个问题，共产党内部发生分裂。

11月30日-12月6日 独立社会民主党莱比锡特别大会。草拟行动纲领，提议在“理事会”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

1920年

1月10日 凡尔赛和约生效。萨尔省行政权被交给国联托管。

1月13日 柏林发生游行，抗议企业理事会代表权被取消。游行中死亡四十多人。

1月19日 艾尔茨贝格尔-黑尔福里希诉讼案开始。在1919年7月和



8月的《十字报》上，黑尔福里希发表了一些文章，要求艾尔茨贝格尔从政府中辞职，并指责他参与磋商停火协议一事，因此是“腐蚀民族的人”。

1月24日 赔款委员会开始工作。

1月26日 艾尔茨贝格尔遭人行凶。2月4日，他却又重返职位。

2月4日 颁布关于企业理事会的法令。

2月24日 国社党(N.S.D.A.P.)成立，确立25点纲领。

2月25-26日 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除所谓“左翼宗派分子”，后者成立了一个独立党派，即工人共产党(K.A.P.D.)。

3月12日 艾尔茨贝格尔辞职。诉讼案作出不利于黑尔福里希的判决。黑尔福里希被判诽谤罪。

3月13日-17日 卡普军事政变。13日，呼吁进行总罢工。17日，政变失败。罢工一直持续到3月20日。

3月19日-4月10日 鲁尔省、萨尔省和图林根省人民起义。

3月22日 军事部部长诺斯克辞职，由盖斯勒接任。

4月2日 德国军队为恢复秩序和压制人民游行活动，违反凡尔赛和约，进入鲁尔非军事区。

4月6日 法国军队对此作出反应，占领法兰克福-缅因地区。

6月5日 冯·塞克特将军受命指挥军队。

6月6日 立法选举，“魏玛联合党”失败。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选票翻了一番，社民党(S.P.D.)则失去一半选票。人民党的选票也翻了一番，德国民族党获得30%的选票。共产党只得到2%多一点(400000张选票和两个议员席位)。

7月5日-16日 斯帕大会。

7月19日-8月7日 共产国际提出加入共产党的21项条件。独立党在哈勒召开特别大会(10月12日-17日)，关于是否加入该组织问题，导致一次分裂：多数人在柏林12月4日至7日所举行的合并大会上，加入共产党(K.P.D.)，组成统一共产党(V.K.P.D.)。

1920年，恩斯特·容格尔出版《钢铁暴风雨》一书。罗伯特·维讷的电影《卡利噶里医生诊所》上映。爵士乐进入德国。绘画方面，新客观性与真

实主义不久取代了表现主义。

1921年

3月1日-3月7日 伦敦赔款大会。德国对所提措施表示出敌对情绪。

3月8日 法国军队为抗议德国的拒绝行为，占领鲁尔数城。

5月5日 伦敦关于赔款问题的最后通牒。

5月10日 维尔特政府接受赔款条件，偿付第一笔赔款。

8月22日-26日 统一共产党耶拿代表大会。宣称资本主义的崩溃不可避免——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无产阶级专政。

8月25日 德美签订一项和平协议。

8月26日 执政官组织命人暗杀了艾尔茨贝格尔。

8月29日 根据宪法第48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煽动暴力的报刊或出版物被查禁。巴伐利亚省无视该法令，拒绝查禁纳粹报纸《人民观察家》。

10月18日-24日 社民党(S.P.D.) 戈尔利兹代表大会。根据其新纲领，它将致力于保卫共和制度，为改善社会状况而斗争。

1921年，乔治·格罗茨及其出版商维兰德·海尔茨费尔德被送上法庭，罪名是肆意诽谤教会，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保罗·辛德米特根据奥斯卡·科科施卡的剧作写了一部歌剧《谋杀犯，女人们的希望》，弗里茨·朗拍摄了电影《可恶的死亡》（又译《三束光》）。

1922年

1月6日-13日 夏纳赔款大会。

1月14日-16日 天主教中央党柏林代表大会。

1月31日 瓦尔特·拉特瑙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

4月16日 德苏拉帕洛协议。

4月20日-5月19日 日内瓦国际经济会议。

6月24日 瓦尔特·拉特瑙被执政官组织成员暗杀。

6月26日 颁布共和国保护令。禁止违反共和国法律的会议与游行。

6月29日 颁布新法令。6月底-7月初，钢盔组织与泛日耳曼团被查



禁。

8月 通货膨胀开始，势如奔马。

8月27日-30日 德国天主教慕尼黑代表大会。孔拉德·阿德瑙尔确保其主席位置。浮尔哈伯尔主教认为，煽动革命应该被视为叛国罪行。天主教拒绝一派制。

9月24日 社民党(S.P.D.)与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重新统一。

10月9日-10日 民主党(D.D.P.)艾尔伯费尔德代表大会。

11月16日 艾伯特要求威廉·库诺组建新政府。

11月30日 慕尼黑纳粹游行。

1922年，布莱希特获克莱斯特奖，弗里茨·朗导演电影《马布塞博士的遗嘱》，穆尔诺导演电影《诺斯费拉图》。首次苏联艺术家展览在柏林迪门展览厅举行，达达代表大会在魏玛召开。

1923年

1月11日 法比两国军队占领鲁尔省。

1月19日 德国政府决定在鲁尔省采取消极抵抗政策。

1月21日 共产党(K.P.D.)发出呼吁，要与鲁尔省的普安卡雷政策和柏林库诺首相作斗争。

1月28日-2月1日 共产党莱比锡代表大会，要求与左翼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建立“工人统一战线”。

5月12日 内务部部长塞福林决定查禁共产党准军事组织，无产阶级百人团。

8月10日 颁布总统令，保护公众秩序。

9月2日 纽伦堡爱国组织日，150000人参加游行，猛烈攻击政府政策。

9月26日 人民党领导人、新政府主持者古斯塔夫·施特雷斯曼决定结束在鲁尔省的消极抵抗。

10月21日-11月 莱茵省分裂主义分子预谋政变。

11月8日 希特勒与鲁登道夫在慕尼黑策划政变。

11月30日 组成新的政府内阁，威廉·马克斯任首相。

10月-11月 图林根省和汉堡发生人民起义。

1923年，亨利·福特自传德译本出版，同年出版的还有莱纳尔·玛丽亚·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与《十四行诗致俄耳甫斯》，托马斯·曼的《菲利克斯·克鲁尔骑士的忏悔》，“包豪斯学校”合作者们的一部文集。

1924年

2月22日 国旗党在马德格堡成立。

2月26日-4月1日 希特勒在慕尼黑接受审讯。除希特勒外，被告还有：艾里希·鲁登道夫、恩斯特·颇纳尔、威廉·弗里克、恩斯特·略姆。

5月4日 立法选举。

6月11日-14日 社民党柏林代表大会。其领导人之一奥托·维尔斯宣布，为保卫共和国，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反共产党，也反纳粹。

8月15日-17日 国社党在魏玛举行国民公会。鲁登道夫在那里证明希特勒有政变企图。

9月1日 道威斯计划生效。

9月15日-18日 保罗·辛德米特与海尔曼·谢尔辛在法兰克福组织活动庆祝勋伯格50岁生日。

10月11日 升值马克开始流通（1美元 = 4.198 马克）。

10月20日 国会解散。

10月29日 阿尔弗莱德·胡根伯格的德国民族党（D.N.V.P.）提出回到君主制度之下，并与“犹太统治现象”作斗争。

12月7日 新一轮立法选举。

12月9日-12月23日 针对恶意中伤艾伯特总统者之一、记者洛特哈特的诉讼案在马格德堡进行。此人指责艾伯特在战争最后几年中对祖国犯下罪行。他被判了刑。

12月31日 巴尔梅兄弟被捕：由于其商业集团与社民党影响极大的政治要人间存在着关系，因而制造出丑闻。

1924年的克莱斯特奖被颁给恩斯特·巴尔拉赫。托马斯·曼出版了其小



说《魔山》。《工人画报》第一期于11月开始发售。

1925年

1月15日 组建新政府，路德任首相。

1月底 钢盔团、德国青年队与各民族主义职业协会创立了一个全国协调委员会。

2月21日-22日 国旗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它宣布拥有3百万名成员。

2月28日 共和国艾伯特总统逝世，享年54岁。

3月9日-10日 国会辩论：总统选举定于3月29日举行。

3月29日 总统选举结果揭晓，必须进行第二轮选举。

4月11日 德国民族党(D.N.V.P.)推出兴登堡元帅参加竞选。

4月26日 新一轮总统选举，兴登堡获胜。

5月12日 共和国新总统正式就职。

7月21日 法国军队驱散鲁尔省居民。

8月26日 兴登堡决定，一个于1921年8月被查禁的日用军服或准军服口岸重新被容许生产。

9月10日 被判诽谤艾伯特的记者洛特哈特被赦免。

10月5日-16日 罗卡尔诺大会，最后签订了一份“12·1”协议。

1925年出版了卡夫卡的《诉讼》，里翁·福伊希特万格的《犹太人徐斯》。曼海姆新客观性作品展举办。查尔斯顿舞流行。艾里希·门德尔松在波茨坦建造爱因斯坦塔。

1926年

5月5日 颁布法令，决定可将旧帝制时期的国旗用于外交公派事宜，也就是说领事与外交机构也可使用，而不仅仅只作商用。

5月11日-12日 众议院就该旗帜使用问题展开辩论。根据社民党议员布莱柴德的观点，使用帝制时的黑、红、金三色旗是对共和国的损害。

5月12日 在这场关于旗帜的辩论之后，政府辞职。

5月17日 组建新的政府内阁，威廉·马克斯任首相。

7月4日 国社党魏玛第一次代表大会。

8月1日 汉堡殖民周开始。

9月10日 德国进入国联。

9月17日 施特雷斯曼与布里昂德在托伊利会谈。

10月6日 塞克特离开军队指挥职位。9月，威廉二世的长子被揭露身穿军服参加军事训练。在报界的一片骂声中，军事部部长盖斯勒要求冯·塞克特辞职。

1926年，里尔克与《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总编雅科布松去世。普鲁士艺术科学院创立文学部，主席是海因里希·曼(他一直任至1933年初)。卡尔·爱因斯坦出版《20世纪艺术》。特拉芬，笔名为雷特·马鲁特，因一部小说《死人船》而出名。卡夫卡《城堡》出版。《工人画报》(A.I.Z.)成为周刊。音乐方面，有保罗·辛德米特的歌剧《卡迪拉克》和克雷内克根据科科施卡一本小册子所作的《俄耳甫斯与欧里底斯》。

1927年

1月10日 兴登堡请库尔提乌斯(D.V.P.)组建新政府，但其请求失败。于是由威廉·马克斯第四次重新组建内阁，并于1月29日正式上任。

3月2日-7日 共产党埃森代表大会。

5月4日-23日 日内瓦国际经济大会。

5月22日-27日 社民党基尔代表大会。

7月24日-25日 国旗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建议同时与共产党和纳粹进行斗争。

8月22日 萨科与梵载蒂在美国被处绞刑，欧洲发生抗议示威活动。

9月18日 塔嫩堡纪念碑揭幕仪式。兴登堡元帅发表讲话，否认德国应对1914-1918年的战争负责。

1927年，戈特弗里特·本恩与贝尔特·布莱希特出版了一些诗集。阿诺德·茨威格出版《警察格里沙的案件》。鲁特曼拍摄了电影《柏林，大城市交响乐》。皮斯卡托导演了一部戏作，即恩斯特·托勒的《嘿！我们都活着》。抽象画在欧洲流行，曼海姆举行了一场展览会。慢步舞流行。



1928年

3月31日 国会解散。

5月20日 立法选举。国社党有12名议员。

6月12日 威廉·马克斯内阁辞职。

6月29日 在社民党人海尔曼·缪勒的主持下组建联合政府。

8月10日 政府决定建造一艘装甲舰。

8月18日 社民党决定，尽管他们不同意建造装甲舰，但其部长们仍留在政府中。

8月27日 布里昂德-凯洛格契约。

9月5日 共产党要求就装甲舰问题进行全民公决。

10月19日 共产党作家成立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团。不久拥有了一份机关刊物《向左转》。

10月21日 阿尔弗莱德·胡根伯格被德国民族党推举为主席。

1928年，布莱希特与库尔特·威尔的《四分钱歌剧》举行了首演式（8月，柏林）。路德维希·雷恩的纪实小说《战争》与安娜·塞格尔斯的《圣芭芭拉渔民暴动》——获克莱斯特奖——出版。1月，革命造型艺术家协会，即“阿索”协会（A.R.K.B.D.）在柏林成立。

1929年

5月1日 社民党警察局局长阙尔吉贝尔下令镇压被明令禁止的示威活动，柏林死31人。这一周被称为五月流血周。

6月7日 杨格计划在巴黎签定。

7月5日 在胡根伯格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反对杨格计划的民族主义委员会。

7月31日 海牙大会，德国讨论并正式接受杨格计划。

10月3日 古斯塔夫·施特雷斯曼逝世。

10月17日 施克拉雷克兄弟被捕，这是因其丝织公司与柏林市政府间存在关系而引起的丑闻。右翼势力以此事为由将共和体制形容为“腐败”，并

加以反对。

11月25日 民族主义阵线要求就杨格计划组织全民公决，得到10.06%的同意票，也就是说多于10%，该数字对于这样一次全民公决来说很必要。

12月22日 所举行的全民公决只得到580万张选票反对杨格计划。

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托马斯·曼。自然主义作家阿尔诺·霍尔茨、画家海因里希·齐勒逝世。阿尔弗莱德·德布林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艾尔文·皮斯卡托的《政治戏剧》出版。柏林第一次进行电视节目发送。

1930年

1月23日 一位国社党人威廉·弗里克成为图林根省右翼势力联合政府中的内务部部长。

3月29日 缪勒政府由于联合政府内部在失业保险问题上不和而垮台后，海因里希·布吕宁（中央党）被召组建新政府。

5月11日 在威廉·弗里克所推荐的种族主义“祈祷书”问题上，图林根省与中央政府发生冲突。

5月15日 为东部农业主提供财政资助。

5月17日 杨格计划最终被同意。

6月30日 法国军队在莱茵省的驱散居民行动结束。

7月27日 民主党（D.D.P.）与阿尔图尔·马劳恩的德国青年队领导人联盟，成立国家党（Staatspartei）。

8月24日 共产党发出一份呼吁纲领：与“德国法西斯”作斗争，他们通过“狂妄的蛊惑、刺耳且极端的口号，将小资产阶级、失去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大学生、职员、农民，以及落后反动的工人团体等大量阶层人士吸引到身边来”。

9月14日 立法选举，国社党在国会获得107个席位。

10月5日 钢盔团科布伦茨代表大会：强烈要求在普鲁士打倒“贫瘠的马克思主义专政”，也就是说取代该地区的社民党政府。

12月11日 由于某些老兵协会——其中有钢盔团——的抗议，根据艾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小说拍摄的电影《西线无战事》被禁演。相反，与钢



盗团有关的一部电影于12月8日被解禁。

1930年，出版了罗伯特·穆西尔的《毫无优点的人》，汉斯·法拉达的《农民、头目与炸弹》，路德维希·雷恩的《战后》。当年的电影还有约瑟夫·冯·施特恩伯格的《蓝色天使》，由马琳·迪特里希主演，以及米勒斯托纳的《西线无战事》。在图林根，威廉·弗里克命人将魏玛博物馆中的现代作品清空，并摧毁了奥斯卡·施莱默的壁画。

1931年

1月 《工人画报》(A.I.Z.) 刊登了65名被捕记者的照片。

1月5日 银行家沙赫特、工业家蒂森与阿道夫·希特勒会面。沙赫特宣称他将对布吕宁首相进行干预，以便纳粹尽早加入政府。

2月19日 帕布斯特的电影《四毛钱歌剧》首映式。

2月25日 由共产党首创，产生世界失业日。

3月23日 柏林国际反法西斯大会。

3月28日 共和国总统颁布政令，中止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

4月1日 纳粹党人威廉·弗里克从图林根政府中辞职。

5月22日 共产党发布一项经济纲领，以便消除失业（将每周工作时间减少为40小时，对财产征税，减少军事开支以便创造就业机会等等）。

5月31日-6月5日 社民党莱比锡代表大会。大会认为，布吕宁政府的独裁措施不算太坏，因为在大会看来，这是在布吕宁政府和法西斯专制之间所能作的惟一选择。为消除失业，大会也要求将整个就业人口工作时间减少为每周40小时。

6月11日 共产党向社民党提议对布吕宁政府采取共同行动。社民党拒绝。

10月2日 社民党内部发生分裂后，成立社工党 (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10月10日 布吕宁第二届内阁。

10月11日 哈茨堡阵线成立，包括钢盔团、德国民族党 (D.N.V.P.) 和纳粹党。

1931年，阿尔图尔·施尼茨勒和弗里德里希·衮道尔夫逝世。出版海尔曼·布罗赫的《梦游的人们》、莱翁哈特·弗兰克的《三百万中的三个》和艾里希·凯斯特纳的《法比安》。

1932年

2月22日 哈茨堡阵线各组织间旨在推举总统选举共同候选人的协商失败。

2月26日 布伦施威克联合政府任命希特勒为顾问，希特勒自然因此而获得德国国籍。

2月27日 社民党决定在总统选举中不推举候选人。它呼吁投兴登堡的票，以打败希特勒。

3月13日 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4月4日 兴登堡再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5月30日 布吕宁内阁辞职。

5月31日 冯·巴本被兴登堡任命为首相。

7月17日 阿尔托纳（汉堡）流血星期天：纳粹党与反法西斯行动组织成员发生街头战。

7月18日 全国禁止任何游行示威活动。

7月20日 冯·巴本首相在普鲁士省自任国务委员，并将普鲁士政府内阁成员解职。颁布法令，在柏林和布兰德堡地区实行特殊状态。

8月10日-12日 冯·巴本与要求担任首相的希特勒达成协议。兴登堡只同意让他担任副首相，希特勒拒绝。

8月30日 纳粹党人海尔曼·戈林被选为众议院议长。

9月12日 国会投票通过对冯·巴本的不信任案。兴登堡解散国会。

11月6日 新的立法选举。国社党失去34个议席。

11月17日 冯·巴本内阁辞职。

11月19日 希特勒得到兴登堡的接见。

12月2日 冯·施莱歇尔被任命为首相。

12月9日 国社党发生危机，格雷高尔·施特拉塞尔被解除一切职务。



1932年，施拉坦·杜多夫拍摄了《库勒·万普兵营》，布莱希特改编了高尔基的《母亲》，勋伯格为《摩西与亚伦》谱曲。德绍“包豪斯学校”不得不关门。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维尔纳·海森堡。

1933年

- 1月4日 冯·巴本与希特勒在银行家施罗德科隆家中会谈。
- 1月7日 冯·巴本在多特蒙德会见工业家施普林霍恩与福格勒尔。
- 1月28日 施莱歇尔政府垮台。
- 1月30日 希特勒组建新政府。
- 3月24日 希特勒被授予全权，宪法在事实上成为一纸空文。

人物简介

Becher, Johannes R. 贝歇尔, 1891年生于慕尼黑。1918年加入斯巴达克同盟, 后加入共产党。表现主义诗人之一, 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30年代, 甚至1945年后一直投身于德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中, 故而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著有一部重要的自传体小说《永别》(Abschied)。1958年逝世。

Benn, Gottfried 本恩, 生于1886年。父亲为牧师。曾为表现主义者, 后转为虚无主义者。1933年亲纳粹, 随即因其诗而被纳粹抛弃, 被视做所谓“腐败”艺术代表人。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48年到1960年间最受赞赏的诗人之一。1956年逝世。

Brecht, Bert 布莱希特, 1898年生于维也纳。魏玛共和国时期著有大量戏剧作品, 其中有1926年的《为人而人》, 1930年的《决定》, 1932年的《母亲》等。1933年2月移居国外。1947年回到欧洲。1956年逝世于柏林。

Broch, Hermann 布罗赫, 1886年生于维也纳。父亲为工业家。1909年任父亲工厂的厂长。后为文学而放弃工厂。《梦游的人们》三卷发表于1931年—1932年。1938年移居国外。1951年逝世于美国。

Bronnen, Arnolt 布洛嫩, 1895年生于维也纳。一战后成为布莱希特的朋友。与戈培尔亦有良好关系, 接近纳粹。战争后期转变立场, 到奥地利参加抵抗运动。著有纪实性小说、大量戏剧作品和一部自传, 也发表了一些关于布莱希特的有趣回忆。1959年逝世。

Brüning, Heinrich 布吕宁, 生于1885年。参加过一战。1920年为基督教工会领导人之一。1924年起为中央党议员。1930年任总理。1934年移居国外。1970年逝世。

Cuno, Wilhelm 库诺，生于1876年。1918年为“哈帕克”公司总经理。德国政府赔款问题经济专家。1922年任总理，1923年辞职。1933年逝世。

Curtius, Julius 库尔提乌斯，生于1877年。律师。1920年到1932年为人民党议员。曾任经济部部长。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死后任外交部长。1931年辞职。1948年逝世。

Darré, Walter 达雷，生于1895年。纳粹党负责农业问题的领导之一。第三帝国时期任食品与农业部部长。1953年逝世。

Döblin, Alfred 德布林，生于1878年。曾学医，后在柏林行医。著有小说和小说，其中有1929年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1933年移居国外。1945年回到德国。1957年逝世。

Fallada, Hans 法拉达（笔名鲁道夫·迪岑），1893年生于格莱夫斯瓦尔德。从事过多种职业，后从事新闻工作，著有大量小说。1947年逝于柏林。

Frick, Wilhelm 弗里克，生于1877年。1924年起为纳粹党议员。第三帝国时期任内务部部长。战后被纽伦堡国际法庭判为死刑。

Gábor, Andor 加波尔，匈牙利人，生于1884年。移居法国，布达佩斯公社失败后迁往德国。在工人文学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记者，作家。1953年逝世。

Ganghofer, Ludwig 冈格霍菲尔，生于1855年。1880年起因情感小说而出名。威廉二世所钟爱的作家。1920年逝世。

Glaeser, Ernst 格莱塞，生于1902年。记者。1930年著有《和平》。1963年逝于美因兹。

Goebbels, Joseph 戈培尔，1897年生于莱茵。受过高等教育。由弗里德里希·贡道夫指导其博士论文。有文学抱负。曾在纳粹刊物中任记者。1928年起为纳粹党议员。第三帝国时期任宣传部部长。1945年5月1日全家自杀。

Goering, Hermann 戈林，生于1893年。一战时为飞行员。1922年加入国社党。1928年当选为议员。后被判死刑，1946年自杀。

Graf, Oskar Maria 格拉夫，生于1894年。“巴伐利亚”作家。著有大量小说和散文。1933年移居国外。1967年逝世。

Grimm, Hans 格里姆，生于1875年。1916年入伍。1926年以小说《没有空间的人民》（Volk ohne Raum）而闻名。支持纳粹，1934年后立场有些



模糊。1945年后直至1959年逝世，一直是努力为纳粹领导人翻案、为他们歌功颂德的人之一。

Groener, Wilhelm 格律纳尔，生于1867年。1899年任上尉。参加过一战。1918年与艾伯特合作。1920年到1923年任交通部部长，1928年任军事部部长，1931年还任过内务部部长。1932年5月13日辞职。1939年逝世。

Grosz, George 格罗茨，生于1893年。著名画家。参加过达达运动。1932年移居美国。1959年逝于柏林。

Hasenclever, Walter 哈森克莱弗，生于1890年。最著名的表现主义诗人与戏剧家之一。1940年移居法国后逝世。

Heartfield, John 哈特菲尔德，生于1891年。真名为海尔穆特·海尔茨菲尔德 (Hellmut Herzfelde)，出版商维兰特·海尔茨菲尔德的兄弟。参加过达达运动。为皮斯卡托戏剧撰过稿。1933年移居国外。政治摄影剪辑最卓越的创作者之一。1950年回到德国（东柏林）。1968年逝世。

Heim, Georg 海姆，生于1865年。巴伐利亚政治家。先为中央党农民部门成员，1918年创建巴伐利亚人民党 (B.V.P.)。1920年到1924年任议员。1938年逝世。

Helfferich, Karl 海尔费里希，生于1872年。法学家。1915年任国务秘书。战后从事外交活动。战败后为民族主义者。德国民族党 (D.N.V.P.) 成员，1920年到1924年为议员，直至逝世。

Hertling, Georg 海尔特林，生于1843年。1896年到1923年为中央党巴伐利亚支部党员和议员。同期任巴伐利亚政府首脑。支持威廉二世的帝国主义政策。从1917年11月到1918年9月任普鲁士政府首脑。1919年逝世。

Herzfelde, Wieland 海尔茨菲尔德，生于1896年。诗人，出版商。1933年移居国外。1948年回到（东）柏林。

Von Hindenburg, Paul 冯·兴登堡，生于1847年。军官。1916年任参谋部部长。1925年至1934年，任共和国总统，1934年逝世。

Von Hindenburg, Oskar 冯·兴登堡，生于1883年。保罗·冯·兴登堡的儿子。1929年到1932年间产生过重要的政治影响。

Hitler, Adolf 希特勒，1889年生于上奥地利。曾努力想进入维也纳美术

科学院未果，失去社会地位。从1914年前起，接受维也纳右翼阶层的反犹太论。1914年参军。战后成为政治鼓动者。后与国社党共生息。1932年获德国国籍。1933年1月30日被兴登堡召任为总理。1945年4月30日在柏林自杀。

Jahn, Friedrich 雅恩，生于1778年。在反拿破仑占领军的解放战争中，曾是德国“民族主义”创始人之一。还创建了一些健身会所。1852年逝世。

Jünger, Ernst 容格尔，1885年生于海德堡。1914年参军。在军队中一直待到1923年。民族主义与极右翼出版物的出版商。以其关于魏玛共和国的作品而积极参与反民主活动。著有多种书籍。有一个兄弟也是作家与民族主义者，即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

Kállai, Ernő 卡莱，生于1890年。艺术评论家。曾在“包豪斯学校”授课。1954年逝世。

Kirdorf, Emil 奇尔多夫，生于1847年。工业家（1918年曾与西门子和施廷内斯联手）。与蒂森一起，曾是国社党的资助者之一。1938年逝世。

Legien, Carl 雷吉恩，生于1861年。工联主义者，社民党控制下的工会领导人之一。曾于1920年为反对卡普政变而决定进行总罢工。同年逝世。

Lissitzky, El (Eliezer) 李西茨基，俄国人，1890年生于斯莫伦斯克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长期居住。建筑家。他是第一个让德国人了解建筑主义理论的人。曾在柏林与密斯·梵·德尔·洛厄一起工作，也与荷兰人泰奥·梵·德斯堡合作过。1928年回到苏联。

Lasker-Schüler, Else 拉斯克尔-徐勒尔，生于1869年。浪荡文人。1933年移居瑞士，后迁往巴勒斯坦，1945年在那里逝世。表现主义最著名的诗人之一。

Leonhard, Rudolf 莱翁哈特，生于1889年。学习法律。1927年起在巴黎生活。著有诗歌与戏剧。从事过新闻工作。1953年逝于柏林。

Ludendorff, Erich 鲁登道夫，生于1865年。军官。1916年起在参谋部任兴登堡元帅的助手，对所作的所有决定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战后进行极右活动。1925年作为国社党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1937年逝世。

Mann, Heinrich 曼，1871年生于吕贝克。兄为托马斯·曼。和他一样，先受民族主义影响，后热烈拥护法国大革命思想。著有大量小说，其中有1905



年的《垃圾教授》(Professeur Unrat, 或者, 鉴于 Unrat 一词是 Rat “建议”的反义词, 也译作《白痴教授》), 1909 年的《小城》, 1918 年的《臣仆》等。1933 年移居国外, 先是住在法国, 后迁往美国。1950 年逝世于加利福尼亚。

Mann, Thomas 曼, 1871 年生于吕贝克。至 1920 年为止, 一直颇受民族主义影响, 后支持民主。1901 年著有《布登勃洛克一家》, 1924 年著有《魔山》, 1947 年著有《浮士德博士》。1938 年移居美国。1952 年在瑞士定居。1955 年逝世。

Mann, Klaus 曼, 1906 年生于慕尼黑。托马斯·曼之子。也是作家。1935 年著的《美菲斯特》, 由阿里亚纳·穆努赫金改编为戏剧。1933 年移居国外。1942 年加入美国国籍。1949 年在戛纳自杀。

Marc, Franz 马克, 生于 1880 年。画家, 曾与康定斯基在慕尼黑创办“青骑士社”。1916 年逝世于凡尔登。

Marx, Wilhelm 马克斯, 生于 1863 年。中央党议员。数任总理。1946 年逝世。

Max de Bade 马克斯·德·巴德(王子), 生于 1867 年。1918 年 10 月任总理。11 月 9 日, 他违背威廉二世的意愿, 宣布皇帝退位, 将总理职位移交给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929 年逝世。

Moholy-Nagy, Lazlo 莫霍利-纳吉, 匈牙利人, 生于 1895 年。画家、建筑家、摄影家。1920 年移居柏林, 在“包豪斯学校”授课。建筑主义者。后移居美国。1946 年逝世。

Münzenberg, Willi 闵岑伯格, 1889 年生于艾尔福特。曾是一家制鞋厂的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居于瑞士。1920 年加入共产党, 后担任高级职务。1924 年设立了一个极左报刊财团(报纸、出版社), 同年当选为议员。1933 年移居瑞士, 后迁往法国, 在报刊和出版界继续其活动(创办反法西斯报纸等)。在莫斯科首批大型诉讼案后, 离开共产党。1937 年被开除出党。1940 年在格勒诺布尔被人发现神秘死亡: 某些人猜测是被斯大林的警察清洗掉了。

Musil, Robert 穆西尔, 1880 年生于奥地利克拉根福特。学习工程。后学习哲学。1922 年起以写作为生。著有《学生图尔莱斯的焦虑》(1906 年)以及短篇小说、戏剧, 尤其有未完成的小说概论《无优点的人》(1930-1943)。

1931年到1933年主要生活在柏林，后回到奥地利。1938年移居瑞士。1942年逝于日内瓦。

Noske, Gustav 诺斯克，生于1868年。社民党中的军国主义者，在该党刊物中从事新闻工作。从1919年2月到1920年3月，任军事部部长。1920年到1933年，任汉诺威省总特派员。1946年逝世。

Noth, Ernst Erich 诺特（笔名保罗·克兰茨），1909年生于柏林。积极参与了一次青少年事件——该事件导致其中一人死亡。参与了魏玛共和国时期著名的诉讼案。后以保罗·克兰茨的名字接受再教育，学习多门高等教育课程以及新闻。1933年移居法国，成为加布里埃尔·马赛尔的朋友，并为大量报纸撰稿。后移居美国，任大学教授。1963年回到欧洲，定居于联邦德国。著有大量书籍，其中有数部小说。

Von Papen, Franz 冯·巴本，生于1879年。军官，后从事外交活动。1921年到1932年任普鲁士迪埃特中央党议员。1932年任总理。第三帝国时期从事外交活动（任大使）。1969年逝世。

Piscator, Erwin 皮斯卡托，生于1893年。从事戏剧工作，赞成“政治戏剧”。1934年移居国外。1951年回到德国（西柏林）。1966年逝世。

Preuss, Hugo 普罗伊斯，生于1860年。法学家，柏林教授。战后为民主党（D.D.P.）成员。魏玛宪法主要制订者之一。1919年2月至6月任内务部部长。1925年逝世。

Rathenau, Walther 拉特瑙，生于1867年。电力总公司（A.E.G.）总裁。1918年赞成将战争进行到底。1920年任“社会化”委员会成员。民主党（D.D.P.）领导人之一。1921年任重建部部长，1922年任外交部长。参加了热那亚会议，与苏联签定拉帕罗协议。另外他也是作家、哲学家。1922年被暗杀。

Roem, Ernst 略姆，生于1887年。一战期间为军官。希特勒最忠实的拥护者之一。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剑之夜事件中被希特勒清洗。

Roth, Joseph 洛特，生于1884年。1921年起在柏林从事新闻工作。奥匈帝国的小说家。著有《拉德茨基行军》（1932）。1933年起在巴黎生活。1939年逝世。

Von Salomon, Ernst 冯·萨罗蒙，1902年生于基尔。出身军官家庭。参



加过卡普政变，是独立部队的成员，积极参与暗杀拉特瑙。其大部分书籍（《军校学生》、《被天主弃绝的人》、《城市》）为自传。1972年逝世。

Von Schleicher, Kurt 冯·施莱歇尔，生于1882年。军官。1918年-1919年是威廉·格律纳尔参谋部中的成员。曾于1932年6月任军事部部长。1932年12月到1933年1月任总理。是希特勒所策划的1934年清理行为的受害者。

Schwitters, Kurt 施威特斯，1887年生于汉诺威。1919年首次举办展览。曾创办了一家达达主义倾向的杂志，后为建筑主义杂志，即《梅尔茨杂志》。1937年移居挪威，后迁往英国，1948年在那里逝世。

Seghers, Anna 塞格尔斯，1900年生于美因兹。真名为内蒂·莱凌（Netty Reiling）。嫁给一位匈牙利裔艺术史专家，拉茨洛·拉德万伊，拉德万伊以约翰·洛伦兹·施米特为名，领导过共产党工人大学“筛眼”学校。她于1928年加入共产党。著有大量小说和短篇小说。1933年移居国外。1947年回到德国（东柏林）。

Stehr, Hermann 施忒尔，1864年生于西里西亚。小学教师，后以写作为生。德国本土著名作家的代表人物。著有数部小说，获得成功。1940年逝世。

Thälmann, Ernst 台尔曼，生于1886年。战前为社民党党员。1920年加入共产党。做过汉诺威码头工人。1924年领导前线红色战士团（Roter Frontkämpferbund）。1924年任共产党主席。1933年被关进集中营。1944年在布横瓦尔德被暗杀。

Thyssen, Fritz 蒂森，生于1873年。工业家。1919年到1932年为德国民族党成员，后资助国社党，并加入该党。与希特勒发生不和后，于1939年移居国外。1951年逝世。

Toller, Ernst 托勒尔，生于1893年。1919年参加了巴伐利亚革命，被判五年监禁。有诗作、戏剧、新闻作品。1933年移居国外。1939年5月在纽约绝望自杀。

Trenker, Luis 特伦克尔，1892年生于蒂罗尔。1931年起从事电影活动（山区题材电影）。著有山区冒险小说。在第三帝国和1945年后的联邦德国获得很大成功。

Tucholsky, Kurt 图柯尔斯基，1890年生于柏林。以其讽刺文章和歌词而

出名。《世界舞台》的固定撰稿人。1924年起在巴黎定居，后于1929年迁往瑞典，1935年在那里自杀。

Weber, Alfred 韦伯，生于1868年。马克斯·韦伯的堂弟，海德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文化社会学”理论家。1958年逝世。

Weber, Max 韦伯，生于1864年。经济学教授，社会学家。与胡果·普罗伊斯教授一起，是魏玛宪法制订者之一。1920年逝世。

Weinert, Erich 魏奈尔特，1890年生于马格德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夜总会里从事歌曲创作活动。写有诗歌与歌曲。1933年移居国外。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后移居苏联。1946年回到德国（东柏林）。1953年逝世。

Wiechert, Ernst 维谢尔特，1887年生于东普鲁士。1933年前一直任中学教师。著有数部畅销小说（《杰罗明纳家的孩子们》、《米萨西纳的任命》、《被选中的孩子》）。1950年逝世。

Zweig, Stefan 茨威格，1881年生于维也纳。以其历史传记而出名，著有大量短篇小说。1938年移居国外。1941年在巴西自杀。

Zweig, Arnold 茨威格，生于1887年（与施蒂凡·茨威格无任何亲属关系）。1906年，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先对犹太复国主义和精神分析感兴趣。1921年著有一部和平主义小说，《警察格里沙的案件》。1933年移居国外。1948年回到（东）柏林。1968年逝世。



译后记

译完此书，算是松了一口气；并非因为译事沉重，而是因为一直被这段历史压迫着呼吸。

本书讲述的是德国1918年到1933年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日常生活，作者通过对当时日常生活各方面的描述，意图指出魏玛共和国产生的历史，尤其是社会根源，并指出它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法西斯独裁政治的。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会空穴来风、无根无由，它如同点滴细水，汇聚成流，仿佛于不经意中，竟成江海澎湃之势，无论是福是祸，终究一发而不可收。

自从俾斯麦统一德国以来，民族主义情绪便在德国人民心中留下根蒂。至于大战炮火纷飞，其中的全民热情不难窥见。失败，本来有机会让这讲求理性的民族惊然反省，可是凡尔赛和约的到来再次逼得德国人民愤然重归民族主义。魏玛共和国的确是诞生了，它本意乃要在德意志建立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制度。然而，贫穷、饥饿、失业、通货膨胀，这样的日常生活让人如何享受民主甘果？理性抵挡不住在生存困境中的挣扎，而全社会共同挣扎更只会给人以混乱、动乱之生存困境。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人们呼吁秩序，渴望某种东西、或者某个人能弭除分崩离析之局面，以一统之力，给人们重新带来宁静、稳定和繁荣。这个人真的出现了，人们于是选中了他，至少是按照“民主”程序，而由大多数人选中了他；他确实能弭除分崩离析之局面，也确实有一统之力，可他并未带来和平，而是将德国人民带向一场新的战争，一场更为惨烈的战争……

人类历史有其悲剧性，但最怕的，一是历史的反复，纵然时移境迁；二怕历史的“偶然”相似，虽非同宗同族。重温历史，只求时刻不忘反躬自省；

能避免这两点，日后回首，方能欣然曰“幸甚幸甚”。

本书作者里昂耐尔·理查尔(Lionel Richard)是比较文学领域的退休教授，主要研究德国(德国表现主义以及纳粹德国)，撰写过《纳粹主义与文化》、《希特勒从何而来?》等著作。在这本书里，作者风格以客观为主，也不失主观评论与感叹，更时有诙谐之笔；而在这种看似冷峻的幽默之中，令人不禁于历史辛酸处扼腕唏嘘。此外，本书资料详备，注解清楚，因此译者照原样复制其表格材料，更且未加一处译注，是恐有添足之嫌。综合起来说，此书既适合一般读者休闲获知，也适合专业学者参照思考，实为不可多得的好书。

一个法国人研究德国历史，并用法语撰写一部有关德国某段历史时期的著作，这再正常不过。可这苦了翻译者。我学的是法语，可对德国历史知之甚少，因此翻译起来困难重重：

困难一，人名、地名的译法。我以前学过一点德语，现在大多也只记得如何发音。因此遇上人名或地名，首先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上的译名为参照，查之不获则以德语界通行译名为依据，再不获则按德语发音翻译(如果我发音还准的话)。

困难二，组织、事件的名称。这些名称多有固定译法，若翻阅资料也难查到，则一般用直译。

困难三，德国历史、文化知识。我观在所知仅限于中学历史课上所学(幸亏还记得一些)。按理应多请教界内人士，怎奈教务不少，脱身不得，局促之余，又疏于怠惰，只好在译后请方家指正了。

当然，法语水平有限，译文词句欠达，又得请法语界和中文界的同仁贤达赐教。

最后，还想借此机会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双语词典中心的黄芳，感谢她在精神上所给予我的支持与鼓励，并且不厌其烦地商榷法语、汉语的理解与措辞。另外要感谢武汉大学德语系的高中杭学兄，有劳他热心帮助查阅德语资料。

李 末

2002年12月于湖北大学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 (1 9 1 9 ~ 1 9 3 3)

作者 =

页数 = 2 5 8

S S 号 = 1 1 3 7 1 5 6 4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